

寻找

储安平



邓加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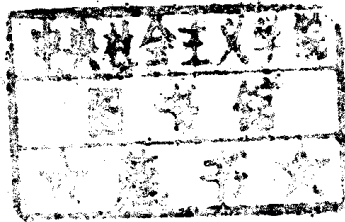
93242

300
400



200200157

寻找 储安平



邓加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储安平/邓加荣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

ISBN 7-5302-0398-3

I. 寻… II. 邓…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942 号

寻找储安平

XUN ZHAO CHU AN PING

邓加荣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2300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02-0398-3/I·384

定 价: 14.00 元

序

理 由

现代报告文学家是综合型的，集记者、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邓加荣就具有这样多方面的气质。

他比我年长。温和又略带忧郁的目光，岁月的风霜悄然爬上鬓角，手中常常拎着一个撑得鼓鼓囊囊的皮包，悠悠逛逛的满神气。往那儿一坐又给人谦恭、随和、顺应环境的感觉，不轻易反驳旁人的意见，一旦严肃起来也不得了，尤其涉入他所熟悉的经济领域，多发惊人的宏论，这是我的最初印象。

那时我们几个人被偌大的《光明日报》社安置到顶楼上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周围堆着发黄的报纸和杂志，犹如置身于人迹罕至的幽谷中。像中国大多的新闻单位那样，经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洗劫，机构仍有增无减，用着、存着、窝着一大批各有所长的人材，难免养有几个散兵游勇，名曰“机动记者”，处于半赋闲状态，既被羡慕又招物议。幸遇顶头上司是一位资深而开明的老报人，用人有方，使这样一个集体得以运作。我去报社较晚，平时各干各的，每次见到邓加荣多是在倾听他那充满忧患意识的感叹中度过。他曾留学苏联攻读经济，在我看来，仍不乏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

的士大夫的文化传统。

当时报告文学界多被道地的散文家占领着，讲求笔触的细腻，抒情的浓烈，注重人物命运的刻画与情节繁绮的铺排，艺术风格似乎跟新闻是绝缘的，尽管每每以对过往岁月的沉重反思赢得社会的反响，题材的规定性与狭义性却被许多身手敏捷的新闻记者视为陌途。自从我离开报社从事专业创作以后，不断见到加荣有新作面世，才恍然觉得他那潜在的素质曾经是被遮掩的，如今在报告文学新的层次上发轫了。

他的《君子兰之谜》展示出多角度的视野，面对着在北方轰动一时的经济与文化现象，以特有的机智与幽默给予揭示。我曾想过，君子兰的狂热波及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些文人也乐此不疲，却鲜见有人剖析过它。加荣捕捉这一题材并应对裕如，恰恰在于他那综合型的知认结构。他与张胜友合作的《命运狂想曲》，触及到一个颇为敏感的事件，在价值观念的取向上富于挑战性，虽然写的是人物命运的沉浮，却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上展开，流溢着悲壮的戏剧色彩，熔铸了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新闻性与文学性。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是熟悉的，早在事件爆发时就采写过，自然引起一番比较与回味。

八十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上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伴随着多元信息的涌入，形成了报告文学的所谓“全方位，多角度，时空交错”的景观，举凡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迅即得到表现。写作风格上新闻主义的崛起，使许多记者型或学者型的作家施展身手，构成作品中报告与文学的反趋势。或是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新的意义上拓展着。这一文学与新闻学以及其它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联姻现

象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就我个人之见，在这一整体现象中犹有缺憾。某些作品仍带有主观随意性的强烈痕迹，介入得过于执著，判断性过于直露，题目求大，篇幅求长，内容有“水”……这种感觉或许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及心境有关——在经过十年来喋喋不休的抒情、议论、介入、判断之后已很劳累，又适逢外部环境进入一个多事之秋，因此在题材选择上更加挑剔而在表现上更趋模糊，仿佛步入“模糊现实主义”状态。当然，这番感慨已离开对加荣作品的评价了。

无论今后的报告文学朝着何种趋势探索，多元化的现象总是可喜的。有一点似乎确定，当着纯文学“失去轰动效益”之后，纪实文学却方兴未艾，这是多元信息社会的必然潮流。报告文学并无雅俗难以共赏之忧，越是严肃、深厚、高级得令人担心的报告文学，就越能拥有众多的读者。

当加荣这本集子出版之时，藉此表示祝贺。依他的实力当能在今后有更多的佳作涌现，我作为一名忠实的老朋友将拭目以待。

目 录

序	理 由 (1)
君子兰之谜	(1)
烹饪王国的“吃喝疯”	(44)
一部打乱的日记	(70)
台风眼里漏下的小船	(121)
当死神无可奈何降临的时候	(166)
他在答辩之前死去	(202)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一周年祭	(215)
寻找储安平	(231)
风云十载 两世情谊	(244)
又见莫斯科，又见喀秋莎	(264)
被割裂开的心愿	(287)
毛泽东与三记者谈话的前因后果	(318)
重奖的震荡	(327)
追捕	(331)

君子兰之谜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引自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谜面之一 绿色的金条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棵君子兰可以卖十四万元？我的上帝，整整十四万元呀！即使全是十元一张的大团结，也得装一麻袋！这，这不可能！什么花这么值钱？你说得太玄了！

可这是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1985年初，长春市养花大户王显文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市的姚敬，付款人民币十四万元整。谓予不信，现有发货票和交税手续费单为证。

这真是太神奇了，不可思议！什么花，值这么多钱！宝石花？七色花？不，不，它不是童话世界里那种呼唤什么来

什么的仙花，也不是瑶池畔上能让死人喘气的还魂草，它是扎根在世俗人家瓦盆里的一株普普通通的花，虽然它长的样子清秀俊逸，招人喜爱。但是，世间名贵花卉多着哪，牡丹，水仙，睡莲……何尝有此骇人的高价呢？

你想想看，十四万元呀！就是黄金，也能买四十多两呀！（按伦敦金融市场牌价，黄金每盎司四百美元，折合人民币三千五百多元一两。）一株君子兰，顶多也不过二、三十片叶子吧，用四十两黄金来浇铸这么一盆金花，也用不了呀！而且科学实验证明，由于黄金的可塑性大，一两黄金就可塑成十七·五平方米的金片，拔成一百二十五公里长的金丝。如果用这四十两黄金制作金花，不知要制成几十盆呢！因此人们都管君子兰叫绿色的金条，或绿色的象牙；也有人叫它“赛金花”。但按王显文卖的那盆君子兰来说，它的价值可是比金条还贵呀！

除了王显文这株君子兰真的算得上是众香国里的“千金”小姐外，可以与之联袂媲美的也还颇有花在：长春另一养花大户曾用五万四千元高价，将一盆君子兰卖给沈阳市的某个省级单位；养花大户夏云飞也用四万二千元高价卖出一盆君子兰。有一次，鞍山市千山区要办一个君子兰花展，派人到长春搜集好花。那人慕名来到养花大户孙连生家里，看到一株取名“孙连生一号”的君子兰，爱不释手，出八万元高价，孙连生高傲地耸了耸肩头，交易没有做成。

还有凤冠换皇冠的佳话。

85年元旦过后不久，省外贸部门陪同一位港商到长春市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参观，玻璃柜中一盆盆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君子兰引得这位港商眼花缭乱，如醉如痴，竟决定不

了自己的选择，最后不得不求教于主人，询问哪一盆最好。发展公司经理郭凤仪指着一盆说：“这盆！它是花的王国中的皇后，是我多年精心培育出来的，名叫凤冠，我们这个公司就是用这株花命名的！”港商再凑近花前看时，那株凤冠仪态万方，飘飘欲仙，频频含笑，差一点就没有和他说话了。港商心旌摇动，不能自持，恍恍乎好像也随之进入仙境。等他楞过了神，便对花的主人说：“这盆花值多少钱？”郭凤仪说：“无价之宝！”港商进一步问：“你卖不卖？我愿意用世界上公认的超豪华高级轿车皇冠，来换你这盆凤冠！”经理用手整整领带的扎结，笑吟吟地对港商说：“不换，也不卖！你的皇冠，每分钟可以生产出多少辆，我用钱可以买到它；而我的凤冠是我多少年精心培育的结果，世上只此一棵，你换走了，我这里就断种了！我要留它在这里传宗接代，繁衍新的品种。老实说，没有了这株凤冠，我们这个发展公司还能用凤冠命名吗？”

在长春，用君子兰换松下彩电，换东芝电冰箱的事，那就纯属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据一位人品笃厚的养花大户对我说，在区区二百万人口的这座中等城市里，卖过万元以上的君子兰，起码超过五十盆。

简直不可思议！请问一下，古今中外在花的世界里，可曾有过这种“株花抵万金”的昂贵价值？可曾有过这种疯狂的交易？

一种商品，怎么可以取得如此离奇的价格呢？是谁对它那充满了绿色汁液的叶子，用了点石成金之术，将它们变成绿色金条呢？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一种商品的价值，主要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所决定。虽然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有时可以上上下下地波动，但无论怎样波动，也不会离开它本身的价值太远，一双拖鞋的价格无论怎样上下波动，总不会卖成一艘轮船的价格来的。

可是，君子兰的高贵价值在哪儿呢？生产君子兰并不比生产其它的名花更为费事，也不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和精湛的技艺，像制造银河亿次电子计算机那样。那么，君子兰的高贵价值藏在哪片叶子之中呢？

谜，谜，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谜面之二 一夜之间，又一落千丈、万丈

啊，神奇的花，宝贵的花，致富的花！长春人把君子兰捧上了天，朝朝暮暮为君子兰大唱赞歌。1984年10月8日，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君子兰定为市花，号召全体市民家家户户养君子兰，至少要栽三株到五株。不种君子兰，愧为长春人！君子兰是长春的优势，长春的光彩，长春的荣耀，长春的骄傲。长春，跌到疯狂旋转的君子兰漩涡里，一切无不打上君子兰的烙印，市报的副刊取名君子兰，挂历十三张全用君子兰彩照，电视台用君子兰作本地节目的片头，长春电冰箱用君子兰作商标，足球赛用君子兰做奖杯，至于用君子兰命名的香烟、肥皂、服装、家具，就更是琳琅满目、举不胜举，只剩下没有把君子兰的徽标挂到城门上了！

一片金色的雾笼罩着长春的街头，多少人从君子兰身上得到了好处，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且不说那几十个养

花大户，昨天还是捞鱼虫的、捡破烂的、修理洋铁壶的、倒卖估衣青菜的，转眼工夫就成了腰缠万贯、出门坐小汽车的人。还是那位为人笃厚的养花大户告诉我说，在长春因养花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已有那么四、五个人，家趁几十万元的起码也有四、五十户了。甚至像下肢瘫痪病休在家的杨勤老汉，也因种花而发家，现在，为儿女办婚事动辄甩手几千块，家里四电皆全，在银行里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别说是养花的，就是制作花盆的，炮制花土的，生产花肥、花药的，也都随之发了财。长春磁性材料厂生产的一种专门浇灌君子兰用的磁水器，吉林农业大学研究制成的一种草炭土——君子兰营养土，也都成为市场上的热门商品，甚至连旅馆、饭店、饮食行业和交通部门，也都增加了收入。无怪来长春演出的著名相声演员杨振华说：“关东三宗宝，不如长春一棵草！”

君子兰！君子兰！全城争夸君子兰，因为它给长春带来了璀璨耀眼的繁华。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又一个奇迹突然出现了。正当人们在君子兰的迷梦里沉睡方酣之时，一夜之间，那高贵的君子兰竟然一落千丈。不，不是千丈，而是万丈，几十万丈！等到第二天清晨，乳白色的黎明之光又洒到君子兰早市上时，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那些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棵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比串红、步步高草花还便宜。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在一夜之间把君子兰身上的灵气、秀气、神气，那一切不落世俗的高贵灵魂，都给摄取去了

呢？人们蹲下来再仔细地端详那花时，叶片还是那样翠绿，花儿还是那样桔黄，君子之风丝毫未减。可是，它的价值怎么一下子跌得这么惨呢？谁来解释这价值之谜？谁来？

如果，在君子兰前一个疯狂旋涡里把握时机，不少人平步青云，一下子由穷汉变成了富翁；而如今，在君子兰后一个疯狂旋涡里，不少人又转眼丧失了一切，成为名符其实的倒霉大叔。

长春133厂有几个退休老工人，大家伙东挪西借凑足了几万元，买进来一批高档的成龄君子兰，可还没等他们给花浇过几遍水，那花就一下子只值几百元了。把几个老汉气得头上青筋暴起，嘴唇上烧起豆粒大小的燎泡。这不是活活要人命吗？

吉林省军区有个离休的干部，离休之后无事可干，就将六千元离休费全拿出来，又从亲家老翁那里借来六千元，合起来买了几盆君子兰。现在不用说，也都全赔进去了。气得他在家直打转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不知道害怕，今天可真害怕了，亲家这六千元可怎么还呀？”

还有一位文化局长领头出来筹措资金，用各种方法集资了一百一十八万元，开办一个以花木为主的开发公司。由于君子兰价值奇迹般的变化，一百多万元的资金全赔进去，现在，顶多只剩下一、二十万元了。

在君子兰最兴盛的时候，长春市先后成立的十家君子兰开发公司已八家破产倒闭，剩下的两家也如牛负重，在艰难竭蹶的泥淖里挣扎着。当初摩肩接踵的君子兰市场，有几处已经转产，变成鱼市和菜市了。至于依靠君子兰而兴旺发达起来的旅店、饭馆等等第三产业部门，也已萧条冷落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嘛！

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君子兰的繁华之梦，像一缕轻烟似的被风吹散了。水润湘江，云散高唐，留下来的只是对往日的惋惜与兴叹。

简直是一个梦幻！人们怎样用科学的方法和现实的逻辑，来解释这君子兰之谜呢？

下边，我们推出几个谜底来，猜得切与不切，只供大家参考。

谜底之一 白头格猜法

宽厚的叶子，成双成对地从叶鞘中伸出来，深的苍绿生烟，浅的青翠欲滴，清晰凸出的叶脉，天然成趣地构成了许多匀称和谐的几何图案。它把象征生命活力的美，都在一片生意盎然的绿色云雾里有层次地、有风度地展现出来。至于那花，更是具有特殊的魅力，活像一盏盏桔黄色的小灯笼，闪烁着诡谲诱人的光波，有十几朵同样的小花井然有序地合拢在一起，簇成一朵大花团，流金溢彩，光灿照人，它在两排扇形般展开的叶子中间亭亭玉立，正犹如一位端庄贤淑、雍容华贵的皇后，在两排绿衣御林军的簇拥下从皇宫里款款走出。

长春人特别喜爱君子兰，也还有其特殊的原因。他们地处北国，风寒雪冷，大自然没有机会给他们更多的绿，一年之中至少有半年的时间看不到蠕动着生命活力的那种颜色。可是，君子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生理上的要求，只要窗台上摆上两盆君子兰，屋子里就充满了生气，充满了生命的旋律，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尤其惹人垂爱的是，它的花期是在春节

前后，在白雪皑皑的天地里，燃起这样一团金灿灿的火焰，给人增添多少美感，多少吉祥！

君子兰兼有松柏的道劲，荷花的娇艳，文竹的清雅，杜鹃的火炽，牡丹的端庄，水仙的俊逸。用郑板桥题画的一首诗来形容它颇为适宜：

道劲婀娜两相宜，
群卉群芳尽弃之。
春夏秋时全不变，
雪中风味更清奇。

所以说，君子兰确实是一种名贵之花，过去在《群芳谱》里之所以没有被点上状元或榜眼、探花之类的荣幸，只是因为它传入到中国的时间太迟了。

原来这君子兰本生在南非开普敦一带。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侵入南非，接着那些冒险家、传教士、探险者们便纷至沓来。他们在南非的丛林草莽之中发现了这种其貌不俗的植物。1823年，英国人鲍威首先将它带回到英国，种植在诺森伯兰郡的克莱夫公爵夫人的花园里，后来有人将它赠送给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博勒。

明治年间，这种花从欧洲引入日本。日本植物学家大久保教授根据其风格品貌，给它起了个“君子兰”的雅号。君子兰是日本人首先创造出来的名字，后来我们一直沿用下来。

实际上，君子兰并不是兰科和兰属的植物，与通常所说的兰花是不沾亲也不带故的。只是因为我们这些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人特别地喜欢兰，便将许多好花好草都冠上了兰的名称：洁白如玉的木兰花，称之为白玉兰，生有螃蟹大螯似的

仙人掌种植物，称之为蟹爪兰；只有一支叶子状如美人蕉的植物，称之为一叶兰。因为自古以来兰就是美好的象征，所以一部《楚辞》，每隔几句就会出现一个兰字：“朝搴阨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公元1932年，在我国的东北建立起一个不幸的傀儡朝廷，日本园艺家村甲先生把两盆君子兰作为尊贵的礼物奉献给爱新觉罗·溥仪。从此，南非的野生植物便成了满洲的宫廷之花。据说，“皇帝陛下”对于此花爱如至宝，除了让御花匠精心培养外，自己也常亲手料理，每逢礼宾、盛会、宴席和祭奠等隆重场面，必将此花搬出来装点环境。1942年，皇帝的爱妃谭玉玲亡故，盛殓于护国般若寺。皇帝爱妃心切，便命人将宫中一盆君子兰摆在谭玉玲的灵前。祭奠仪式一直持续七七四十九天，因之那盆御花也就长时间地抛头露面于宫廷之外。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皇妃厚葬之后，竟忘记将宫花收回宫中，从此它就流落于民间。把这盆花收养下来的是护国般若寺里的一个僧人，法号普明和尚。现在长春君子兰的上等品种，多以“和尚”命名，因为那些叶片宽厚、叶脉清晰的君子兰花种，都是从普明和尚那里取得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好心的出家人，便给花起了个“和尚”的名字，虽然不算太雅，但是倒也意味深长，且能发人诸多回忆和联想。

1945年8月，盟国军队摧毁了关东军的牢固防御工事，满洲小朝廷在风雨之中飘零了。溥仪仓惶出逃，抛下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于是，皇家的许多奇珍异宝纷纷遗落到了民间，御花园里好几盆君子兰，也都被人搬走了。其中有一株是栽在岫岩乌玉花盆里的。皇帝的御膳师将其带出宫外，留

下他所喜爱的乌玉花盆，把花却送给了东兴染厂经理陈国兴。后来这株花经过陈国兴的精心培育也成了一个好品种，人们便以“染厂”命名这种花。

在皇宫里还有一个专门给皇帝莳养花草的花匠名叫张友悌，在皇朝倾覆时他也带出一盆君子兰。这株花后来被收到了胜利公园，人们将这个品种名之为“大胜利”，后来又发展出“二胜利”。

长春城里还有个祖传名医吴大夫，他的姑母是皇宫里的奶妈子，皇家逃散时她也搬出来一盆君子兰，送给行医的侄儿吴大夫。吴大夫既会治病又会养花，这盆君子兰被他莳养得出挑的鲜丽娇媚，后来人们要去种籽繁殖这个品种便得了个“吴大夫”的名字。

君子兰就是这样一种出身高贵、带着帝王豪气的名花。如果花儿有知，能够顾影自怜的话，定然会觉得自己是“龙种自与常人殊”了。后来不幸，它竟“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被打上了“和尚”、“染厂”、“吴大夫”等这样世俗平民的印记。

但是在民间，也有民间的培育名花的能工巧匠。那普明和尚、染厂经理和行医看病的吴大夫等，便是长春第一代培育君子兰的养花人。那时还没有养花大户这个名称，而且，栽植君子兰也决非是为了买卖，为了赚钱，纯粹是为了涵养性情，陶冶情操，完全出于个人的喜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生活提高了。安居才能乐业，乐业之余又产生乐生，人们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于是，莳养君子兰的人逐渐增多了。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长春出现了一批栽植君子兰的能手，像

王宝林、周荣扬、吴鹤亭、姜油匠、贡占元、黄技师、赵雪辉等，这些人都是医生、教师、花匠、技术人员和工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养花经验，业余养花是他们八小时之外极大的精神寄托。他们精心钻研相互切磋琢磨，用人工杂交授粉选优汰劣等方法，接连培育出一代代新的品种来。像长春机械公司的电气技师赵雪辉，从五十年代初便跟随养花师傅姜油匠等在一起养花，他和师傅一道培育出一种君子兰，其花呈桃花瓣，花间闪烁金星，十分好看。后来姜油匠死了，为了纪念师傅，他就将这个品种命名为“油匠”。再如长春生物制品所的技师黄永年，他用“油匠”的纯种与“大胜利”杂交，得到了一种叶片特别油亮、润泽犹如凝脂、娇艳犹如初生春草一般的新品种，后来人们便称这种花为“技师”。以后，第四十中学教员贡占元又利用“技师”与“大胜利”等品种杂交，使叶脉明显如画地凸现出来，并有横纹交错其间，其状如罗纱、羽扇和迴文锦，十分好看，被人称之为“花脸”。因为所用的父本和母本各不相同，后来人们又相继培育出“花脸和尚”、“花脸技师”、“花脸圆头”、“花脸短叶”等诸多名堂。细想这些名字真是又风趣，又热闹，又形象，虽然缺少那么点文雅气儿。

然而，正像人们所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那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顷刻之间又被一场飓风吹得柳败花残，凋零谢落了。文革期间，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孩子般不懂事的大人，手擎着红宝书，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大造其反，而作为美的化身的君子兰更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什么“养花种草的，纯属资产阶级作风，统统要砸烂！”于是，全城千万株君子兰都被拔出来，毁弃于泥涂之中。多少心血，多

少辛劳，多少期待与渴望，倾刻间被摧残殆尽，许多人心疼得流出了眼泪。

然而，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任何暴力也扼杀不了的。就在那红色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有人竟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君子兰偷偷藏到防空洞中及下水道、废品库里。还有人想得更为狡黠，偷着将君子兰藏到公园的老虎圈中，那些造反派虽然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却决无胆量到老虎圈里去碰一碰。

在那灾祸横流的日子里，有不少人竟为一盆君子兰而被游街批斗，忍辱丧生。1969年长春市公开展出了耸人听闻的八大君子兰特务案件，作为红卫兵横扫的辉煌战果。列在八大案件之首的，就是前边提到的长春客车厂八级工匠吴鹤亭。这老汉一直爱养花，平日里结交了一些养花朋友，你到我这儿掰个芽子，我到你那那里授授花粉，来往的人也就显得比一般人家多了些。他家住的又是一间日本老式房子，朝东朝南各有一扇窗户，为了多晒一点阳光，他便不时地把花从这个窗台搬到那个窗台。红卫兵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很快就发现了破绽：这里一定是个特务黑窝。来往的人这么多，什么“染厂”“和尚”的，一定是他们的暗语，而花盆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南，无疑是秘密联络的暗号。

吴老汉被揪出来了，批了又斗，斗了又批。接着他们又顺蔓摸瓜，扩大战果，相继挖出八伙“潜伏已久的特务集团”：其中有以“技师”为代号的黄永年，以“染厂”为代号的陈国兴，以“和尚”为代号的普明，以“东大桥一号”为代号的赵慈元……只有“大胜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未找到窝主，可是也终未幸免。原来，黄永年技师被他们轮

番批斗和施用毒刑，竟然惨死在牛棚中。死尸被拖到火葬场后，没有人敢去认领。黄技师的妻子影影绰绰听到了一点信息，但她不敢出面，就偷偷找她弟弟商量。弟弟也怕事，就央求邻居赵木匠陪他一起去火葬场。赵木匠是胜利公园莳养花的，当年把大胜利送到公园里来时，也有他一份功劳。这个好心的木匠受不了人家几句好话，便不顾深浅地陪同去火葬场认领黄技师的尸体。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胜利公园木匠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大胜利”的代号也破了案，赵木匠在牛棚里关押了两年多，被斗得死去活来，险些没有跟黄技师一道去阴世间里讨论花道。

不管造反派把君子兰放到怎么恐怖的泥潭里，君子兰还是在生活的夹缝里生存下来。而且渐渐地，人们滋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越是把君子兰批得如何如何的臭，人们越是有兴趣莳养。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在长春养君子兰已经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东西南北四大流派。各派有各派的名花，各派有各派的坛主。他们互相之间广泛地交流品种和技艺。这时，那种调剂余缺的原始交换，已经与货币挂上了钩，采取了为古风所鄙夷、为世风所倡导的商品交换形式。子曰：君子不言利。按理说，君子兰是不应当沾惹上铜臭的，但它却偏偏沾上了。

到了八十年代，长春进入了君子兰时代。倾城倾巷，到处飘散着君子兰花香。君子兰挤上了每户人家的窗台。人们都在君子兰的绿色氤氲里呼吸。这时，君子兰的培育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养兰能手新人辈出，风云际会，许多更佳的新品种又相继培育出来。从八·一五光复以来，长春的这些民间养兰专家已经培育出第六代、第七代君子兰新品种来，

花的叶子已由一百公分缩短到二十几公分，宽度已由十几公分增至三十公分，厚度也增了三、四倍。

日本君子兰专家、园艺学家江尻光一先生在参观长春君子兰花展之后感慨地说：“日本培育君子兰比中国早，从四、五十年代起也形成了君子兰热，特别是北海道等寒冷地区更甚。但是，日本君子兰的培育不如中国发展得快，分类不如中国细腻，品种也不如中国这样多！”

在国际上，长春君子兰已经独领风骚。

这是春城的骄傲，是长春人的骄傲！长春的君子兰不是一般的兰，它历经了沧桑劫难，有些品种是人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存下来的，它们在几代的养花人手里精雕细刻，靠着不懈的追求和辛勤的汗水而更新换代，开出最鲜艳的花，结出最美的果来。君子兰，是长春人的自我奋斗！联想到这一切一切，君子兰的昂贵价格，就不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了！因为那一片片青如碧玉的叶子里，都凝聚着一种特殊的、用一般等价物（货币）所不好衡量的价值。

谜底之二 卷帘格猜法

“雪花！雪花！”这是在唤谁呢？

蹭的一声，从花窖里窜出一条毛色光亮、像墨炭一般乌黑的狗来。这是一条黑贝。嗜，一条纯种的德国黑贝。为什么要叫这么雪白的一个名字呢？这叫反衬，懂吗？反衬！你看，反衬得多么漂亮呀！这么叫着，多么动听，让人打心眼里舒坦！花这几个钱算什么！买这一条狗，花了十二万呢！价，是高了一些，可你没看是什么货色吗？纯种的德国狗，硬是由它把财神爷给守住了。

说话的是新近暴发起来的养花大户老A，过去无正当职业，除了为废品公司收购点破烂，也养鸟、养鱼，捞点鱼虫卖，靠弄些零七八碎的营生养活一大家子人口。花，也漫不经心地蒔养过几盆，但那纯粹是为了观赏。可自从七十年代末期君子兰成了一种高档商品以后，心眼灵活的老A可就另有打算了。他把鸟、虫、鱼的营生都收拾起来，一往情深地扑到君子兰上。这倒不是因为他看君子兰比别的物件更清雅高洁，而是看到了君子兰猛烈上涨的趋势。一个收购废品的，每天买买卖卖，能不知道一点市场信息吗？如今是信息时代，谁预测得准，谁就发大财！

于是，他便在君子兰身上下了大注。他把几个儿子都叫来，要求全家总动员，都把劲儿使在君子兰上。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们心眼儿齐，投下的劳力多，很快就把摊子搭得很大，光是花窖就盖了三、四个，为的是爷儿们几个，一人蒔弄一个。当然，为这花窖也费了不少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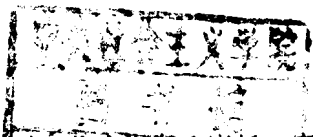
“快！快！赶快把屋里屋外收拾干净，让外宾看看我们中国养花大户不是土包子，懂得文明！”老A一大早就把家里的人轰起来，因为市里昨天通知他，说有一起法国什么代表团要来他家访问。

阳光透过玻璃天窗上的遮挡物，散散落落地洒下缕缕金丝，让花繁叶壮的君子兰更显得凝碧含烟，脉脉温情。下午两点多钟，国外一位园艺学家携其夫人来到老A家里。那一盆盆君子兰，都格外地打起精神，以楚楚动人的风采来欢迎外宾。“和尚”挺拔遒劲，“技师”灿若金星，“吴大夫”温文尔雅，“大胜利”磊落大方，至于各种名目的“花脸”

更是千姿百态，有说不尽的情趣：有的像一柄团扇，掩遮着宫女一般的粉脸；有的像出水芙蓉，还滴着伤心的泪珠；有的像苏州盆景，充满着诗情画意，只要你认真地辨认一下，便能把那诗那画读出声来。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几座小小花窖里竟然莳养着一万多株君子兰！“嘿，好家伙！绿色的海洋！”外宾感受良深，赶忙掏出笔来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花！太惊人了，我知道，这些瑰丽多彩的花朵，是需要长期的艰苦工作和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才能培养出来的！”

老A这天穿着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几个儿子也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在迎送外宾时都显得有涵养，有气魄，有礼貌。临别，他们把自家的两部小汽车开出来，一直尾随着外宾车后，送到宾馆。周围邻居，谁不伸出老长的脖子羡慕地望着这个小小门槛里所发生的一切呀！当那一辆辆锃亮的小汽车轻飘飘地从他们身边擦过时，他们的心能不怦怦地跳动吗？

别看老A过去是卖破烂的，如今可是鸟枪换炮啦！人会随着他的身份地位的改变，变得越来越聪颖，越明智，越有学问。随着君子兰价格野马狂奔般上涨，老A头脑里的智慧越来越多起来，不仅养花的学问多得用几辆大卡车也盛不下，别的学科知识也能触类旁通，娴熟地掌握起来，什么管理学、市场学、物价学、财政学、税收学……他都已处于领先地位。君子兰市场的价格虽然是头桀骜不驯的野马，但在他的面前却像个温顺的婢女，乖乖地听他吆唤和驾驭。某些高档君子兰的特殊价格，便是由他与几个养花大户在直通电话里嘀咕出来的。他掌握了君子兰，掌握了市场，掌握了价格，也就



掌握了一切。因此他家的现代化水平，什么汽车、摩托、家用电器、黑贝、双筒猎枪……都率先追赶上了世界新潮流，已不足为奇了。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周围的人群，超越了同行，超越了自我，也就是说，已经从容地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美国电影有个幻想中的《超人》，而换破烂的老A，却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超人。

让我们再去看看另一个养花大户M家。他是长春市有名的祖传名医，所以正厅上挂有“妙手回春”的匾额。他养君子兰完全是出于爱好，出于与他行医职业颇为相通的兴趣，后来竟因养君子兰而发迹了。君子兰也给他带来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好处，因此在长春，他作为养花大户的名声甚至比祖传名医的名声还要响亮，这不能不使他对养君子兰更为倾心。

老M的君子兰虽然在经济实力上较之那些头等养花大户差一些，但在政治上他却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家的墙上挂有一排二十吋的大镜框，里面全是与一些领导人的合影，这是他在几次花展上托人为他抢拍的。这些荣誉，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在北京花展期间，还找到溥杰家里去，溥杰为他挥毫写了一张条幅：“培人育花挥妙手，碧翠流丹灿长春”。君子兰给他带来的政治荣誉，丝毫不逊于养花大户的百万家当！当然，他家里也安有电话，常与其他养花大户传递市场行情，揣摸购买者心理，商量驱使价格上涨的对策。反正一些好花都在几家大户手里，你别看几里长街的君子兰市场上熙熙攘攘，万头攒动，可真正能够拨动君子兰价格琴弦的，还不就是几个养花大户！是他们几个人在电话里定下了基调和主旋律。因为，好花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又最有资

格评议君子兰花的好坏标准。既然货源都操纵在他们手里，价格也就不能不拴在他们的裤腰带上了。不过，老M这个人可一向是老实忠厚的，凡是欺行霸市、以次充好、买空卖空、倒买倒卖的事情，他是从来不干的。

他是行医为本的，在养花上不过是个票友罢了！能够赚着大钱更好，赚不着也不损失什么。这不，现在花价大跌了，他还照样怡然自得，坦坦荡荡地望着花窖里的千百株君子兰。你别说，他倒颇有点君子的风度哩！唯有小人才常戚戚呢！

再说说另一个养花大户老F吧！他四十多岁，灵巧干练，英气勃勃，浑身透着精明劲儿。一身高等呢料的西装，扎着金利来丝光领带，气度潇洒磊落，举止超脱不俗。他是长春的花王，声誉之高不亚于京剧界里的梅兰芳、国画界里的齐白石和清洁工人时传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谁能想得到养花人也有今天？他出门坐高级轿车，常有专职秘书随其左右，招招手便能左右君子兰市场的行情。谁会想到他过去的经历是那样的晦气，那样的没有光泽呢。

十年浩劫期间，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一家工厂里当钳工，家里穷得三个人盖一条被子。当时工厂里两派，一天到晚斗得不可开交。他却坐在家想着如何治穷的窍门。那时，养鸟养鱼很盛行，他也跟着人家学。七十年代后期起他开始养花。他的成功，简单地用“命运”二字是不能解释的，他把天时、地利、人和等各个方面因素，都巧妙地凑合到一块了。今天，他培育出的花夺标呼声最高，价值连城，多少养花人都自动地把花王的桂冠戴到他的头上。

现在，他正开车出去筹备长春第二次迎春花展，市里一些主要领导同志说都将出席开幕仪式，还将亲自为之剪彩。

生活，从来没有委他这样隆重的使命；时间，从未给他投来过如此光彩的影子；而今天，一切幸运的大门都向他敞开了。这不，马上就要成立民间君子兰协会了，人们都准备把主席的位子推让给他。领导同志对他也都非常地器重和信任。他知道应当怎样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怎样利用自己的优势，把更多的养花户、更多的君子兰爱好者争取到自己身边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展出的花选好，首先把属于他们那一派的好花，什么“花脸圆头”、“珍珠”、“翡翠”等选出来，明天，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黑龙江和辽宁省电视台都将来采访，他是知道宣传和舆论的份量的。有一个记者曾经对他说过：“君子兰嘛，我们可以把它捧上天，也可以把它踩到地上！”而他的一切幸运，都是寄托在扶摇直上的君子兰身上。君子兰被人捧上天，他才能攀着君子兰的颈子飞上天；君子兰跌在地，他也就成为人们不屑一顾的草芥了。

应当维持的，他便要尽力地把各方面都维持好。只要能把君子兰的价格扶上去，便是保住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现在他开车出去，征选，磋商，协调，筹划，不都是为着这个不言自明的目的吗？当然，嘴上要另说一些动听的词儿：“我非常反对目前有些人用低档君子兰出售高价，坑骗他人钱财。君子兰是一种使人进入美好境界的花卉，它象征着纯洁和高雅，我们经营君子兰的人都应当有一种君子之风！有些人富了就忘本，昧着良心抬高价格，发黑心财，一颗种子张口就是几百元，极大的败坏了君子兰这个美好的名称，这是很不应该的！”

谜底之三 求凰格猜法

有一个养花户写了一首赞咏君子兰的诗：

小小一颗豆，
种在盆里头，
不要大成本，
长出就销售。

话虽不多，可正说到了点子上，二十个字，二十尊铜铸罗汉，个个掷地金石声。那花的妩媚，叶的清雅以及它的整体和谐，都被理性的思维给抽象掉了，剩下的只有小小一颗豆和资金的循环过程，一个可以不断增殖的再生产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人们热情栽种君子兰的真实的内在动力。

这种动力，不仅在民间发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且通过力点的扩散，很快也推进到政府方面来，在上层建筑领域产生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若不，人们怎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呢！

1983年，市政府做出了《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做出规定，这在世界上也较为罕见。1984年，政府接着又作出了一个《若干补充规定》，决定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不得超过五百元，小苗不得超过五元。同时还规定，除了按交易额征收百分之八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五千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

为什么有这个补充规定呢？无非是因为君子兰一经商品化之后，它的价格便扶摇直上，让人看得眼晕。可是，这时社会上正滋生着强烈的逆反心理，由于这种逆反心理的作用，

价格是越限制涨得越高，那份《补充规定》完全没有起到应起的抑制作用。

面对君子兰的这样活跃的、生机勃勃的形势，市里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君子兰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开拓意识很强的副市长清楚地意识到，长春君子兰商品化的迅速发展，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落实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飞跃。古今中外，有些城市就是凭借一种产品作依托，很快使经济发展起来：景德镇靠瓷，自贡靠盐，近两年来芜湖靠着一个傻子瓜子，都出了名。君子兰为什么不能作为长春的一项依托产品呢？由花来打通经济起飞之路的，在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先例。荷兰的莱斯城，就是依靠种植郁金香而发展起来的。副市长在各城市经济崛起的历史纵座标和横座标的交叉点上，发现了君子兰这株奇异的花。长春无渔盐海运之利，又无矿藏石油资源，所幸的是，还有君子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优势。扬长避短，若要开发长春的经济，便不能不充分发挥君子兰这一优势。君子兰是长春的一项拳头产品，依靠它近则可以占领国内市场，远则可以打入国际市场，有朝一日会像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玫瑰那样，给国家赚来几亿、几十亿美元的外汇。看来，长春要实现2000年的目标，达到小康人家水平，君子兰要大显神威了。一股开拓的精神驱使着他，连夜奋笔挥毫撰写文章，提出：“国营、集体、个体、联营的经济单位一起上，大家都来经营君子兰。团结协作，互相竞争，把生意做活，把市场搞活，做到生产大发展，市场大繁荣，进一步满足各地各方面的需要。”

他视长春君子兰为长春经济发展的启动杠杆。

颇具学者风度的市委书记，在他家里接见记者时说：“立似美人扇，散如凤开屏，君子兰的确是一种令人喜爱的花卉！目前长春君子兰，成龄花已达三十万株，小苗一千多万株，全国各省市的君子兰，没有一个地方像长春这样普及，所以，把君子兰与解放牌汽车、长影的电影并列为长春城的三大名产，并不过誉！”

“君子兰不仅花色嫣红，纯洁高雅，而且四季常青。因此我们不仅要让它长春放射光彩，还要让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愿君子兰开遍祖国大江南北，开遍五洲四海！”书记有着非常炽烈的感情，说话简洁得体，落落大方而又饶有风趣。

人们沉醉在君子兰的梦幻中。1664年，荷兰人用一株郁金香的鳞茎换一幢带花园的房子。在我国，也有过“牡丹一株换楼阁”、“病梅值四两”的事例。至于蟋蟀、八哥、画眉、斗鸡等鸟虫，卖奇贵价格的更不少见。《聊斋志异·促织》中就写道：“每买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更何况，一棵名贵的君子兰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杂交换代才培育出来的，是在几万株君子兰中通过选优汰劣的方式筛选出来的，这中间要花费人们多少心血和劳动呀！不是随便哪棵君子兰都能成为珍品的，这正如一幅名画能价值连城，是因为作品中凝聚着画家多年劳动的结晶。这种特殊劳动的价值，是很难用一般价值规律来解释的。

于是，人们都把经济开发的焦点，对准了纯洁端庄、品格高雅的君子兰。以它作为开发长春经济的依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由它一身来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预测明晰，决策果断，这是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关键。现在，应当有胆有识地及早定下决心，给君子兰一个广阔的发展余地。先前限制君子兰发展的那些规定，该推翻的推翻，该改正的改正。捆绑起来的君子兰，是不会使长春经济起飞的。

正是根据这样一些预测和决心，1984年10月11日，长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市长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案，决定将君子兰命名为长春市花，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宣传，积极指导，普及君子兰的养殖。同年12月20日，长春市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有关君子兰交易的新的法令，明确地提出要放开价格，取消限价的规定，无论成龄君子兰或小苗，一律实行买卖双方自行议价；降低税率，一律按照百分之八收税。同时，划出更多的地段，开辟新的君子兰交易市场；鼓励居民养殖君子兰，每户至少要养三至五株，对于发展君子兰有贡献的，有关部门要授予荣誉称号。

市府唯恐语焉不详，还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有人向副市长问：“这次取消限价后，花价是否有可能大幅度地上涨？比如说，一棵卖几千元吧，政府会不会干涉？”副市长坦率地回答说：“这次取消限价是彻底地开放，或高或低，完全由买卖双方自由议定。这次取消限价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措施，今后不会改变的！”“我们总的想法，就是把长春君子兰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它做为我们致富脱贫之道！”

一棵小草，被委之以经邦济世、致富脱贫的大任；君子兰，成了一个城市的守护神！这是它（不仅是它，包括所有

的花草在内)，连做梦也未曾想象到的！

长春市迎春征联获奖作品中有一副说得很好：“生财无路问君子，致富有道养兰花。”

市里一些同志，把养兰花作为致富的重要手段，决心要把长春变成君子兰之国。就像荷兰的郁金香、法国的玫瑰、桑给巴尔的丁香一样。因为我国自古就是养花之国，三千多年以前就养殖菊花，二千年前就种植牡丹，今天，我们也应当成为花卉出口的大国（你看人家荷兰，每年出口花卉七、八亿美元，哥伦比亚、泰国、保加利亚每年也出口几千万美元），我们的花卉出口也一定能够赶上他们，超过他们！

而在我国的花卉出口中，君子兰应当成为对外开发的前驱。八十年代崛起的，应当是君子兰，而不是其它的花。如果说，三十年代是郁金香的时代，玫瑰的时代；那么，八十年代就是君子兰的时代。因为，三十年代是庭院式的生活方式，而郁金香和玫瑰在庭院里是娇娘，是宠儿，它们在庭院里垄断着全部的温柔之梦。而八十年代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在室内，庭院里的小夜曲已经唱完了，人们走进了室内。而君子兰才是室内花卉的皇后。它在室内养殖好处极多，因为叶片宽厚，叶面上的气孔大，所以它呼出的氧气特别多，比一般的植物多三十五倍，在极微弱的光线下，也能起光合作用。更适人意的是，它与一般植物不同，在夜间不吐二氧化碳。因此，在豪华的客厅、大宾馆的卧室、新婚的洞房、少女的香闺里摆上几盆君子兰，是最为理想的了。

有人还举了个例证，说他有位姓杨的邻居，独居卧室，夜里转了风向，炉烟筒往里灌风，屋子里产生了煤气。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只觉得头疼欲裂，很难挣扎起来，抬起头

看看屋内那几盆君子兰，叶子都蔫蔫地倒垂下去。这时他才知道，是君子兰代他受了煤气，并用它们所能呼出的微弱的氧气救了他一条命。君子兰是个吸尘器，空气过滤器。一株成龄君子兰，一昼夜能吸进一立升空气，呼出百分之八十的氧气来。

此外，经过医学专家、教授们的化验分析与临床实践证明，君子兰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能够消炎、止痛、利尿、保肝，还能起催生及抗癌作用。

君子兰确实是宝中之宝！它是开拓之花，时代之花，于是，市府出面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开会，商讨如何开发长春君子兰的丰富资源，尽快开展君子兰经济横向联系，开办各种经济实体。会议开过不久，各种名目的君子兰开发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在短短几十天里，就出现了十大公司和四十家花木商店，向外省市扩展的分公司、子公司更是不计其数了。这些公司个个都声势赫赫，气度不凡，它们动不动把触角就伸入到北京、广州、沈阳、鞍山、大连、哈尔滨，甚至连开放的窗口深圳也去了。最高潮时候有五千多人去各地搞君子兰展销，来回都坐飞机。君子兰有很强的渗透力，它既然已经扩展到了深圳，自然也便觊觎香港，觊觎世界。

可不要小瞧这绿色的魔鬼！

到长春来的、或参观过君子兰花展的文化名人，都要请来为君子兰捧捧场。歌唱家王洁实、谢莉斯为君子兰歌唱，画家范曾为君子兰作画，作家万忆萱为君子兰赋诗，音乐家侍葵为之谱曲，书法家启功为之题字，甚至语言大师侯宝林也要为君子兰说上一段幽默含蓄的相声……当然，一般来说

随后都要送去一盆君子兰，还要赠予君子兰协会名誉会员的称号。

更为隆重的君子兰的盛典，还要数1985年春节期间举办的长春市花首届迎春花展了。2月17日下午一时，儿童公园里彩旗飞舞，鞭炮齐鸣，人潮花海，车水马龙，省市的十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亲临现场，省市委书记还双双为之剪彩。一位挂名中国花卉协会名誉主席的国务委员还专门发来贺电。如果花卉有知，定会受宠若惊，在古今中外的花的王国里，有哪一种花曾经受到人类如此深厚的宠爱和隆重礼遇？

在花展期间，又不断地有党政领导同志和社会知名人士前来参观，并与养花专业户会见、谈论养花之道、合影留念。这些喜讯通过条条有形的和无形的、有线的和无线的载体传播到国内外，于是君子兰便名噪一时，蜚声海内外了。

自此，君子兰变得更加身价百倍，那令人难以想象的价格奇迹，也就随之出现了，超越了著名的拉马曲线的最高点。

长春首届迎春花展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怎能不强烈地震撼着相邻和不相邻的省市呢。一花引来百花开，谁不向往着繁华之梦呢？

君子兰具有很强的辐射力！

多少长春人，其中包括管理宏观控制闸门的人，都把长春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寄托在君子兰的身上。

谜底之四 破损格猜法

至此，君子兰的价格，已被无数双有权的和无权的手、养花大户和养花小户的手，给高高地捧起来了。但是，那价值高贵的灵魂却仍然缺乏坚实的肉体。灵魂抬起了高贵的头

平

颇，在忘情地呼唤着，然而甘心趋附者却寥寥无几。尽管倾心者有千千万万，但是，都苦于囊中羞涩。

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而交换中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倾慕、向往和热恋，而是坚实的货币。理念代替不了金钱，这正像《神曲》中的但丁，当他来到天堂向圣彼得讲述了信仰的要义之后，圣彼得毫不含糊地问他：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

遗憾的是，群众的钱袋里正缺少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买一棵小苗子还要花几百元，要买棵大花还不得万儿八千的呀！我们现在还处在向着小康之路迈进的时候，离小康人家还有很远的距离，谁有那么多的钱，做这种高贵的欣赏呀！消费，缺乏现实的基础。因此，这时君子兰市场上，万元以上的高档君子兰，还只是有行无市，由几个养花大户在做象征性的买卖。你买我一株万元，我再买你一株万元。你的花好，我的也不差。做的虽然是等价交换，但却是虚拟资本。在这种交易中，收到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你提高了我的花价，我也提高了你的花价，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

当然，也不能小看这种社会意识！它虽然只是精神上的东西，但一经形成便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它既已改变了消费者的心理，也便随之开拓了消费市场。在社会上既已形成了一种观念，认定君子兰是一种高贵的东西，也就随之产生强烈的追求，正像人们追求高贵首饰、名人字画和珍贵艺术品那样，这是一种特殊的购买欲望，经济学认为，这种特殊

的购买欲望，是形成某些商品的特殊昂贵价格的基础。

但是，自从国营单位插手于君子兰买卖之后，情形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是有行无市，现在变成了有行有市；过去是虚拟资本，现在变成了现实资本。开始，是各宾馆、饭店、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美化和绿化环境为理由到市场上购买君子兰。绿化费是相当大的一笔款项，它投到市场之后，很快就把君子兰的价格抬高了。而用高贵的花卉来装点气氛，美化环境，自然使环境显得高雅不俗。君子兰曾是宫廷之物，当年曾经是皇家高雅的装饰物；今天，用它自然也会装点出一个现代化的气氛来，且有那么一股倜傥不羁的君子之风。长春洗衣机厂的一位开拓型厂长颇有见识地说：

“我们能生产出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具有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工作环境呢？于是我想到了君子兰。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你摆上一盆君子兰，立刻就能感受到它给予你的宁静感。”洗衣机厂投资了几十万，在办公主楼的顶上盖了六百平方米的空中温室，用大笔的钱购进了大批花卉。

1985年2月，吉林热电厂服务公司到养花大户王安志家，一次购买九株成龄君子兰和一些小苗，共付款十四万元。吉林市二〇一服务公司到另一养花大户家，一次购买成龄君子兰十几株和一些小苗，共付款三十二万元。

要知道，国营单位可是财大气粗呀！他们手指头缝儿稍稍漏一漏，钱财就大把大把地流出去。几十万元在他们那里是个区区小数，聚到市场上可是个相当可观的大数！在计划经济社会里，集团购买力是个强大的冲击波。若不，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为什么总是一再强调要加强集团购买力的

控制呢！

与此同时，各地的园林部门看到君子兰如此的高价，也要与民争利，因之也拿出大量公款从市场上购进优良品种，作为繁殖的母本。后来，又兴起了机关单位办企业之风。在长春市里，最容易办起来的企业莫过于君子兰公司或君子兰商店了。而要开发这种公司或商店，也得要投资，于是又从国库里拨出若干款项来，拿到君子兰市场上去购买好花。有了母花，而后才能下仔呀！母花越高贵，仔花才能卖出好价钱来！于是，水龙头又打开了，国库里的钱哗哗地流到私人的腰包里去。可这是为待业子女解决就业问题呀！公家拿出点钱来也理直气壮，名正言顺，谁也说不出来！有人粗略地做过统计，在1984年的一个月里，长春市就成立三十二家知识青年办的花木商店，几年的功夫，长春街头就出现了百余家专以经营君子兰为主的知青商店。他们要从私人那里购进多少君子兰呀！有多少公款又在为君子兰的昂贵价格撑腰！

“疯狂的君子兰交易”，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里，在这样一个社会心理状态下形成的。

君子兰沉醉在狂欢的梦境里。市场上繁华似锦，万头攒动，人人都在寻求神奇的效益。市里又增辟了几个繁华地段作为君子兰市场。每个市场都有二三里路长，从头到尾摆着的只有一种商品——君子兰。绿色的金条在召唤着万万千的人。人们你拥我挤，都低眉俯首、绞尽脑汁地在那青黄苍翠之间进行选择，在“和尚”与“技师”之间讨价还价。据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最高潮的时候每天市场可达四十万人次，也就是说，全长春有五分之一的市民走进君子兰市场，而且还不包括那些走街串巷进行无证交易的人。全国各

地有一百多个城市，北至新疆，南至广东，都有人慕名来春城购买君子兰。长春市每年的君子兰成交额竟高达一千七百万万元，一年收入的税金也有四、五十万元（还不包括那些偷税漏税的钱）。

南无阿弥陀佛！真是广开善缘，生财有道呀！

有人从外地来长春，随着人群信步走进市场，看到了疯狂的君子兰交易，一下子就看呆了。眼前的现象简直无法理解：卖君子兰的像疯子，买君子兰的像傻子。疯子疯得精神颠狂，傻子傻得拿钱打水漂。

啊，疯狂的君子兰！

谜底之五 会意格猜法

清晨，有几个工人刚刚换上工作服准备走上自己的操作台，忽然看见采购员一脸诡谲的神情，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厂长办公室。他找到厂长秘书后便悄声地说道：“唉，小王，快把厂长的门打开，我给他搬进两盆君子兰去！”

“屋里不是有他自己养的两盆吗？长得好好的，还搬来两盆干什么？”小王不以为然地说。

“你懂啥！那两盆一般，我给他换两盆高档的！这是我刚从市场上采购来的，价钱可是这个数呀！”采购员捏起了三个指头。

“他会同意吗？”小王担心地问。

“都是一样的花，在单位里摆在哪儿不是一样！”采购员总能找出人们无法回驳的理由。

厂长上班之后，也许留意也许没留意，他窗台上那两盆花怎么变了样。只有采购员知道，他这小小的移花接木戏法，

会变出万儿八千的钞票来的！

当然，采购员日后也会从厂长那里得到一定的好处，这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七十年代初期，比较流行的话是：“烟搭话，酒搭桥，解决问题大炒勺。”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进了一步，讲究什么炸药包、手榴弹、十二响（糖果、名酒、手表），还有什么“研究研究”（暗指烟酒）、“看看积压不积压”（暗指鸡鸣）、“再填个表吧”（暗指手表）。到了八十年代，经济发展了，时代进步了，那些轻武器都失灵了，某些人若想走后门办点事，得用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最好还是用“大团结”。

但是，这些轻重武器都有一个弱点：太打眼，赃迹明显，铜臭味太浓，难以洗刷。自从君子兰兴起之后，便出现了一种攻无不破的新式武器，它清幽淡雅，不带一点铜臭味道，谁能说送一棵花草，算什么行贿受贿呢？以花会友，正是一种君子之风，一种风雅韵事。至于君子兰的价值，在这里又视而不见了，它再贵，也是一棵草呀！总不能因为一棵草，犯什么法吧？

因此，君子兰便成了打开一切关系之门的绿色金钥匙。有个工厂厂长说得好：有了君子兰，出门好办事，什么签合同，要材料，求能源，找交通，别人办不到的事，有了君子兰就能办到。长春人都有这种体会，到外边办事，你不提君子兰，对方也要找机会给你点出来：“听说你们长春的君子兰很好！”

君子兰是不错！可也是个好价钱呀！

一辆小汽车轻轻地停在养花大户老B家的门前。一位××长带着秘书来看养花大户老B，老B早已打扮得衣冠楚楚，

指挥家里的人各司其职地做好了一切接待工作，××长一行在客厅里小憩，叙谈了一阵子养花之道，过问了一下养花专业户的情况之后，便走进花窖，观赏那一株比一株更鲜艳的君子兰。花儿好像也通人性似的，知道有贵客前来观赏，便格外地打起精神，显现出一身灵秀劲儿，每片叶子都风度翩翩，每朵花儿都含情脉脉，几千株君子兰就是几千颗水晶的心。

“噢，这株长得真好！”××长停立在一株花前，那像孔雀开屏似的展开的绿叶，特别地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什么品种？是你培育的？”

“噢，这盆也不错，也是你……”××长又对另一株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那是碧玉簪！这是玉蜻蜓！您看它的叶子有多宽，多厚，多么水灵！”花的主人自我欣赏地说。

“这哪里是花，简直就是仙子，只差不会说话了！”那位惯耍笔杆子的秘书跟在后边捧场说。

“花是不会说话的，可它是解人语的！古诗上不是说，良宵花解语嘛！”××长自然比秘书博学多识嘛！

××长一路谈笑风生，带着秘书在花窖里逶迤地行来。刚走出门口，花的主人便笑容可掬地问道：“××长！您喜欢那两盆花，就给您带着吧！”

××长摆了摆手，谦逊地说：“啊，不必，不必！君子不夺他人所爱嘛！”

周围的人跟在一旁圆场说：“一盆花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左右又是他自家出的！”

“是呀，是呀，是自家出的，又不是从街上买的！”

××长依然没有首肯，带着秘书便上了汽车，可是机灵

的司机却早已把车后座打开，老B一家人七手八脚把花放进去，车子一溜烟地开走了。

难怪长春市有人给君子兰运动总结了一个公式：钱——权——钱。后一个钱的上面有个黑点，表示是一个更大数目的钱，君子兰已由一个幽谷佳人，打进了政界，走进了官府，成为走后门谋私利的一个打扮得漂亮无害的活动分子。有人用君子兰找到了工作，受到了提拔，有人用它报上了户口，还有人用它寻到了职位，觅得了爱情。

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肢瘫痪的青年没有工作，在家中也没有温暖，继母冰冷的脸色让他心寒，因此他丧失了求生的渴望而想投湖自杀未遂。两年之后居然大变了样，他已寻到了爱情，寻到了快乐，春节期间结了婚。给他打开生活之门的钥匙，还是那多情的君子兰。

将近黄昏时分，天气竟阴晦起来，不久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鹅毛大雪。这时，从风雪深处蹒跚踱地走过来一人，脸上的条条皱纹，在滑稽地莫名其妙地活动着，变化着，眼角里闪烁出喜不自禁的怕人的亮光。他浑然不顾地从人群中挤过去，如入无人之境。到自家门口时他竟然再也收敛不住，一进院子就高声地说：“我提拔了，提拔了！当了科长了！”邻居打开房门探出头来，都诧异地望着这个突然变得发疯似的风雪夜归人。

“怎么了，他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人们互相探询着。

“我提拔了，提拔了！当了科长啦！”

“范进中举，乐得发疯了！”邻人们都既可笑又可怜地望着他的背影。

怎么能不使他乐得发疯呢？这个一直在大机关里当小办事员的人，几十年来，只知道一字一句地给机关抄写公文，

只知道一宗一件地听从别人的命令去办事情；命运之神总是冷落他，总是给他一个背影！现在，已经进入最后挣扎的年龄了，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没有多少挣扎本领的，冷冷落地跨过那个坎儿已是命中注定的事了。

然而，命运之神偏偏在他最后挣扎的年龄给了他一个机会。原来他与黄技师（或者是姜油匠）姑母的姑母，有那么一点远亲，从他们那里弄到了一点好花籽，种上那么十几盆君子兰；又用工作方便的机会，从养花大户那里授上花粉。也算老天有眼，他的花盆里竟然长出上乘的君子兰来。他知道自己身微位卑，不配享用这等高贵的尤物，于是便颤颤巍巍搬到领导家的客厅或花窖里去……如今，他竟然被提升为副科长了。

这两个可怜的小人物，命运之神竟如此残酷地捉弄了他们，如今又如此戏谑地拯救了他们，从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他们伸过一根手杖，将他们引渡过去。不可思议的是那只手杖竟是一棵小小的君子兰。

至于收取君子兰的那几位领导，包括自认为懂得花解语的××长，少不得还要增添以花会友的机会。××长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对于养花之道却未免有些生疏。有些难题上来了，也少不得又要去麻烦那些养花专业户。好在此事用不着他自己操心，老伴和孩子就会出面解决。那些养花大户家里都有电话，操起电话耳机，意思就传达过去了：“喂，他张叔（或李叔）吗？你看那几盆君子兰，叶子有些下垂，不知是咋回事？什么，你来看看？哎呀，又麻烦你了！”大户来了，除了自带花锄、花铲、花剪之类工具外，还要带上必不可缺的花肥、花土、花药。“噢，这屋子里的光照和温度都达不到要求，我给你们顺着这窗台，向外接个

小花窖吧！”于是，角钢、铁柱和玻璃槽子便乒乒乓乓地竖起来，亮堂堂的花窖子盖起来了。

有时，君子兰收取得多了（当然不是他要的，而是别人一再转托送过来的），也是个麻烦事：屋子里摆不下，小花窖里也装不了那许多，老伴没有那许多风雅幽情和闲情逸致，自然感到这坛坛罐罐是个劳什子，于是操起电话又把那位张叔、李叔叫来：“你看这个老东西，又弄来这堆破烂货，把屋子装得满满的，让人转不过身，透不过气来，烦死人了！我真想把它都给摔出去！”大户赶紧陪着笑脸说：“您可别摔，这可摔不得！这么着吧，我拿回去给您代养几天，逢年过节的或者是你家有了空闲的地方时，我再给您搬回来！”

过了几天，养花大户拿着一大摞钞票来，说：“那几盆花让我给卖了，这是花钱。”领导的老伴儿推辞说：“这钱怎么好拿！”养花大户说：“有啥不好拿的？他愿买我还不大愿意卖呢！”说着，把钱摆在桌子上。

谜底之六 秋千格猜法

在1985年2月18日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新闻：

2月8日上午，在红星剧场公开宣判了抢劫盗窃君子兰花的惯犯姜有田一案。姜犯以砸碎玻璃、撬门等手段，先后盗窃君子兰花十七株。尤为严重的是，有一次他竟闯入汽车厂职工宿舍武某的家里，强行抢走成龄君子兰花一株。……法院决定从严惩处这个无耻之徒，判处姜犯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啧啧，为了几盆花判了十四年刑！哪头合算？”读报的人感慨万端地议论着。

“色酒红人面，财宝动人心嘛！那是花吗？那是金条，象牙，元宝呀！”另一位见识很深的人说。

“哼，真是要命的花！”

“这算啥，还有为一盆花，送掉两条人命的呢！”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农机厅有个技术员，在家里养了两盆君子兰，花儿长得好，品种也不错，不是“花脸”，就是“圆头”。人们说这花可以卖出一个大数来。技术员有个弟弟看着红了眼，邪念侵入他的骨髓，魔鬼迷住了他的心窍，一天，他到了哥哥家里，抱起那盆花就走。技术员哪里肯依呀！弟兄俩你争我夺，撕掳在一起了。弟弟拳打脚踢，不大一会儿就把技术员给打昏过去。技术员的妻子闻声赶过来，走上前去想拦住，但已经丧失了人性的弟弟又把嫂子打昏过去，并把她塞到灶炕里。技术员苏醒过来去扶救妻子时，妻子由于伤势沉重，再加上灶里倒出来的煤烟熏呛，再也不省人事了。当然，那个贪财害命的弟弟，也难逃法网，最后，以命抵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香港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嫂弟俩为一盆花双双毙命》。

这仅是轰动一时的君子兰四大血案之一。

最大的血案，爆破吨位最高的就是那件尽人皆知的所谓“达木兰之梦”了。达木兰就是君子兰，辽南一带的人都喜欢这样称呼，就像《阿Q正传》里的未庄人都喜欢管长凳叫条凳一样。原来，在辽南的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检察院里有个姓方的检察员，他听说长春是一座宝藏着绿色金条的城市，于是，周身的邪念便不可遏止地一天天膨胀起来。一天早晨，他找来自家的两个兄弟，又约合了另外一个人，全都配戴枪支，开着一辆越野吉普径直地向长春奔去。他们要明火执仗

地去抢劫君子兰城里的君子兰。谁让它那么值钱的！遗憾的是，欲火烧昏了他们的头脑，也不知从哪个细节上走漏了风声，因此车子刚从鞍山一开出，长春公安局就接到了电话，调动起公安系统的全副武装，甚至连消防队的车辆都开动出来了。全城严阵以待。他们的吉普车一开进长春，便已进入了秘密的包围圈。当他们找到养花大户的门，刚刚举起锤子去砸花窖的玻璃窗时，连护花的黑贝还没来得及吠一声，手铐子就将他们的手紧紧铐住了。四个想君子兰想得发疯了的人，全部陷于囹圄之中。

但是，想得发了疯的人并未因此而绝迹。他们还在伺机而起，蠢蠢欲动。好像只要君子兰价格不降下来，他们就决不罢休似的。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君子兰的盗窃抢劫案一百二十七起；1985年一至五月是二百四十三起，发案率有增无减，养花人提心吊胆，社会的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连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家里的君子兰，也被盗了。

君子兰弄得人们神魂颠倒，使社会处于一种病态心理状态之中。那样一种品格高尚的花，竟会成了一股祸水，就跟当年由艳丽的罌粟花所结出的鸦片一样，一步步地污染着人们健康的肌体和纯洁的灵魂，助长歪风邪气，败坏伦理道德，破坏人们正常的价值观念，增加社会的犯罪心理和犯罪活动，导演出多少污浊怪诞的荒唐事来。

啊，堕落的君子兰！

于是，一片责难和非议之词，便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间风涌而起，特别是那些没有养花、或者是虽则养花但没有

见到经济效益的人，唾骂得更为厉害。君子兰一不能吃，二不能用，最多只有个观赏价值，怎么可以卖那么高的价呢？如今这么高的价，完全是被少数人哄抬起来的！它比精神污染还精神污染，使得许多人不上班，上了班也不专心干活，一心只想着接花授粉的事。有些中学生也不上学了，钻到君子兰市场上去当倒儿爷，成何体统！在鞍山，甚至有人给市长写信，尖锐地向市长提出质问：“你是要钢铁，还是要君子兰？”因为有不少工人不上班，在家养君子兰。娇嫩的君子兰，挤了坚硬的钢铁！

于是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接连发表文章，出现了一篇篇声讨君子兰的檄文。《人民日报》以《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为题，揭示出长春君子兰市场之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靠挖国家财政的墙脚所致，是一种虚假的繁荣。长春君子兰市场的这种交易，既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不是第三产业，而是一种“虚业”。搞四化建设要踏踏实实地干实事，而不是干这种虚事。《吉林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一鼓作气地发了一评、再评、三评《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的文章，揭露和抨击了疯狂的君子兰交易中的种种弊端和劣迹，措词严厉，声势猛烈。其它的报纸，如《团结报》、《天津日报》等也有专论发表。

君子兰交易的反常现象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1985年6月1日，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虽然依然提出要继续发展君子兰的优势，让市花怒放春城，但是却补充了几个关键性的细节，仅此几个细节，就使得那奇高的价格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几条细节是：“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

导干部养殖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此外，对于那些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偷税漏税和不按指定地点交易影响市容和交通的，都提出了严厉的惩治办法。为此，市里还专门抽调了公安、税收、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了联合办公室，深入到市场内外去明察暗访，严格执行法纪。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就取缔了一千多人次的场外交易，惩治了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的违法案件二百四十起，追回补交的税款四万五千元。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堕落的君子兰得救了，它那颗锈损了的灵魂经过洗礼而得到了升华。从现在起，它开始洁身自守，不再勾引良家子弟，特别是那些在职职工与共产党员。它不再用金钱去撩拨人心，干出许多合理不合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事情来了。市场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场内井然有序，场外交易明显减少。自从省报的三篇评论文章发表，再加上市场管理的几条补充规定，不出两个月的时间，君子兰的价格不仅是一落千丈，而是一落万丈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如果旧时的燕子再飞到春城来的话，它决然不会相信街上卖的还是昔日那赫赫有名的长春君子兰，还是那曾经让人们心旌摇动的“小小圆头”与“花脸和尚”。

那份为君子兰苦苦辩争的《长春君子兰报》，在那不可遏止的急退狂潮之中，如何能够支撑得住呢？它在君子兰价

格跌到谷底的前夕，便自动宣告停刊了。

大报战胜了小报，理智战胜了疯狂，常规战胜了病态。

只是稍微冷落了君子兰市场，那里已是人影疏落了；同时，也冷落了一些养花专业户，他们赔得叫苦不迭。名贵的市花君子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显赫发光了。

至此，乱哄哄的一场君子兰闹剧收场了！这样一场离奇古怪的闹剧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发生是不足奇的，这是初有开放意识欲把经济搞活但对搞活的观念仍很朦胧、初学走路但步子仍迈不很稳的人，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

君子兰从沉醉的梦中醒来，连它自己也无法理解，它是怎样走过了那令人头晕目眩的不可思议的四个阶段：从高贵的君子兰到疯狂的君子兰，到堕落的君子兰，到衰败的君子兰。在这离奇古怪的四个阶段里，正不知酿成了多少出轰动南北的人间喜剧、悲剧和闹剧来！

猜残灯谜无人解，何处凭添两鬓丝？

至此，谜底我们已经推出了六个，有人可能要问，到底是哪个谜底射中了？影响到君子兰价格如此地暴涨暴落？我们只能说：长春君子兰价格的奇迹，是上述几方面的合成力所致，是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致，我们只能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来揭开君子兰的价格之谜。

尾 声

时间：在君子兰被批得如同失贞少女，再也抬不起头来的半年之后。

地点：总是令人产生倾慕感情的繁华城市——香港。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在一片温柔的嫩黄的阳光下，空

气中仿佛总是响着一种微妙的撩人心弦的声音。街上熙熙攘攘，在两排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间，样式繁多的小汽车覆盖着路面，像一条彩色的河流在急速地流淌着。通过了车的河谷，人们川流不息地向大会堂方向走去，心头怀着盎然的春意去观赏第十九届花卉展览。能够引起香港人更多的美好冲动和缠绵缱绻的乡土感情的是：北国的长春君子兰竟然夺得了盆栽花卉冠军，成了本次花展的皇后。

千里迢迢，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这次花展的两盆君子兰，一名“长寿”，一名“风舞”。“风舞”独占花魁。花的主人是：长春君子兰专业户、君子兰技术学校顾问张道路同志，他获得了一只金光闪闪的嘉多里奖杯和两万元港币的奖金。

长春君子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风舞”和“长寿”的名字传遍了香港。港九的人们都被这充满着高贵和吉祥的花儿给迷住了，香港《文汇报》还专门发表《宫廷御花君子兰》的文章，编写了观赏君子兰的十条要诀，让人们快到大会堂去，“不妨根据这十诀歌谣来细细品味！”

1986年3月，长春君子兰还在广州越秀公园的花卉馆里展出。在北国春城已被咒骂成一身祸水、通体邪祟的君子兰，在南国花城里又受到了一片青睐。每天有数千人到花卉馆去参观这北国名花，连省市许多领导同志都去参观了，并给了很高的评价。孟加拉国国防部的四位将军也参观了花展，刚柔并蓄、端庄雅丽的君子兰，使他们盛赞不已：“在世界上走了这么多国家，还没有见过这么美好的兰花！希望你们能去孟加拉国展出！”美籍华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东亚分公司负责人李铁芬女士也对此花爱不释手，邀请长春养花专业户到美国去展览，当场就以一元钱一粒的价格，买下了三十

粒花种籽。

张道路荣获嘉多里金杯的消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花卉报》、广东《花鸟世界报》、《羊城晚报》和《信息时报》等许多报刊上都以显著地位刊出，有的还配以大幅彩照，但在君子兰出生的本省市的报纸上却只字未提。

君子兰现在正纷纷办理迁移户口手续，大量地从长春转向外地，希图在外地寻找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许多长春养花户惋惜地说：“为什么我们培养出的凤凰，让它到外地下蛋去？”

为什么？当然没有人去回答，这是由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所决定的。不过在长春，君子兰也在自找门路，它已转变了投资方向：由观赏型转变为科研型，由经营型转变为生产型。业经市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北方君子兰公司已与贵州茅台酿造厂进行横向经济联系，共同投资开办了一所“君子兰滋补饮料酒厂”。他们利用君子兰的抗癌效能，生产君子兰高级滋补酒、君子兰小香槟、君子兰清凉液等产品。

预测未来，君子兰饮料也许会风靡市场，誉满全球，领导着饮料市场的时代新潮流；也许会在下一届（或者是下下一届）的奥运会上，各国来宾从飞机升降梯上走下来，运动员从赛场上跑出来，广大观众从看台上走出来之后，争着抢着要打开瓶口的饮料，不是美国的可口可乐，而是长春的君子兰可乐。

有人询问：“味道怎么样？”

饮者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OK，味道好极了！”

也许这并不是幻想！谁知道呢？当前正是处于开拓的时

代，一切都得用八十年代的眼光、或者是用九十年代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看待问题。老脑筋是不行了，整个世界都在开拓中飞旋，何况君子兰呢！

噢，君子兰呀，君子兰！

附注：

谜格是猜谜语的一种方法，灯谜共有谜格二十四种，常用者有鹅顶格、卷帘格、会意格、白头格、破损格、拆字格、秋千格、徐妃格、求凰格等。鹅顶格，就是把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联起来猜；卷帘格，就是把一句话倒过来读；白头格，就是把第一个字读成别字；拆字格，就是把谜面的字拆破；破损格，也是拆字，但谜底的字拆得不完整；会意格，是从揣想上领悟；求凰格，是猜对应物等等。

烹饪王国的“吃喝疯”

科学最新发现：限食能够使人长寿。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阿瑟·埃弗里特在大鼠身上进行了一项试验，热能食物供应减半的大鼠和食物摄取正常的大鼠相比，少食的大鼠不仅健康，而且活得时间较长，可以避免许多退化性疾病和癌症。进行相同试验的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阿鲁恩·罗伊认为，如果人类采用“少吃”这种饮食模式，能使概率寿命增加20—30%，通常情况下一般人的寿命可由平均七十二岁延长至一百〇二岁。他还指出，“限食”行为开始得越早，持续时间越长，寿命越可能延长。

多么令人鼓舞的科学发现！不知道这两位教授是否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金？

我国古代医学早有论述，粗食和素食具有增强脾胃、养气补元、防止秃顶等功能。不过，我们这些有着悠久医学历史的龙的传人，对于祖先的文化遗产和最新的科学发现并不怎么信服，大多数人还是崇尚美食，有一段时间举国上下甚至刮起愈演愈烈的吃喝风。

远去的时光已经淡漠，留下的印象说不大清楚了。自从跨进八十年代门坎之后，一会儿倡导高消费与能挣会花，一

会儿倡导公共交际和横向联系，吃饭招待无法避免，于是乎从城市到乡村，从干部到群众，从民间到官场，铺陈排场、大吃大喝之风便蔓延开来。

在民间，婚丧嫁娶，生辰忌日，亲友相聚，送行接风，不仅当吃必吃，而且吃的花样越来越多，吃的规格越来越高，令人瞠目结舌。据福建省农村抽样调查组对福鼎县的调查，该县农村1986年用于红白喜事费用是一千七百六十四万元，人均四十四元五角。用这笔钱可以购买五千部小拖拉机，兴办四百二十三个乡镇企业，安排八千多人就业。然而他们却把这笔钱生生吃掉了！贵州省修文县有个组织部长，老父病故时他做了三天道场，购买猪肉六百公斤，菜油五百公斤，大米一千公斤，白酒一百公斤，香烟一百多条，办酒席一百二十桌。在温州地区，有的人结婚要花三四万元请吃请喝。难怪有位美籍华人从异国他乡归来，见到这番情景惊叹道：“这是未富先豪！”

联合国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将世界各个国家划分为六个档次：即高度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中收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加纳等国均属第五类——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可是我们的宴席场面与吃喝之风，其丰盛排场程度远远超过中收入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然而，这种大吃大喝未富先豪的状况如果仅仅限于民间倒也罢了，你花你的钱，你请你的客，纵然极尽奢侈排场之能事，也不过倾其囊中所有。可是这风气一旦扩展到官场上，扩展到使用公款招待吃喝上，可就是无边无沿、无止无休了。王熙凤感叹：“十里搭凉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想

当初，荣国府虽富贵簪缨、衣团锦绣，可毕竟是私宴，总还有个边儿，而当今的公款吃喝花的是国库的钱，可就不是十里搭凉棚，而是百里千里万里，有天天吃不完的筵席了。开会要吃，参观要吃，协作洽谈要吃，签订合同要吃，上级单位来人要吃，兄弟单位来访要吃，新产品问世要吃，大项目竣工要吃，周年纪念要吃，开工典礼要吃，干部上任、晋升要吃，离任、解职也要吃。吃请和请吃的机会接二连三，有的人竟在宴席中度过了朝朝暮暮，被尊称为“吃喝专员”、“吃喝书记”、“吃喝经理”。

有好事者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以志其事：

上联：厂庆、场庆、矿庆、社庆、店庆、处处可庆；

下联：卅年、廿年、十年、五年、一年、年年能吃。

横批：普天同庆。

吃的名目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如果有人要增补《吉尼斯世界之最》的话，中国的公款吃喝应列上一条。

全国上上下下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屡反不绝，形成了一条不算规律的规律：越往下边去，吃的名堂越多，席面越丰盛。有些区乡干部巴不得上边每天都能来个人，他们便可以天天陪着吃它个不亦乐乎。

难怪人们感叹：“现在的吃喝风已经成了‘吃喝疯’了，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病’！”

令人振奋的是，这次中央清除腐败的决心很大，首先由江西带了个好头，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专门颁布了《关于坚决刹住吃喝风的试行规定》，关于吃喝和接待标准都做了详文规定，各级领导身体力行，这项廉政措施很快推广到全

国，每年要花掉几百亿元的吃喝风，终于得到了有效的制止，积重难返的“社会病”得到了彻底的治疗。

本文是在治理这种“社会病”的过程中写就，所列举的材料，都是治理前发生的事（也有少量是治理中发生的事）。古人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吃喝风已被世人称作“吃喝疯”病，因此，这里运用中医诊断疾病的“八纲辨证”路数，由表及里、由虚带实地将其一一诊治一番，期望能够对“吃喝疯”病患者聊有裨益。

一、外邪犯表 内传入里

“吃喝疯”作为一种“社会病”，依照“八纲辨证”的路数，从病体部位来说，不是里症，当是表症；从病的性质来说，不是寒症，当是热症；从邪正盛衰来说，不是虚症，当是实症；从错综变化来说，不是阴症，当是阳症。但是，其中又都有个浮沉得失和真假正邪的更迭过程，个中的五味不是一下子就可参透的。

下面，我且冒昧地依序说来，先说表症。按医书上讲：“表症，是六淫外邪从人的皮毛、口鼻侵入肌体所致的症候。”细心想一想，“吃喝疯”不正是外邪犯表，常侵不解，进而内传入里而染患成疾的吗！

美国有一家杂志曾就“哪个国家的菜最好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竟有9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菜最好吃。

中国餐馆风靡全世界。在意大利米兰市就有三百八十家中餐馆，连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也有八十多家，而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中国餐馆则上千家上万家，甚至

十几万家，仅在日本东京“芝”区的留园饭店，就集中了北京全聚德、东来顺、便宜坊等五家餐馆的精华。

中国在上世界上被誉为“烹饪王国”。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吃”的文化，盛传川、扬、粤、鲁四大菜系，此外还有京味、晋味、陕味、宫廷膳食、孔府膳食等等，不一而足，璀璨绚烂，丰富多彩。

翻开我国古代史书典籍，堂皇庄重地记载吃喝场面的篇章不计其数，关于争吃争喝而一命呜呼的也不乏其事。最著名的有“晏婴二桃杀三士”，“郑子公染指于烹鼋鼎内”，“楚商臣逼父不准其吃熊掌”等故事流传于世。

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偏偏儒家的两位开山鼻祖就特别地注重讲究吃喝。《论语》中有好几处记述了孔子对于饮食的追究。比如“席不正不食”，“割不方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等。孟子也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可见，我们的“吃”文化确实历史悠久，吃的欲望源远流长。

吃，对于烹饪王国的子孙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诱惑，在《内经》上便称作“邪”。

邪侵入表，能够排遣、消散，自然不会淤积入脾，郁结成疾；可是有些地方有些人却偏偏不能排遣消散，特别是倡导高消费与公关交往、横向联系以来，客观上，对于吃者打开了一切机会之门。

有人说：且慢，中央有了四菜一汤的规定，刹了吃喝风。怎道还为吃者打开了一切机会之门呢？

可事情偏偏有另一方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某报摘抄一段《关于“四菜一汤”的会议记录》：

“参加人：一、二、四、五把手，三把手办公室主任从外地归来，参加了一半会。

“老A：咱们开个短会，今天只一项议程，研究一下如何执行‘四菜一汤’的规定。我们是领导机关，过去一到下边去，不论是公干还是私访，人家总是盛情款待，用公款大吃大喝，造成极大浪费，影响也不好。现在提倡廉政，要从领导机关做起，先从我们做起，从我做起嘛！而廉政又需从狠刹公款吃喝开刀，今天咱们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个决议。

“老B：这个‘四菜一汤’的内涵与外延要搞清楚。这些年来，咱们对上边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下边对咱们也是咱有政策人家有对策。谁都不好意思真的端上四菜一汤，到人家串个门还要弄上十个八个菜嘛！所以，名义上是四菜一汤，实际上呢，这个撤下去那个又端上来，桌上虽总是四菜一汤，可一顿饭撤几次换几次，还不是一二十个菜！这回咱们说到做到，四菜一汤，从开席到散席……

“老E：还得规定一下四菜一汤的档次，每个菜的价码大致有个标准（看来严格规定菜价也不大现实），就是说尽量别超过多少钱。

“老D：这很难做到！

“老B：怎么规定？你规定低了人家觉得咱不通情达理，若规定高了呢，人家也为难哪，还是别规定好些。

“老D：入乡随俗吧！还是客随主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老A：下边太热情，只要知道你下去，头半个月就准备伙食。

“老E：今后下去可以不打招呼。

（这时老C从外地归来，老B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会议内容。）

“老C：不打招呼不对！你下去，人家总得准备个汇报什么的。你不打招呼，人家会以为咱们是故意搞突然袭击，感情上也说不过去嘛！”

“老D：已经离体的几位老领导是不是就不必受这‘四菜一汤’的限制了？”

“老B：对他们可以加一、二个菜！比如说五个，噢，中国的习惯是双数，那就六菜一汤吧！”

“老A：其实加个菜倒不需要多少钱，可这就不是‘四菜一汤’了……”

“老C：他们年纪大，下边会谅解的，老领导嘛！”

“老D：上级到咱们这来可怎么执行呢？也是四菜一汤？”

“老A：那就见机行事好了！不妨多准备些，他乐意，就上；若碰上个叫真格的主儿，就撤嘛……”

上边这段文字是否完全纪实，或许杂有若干虚构成分，我不敢保证。但这种事儿，这番理儿，我敢断定是有相当普遍性的。

有一年我去海南岛，就亲身听到这么一段新闻。那里有个颇有名气的农场，农场里有个颇有点名气的老场长。老场长已年过六旬，身板结实，精爽干练，常年穿一身短裤短衫，戴顶球帽，像刚从球场上下来的体育明星或教练。我们都戏称他为“花甲少年”。说起他的办事本领，真叫人佩服。他曾得意地告诉我们：上个月有几位领导同志到我们这里来，没来之前，上边就打招呼，让我们严守“四菜一汤”

规定，不饮酒。下边人问我，这能办到吗？我说你们都准备好，到时候看我的眼色行事！领导来了，我们上的确实是四菜一汤，但这四菜，每道都是个大拼盘，每盘装的都是四五个菜，四盘就是二十个菜。汤呢？我们是八珍荟萃火锅汤，每人一个火锅，里边什么山珍海味全有了。领导同志先是不喝酒，有人去斟，他就用手把杯子捂住。我见势就向领导汇报说：我们农场最近办了个啤酒厂，生产了一种啤酒，质量还不过关，领导恐怕是不会品尝的了？领导听说立即兴起，很关心地说：喔，办了个啤酒厂？怎么样？味道还不过关？那就拿来尝尝嘛！我听领导这么一说，马上向服务人员递了个眼色，于是酒便一杯杯地斟上了。先是啤酒，一片赞扬声，后来别的酒也斟上了。领导走后，当地的头头都夸我会办事。

这位老少年真有他一套老把戏！于不知不觉之间请君入彀。

其它地方，虽然没有这位本领高强的“花甲少年”，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也都各有各的高招。

表面看，这“四菜一汤”是对公款吃喝的一个规定，可是规定一出，人们会另有一番理解——由此公款吃喝便合法化了。何况当时还定下了许多例外与补充，说是在某种场合（例如洽谈交往、横向联系等业务活动）可以不照章办事。有了例外，大家都可以生着法儿制造例外，变着法儿援例去做。这个可上可下可圆可方的伸缩性，极大地为公款吃喝打开了方便之门。

说起来，“四菜一汤”本是一个限定，但事情的发展正像老黑格尔说的，“有了界限，就意味着将要突破这个界限！”

近闻有人篡改毛主席语录，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从理论上讲，确实荒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常见。你要搞公关交际、横向联系、送往迎来、鉴定验收、评比考核，不请客吃饭还真办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事情就是要在筵席宾客之间觥筹交错之际，方能拍板；有些考核鉴定（不都是如此，但总有一小半儿）是根据杯盘上的诚意，确定出名次和标准。报载：某酒厂为评上金牌或银牌，出巨款宴请评委吃喝并送礼，弄得工厂亏损险些倒闭。这当然是极端的典型，过而言之例子。不过，对大多数单位来说，不请客吃饭就办不了事。尽管大家对此都很头疼，但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把革命和请客吃饭联到一起，出言不恭，极不严肃。革命，是个神圣的字眼，人们不会忘记“以革命的名义”那句庄严的誓词。但如果把“革命”二字换成“办事”（自然办的是革命的事，或是为革命办事），说“办事就是请客吃饭”，确是明明白白，谁都无法否认的约定俗成。

办事与请客吃饭在原理上不是个恒等式，但在现实中却成了恒等式。

唯其办事就要请客吃饭，推演它的逆定理：会请客吃饭的人，才是会办事的人，在现实中也是成立的。像“花甲少年”那样的人，谁不称道，谁不重用？识时务者为俊杰，像这种会办事的人，在各地方各单位各部门里自然应运而生。反之，不会想法请客吃饭的，或者虽能请客吃饭，但办得不爽利、主客都不能尽欢而散，甚至造成“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那般情景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其仕途多少要受点影响。前两年报上披露一条消息：某县选举县长

时，某人因为不会饮酒应酬，竟然落选。因之民间流传一首顺口溜：“坚持原则意见多，好好先生选票多，拉拉扯扯朋友多，吃吃喝喝好处多。”

也有人极而言之说，现在做地方干部要三会：喝酒、跳舞、打麻将。这是三种看家本领，哪个上级哪个协作单位来了人，都能招待得融融洽洽，应付自如；哪个场面都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人们称赞他们是：“喝酒七两八两不带醉的，打麻将三宿两宿不用睡的，跳舞三步四步全都会的。”难怪有的人自嘲是“酒精考验”（而不是久经考验）的干部。

这样一来，吃喝能不成风成痼吗？表邪不解，侵犯肌里，自然积患成疾。

二、热邪炽盛 口关不固

“吃喝痼”就病的性质来说，属于热症，是感受热邪引起的。《中医学》认为：“热症是肌体的机能活动亢进的症候，其临床表现为：发热喜凉，口渴喜冷饮，面红耳赤，烦躁不安，舌苔黄而干，脉数。”从这些表象来看，果然与“吃喝痼”句句对症。

我有一位搞科研的朋友，虽是个务实的科学家，但是自从得过几次科学发明奖后，请吃请喝的席面就日见其多了。他逻辑思维系统敏捷过人，曾将他在席中所见所闻归纳出五部曲。人们听了品咂一下，皆点头称是。这五部曲是：

第一部：雅言趣语；

第二部：豪言壮语；

第三部：胡言乱语；

第四部：自言自语；

第五部：不言不语。

一个大筵席摆开，宾主入座，春风扑面，笑逐颜开，主人殷勤地敬酒让酒，客人谦逊地答酒谢酒，人们均保持充分的冷静和从容，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言谈间，和风细雨，温文尔雅。这是筵席的第一部曲。待到三杯酒落肚，温度升高，席面活跃了，说话的调门跟着拔高，就出现了满座豪言壮语的场面，一个比着一个亮出喝酒的本事，这是第二部曲。接着越喝酒意越浓，胆气越壮，于是乎，该说的话和不该说的话统统吐为快，到了胡言乱语的第三部。再往下不停地推杯换盏，酒就喝过劲了。开始神志恍惚，精疲力竭，互相间自然无法对话，只有自言自语了，这是第四部。待到最后连自言自语的劲儿都没了，便阖上眼皮打瞌睡不言不语，恰是夜阑人静酒席将散的时候了。

“将进酒，杯莫停！”讲起劝酒，四面八方可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有各的一套本事。有的讲“鱼头酒”，有的讲“鸡尾酒”，各说各的东道令。客人嘛，自然是入乡随俗。菜一端上来，鱼头对着谁，谁就得自饮一盅，然后举起筷子挟第一口，算是为这道鱼剪彩。“鸡尾酒”嘛，语义双关，盘中的鸡尾对着谁，谁就享受如同鱼头一般的殊荣。

东北还有一套嗑儿，叫作“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主人把杯子向你碰过来，念过这套嗑儿，看你怎么办？自然是要拼着老命闷它一口了，不然，这感情上怎么说得过去？

为了应付这种场面，有的领导竟要常常带着酒坛子下乡。所谓酒坛子，并非瓷坛瓦罐一类的东西，而是指酒包、酒鬼、高阳酒徒。领导怕自己闷得多了，酒后失态，当其感到处

于困力不从心之际，便将酒坛子搬出来保驾，为己代劳。这也是为了维持场面，防止出现冷落寡欢、尴尬沉闷的局面。

酒，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文化，我国有着悠久的“酒”的文明。远的不说，仅茅台酒就有二千一百年的历史。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几千年来，酒曾经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许多光彩，当然，人们也在推杯换盏之间耗去了大量的粮食。可是历史上，人们从没有像当今这样消费这么多的酒。统计数字不偏不倚不张不隐地告诉人们，1988年我国酒产量是一千一百五十四万吨，耗用粮食二百八十亿斤，相当于全国十一亿人口一个月的口粮。其中啤酒增加得最快，每年以30%的高速度递增，现在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啤酒的故乡西德了。

据有关部门透露，在我们融融洽洽的餐桌上，1986年喝掉国产酒六百万吨，耗人民币一百三十亿元，喝掉进口酒二千五百吨，耗去外汇四百五十万美元。

渐近神州酒意浓。

酒的生产量和消耗量这样高速度地增长，不论从哪个方位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说不与吃喝风的盛行存在着一种互相支撑、彼此联动的关系。

有人说得好：“白酒白酒，唯其是‘白酒’（白喝的酒），才要喝它个一醉方休！”

且看那些用公款摆出的大小筵席场面：

在河南沁阳县管辖的一个小小单位里，主事人在玉斌酒楼上请客吃饭。席上除了摆有三十几盘菜之外，还有八大名酒五粮液。入座的八个人成了醉八仙，全都喝得醅酊大醉。

等他们杯盘狼藉扬长而去之后，村民将剩菜剩酒汇到一起担回去喂猪，想不到十头猪崽全部醉倒，躺在猪栏里竟昏睡了两天。

茅台是酒中之王，因为它的名气太大，所以身价一涨再涨，由八元一瓶涨到二十四元、三十九元、六十三元，但还是供不应求，最后涨到二百四十元，高级饭店卖二百五十元，这回在柜台上摆住了，但依然有人光顾。河南开封的一家烟酒公司半年时间就卖出五百瓶。不问可知，这些买主中，绝大多数花的是公款。

1988年底，北京有些单位搞年终评比都到东来顺聚餐。席上吃的喝的不说，临走时每人还要带上两瓶茅台酒。

公款筵席是个法力无边的大网，就像童话里的魔毯，一铺开就可以把天下味最美、质最精的食品全兜进去。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能收罗来；山珍海味，八珍九馐，应有尽有。

近来，人们越吃口胃越高，平素见怪的东西已经不稀罕了。大鱼大肉已是“乡巴佬”，全鸡全鸭成了“土老帽”。有人提出一个口号：“鸡鸭鹅鱼猪羊赶下台，乌龟王八毒蛇爬上来。”许多人海参鱿鱼早已吃腻，对虾大蟹口感一般，唯有一二百元的燕窝鱼翅和五百元一只的熊掌才能调动胃口；而且越是稀珍名贵、难以寻觅的东西，吃起来越是感到够味儿！

许多珍稀动物属国家重点保护对象，明令严禁捕猎。可是在黑龙江的一些公款宴席上，却可以吃到飞龙、天鹅、秋沙鸭；在海南岛可以吃到穿山甲、猕猴和坡鹿。舆论不断惊呼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越来越少，濒于灭绝，可是餐桌上摆出

来的花样却越来越丰富。

青蛙是益虫，国家早有明令禁止捕杀。但是因为餐桌上人们追求这点口福，于是就刺激一些人下乡捉青蛙。快手一夜功夫可捉一千只，功夫一般的也能捉三五百。蛙肉几十元一公斤，捕者几个月功夫便成了“青蛙万元户”。无数的青蛙骑士和青蛙公主都作了砧上肉、镬中羹了。在上海的一些大菜市场，斩头去皮的青蛙肉一次上市就是几百斤。自然界由此失去生态平衡，蚊虻蛾蚋等害虫失去了天敌和克星，可就无人关心无人顾及了。

深圳的香蜜湖有个外表上看很不显眼的餐馆，名叫“香蜜湖度假村员工食堂”，却远近驰名，专以经营野味招待四方食客，有几道菜，诸如天麻炖猫头鹰、清煮穿山甲、红烧娃娃鱼、药材炖猕猴等，是很能调人胃口的。

1988年4月1日，餐馆因破坏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而被查封。清查组在餐馆旁边的动物园（实际上就是餐馆特设的菜篮子）里，查出被囚禁的猫头鹰1只、山鹰4只、穿山甲8只、猕猴10只、蟒蛇9条、山瑞11只、娃娃鱼5条。此外，还查出已被杀死的猕猴和穿山甲等残体140多斤，雪豹皮1张，华南虎皮3张（需要指出：华南虎目前只有中国出产，现已濒于灭绝，总数只有四五十只，已被世界列为“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多么残忍的行径！

吃这些珍稀野味是要花很大价钱的（实际上，它们的肉并不怎么好吃，比如老虎的肉就有些发酸，可是一些人偏有这种吃稀奇的癖好），一般是吃不起的。在查封香蜜湖野味餐馆时，从他们的收据存根中发现，前来享受野味的食客，除了香港一些有钱的阔老板外，都是本市和外地的机关

企业单位，他们凭公款报销，有的在名片上还专门写明“预定老虎肉”。

据熟悉情况的人披露，像这种野味餐馆不仅香蜜湖有，深圳的许多饭馆酒店都做这种生意。有的明目张胆地把娃娃鱼等禁捕动物摆在店前招揽过客，有的靠“拉客女”悄悄地向人泄露隐情：“先生，店里有娃娃鱼，五十元一斤，穿山甲四十元，猫头鹰五十元……”能够走进去享受的人自然大都是用公款请吃和吃请的“大户”。

筵席的主人每当献上一种山珍海味和土特产品时，为引起人们的食欲，总能从药性物理上讲出一大堆名堂，有的竟搬出《本草纲目》一类的经典。例如吃猴子可增机灵，吃鹿能敏捷，吃熊能壮力，吃骆驼能增强耐力等等，此外还有补阴补阳补肾补肝种种说法。近来，又增添了一种新花样，凡是能够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的食品一端上来，都要加上防癌治癌的宣传，那真是神奇效应，马上就把一桌人的胃口调起来，纷纷举起已经放下的筷子。

总之，席面上是唯恐不够丰满隆盛，不够味珍品稀。有好事者编了一副对联，专门吟咏公款筵席的盛况：

上联：迎宾十菜一汤，尝八宝鸡、凤凰腿、全家福等山珍海味，直吃得挺腰拔肚，花公共款何必小气；

下联：陪客一桌十人，品五粮液，杏花村、味美思诸佳酿名酒，喝他个天昏地暗，嫌国家概干嘛伤心！

三、实虚夹杂 伤神滞胃

“吃喝疯”如按病的正邪盛衰状况来说，当属实症；但它却是虚实夹杂，由实向虚转化，即医家所谓“至虚有盛

候，大实有羸状。”根据临床表现，《中医学》认为：“精神兴奋，声高气粗，形体壮实，舌苔厚腻。”看来与“吃喝疯”也很对症。

近闻美国纽约有一个世界闻名的香料大王，他有一项超人的长处——生有一个“伟大的鼻子”。在他五平方厘米的鼻孔内壁，生有较之常人多出几倍的嗅觉感受细胞，他能够从众多使人迷乱的混合气体中，立即分辨出某种关键性元素。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一共发现并制造出一万多种气味。他十分得意地声称：“在日常生活中，凡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凡是人们感到需要的气味，我都能制造。”

世人对他那个伟大的鼻子，莫不叹为观止。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好像“吃喝疯”症患者也都生有一个非凡的鼻子。这种鼻子的特异功能在于善辨酒肉香味。同香料大王稍近相似的是，日常生活中，只要他想象到的酒肉香味，就能设法造出成品。

四川省泸州市委书记路森令就有这种特异功能。他在调到省里任人事局长时，先是以“告别”、“辞行”之名大吃大喝了几通，可是馋瘾未过，他又凭借非凡的鼻子在下属的五县一区六十七个单位里想象一番香味，然后跑下去制造香味。结果，在三十三天的时间里吃了五十二桌筵席，耗去人民币七千多元。

无独有偶。四川省安康行署专员魏明生也有同样的功能。他在临调到省里荣任经委副主任之前，四下里寻吃寻喝，制造扑鼻酒香和美味佳肴，花去国家钱财五千多元。

人们对这些人的能耐有口皆“碑”：“嘴里没有味，出去开个会，肚里想挂油，下去走一走！”

实际上，制造酒筵香味并非只在荣升、晋职、厂庆、社庆、奠基、剪彩等喜庆之日，有的地方在丧葬、追悼等丧事活动中也要借机大吃一顿。有一年，我去河北省某个县采访，那里因抢救井底中毒的乡民而牺牲了两名战士，县里正在开烈士表彰大会。大会刚一结束，主持人马上就宣布赴宴者的桌次名单。我坐在宴席上端起酒杯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由得想起《儒林外史》中王玉辉去赴县里为三姑娘立贞节牌坊宴席的情景。

我确信，像我碰到的这种苦涩的筵席绝不是个别的。果然今天一翻开报纸，就有一个实例钻入我的眼帘。江苏省铜山县有一名副县长病逝，县里除照例为他举行追悼会之外，又破例动用公款五千余元办了几十桌的酒席。

死者长已矣，生者无悲泣。当吃当喝绝不能放过机会！更有一等丑陋行为，叫作“吃贫”。

前些时候，有些贫困地区的干部为了伸手向国家要钱，总是尽量把自己属下的老百姓生活说得越穷越好，可是等扶贫的款子一拨下来，便把老百姓的贫困丢到脖子后边，张开大嘴吞吃起那笔扶贫的款子来。他们除了盖宾馆、造宿舍、建剧场、买轿车之外，还学起富裕地方的样子，找出一切名堂摆开筵席大吃大喝。

河北省广宗县被列入全国一百个贫困县的榜内，穷得县府机关里的干部三个人坐两把椅子，村里的老百姓还住着土坯房，可他们一接到国家扶贫的款子，便不停地大吃大喝。该县唐町乡的干部几乎是天天都用公款请吃和吃请，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二万元，他们的吃喝就花去将近一万元。老百姓形容这些干部是“蚂蚱队”。

河南省某县某乡依靠上级拨下的扶贫款子兴办起一座规模不大的麻纺厂，开机那天，乡政府借机向各部门发出请柬四百七十二张。盛况超出预料，实到人数四百七十五人，摆了四十八桌酒席，吃的是鸡鸭鱼肉，喝的是五粮液，耗资之巨足以想象。与此同时，乡里有三百余人正面临亟待解决的缺粮问题。

1987年8月4日，黑龙江省呼兰县遭受龙卷风袭击，有些地方腰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地里的庄稼倒伏一片，村里几百间民房屋顶被掀掉。可是就在这天中午，县委书记和县长却带领一班人马到邻县吃请去了。灾情虽怵目惊心，但宴席不能不赴。前些日子他们请邻县来赴宴时，在座的都是领导班子中的一二把手。此次旗鼓要相当，也得书记对书记、县长对县长才不失礼仪。有什么法子呢？生活中就有这个不成明文的规定嘛！

湖南省大庸县是个老区，当年贺龙同志在这里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如今仍没有摘掉贫困的帽子。1987年，上级拨去了一笔救济款，县里却用这笔钱去吃喝、造宾馆、买小汽车。老百姓又气又急，跪到贺龙铜像下悲愤地痛哭。

平心而论，这些贫困县里的干部也并非存心有意吃贫，他们吃贫也有非吃不可的难处。不在个中，难以理解个中的苦楚。有位贫困县的干部讲述他的难处说：“我们也知道用公款请客这样大吃大喝不好，可是不如此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争指标，要拨款，都得上头点头。可上头主管部门的钱财也有限，多给了这个县就必然少给那个县，你不请客别人请，最后吃亏的还不是你？不瞒你说，咱们贫困县的这块牌子，也还是请吃请喝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才争来的！”

谁能说不是这个理儿呢？吃贫也有吃贫的因由和苦衷。

现在好了，中央雷厉风行地清除腐败，大搞廉政建设，撤了“吃喝书记”和“吃喝专员”的职，堵塞了请客送礼的歪风。可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是极个别的），就在我们派出工作组去清除吃喝“蚂蚱队”、检查廉政建设的时候，去检查的人有的又一路吃喝起来。

1989年7月，湖北咸宁地区工商管理局派出二十余名干部组成的廉政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廉政进展情况”。他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检查下去，一个县一个县地吃喝起来。吃的是冷素热荤十余个菜，喝的是啤酒果酒白酒，抽的是阿诗玛、石林、白沙等名烟，住的是带空调的宾馆。更有趣的是，每当他们吃完喝完听完汇报之后，还要板起面孔一脸严肃地问：“你们这里有没有白吃白喝白拿的工商人员？”

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有句黎巴嫩谚语形容这类人倒很恰当：“说话时像只苍鹰，做起事来像只泥鳅。”当地群众气愤地说：你们就别叫廉政检查团了，就叫吃喝团吧！

当然，也有敢于挺身而出和吃喝团顶着干，硬是不给面子的。1989年5月，许昌市卫生局派出个“新会计制度执行情况验收组”，到下属各县检查。到了长葛县卫生局，中午请他们吃了8个凉盘6个热炒，喝过啤酒又要白酒，吃喝完了又要好烟。晚饭时接待人员安排了便饭，验收组马上把脸子拉了下来，直言不讳地提出再弄酒和菜，中午没有喝好晚上要补上。这事被县卫生局长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就向验收组发出通知，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让他们走。卫生局长大义凛然地说：“像这样要吃要喝的检查组，我们宁可落个倒数第一，也不欢迎他们检查！”

好一个铁面无私老包公！后来，长葛县委书记在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他们轰走验收组这一壮举。

对于“吃喝疯”病，还是要扶正祛邪，标本齐治，下下深针，动动灸灸。否则，病症深入肌里，根治起来就非一日之功了！

四、阳气亢盛 气血亏耗

阴阳，是“八纲辨证”的总领，是综合疾病的部位、性质、病因、气血以及正邪盛衰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判断的。以此论定，“吃喝疯”当属阳症，正像《中医学》所说，“是体内热邪壅盛，或阳气亢盛的征候。临床的主要表现是：精神烦躁，面赤身热，气壮声高，口渴喜冷饮。”这是通常的症状，但从事物向对立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阳气过胜必转阴虚，转亏损。“吃喝疯”是一种社会病，转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虚耗，财政库帑亏损。

人、社会、天体、宇宙虽然各不相同，但运转的规律却有极其相似之处。

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有一处神秘莫测的天体结构，位于天秤星座附近，天文学家称之为“天体黑洞”。在黑洞里，时光是静止的，景象是倒呈的。黑洞边界外的物体常被吸进黑洞里来，但黑洞中的物体却永远也抛离不出去，吸到里边的物质和能源便彻底消逝。至今，人们对黑洞的认识还很少很少。

“吃喝疯”便是“财政的黑洞”，对这个黑洞，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并且已经采取了种种断然措施，想方设法堵塞住这个黑洞。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1987年的集团购买力有一半左右用于公款吃喝，大约吃掉公款二百五十亿到三百亿元。这个数字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3.2%，占国民收入的3%左右。1988年进行治理整顿，压缩集团购买力，但“吃喝疯”仍是痼疾难消，压而不下，黑色的曲线一直呈上升趋势。年终结算表明，1988年的集团购买力较1987年又增加了20.3%。有人计算，1988年的公款吃喝，恐怕要在四百亿元左右。国家公布当年农民人均收入是四百二十四元，也就是说，公款吃喝相当于一亿农民的一年所得。也有人认为，这还是个保守的数字，有人估计是五百三十亿元，还有说六七百亿元的，总之各有各的算法。因为有些吃喝开销不一定从财政预算支出，可以打进其它开支项目或是摊进成本里。联邦德国经济学家普杨·德威博士对我们这样豪华的席面感到很吃惊，他中肯地指出：“现在，中国还是个最大的贫穷国，但却已是最大的消费国了！”

华君武曾画了一幅漫画，告诫那些不顾一切大吃大喝者：“岂知盘中餐，粒粒皆国库！”

重庆市农村调查组对三个县十八个乡的调查发现，仅在1987年内用公款吃喝就花了十万三千万，占乡政府实际财政收入的59.3%。有些乡财政收入不足吃喝，就动用生产基金和救灾款项。

安徽阜阳地区一些乡、村干部请客去集镇饭店吃饭，一时付不出饭钱，就向信用社贷款。1989年7月阜阳农业银行工作组去江集乡信用社抽查，发现有五笔这种奇特的贷款，在“贷款用途栏”里毫不掩饰地注明“付饭帐”。乡、村干部在申请这些贷款时，向信用社提出保证：要靠夏收后各种提

留的款项归还借债。

这已是寅吃卯粮，超库存开支了。

国家已经多次提出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上边提归提，下边负担却并未减轻。原因之一，便是要多留一部分款项作吃喝开销。有些乡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当地有名气的饭馆里都立有户头，年初向户头里预拨一笔吃喝费，以后每次吃喝记一笔账，年终结清，多退少补。但一般的都是少补，从未见有多退的。

还有一些地区的乡镇机关、财政金库里的钱吃光了，就吃超生子女的罚款。四川省某镇1987年4月到1988年9月期间，收进超生子女罚款三十四万六千元，而乡镇干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这笔罚款都吃进去了。农村有“三千一郎”的传说：有个农民宁肯认罚三千，也要超生一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三千一郎”。不曾想，这笔三千元罚款竟打了水漂，滑到了公款吃喝的餐桌上。

概算的数字表明，像江西省这样一个生产不很发达、财政收入不算很高的省份，每年的吃喝费用也曾在一亿元左右，而那些财源茂盛、富甲天下的沿海省市，便要几倍、几十倍地支出了。上海有个企业举行一次厂庆，就吃掉几十万元。

请吃请喝者，财政也；用财政来贴补吃喝，可不是填不完的黑洞吗！

河南省南乐县一年之内用财政支出的请吃请喝公款就达九十万元。昔时“天地牌位”上有副对联，我给它略改了一两个字，其联如下：

中国之大也

吃喝其盛乎

现在，我们想探究一下（探究的人已经很多了，也写出不少好文章），为什么吃喝之风能够如此之盛？这个问题说它简单又很复杂，说它复杂又很简单，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花的是国家的钱，掏的是公家的腰包，绝不是自己的腰包。如果由个人结账，餐桌上的菜就不会那么无拒无挡了。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回国访问，有位科学家请他吃饭，竟有几桌的人作陪。李博士说：“我拿的工资比这位国内朋友高出十倍，可是我请不起这样大场面的客！”李博士能够窥测出微粒子中的宇称守恒定律的反常现象，但他却没有探究出这场宴席的财源并非出自个人腰包的个中三昧。

东北地区流传这么一首顺口溜：“到处都请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谁不吃白吃？”

这首顺口溜读来并不顺口，但却道出了吃喝风如此之盛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白吃”二字。

因为是白吃，吃的人就多。谁不去吃呢？不吃白不吃！

因为花的都是公家的钱，这吃喝的排场也就越摆越大。横竖是借花献佛！场面越大，菜肴越多，既可以把客人招待得心满意足，又可以把自家招待得心花怒放；既可在客人面前买得人情，又为自家买得享受。童话中有两面打的魔棍，我们这里有两面受益的魔桌。于是，饕餮者们也就顾不得“少吃”这种饮食模式的益处，更顾不得营养摄取过剩造成肥胖影响寿命的害处了。

1988年9月，为了限制这种吃喝风，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筵席税暂行条例》，这对于好吃者虽然起到了

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吃喝风并没有彻底刹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筵席税的期望值不能太高，关键的一条还在于“公款”二字。吃喝用的是公款，筵席税用的也是公款，花公款总不像花自己腰包里的钱那么动心。就像对企业实行罚款一样，有人说得清楚：罚企业百元，不如罚厂长一元。

如今江西省带头施行廉政建设，颁布了《关于坚决刹住吃喝风的试行规定》，规定个人下去一律实行分餐制，一律一菜一汤，会议期间如果需要集体用餐的，只准四菜一汤，而且详文规定每盘菜每个汤里的蔬菜品种和规格。正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对于那些惯于弄虚作假、耍花枪钻空子、四处寻觅白吃白喝门道的“吃喝痲”患者，不知而今对于禁忌公款吃喝“能持”否？

众所周知，每年诺贝尔奖金颁发之后，诺贝尔基金会主席总要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为获奖者举行一次招待晚宴。出席晚宴的一千多人，包括瑞典国王、王后、议长、首相等，规格极为隆重。但是晚宴历来都是三道菜：冷盘、热菜外加一道水果冷饮。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出席晚宴的人除了极少数几位特邀者外，一律都是自付饭费。

有一年，中国青年代表团乘中日旅游船出访日本，北海道的青年团体为招待中国客人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举办单位事先就已明文规定：凡来参加聚餐的人都要缴纳聚餐费，连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也不例外。首相先生得先在认捐簿上签上认捐的款数，才得以入内。

目前，对“吃喝痲”虽有条例规定，但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因为吃喝的事儿千姿百态，五花八门，内里的机关

埋伏也非几条详文细目所能限定。不如从根本上来一条：谁吃饭谁掏钱，吃多少拿多少，国库不再开支请吃费用。

如果有人实在好客也可以，那就谁请吃谁付钱。以免像往日那样：人情自己买下了，饭费却记到公家账上，或摊到成本里去。

《今晚报》有篇文章介绍：英国皇家人员在吃喝问题上远不像外面人所想象的那样奢侈。伊丽莎白女皇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多用自己农场里的蔬菜和水果，她反对皇家厨师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菜肴的色、香、味上。她说：“吃得简单些既可避免发胖，又可节约开支，何乐而不为！”女皇宴请胡耀邦同志时，报纸曾公布了一个菜单，只有熟蛋、芦笋、烩鸡、炒饭、菠菜、红萝卜、鸡蛋布丁、草莓、奶酪。看来，这种家庭宴请很可能是自费的，菜肴的数量便都在费用中受到了限定。

联邦德国自由大学物理系教授孟大中先生曾经非常友善地对我们说：“中国在外事工作中花钱大方，比西欧美国大方得多。好像中国方面出钱越多，被邀请者就越满意，或是给中国的帮助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在国外，宴会之意不在“宴”而在“会”。通过“会”来洽谈工作，交流感情，而吃是第二位的。以不多的酒食创造出热烈融洽的气氛，是宴会成功的标志。剩下的酒菜越多，会被人认为是宴会的组织者缺乏计划和本领。

但愿我们在吃喝问题上改变陈旧观念，不再以用公款摆豪华筵席为荣。

几年来，我国的财政收支一直很紧张，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哪里都需用钱。需要增加投入的项目很多很多，而收

入又由于某些地方主义的截留和个体户的偷税漏税产生了许多跑冒滴漏之处。在开源节流中，如果真能够省下吃喝风消耗掉的大笔费用，不知能为财政缓解多大的矛盾。

看来，自费吃喝，谁吃饭谁掏钱谁请客谁付款是彻底根治“吃喝疯”的好法子。

医学家认为，中医治疗的方法和原则是很丰富的，诸如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正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治病必求其本”。吃喝自费，恐怕将是医治“吃喝疯”病症的求本妙方。

一部打乱的日记

——一位共产党员的奉献录和墓志铭

看到了吧，那颗星星，辉耀在遥远的宇空，它是那么遥远，又如此贴近人们的心灵，有一颗灵魂正向那里飞去，飞去了。

追求高尚的人寻觅完美。

我知道，人们在思念一个特异的品格，寻觅那优美的人生，使生活不被世俗的灰尘迷濛，透过一条发光的轨迹，看到良知，看到真善美，看到纯净的蓝天，看到那颗充满生之激情的永不坠落的星。

一个壮烈的死，给社会风尚增加了深度。

神州作证：杨振北，这个永远温文尔雅、潇洒从容的典型的知识分子，这个饱含中州大地侠骨柔情的男子汉，在生命的瞬间，竟然爆发出不可思议的殊死搏斗，完成壮丽的人生句号，载入了永恒。

血，喷涌而出的鲜红的血，凝结成一首辉煌的圣诗，一首并非在教堂里唱念却同样圣洁的诗，一首记述肉体的毁灭和礼赞精神的永生的诗。

世俗的圈子是不容易走出来的。因为，世俗也有它必然的逻辑。而他，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却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了出来。那是怎样一条艰难、辛辣、坎坷崎岖、甚至忍辱负重的漫漫长路啊！

信仰，是人生的脊梁骨。信仰，不是一门空头学问。信仰，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信仰，是一种力，属于大智大勇的人。坚韧不拔的毅力，正是他通向信仰殿堂的支撑。

我想把这个品格剖析出来，把这个人物展现出来，敬献给我亲爱的读者。铺展素笺，握笔凝思，我费尽力气寻觅、追索，但始终像位失去高倍望远镜的天文学家，常常迷失那光亮的轨迹。现在我能够奉献给读者的，只有一部染透鲜血的、被打乱了了的日记。希望你掀开它，喜欢它。

1990年3月12日

（用血写的一页）

这篇日记还没写出来，就已经被血蒙住了。是的，永远地蒙住了。

当他的喉部静脉血管被刺断时，血流如注，喷洒到窗台上、墙壁上、地板上、办公桌上。桌上的台历永远地静止在1990年3月12日。这页纸溅满了殷红的血，字迹都模糊不清了。

窗外正在施工。远处搭起了纵横交错的脚手架，搅拌水泥的池子边杂乱地堆放着砖石木料，半堵墙壁已经拔出地面。临近窗口的空地杂生着绿草，鲜血正溅到草丛边铺满暗

绿色苔藓的水泥地上。

这天是共和国的植树节。东关分厂共青团员要上山植树。为了给小青年送行，厂长杨振北一早就起来了。

妻子在一家百货公司当会计，离家很远。按照惯例，他先用自行车将患有关节炎的妻子送到汽车站，再回厂上班。

下楼时妻子忽然停住脚步，想起家里的蜂窝炉子，杨振北告诉妻子他已经封好了。妻子自然放心，家里这类带有技术性的活儿，诸如装卸电扇、拆洗排风机、修理家用电器之类，都是丈夫主动去干，而且干得很好。

他把妻子送到公共汽车站。妻子说：“你回去吧，厂里不是还有事吗。”他没有动身，照例一直等汽车来了，默默看着妻子费力地挤上车，两人车内车外相互招招手，等车开了，他才放心地推车离去。朝朝暮暮，岁岁年年，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的感情还是那么温情脉脉，和美如初。如果需要解释的话，他们能够如此守恒，源于他们懂得生活，懂得尊重对方，尊重感情，珍惜生活中值得珍惜的一切。在他不会欺骗的眼睛里，含着永远不会减退的纯真。

七点半钟，他把参加植树的30多名共青团员送上车，叮嘱大家上山后要特别注意安全。

八点钟，上班的铃声响了。东关分厂严格的作息制度早已出了名。他曾多次向全厂强调：“一定要清楚，八点的铃声意味着什么？那是机器开动、流水线运转、投入和产出同时进行的时刻！”他不允许职工踏着铃声走进工厂，走上岗位，要求铃响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没有一个在枪声响起之后才走进战场的人能够赢得战斗。他要求东关分厂的每一

个人，包括坐办公室的科室人员，必须在铃响之前到位。

八点三十分，他将开发部和质量管理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找来。眼前摆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镜框，镶嵌着机电部刚刚颁发的发电机组系列产品生产许可证。那几行铅字，那颗钢印，告诉人们的太多太多了！指着证书，杨振北欣喜地说：

“好好看看，这可是来得不容易啊！为了它，大家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汗水！”人们的脑海闪回许多镜头：上百张图纸，几十本工艺卡片，奔跑、取证、检测、化验，成串的汗水，无数的困难。

“请大家珍惜我们的荣誉吧！”他扬了扬手说。

九点十分，他走进党委书记郭向文的办公室。两个房间斜对着，一样的狭窄，一样的摆设：一张简易长沙发，书柜，脸盆架和衣帽挂。单凭房间的摆设，谁也猜不出这是年创利润几百万元、在洛阳市瀍河区挂头牌企业的厂长和书记的办公室。

郭向文见杨振北走进来，立即起身，两人一起走下二楼，汽车正在楼下等候，他们要赶到百里开外的偃师县李村，帮助料理厂里职工高土木母亲的丧事。

大地开始浮荡温暖的气流，在明亮耀眼的氤氲中，有细长的游丝和白茸茸的生命种子在闪动。田里的麦子迎着春风掀起高低起伏的麦浪。槐树开花了，泡桐开花了，淡青色的雾笼罩着黄土坡崖。

窗外怡人的景致没能牵动他们更多的注意。他们商讨着厂里的生产问题。去冬以来市场疲软，主导产品和发电机组都面临着销路问题。有时即便销售出去，货款也难收回，三角债把他们牵扯到百慕大魔鬼三角地带，船头船尾、轮舵桅帆

都有点调动不灵了！而且就连总厂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二月中旬，他们在厂里开展了“国家有困难，企业怎么办？企业有困难，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充分发挥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与企业风雨同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从三月份起，企业初步有了回升势头。要把握住契机，紧紧把握住。两个人在汽车里议论的正是这个不好把握但必须把握的契机问题。

从偃师回来，已是中午，妻子一般不回家吃午饭。他胡乱吃了点东西又回到办公室。

下午上班后，他打电话找来财务科长，商量一二月份奖金的分发问题，并让科长给他开列一张南方各地企业的欠款名单，他准备去深圳开会时顺路催一催。跨过魔鬼三角地带还真要下点死力气呢！

在企业里，厂长经理亲自抓财务还不多见。他虽是技术人员出身，却很看重财务这把金钥匙的作用。他一生注重清白，也要求身边的人都要留下清白的轨迹，性情敦厚温和的他，在这方面是十分严厉的。他曾庄重地告诫人们：“我再次给同志们打招呼，奉劝个别领导同志，要以整体利益为重，不要在这上面犯错误！”

与财务科长谈过话已是两点多钟，他告诉科长自己不能参加职代会了，再过两天要去深圳参加全国内燃机发电机组企业联合集团理事会，他是这个协会的理事，要赶写会议发言稿。

三点二十分，生命的时钟即将走到最庄严的时刻。没有什么压迫的预感和灵魂不安的启示，没有。一切构成心理的生理的运行机制都是顺畅的，身内身外都是一样的和谐有

序，就像刚刚来到的暖春，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为大自然装点色彩增加亮度。

整个二层楼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作为东关分厂的神经中枢、条约合同规定的法人代表，正伏案凝思，奋笔疾书。缜密的思考，精确的运算，将大脑贮存的信息和性格蕴积的内力全部调动起来。编织一篇有光彩有魅力的发言稿，如同锻铸一把打开国际市场的钥匙。因为在那个理事会上，将要着重讨论如何打进国际市场的问题。

时针，转动得异常的凝滞、沉重，除了笔尖的沙沙声，周遭如同夜一般静寂、空落，好像上苍听信了魔鬼撒旦而有意制造了这样一个非常的时刻。

果然有两个鬼鬼祟祟的魔影蹿进厂长办公室。门，哗啦一下被反锁住，两个手持匕首的歹徒将一个黑色塑料包掷到杨振北的办公桌上，威胁道：“这是烈性炸药包！马上交出30万元，不然，就把炸药包拉响！”

邪恶带着凶残的暴力，猝不及防地闯进这个像钟表一样运转有序的世界，空气骤然凝住，沉重得令人窒息。

他站起身，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很快镇定下来。他望了望鼓鼓囊囊的炸药包和两个手持匕首满脸狰狞的歹徒没动声色，魁伟的躯体凝住一般，冷峻威严地扫视对方。在短暂的对峙中，他被推到一条险恶的人生窄径——非生即死。一切只能取决于一个比瞬间还要短暂的抉择。

他没有屈服于恫吓，没有选择妥协，而是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胁迫。他知道这一声拒绝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无异于自己拉响了导火索。

“笑话，你们工厂里没钱？”歹徒恶狠狠嚎叫暴跳，“限

你五分钟时间交出钱来，不然——”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穷凶极恶的歹徒以为是报警器，不顾一切疯狂扑上。杨振北挺身而出，边迎战边对着窗外大声呼喊：“来人呀，抓土匪！”

歹徒大惊，慌忙奔向窗口，抢着关上窗子。在争夺中杨振北用臂膀将一歹徒的脖子死死夹住。另一歹徒见状，挥刀向杨振北面刺去。他一边用手拨开匕首，一边继续向窗外高声喊叫，声音陡厉，石破天惊。被夹住脖子的歹徒见势不妙，抽出匕首，从下边向他后腰猛刺。他腹背受敌，赤手空拳，已是刀伤累累，血迹斑斑，在毁灭性的打击下拼死搏斗。只有坚硬的脊梁，给他支撑的力量。突然，一刀刺中他的颈静脉，鲜血立即像泉水一般喷射出来，喷射到墙壁、窗台、地板、桌面和一摞摞文件资料上。他依然夹住歹徒的脖子死死不放，同时奋力将另一歹徒的匕首打落到窗外楼下。

这时，留在三楼办公室的两个同志闻声赶来，用力撞开门，愤怒地擒住歹徒。直到这时，杨振北才感到释去了重负，缓缓地舒了一口气，立时，一股一股鲜红的血从嘴里大口大口地喷出来……

人们搀扶着身负重伤的厂长，他濒临危境，依然还迈动自己的脚步，从二楼走下楼梯，穿过一楼的长廊，走向厂门口的医务室。他一步一注血水，一步一滩血迹，没有畏惧，没有恐慌，他默默地、平静地支撑着，一步步踩过人生最后的路程，每一步都蕴藏着自强不息的力量，将一个人可能有的生之追求与死之坦然和谐地交织在一起。面对死神，只有一个卓越的心灵，才具有如此超乎寻常的镇静和力量。工友们惊呆了。女儿望着一身血迹的父亲顿时晕了过去……

生命的河床即将干涸。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在这条从生走向死的路上，他视死如归，一点也没有丢失做人的分量。

他没有留下遗言。此时，他高大的身影像一柱无字的汉白玉碑石，那圣洁的碑面，历历昭示着他一生的思想、感情、作风和每一步奋斗的足迹，人们从中看到了一部闪光的墓志铭。

他被抬进了医院。窗外三四百名职工伸出手臂，密匝匝的像一片森林，工人们失声痛哭，争着要为他们敬爱的厂长献血。可是，一切都已无力挽回，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了。

四点二十分，那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牺牲后，夹过歹徒脖子的那条臂膀竟一直弯屈成弧形。人们在追悼会上向遗体告别的时候，依然看到这条弯曲的臂膀，仍旧保持着搏斗时死死挟定歹徒的姿势。

一个多么坚强的中原大地男子汉形象！

1990年3月10日

（用汗写的一页）

多唱同心曲，不唱独角戏。

从三月份起，每天有十人到车间参加劳动，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液压弯管机。

有人说，杨振北的一生犹如一支红烛，从头燃到底，通体光明。

这一天，他一早就来到二车间参加劳动。同去的还有副厂长王之孝和技术科长康天申。

他们都是五十出头的人，都是六十年代初期分到这个厂里来的大学生。那时，这儿还只是个百十来人的小厂，原名洛阳地区农机厂，后又改名柴油机厂。产品很不定型，一会儿生产犁尖、翻土板，一会儿生产棉花打包机，过的都是找米下锅、不定时开饭的日子。

杨振北当年的日记帮他回忆了初来时的情景：“1961年8月，分配到咱厂工作。我愉快地听从党的安排，决心在工作中向工人阶级学习，把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去，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

厂里的一些老人们还记得，当时工人们都用怎样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生得清秀修长、文雅肃静的大学生。他是吉林工业大学的高材生，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都很强，人们背地里议论：“茅草窝里怎能留住凤凰？你们瞧着，过几天就该飞走了！”工人們的疑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与他前后分来的大学生另攀高枝的已不止一两个。不少当时在洛阳几家大厂工作的同学亲友，主动要帮他调换工作，可是他不肯走，说：“厂子里因为缺乏技术人员才穷，留不住人，我若是再走了，不是更缺乏技术人才吗！”

他没有走，一生都奉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那天，他特意从家里移来一棵石榴树，栽到二车间门口，表示他扎根的决心。

王之孝副厂长还记得，杨振北那时住在仅有三平米的小浴池里。他在澡盆上搭了块铺板当作床也当桌子，出入只能横着走。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澡盆里。他素爱整洁，屋里总是

收拾得井井有条。

一进厂就同他一起工作的徐自强工程师还记得：“他的办公室和床铺底下放着一大摞笔记本，上面记的东西都有条有理，分门别类，规整得很。比如外出参观遇见了新产品，他便仔细观察它的外形，研究它的性能，琢磨它的原理，然后一一记下来。再如看到某本书或杂志有了感想心得，他也记下来。平时构思出某种工具和部件，也记下来。凡是经他手的图纸，更是要把上边的工艺要求、技术标准等重要数据都记下来。日积月累，这些笔记本简直成了小资料库，谁想查点什么，他动手一翻就能找出来，就像我们查编码字典一样！”

平凡的认真，具体琐细的积累，告诉人们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种自强不息的拚搏精神。记得整整齐齐、放得有条不紊的笔记本，不仅仅为他积累了知识，同时铸造了他对自己理智力量的信心。

杨振北在二车间工作的时间最长，进厂不久就与工人们一起研究琢磨，很快搞出了电镀、震动推焊等新工艺。后来，他又自己绘图、自己设计安装了几条生产线，使这个原来只生产农机具的小厂生产出整台的柴油机。工人们都很喜欢这个有技术、有学问、谦逊温和的小伙子。

三十年的时光转眼过去了！工厂几经风雨，几经波折，现在已经成为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一个分厂，拥有上千名职工；杨振北也由一个普通技术人员提升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技术科副科长、副厂长；1984年又被推上了厂长这个重要岗位。

他走到二车间门口，在那棵石榴树前停住脚步。三十年

了，这棵小苗已经长成根深叶茂、枝叶纷披的大树。火红的蓓蕾深藏在密匝匝的绿叶丛中，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旺盛的树体里散发出来。他深情地用手抚摸着树干，总喜欢和它默默交流。

进了二车间，立即投入紧张的劳动。今年年初，总厂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新的任务：生产802改型拖拉机的副驾驶座。座棚顶部需用一根弯管。当时由于生产量不大，就用手工来弯管子。从3月份起改为大批量生产，手工弯管，劳动强度显然过大。杨振北今天特意带厂里两位主要技术干部到车间劳动，一是体验手工弯管到底要花多大力气，同时也想与大家研究，将厂里闲置的那台液压机改造成液压弯管机。

那天，他们使用的管料恰巧又是最坚硬的一种，杨振北和几个干部着实地费了力气，两个人弯不过一根管子，回去时，全身都被汗水湿透，手上磨起大泡。

他牺牲后，这台弯管机很快被设计了出来。

汗水给他思索、启迪和智慧，汗水也是他的快乐。

1984年4月29日

（用忠诚写的一页）

找赵仁东同志谈话。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我努力学习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的心情激动得很，这是别人所无法想象的。

二十多年来，他多次向党表示决心要求加入组织。他向

组织上交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的一颗心早已奉献给那块圣地，可是至今还没有被吸收到组织里来。

坐在灯下，他又翻找出过去的日记，那是1960年9月9日的一段文字：

“在初中时我就想过，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共产党员。在大学几年里，党的教育使我明确了生活意义：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应该有个正确的生活目的，特别是青年一代。我要做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光明社会的创造者，不当碌碌无为的庸俗的可怜虫。我迫切地要求参加党，这是我的志愿，也是我的需要。”

时光回溯到1955年的夏季。那时他正在洛阳第一高中读书，这个瘦高个子、沉静寡言的青年，内向而不孤僻，在教室和体育场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多次被选为三好学生。那年暑假，他经学校推荐参加了洛阳市委党校举办的短训班，系统地学习了党建知识。因此，在他十八岁刚刚达到党章规定的入党年龄时，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是他第一次向党表示的忠诚，距今已经整整二十九年了。

二十九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差不多已占了他多半生的时间。

天旋地转，物换星移，在永不停息的生活奔流中，二十九年的时间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该有多么大的变化和迁异！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河东河西，陵谷交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流逝，而始终不变的是——杨振北的信念和追求。

对于共产主义信仰，他始终一贯，坚信如初。人活着，

总要有个信仰；而在所有信仰中，共产主义最有生命力和凝聚力。他认定了这个信仰，二十九年来从未发生过动摇。尽管在他身外有着激烈的潮升浪涌、雷电风雨，在他身内也有着激烈的冰冻火烧、波涛起伏，但他一直坚信着，一直保持着永不减退的忠诚。信仰的火焰既已点燃，便成了他生活的动力。他感到无论是坐着还是行走，无论是活着还是倒下去，都生活得异常丰富和充实。

他把信仰，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

可是，历史几乎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又何尝没有时代的烙印呢！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一直是知识分子入党的一个障碍。现实是异常严峻的，无法解脱，就像一个黑色的梦魇。在那个沉重的氛围里，有些人便抛开政治钻研业务；有的人堕入世俗圈子，或者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摆出一副看透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看透的超然架势。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蒙受了不应有的委屈，但他却一直抱着最初的虔诚，直面人生，历尽曲折，虽九死而不悔。信仰既然是崇高的，对它的追求就要付出同样高的代价。因此，他从不发牢骚说怪话，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了能够争得组织上的多一分帮助，他甚至到了三十三岁还不肯退团。开会时团支书都不好意思通知他，他却怀着一如既往的深情。

法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经说过：“在人生的字典里最重要的是三个词：意志、工作、等待。”而在杨振北的字典里除了这三个词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词：追求。

追求，便是他的人生。多年来，他一直是在苦苦追求中奋进的。

然而，客观上对他的打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考验），由于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严厉了。“文革”期间，他父亲被误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那一人有罪、九族株连的年代，无疑等于判了他“政治生命的死刑”，入党的追求之路被完全堵死。

欲登太行雪暗天，欲渡黄河冰塞川。他陷入到极大的痛苦中。

深秋，落叶从枝头上像雨点似的飘落下来，铺洒在冰冷的人行道上，灰暗的天空堆满湿漉漉的云层，路灯摇曳着凄楚的光晕。一次他到北京出差，抽空找到哥哥，原原本本地诉说了所承受的一切。哥哥送他到郊区汽车起点站。他们踏着落叶缓缓地走着，仿佛那是一段艰难的里程，踏碎的落叶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他们默默地走着，一波又一波的悲凉不时袭上心头。

哥哥怀着深重的感触说：“人，有一种无告的痛苦，痛苦得让人感到绝望，因为它无以述说。即便无法承受，也只能是默默地去忍受。世界上最悲惨的事，莫过于忍受这种无告的痛苦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再痛苦，再冤枉，再沉重，也还是要坚持。有勇气坚持，才有希望。要相信历史一定会走完这段曲折的历程！”

决心忍受痛苦，便是一种不平凡的毅力。然而，最大的毅力还是来自信仰。人生有了伟大的目标，便会产生伟大的力量。

杨振北听了哥哥的内心剖白又像是对自己的勉励，点点头说：“相信我，哥哥！我也有勇气坚持，因为我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来没有发生动摇。无论天地间发生什么，我

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

弟弟没有上车。弟兄俩总想再多说些什么，但只有悬垂的泪光，默默地相望又避开了。弟弟上车了，坐在后车窗下，隔着玻璃，他们久久地互相招手、流泪，代替了互道珍重的万语千言。

他记得，哥哥给他背诵过的周敦颐的《爱莲说》中莲花的品格，给他讲述过的苏联小说《忠诚》。书中说的是一个革命者被自己同志枪决时，还对党坚信不移，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不移。他说：“即便把我枪毙十次，也丝毫不会改变我对党的忠诚！”

杨振北的心中，有着这种钢铁浇筑般的忠诚。即使“在党和国家遭遇各种困难的时候，在个人和家庭蒙受不幸和冤屈的时候，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有人说：“宗教是毕生的苦楚！”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但决心为这崇高信仰而献身的人，何尝不经历毕生的苦楚！

今天，他在同后来成为入党介绍人的赵仁东同志的谈话中，便万分感慨地说：“到死的时候，我身上能盖上一面鲜红的党旗，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了！”

1989年12月21日

（用情写的一页）

冒雪去邮局寄包裹

这天，雪压洛阳城，几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下了班，他挟着两卷挂历匆匆奔向邮局，寄给北京的哥哥和妹妹。

挂历是分厂用广告费订制的，全是迎接11届亚运会的精采画面。他不愿动用专车，就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完成他记挂的情分。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员工家庭，父亲做过总务、会计之类的工作。兄弟姐妹八个，生活一直是紧巴巴的。一件衣服哥哥穿过弟弟穿，姐姐穿过妹妹穿。他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童年时就充满了对人的爱。大学毕业，他把姐姐送他洗脸的瓦盆又完好无缺地背回家来。母亲和姐姐悲喜交集，流下疼爱的泪。多年来，他把兄弟姐妹之间来往的书信都珍贵地收藏着。

如今他已当了厂长，人都老了，但手足真情，却一直在心里珍藏着。此时，他匆匆往邮局赶，唯恐关门。纯洁的六角形晶体纷纷扬扬扑满他的全身，一片苍茫的暝色遮掩住他踏雪疾进的身影。

1984年8月19日
(用誓言写的一页)

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一辈子按共产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工作，把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安排，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穿着浆洗得板板整整的白衬衫，庄严肃穆地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屈举手臂握紧拳头，向着亲爱的党倾诉自己的心声，宣读自己的誓言。

他流下了泪，流下了从心底里涌流出来的泪。他激动、

亢奋、狂喜，因为从今获得了一条新的生命。

分厂的宣传干事给他拍了照，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幸福、最辉煌灿烂的瞬间。他把这张照片珍贵地放置到自己的床头。每天都要望望这张照片，回味那个庄严的时刻和多半生的追求。

头天晚上，他走进入党介绍人赵仁东同志的办公室，心情激动得很，一向不爱聊天的他这次却一谈谈了整整一夜，从傍晚七时谈到次日凌晨三点。他谈的很多，从家庭到社会，从工作到人生，从现在到未来。二十九年的向往，二十九年的追求，二十九年历经风霜雨雪从未减退的热情，二十九年诉说无尽的赤子之心！

他把用全部生命的爱所窥见的真理，看得比什么都贵重，比什么都圣洁，比什么都崇高，绝对不容丝毫的亵渎。

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若是入了党，就要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87年1月11日

（用勤奋写的一页）

总厂党委宣传部通知，《政治经济学》的考试成绩是：

杨振北 91分 王之孝 86分

崔贵洲 83分 （70分以上的八人）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工队伍结构的经常变化，企业劳动者的生活空间、思想空间、信息来源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观察方式也在相对变革。作为处在

中心地位的厂长，要做好各项工作，必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知识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快乐。杨振北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分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厂之长，工作比谁都忙，可是用钻和挤的时间来学习，很少有人比得上。学习、工作，工作、学习，是他人生中永远做不完的课业。

1984年10月9日至11月8日，总厂举办了为期六十课时的电子计算机培训班，学习BASIC语言。杨振北那时已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身为工厂里的技术核心，工作压得像山一样重，可他得知消息后仍主动报名，每晚跑十几里路程上课，回到家差不多将近午夜了。他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学的东西有些已经老化了，需要不断地更新，不然，就无法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工厂里工作了！”

那次结业考试，他得了92.4分。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是用新型的知识结构组合而成，必须及时进行知识更新。没有这种强烈的更新意识，注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考高工的英语测验，他来不及充分复习，还是得了80多分。他不满足地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要求自己像通晓俄语那样掌握英语。

对于政治学习，他也从不肯松懈。这是他的性格，追求的性格。

凡是报纸杂志上登有政治理论和思想工作方面的文章，他都细心地阅读，做出笔记，有时还剪下来勾勾画画，

推荐给共青团和工会学习。有一次他找郭向文借阅最近几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和《政工信息》。郭书记笑着问：“老兄，你这企业家还想同时当政治家？”他笑笑说：“希望咱们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嘛。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可不是等闲的一句话呀！”

他的办公室，摆着一个他自制的木框书架，上面放有《思想政治工作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企业集团的组织与管理》、《质量控制手册》、《工业企业法规》等书籍，不少书用红蓝铅笔勾划出密密麻麻的道道。

总厂组织的各种理论学习班他都参加，每次结业考试都在90分以上，居分厂第一名。

洛阳市委号召在各大中型企业组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他带头写出《厂长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团结、进取、实干、争先的企业精神》等论文，并在分厂举办的“论文发表会”上郑重宣读。他的论文五次获得省、市、总厂颁发的论文奖，有两篇还被收入省里选编的《优秀论文集》。东关分厂的政治思想研究会，也连续三年被评为市里的优秀研究会。

《“清闲”厂长杨振北》，是1988年5月18日《洛阳日报》刊发的一篇通讯，记载了杨振北身居厂长要位，工作千头万绪，却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出许多篇论文。“清闲”实际不清闲，正是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新型的领导艺术。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杨振北的日记抄录了这段名言。他毕生恪守着“言必信、行必果”的格言，始终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1986年7月25日
(用党性写的一页)

党性，就是要有一种坚定的事业心。最近，决定让我担负厂级领导工作，我的态度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勇敢地挑起这个重担，决不辜负党的期望和同志们的信任。党员的唯一生活目的，就是无限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想当官”到共产党内来，是走错了路。

他自己也不曾想象，他会被推到厂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来。

这个担子可不轻呀！一般来说，一个大中型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生老病死，吃喝住行，无所不包。企业实行经济承包和厂长负责制后，这种职务所秉承的责权利就更大了，范围更广了，担子更重了。然而他面临着的却是一个濒于倒闭的企业！

前任领导班子不团结，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经济效益都受到严重影响。三个盈利的车间没活干，两个有活干的车间亏损。主导产品150拖拉机的前桥和转向机形成不了批量生产能力，新开发的产品一筹莫展。参加了几个全国订货会，一台发电机组也订不出去。修复的几台推土机没有买主。价值几十万元的拖拉机配件和农机具配件积压在库里。售出去的七十台发电机组有四十多台要求退货返修。头年的钱没挣到手，第二年的债又找上门，简直陷到一滩泥沼中。有人劝他还是

专心搞技术，不要接这个乱摊子，免得把自己陷进去。他没理会。

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决心做一个快速旋转的陀螺，用加快自身的旋转速度来排除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抵御各方面的压力。他充满信心地告诉人们：“如果说东关分厂是艘搁浅的船，那么，我就应该是拖出沉船的纤夫！”

1986年8月16日

（用苦斗写的一页）

要像钟表那样——拧紧生命的发条，有节奏地前进。

我不相信，产品质量就是搞不好，也决不甘心产品质量就永远上不去！

他上任后，没有搞大换班，也没有烧三把火，而是找原班人马一一谈心，用信任和理解活血化瘀，把上上下下的人心理顺，形成一股坚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然后依靠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共同面向企业生存的基础——质量。

一个企业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质量，它是衡量一个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东关分厂的质量一直不高，在总厂已经挂了号出了名。总厂领导在总结工作时曾严厉地提出过批评。杨振北上任后首先从TQC（综合性质量管理）着手，决心把产品质量搞上去，他不相信，东关产品质量就搞不上去！

东关分厂产品质量不好的关键，是小四轮的前桥轴承损

坏率高，还因此发生过车毁人亡的事故。要改进产品质量，就要把这作为主攻方向。为此，他与厂里技术人员一起详细查找资料，研究图纸，分析同行业同类产品的结构，经过比较鉴别，化验分析，最后终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

于是，他们便从设计、工艺、设备、制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杨振北亲自下到车间去调试操作，率先生产出一个标准件来，然后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从现在起，都照我干的样子去做，按此标准打出钢印来，再出问题由我负责！”

TQC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建立起许多工人质量管理小组，培训出大量的车间班组骨干。他亲自给厂里工人上质量管理课，每周一个半小时，使职工都树立起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意识。

“你认为我分厂质量上存在什么问题？结合你自己的工作如何提高产品质量？”这是他们开展的每月一题有奖答题竞赛的一个题目。形式生动新颖，有亲切感和说服力。TQC活动共收到答卷二百〇八份，其中提出合理化建议七十八条，有八条已被采用。

日本一位管理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全体职工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加，质量管理工作是不能收到实效的。”

杨振北走的便是团体赛的路子，把质量管理意识输送到工厂的每个角落，使其成为全体职工、所有部门的自觉行动。

一天，四百台新装起的小四轮拖拉机准备出厂，忽然有个装配工反映：“印象中，好像有台拖拉机前桥上少装了一个开口销子。”工人们一听炸了窝，追问能不能说得准。那个工人却不能完全肯定。大多数人认为要把机器一台台拆开检查，

看是否漏装了；也有人认为，既然说不准就不必认真了。杨振北知道了此事，严肃地指令大家务必把机器拆开一一检查，虽然说不准是不是漏装，但质量问题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保证质量就是保证企业，对产品负责就是对用户负责，对人民负责！

检查结果，没有漏装。有人埋怨那个工人瞎炸呼。杨振北拍着那个工人肩头对大家说：“别埋怨他，他也是一片好意。他是为咱们厂的声誉着想的！大家虽然多费了半天工，可是质量有了牢固保证，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对我们大家也是个教训，今后必须建立起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上一道工序为下一道工序负责，下一道工序也要为上一道工序负责，互相把好质量关。不然，今天漏装个开口销，明天就可能漏装其它零部件，那是要出人命的！”

东关分厂的质量关终于被一道道地突破了，小四轮拖拉机变成了过得硬产品。1988年5月3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对抗赛中，他们的小四轮获得了第一名。

俗话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头自来。优良的产品质量是最好的通行证。到1987年时，小四轮已经畅销国内外，东关分厂生产的前桥和转向机已由过去的四万台提高到九万多台，原来十几万元的亏损产品，一跃而成为企业的盈利“大头”。

一个明晃晃的金字标牌“河南省守合同重信誉企业”，赫然醒目地挂到东关分厂的大门口。

1987年7月31日
(用包字写的一页)

今年是总厂对我分厂实行一定三年不变的经济承包制的第一年。这一重大的改革，充分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我们分厂带来了活力，广大职工团结一致，勤奋工作，促进了分厂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人，是生产的主体。在人和物的立体交叉中，人永远处于座标的中轴地位。效益曲线，在绝大部分程度上决定于人在中轴座标上的位置移动。调整好人与人、物与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让人的潜在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

杨振北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解开这种变量的函数关系，因此他上任后不久，就径直走到企业神经系统的交感方向，不失时机地抓住改革轮盘，引进了承包的机制。

1986年7月，他第一个与总厂签订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书》，因为他知道（就像他在日记中写的）：“振兴拖厂的出路在于改革；同样，振兴东关分厂的出路也只有靠改革。它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有力武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杨振北采用五种形式，同他下属的十一个单位签订了“承包合同”。让“黑头老包”进车间，到科室，上岗位，充分发挥了一个“包”字的威力。

“包”字，显示出所有人在立体交叉座标中的位置，使人人明确自己的职责和肩负的重担，以对党、对人民、对企业、对用户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完成任务。职工们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上，都活生生地看到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杨振北立志改革，改革也为企业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显著的效益。下面，就是东关分厂的一条飞跃的曲线：

1986年创利六十四万元，1987年创利二百二十一万元，1988年创利四百〇九万元，1989年受到市场疲软影响，仍保持三百五十一万元。

这些闪光的数字是释放出来的能，是改革承包所释放出来的能，是辛勤汗水和创业精神的结晶。

企业界又耀起了一颗新星。东关分厂由拖厂的后进单位一跃而为先进单位，它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创利率在拖厂所属的几十个分厂中占居首位，被总厂命名为“创效益先进单位”。杨振北本人也两次被树为“总厂先进标兵”，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1988年又被选为洛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6月21日 (用团结写的一页)

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按照党章的要求，处处事事做职工的表率。

杨振北的身分地位变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因此而把自己摆到一个特殊的地位上。

“我是一个党员！”这是他常说的话。作为一个党员，就是要与那一连串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而党员最光荣、最神圣的权利，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经常地按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严格检查自己，凡是一个党员应当做到的，他都要努力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他明确地表示：“我是厂长，但首先是个党员！”

平常，不论工作怎么忙，支部和党小组通知他参加的会他都准时参加，并主动向党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主动地听取党员们的批评和意见。他常说：“一个党员不置身在党组织的监督下，是做不好工作的。”

每个季度他都要写出书面材料向党委汇报工作，让党委能够在企业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厂里的重大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他都主动地提交到党委会上讨论，党委通过后他再执行。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为了使党委的保证有目标，监督有内容，工作有成效，厂长要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计划、目标、措施、意图向党委通心，主动接受党委的保证监督。”

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认为只有党组织才有能力全面地考察和任用干部，个人不能超过组织的力量。去年，总厂布置精简机构，规定出具体的编制，将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落聘。谁上谁下，作为厂长他本有权决定，但他却主动去找书记商量，坚持由党委通盘考虑。后来由党委出面开会研究，组织有关部门对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层层民主评议，最后在评议的基础上协商讨论，确定下精简名单。由于工作做得充分，使得去留的人都比较满意。

说来也巧，他与党委书记郭向文竟是同年同月出生，前

后只差一天。两个人的气质和风度既是那样的不同，又是那样的相似。一个生得文质彬彬，书生气息，举止沉着稳健，说话简洁明快，有着缜密的逻辑思维力量；另一个则热情开朗，豁达大度，举止爽快，待人坦诚，不管是怎样拘束和腼腆的人同他见面相谈，都能敞开心怀，感到他有虚心接纳并愿意向你提供帮助的诚意。他俩同时上任，一开始合作，他曾向郭说：“咱俩是同志加兄弟。同志者，原则也；兄弟者，亲密也！”他们俩互相配合，互相弥补，默契到天衣无缝的程度。

周围的人都羡慕这个厂子有这么一对好领导，本厂的人也夸耀地称赞他们是《将相和》里边的廉颇和蔺相如。

杨振北亲切地对郭向文说：“我当厂长不专权，你当书记不争权，我们共同依靠职代会掌好权，用好权！”

1988年10月3日

（用身教写的一页）

能把别人的缺点弱点看成是自己的缺点弱点一样，把别人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成功一样，这样的人，永远会受到人们衷心的敬仰。

明路和小锐在正骨医院工作，业务技术进步很大。

今天，他来到正骨医院，去看望厂里的一个住院病人，顺路也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

他们都是由河南中医学院毕业，一道分配到这里来的。原先，儿子曾想留到省里一些科研单位或重点医院，对于分

到这个离家很远的基层单位多少有些抱怨。他给父亲的信中说：“许多同学都像疯了似的，四处托人活动。家长和家长、亲朋和亲朋之间展开了竞赛，只是自己没有门路；即使有了门路，一想到了父亲，也不会去找，也不敢去找。”

杨振北立即给儿子写信，告诉他：“要正确对待毕业分配。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志愿；当个人志愿未被满足时，就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讲述了他自己当年听从组织分配甘心留到小厂的情况。告诫儿子，不要苛刻地选择土壤，辛勤的耕耘者在哪里都能得到好的收成。

儿子是在1984年与他同一年入党的。作为父亲的杨振北，既关心儿子的学业，又关心他的政治进步。儿子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两个重点发展对象：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位女同学。当时上边决定一个班只能发展一个。儿子将情况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写信告诉他：“一个女同学能够在各方面取得与你相同的进步，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只能允许先发展一个的话，你就应当无条件地让她先入，你再努力创造条件争取以后的机会。”儿子听取了他的意见，一再向组织上表示要争取下一批。

儿子入党后，思想上慢慢地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松劲散漫的情绪，看来年轻人的思想进步是很不稳定的。杨振北很焦急，马上给儿子写信严肃地指出他的缺点：

“党中央号召青年人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你把你的一言一行对照检查一下，你能够格吗？何况你还是一个正在接受考验的预备党员呢！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八条义务，你扪心自问一下，够格吗？”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把革命理想、事业、前

途丢在脑后，这就是在精神污染中蜕化变质的和平演变过程！”

升到大学三年级后，基础理论课程差不多学完了，儿子有了松劲情绪。杨振北像老朋友似地找儿子谈心：“你已经学完了理论课程，打下了理论基础，就要学会独立地走路，自己摸索出一条做学问的路子，这就是学术上的学步，这种学步也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头两步是很困难的。但你一定要迈出，哪怕是摔跟头也好，否则，就永远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他帮助儿子学走路。同儿子一起商量写作题目、写作提纲，指导他如何搜集资料、分析整理、提出问题、寻找答案。后来，儿子在父亲的指导下用了一年时间，果然写出了科学论文《清人雷丰的〈时病论〉及其主要学术思想的出台》。父亲的字迹端庄工整，清秀俊逸，在儿子的请求下，盛夏，杨振北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帮助儿子誊清论文。后来论文获得“河南省青年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此后儿子结合自己的实践，又写出了三四篇科学论文，刊发在中央和省级的学术刊物上。1989年10月，他还到北京参加了国际传统康复医学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父亲对孩子的进步很满意，他找到医院的郭院长，请求这位老大夫像对待子女一般，严格要求这两个青年人，有不对的地方，就严厉地批评。“年轻人管得严一点好，从难从严出人才，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他同郭院长握手话别时真诚地说。

1987年1月13日
(用开拓写的一页)

产品开发专题会

8KW发电机组：安阳地区销千台以上

3KW发电机组：湖北宜昌……

开发顺序：8、3、20、30、75、5、10、100……

搞企业的人都知道这样两句话：“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要发展，要振兴，就得不断拿出新产品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杨振北自从把主导产品150拖拉机的前桥和转向机的质量问题解决后，就把全部精力扑到新产品开发上来。1986年，50瓩的发电机组砸了牌子，丢了市场。有没有志气让它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呢？杨振北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总觉得棋没下死，有希望重新打开一个柳暗花明的局面。我国地域广阔，总会有尚未开发的空白区域，只要把路子摆正，质量提高，不信春风召不回！

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变得更科学更可靠，必须做好市场预测工作，从市场变化风云中找出依据，用供需的动态系列建立起产品开发的数学模型。一个企业家只有把市场作为特尔菲（阿波罗神殿的地址）进行祈求和筹算时，才能做出误差最小的预测。为了探求和问卜市场的神意，杨振北决定派出一名副厂长带队，到全国各地探索走访，认真考察这种产品的供需状况，并向他们提出了口号：“千山万水不怕远，千

言万语不嫌烦，千方百计找活干，千辛万苦无怨言。”

路漫漫，水纵横，副厂长带着队伍走遍了全国，一路上了解市场信息，探听需求状况，还到老用户单位走访，主动服务上门。这种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好感。服务组的一位张师傅到四川双流县粮食局去回访，用户反映电压表不稳。张师傅饭也没吃，立即去修理。只用2分钟就把电压表修好了，还详细介绍了操作技术。用户深受感动，把原来准备好的一顿午饭改为酒席招待。

服务上门，开拓了产品销售的新门路。国外常讲：服务第一、销售第二。而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应当说服务就是销售，销售就是服务。

不久，那位副厂长果然带回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市场上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并没有饱和，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特别是那些型号偏大的（100瓩以上）和偏小（20瓩以下）的发电机组，就像特体型号的衣服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去占领这块阵地。

对市场的全方位考察，给杨振北带来很大的启示，要面对市场，面对用户，根据他们的需求状况，决定对发电机组进行系列的开发，而其中首先应当开发的是那些型号偏大和偏小的发电机组。他在日记本上排列出的矩阵，就是对这个产品系列的开发顺序。那可不是随意的排列，每一种都建立在一整套的线性规划和数学模型之上。

《排队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门最新学科。

1988年4月22日
(用花期写的一页)

花好，蝴蝶才会飞来。

以花为媒，广交朋友。订货会议在4月15—20日召开。来自十四个省市五十一个单位的八十四人参加。特点是声势大，有竞争力，影响大，效果显著。订出合同八百十六台，成交额五百万元，是分厂生产发电机组以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转机性的一次会议。

东关分厂的发电机组果然开发出来了，而且是整整一个系列，十六个品种，由小到大，多种规格，多种型号。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向市场的深层次开拓，他们借名扬天下的洛阳牡丹花期，召开了订货会议。

多么让人倾心、动情、留恋、沉醉的牡丹王国呀！环绕在亭亭玉立的牡丹仙子塑像周围，数百万朵牡丹竞相怒放：姚黄、魏紫、夜光白、玛瑙黑、案首红、翡翠绿，五颜六色，千姿百态地簇拥在一起，彩云重叠，落霞缱绻，蝶须钩连，络纓缤纷，就像一片流光溢彩的神秘海洋。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用户，在这些日子里既陶醉于牡丹的天香国色，又迷恋于东关分厂的发电机组系列。从型号上看，是大小兼备，由3吨到200吨随君选购，从质量上看，更是无可挑剔。分厂自己投资三十万元安装的试验台，每台产品和每个零部件都在试验台上经过严格的测试，没有任何误差和纰漏可以从这科学审判台上逃脱过去。

杨振北的开发计划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用质量为企业打下了生存的基础，又用系列化的新品种拓宽了振兴的渠道。他以渊博的知识、新型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为东关分厂赢得了信誉，赢得了效益，赢得了很好的竞争力。这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上了平时很少穿的深灰色西装，整整齐齐地系上了枣红色领带，举止文雅，风度翩翩地来到订货会上。他亲切诚恳地与人交谈，一方面给人们充分的信心，一方面虚怀若谷地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有的当下就触动了他的灵感，脑子里立即勾画出未来的改进图案。

他也走到宴会桌前，举杯向各位来宾祝酒。不过他有个习惯：“只敬酒不陪酒”。春风洋溢地敬过一番之后，他便静静地从宴会桌前悄然退下。人们能原谅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烟酒不沾的人。分厂里这些公关往来和横向联系，自有专人作陪。

1987年7月22日

（用清白写的一页）

生产经营不断发展，经营效益不断提高，增强了东关分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现在申请进东关分厂的有上百人。

实际上，在那几年里要求调进东关分厂的，还不只“上百人”。后来，人们在他留下的笔记本里翻到一个名单，要求进东关分厂的有二百多人。道理明摆着，东关分厂效益好，

职工福利待遇自然要比一般工厂高一些，更何况，那时候有些厂子关停并转，产品滞销，甚至发不出工资。

有这么多人要求调进，该让谁来不让谁来呢？他的日记本上还有一段话：“在用人时，要先想想我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在破‘关系网’，还是在拉‘关系网’。”

分厂技术科副科长马一龙的妻子，在洛阳市塑料一厂工作。厂里亏损，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只好给职工发塑料鞋。马一龙和妻子都是腼腆的人，家里生活再困难也不肯拿着鞋子沿街叫卖。马一龙看着那堆塑料鞋发愁，后来干脆把鞋放到工厂大门口，厂里职工谁愿意要谁就拿一双。杨振北知道后，立即与有关部门商量，很快将马一龙的妻子调进东关分厂。马一龙这个平时从来不好意思向组织提什么要求的知识分子，从心底里流出感动的泪花，他和妻子都决心用双倍的辛勤为分厂报效出力。

还有一个叫李敬泽的技术人员，虽然颇有些专长，但苦于没有门路，几次想来东关分厂却又怯步。担心自己一无门路，二又请不起客送不上礼。后来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走进杨振北的办公室。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厂长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当即拍板将他安排到技术科工作。现在，李敬泽已是东关分厂的技术骨干。

杨振北有权为职工排忧解难，可对自家的事却严格要求，绝不用权谋一点“私”。

一天姐姐来到他家，要求将她儿子由一年没活干的手表厂调到东关分厂。杨振北望着姐姐近似哀求的神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向重视手足情谊，何况姐姐在他上大学时主动休学，为他作出牺牲，还卖掉自己的手表为他作路费。可

是难道因此就可以徇私吗？情是情，理是理，向来一丝不苟的他决不肯在这方面有什么含糊。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原则问题，更谈不上什么营私舞弊，但总是个因私而越界的事。

姐姐生气了，说：“我五十多岁了，从没求过你。你当这么大的厂长，办这么点私事有啥要紧？今天你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姐姐用了最后通牒的口气，杨振北更加感到这不可抵御的人情分量。可他还是满脸陪笑地对姐姐说：“姐姐，你别生气，这事你得为我想想，今天我若不是当了这个厂长，你也就不来找我了。我当厂长，就要为厂子办事，你也知道我平素的秉性，我是决不能用权谋私的。”

姐姐不好再说什么了。虽然心里还装着一肚子气，可是她能理解弟弟，因为她太熟悉弟弟了，他自小就是这么一副秉性。人们曾背地里说他较板固执，过于较真，姐姐还曾为袒护弟弟，同人争辩过。今天，事情较板到她自己头上来了。她能因此而怪罪弟弟吗？

妻子近来年纪大了，关节炎老毛病时常发作，有人劝杨振北，阴天下雨时你就用厂里的车送送她，至少你去总厂开会时顺路带带她。杨振北哪样也不肯，他说：“公家的车，只能公用，老婆孩子不能搭乘！”因此，他每天都先用自行车将妻子送到汽车站，然后再回厂上班。当然，这不仅仅出自遵守规定。

当请客送礼风漫过无数院墙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竞争的浪尖上精心弄潮的厂长杨振北，要保持他的一身清白，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都仿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一不慎，就会……

一天晚上，他刚放下碗筷坐到沙发上喝茶，有个外地搞协作的人登门拜访，寒暄几句，那人就将一大迭钞票放到桌子上，表示就像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角落一样，这也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区。杨振北将钞票向对方轻轻一推，平静得出奇：“有事明天到办公室去谈。”

“我有权，你有钱，休想用钱买走我的权。你有钱，我有权，决不用权吃掉你的钱！”当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

他，就是这样如履薄冰地度过人情繁杂的十字路口，坚定不移地追求最初选定的做人准则：光明磊落，一生清白，决心脱离低级趣味，走出世俗圈子，做一个大写的人。

1987年1月4日 (用职责写的一页)

1987年计划安排：①10号家属楼四十万元；②浴池二十万元；③油库三十万元……

要主动关心人的困难，不能只安排任务，那是仅仅把人当作工具。

瓢泼大雨把他从梦中惊醒。他找了把雨伞，就急匆匆从屋里奔出去。外面雨流如注，万物都在疯狂的雷暴雨中翻腾着，颤抖着，他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走到工人宿舍区，一家家地查看房子。有些人家已经漏雨，床上地上摆满了接雨的盆子。地势低洼的住户，水已经漫进院子、漫进屋子。有人一边淘水一边发牢骚：“让厂长来看看，我们住的是什么房

子！”

杨振北听到后什么也没说，悄然接过盆子便帮助舀水。人们发现厂长不声不响地来到他们中间，感动得喉头发哽，刚刚发牢骚的人流下了泪。

厂里的经济状况好转后，杨振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职工盖宿舍。也有人提议先盖办公楼，因为那座办公楼实在太破旧了，还是70年代盖的一栋宿舍筒子楼，没有暖气，每逢冬季，厂长、书记都要自己动手搬煤升炉子。对此，杨振北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否定了那个提案。办公楼缓建，先让职工们有个温暖的家，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振兴东关分厂的当务之急。

“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先想想职工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遇到自身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相抵触时，以他人利益为上，为重。”这是他记在日记中的心得。

很快，两栋高层职工宿舍楼拔地而起，职工们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居。

杨振北还计划，每年要为职工踏踏实实地做十件事。这些事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里。后来，纸上的规划都魔术般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闭路电视系统、无塔加压增水器、封闭式自行车棚、女工更衣间、女工卫生间、文娱活动室、老干部俱乐部，还有那座花了二十万元新建起来的漂亮浴室，设备条件齐全适用，美观大方，就是在整个洛阳城也算得上第一流的。

在他的日记本里，还常常见到某月某日去医院看望某某人、听某某人讲述自己困难的记载。如果详细展开，都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1986年冬季，已经退休十多年的老工人马西云患了癌症。杨振北知道后，立即通知行政科派车将老人送进职工医院，又亲自找到主治大夫，拉住大夫的手恳切地请求：“这是我们厂的老工人、老党员，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尔后他又与郭书记一道去病房看望老人，在手术单上为他签了字。老人如今依然健在，谈起往事还是激动万分，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这个一心为职工办事的好厂长。

那天，杨振北吓了一跳，真的，着实地吓了一跳。他一抬头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无论是他的责任感，还是他的道德观，都不能接受的事实：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他没注意的时候走进办公室，颤悠悠地跪在他的面前。他惊慌失措，立即扑奔过去将老人扶起，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使得一向注意尊老爱幼的杨振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原来，这位老人是幼儿园里的临时工，年老后孤身一人无人照顾，是杨振北提议给她按时发生活费，并免去她的房租水电费。老人无法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听说这天是厂长接待日，便特意前来行了这个大礼。她不知道，这个举动使厂长的心态大大倾斜了；她怎能知道，厂长是把她作为母辈来尊敬的呀。

在杨振北的日记本里，记载着厂里职工的每件具体困难和问题。他时常找出来翻看，检查哪一件事已经做了，哪一件还没办到。就像季米特洛夫说过的那样：“要找出时间考虑一下一天做了什么，是正号还是负号。假如是正号——很好；假如是负号，那就采取措施。”

每天晚上常有人到他家里来找他，他从不拒人于门外。他常对家里人说：“工人来找厂长都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小事是不会轻易找上门。他们来了，我就是不睡觉也要接待。”

他把心交给了人民，他热爱他们。

1987年5月6日

(用胆识写的一页)

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因此，对教育工作是否重视是衡量干部领导水平高低、对现代化事业认识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志。

希望每个青年工人发奋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我厂的生产技术骨干和栋梁之才。

杨振北决定让他——1984年由洛阳职工科技学院毕业的崔健刚负责安装和调试试验台的工作。这是个重大项目，厂里投资三十多万元。起初有人怀疑：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他行吗？要不要雇请郑州厂派专人来安装？

杨振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用人有自己的胆识。

崔健刚1970年进厂当工人，老三届毕业生，是个老实厚道、好学肯干的小伙子。1980年，他报名考上了洛阳科技学院。谁知，当他拿着入学通知书去学校报到时遇到了阻碍：必须同时持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他回到工厂取介绍信，有人短视，认为工厂正处在调整经济困难阶段，无力再派人出去学习。崔健刚心急如焚，一筹莫展。

当时还是副厂长的杨振北见到后，找崔健刚长谈了一次，热情支持他去学习。杨振北找厂长商量，到各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请人们认识到人才开发的重要意义。

崔健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想学厂里一时用不上

的电气自动化专业，去征求杨振北的意见。“现在用不上，将来肯定会用得上！学吧，我支持你！”杨振北坚定了他的信心。

小崔家住农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上很困难。杨振北几次主动为他提出申请补助。小崔和妻子心怀一片感激之情，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报答才好。春节，妻子准备了十斤红薯，让他送到杨振北家里。见面后，杨振北只是鼓励他好好学习，红薯是无论如何不肯收下。争执再三，到底是付了他五元钱才算了事。

四年后小崔毕业了，想留到技术科。杨振北却另有一番见识，年轻人要想真正成才，还需要到基层去锻炼一番。没有足够的淬火，就没有足够的硬度！

小崔在基层又磨炼了两年多，漂漂亮亮地拿下了工厂交给他的激光试验器和空氧压缩炮等试制任务。杨振北这才把他调到技术科。

后来，厂里开发发电机组系列，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为了十六个新品种都能取得生产许可证，杨振北又把安装试验台的任务交给了小崔。他没有要求他的承诺，只因他识才所以才敢大胆用才。人才培育企业，企业也培育人才。崔健刚果然没有辜负厂长的厚望，历经艰难，两个月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87年8月19日

（用尊重写的一页）

上午，开老干部座谈会，听取老干部对其个人困难

的倾述和意见。

下午，开参事会，议论主题是如何提高经济效益。

在杨振北的思想中，有着火焰一般鲜明的意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厂长既是企业的决策人（因为他代表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又是职工的公仆。”要使自己的决策准、指挥灵、效率高，就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善于理解职工，也善于被职工所理解。”

理解可以活血化淤，理解可以政通人和。理解，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

为此，杨振北在东关分厂坚持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职工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他们还建立了由离退休老干部组成的参事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发扬群众参政议政的作用。

参事会每月开一次例会，事先定出主题，通知大家做好充分准备。会上党政领导同志都参加，虚心听取这些老同志的意见。他还独具胆识地设立了“中肯意见奖”，鼓励大家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向领导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我看，这是特殊化！为什么给领导干部家里铺地板，而一般职工家里没铺？”在参事会上有人尖锐地提出了批评。

杨振北接受了这个意见，立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让行政科算出标准价格，然后向铺地板人家按标准收费。为了表扬这个意见提得好，杨振北向提意见人发了三十元的“中肯意见奖”。

杨振北还在厂里设立了“厂长意见箱”和“厂长接待日”。在财务监督方面，他与有关同志商量，专门设立了监察审计小组，使职工有话有地方说，有策有地方献，有气有地方出。按照他的构想，东关分厂要逐步建立起：

有预见的超前监督，
有措施的过程监督，
总结性的最终监督。

实际上，管理就是监督。健全的控制手段，就是完善企业管理；而最完善的控制手段，就是使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在内。

1990年1月9日
(用父爱写的一页)

明茹与泽民举行婚礼

孩子们从懂事时起，所见到的就是一个一身工作服从早忙到晚的爸爸。他们很少见到父亲发脾气，但也很少受到溺爱。父亲的爱永远是温馨的、含蓄的。他细心地教给孩子们各种道理，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启发和诱导孩子们向善的良知。人格，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久而久之，孩子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在一个星期里没做出什么成绩，没做什么值得让父亲高兴的事，就会感到有一种压力，不好意思见父亲的面。

前年，他的小儿子考入安徽建工学院，他很高兴，一家六口人，已有四人上了大学，现在最小的一个又跨进高等学

府，难怪人们都羡慕地说他家是个“高知家庭”。

寒假期间明峰回家，父子闲谈时小儿子说道：“大学里功课多，难度大，要学好不容易，许多同学的目标是超低空飞行，60分通过就行了！”父亲听了很吃惊，严厉地批评了他，要求他，每一门功课都要学得扎扎实实，要向学习尖子看齐。

他又检查了小儿子的课堂笔记，看后摇了摇头，从书柜里拿出自己上大学时的笔记给小儿子看。好家伙，每一本都是那么干净利索，字迹工整，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品。小儿子十分敬佩，将父亲的笔记要去了一本，带在身边留作学习的参照系。

去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时，小儿子对有些问题感到困惑不解，父亲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和他作朋友式的交谈，把自己多半生的经历感受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与不懈追求，耐心地讲给儿子听。他在信中写道：

“学习搞好了，既是学生的天职，又是千里求知的目的。与此同时，努力学习政治，提高觉悟，争取参加党组织，才有希望。望儿珍惜大学时光，在学业上能不断进步，在政治上也要不断进步，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两者溶化在一起，就是又红又专。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望儿朝着这个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去浇灌成才之树，定会结出丰硕成果来。”“不把自己造就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将来能作为老一辈的接班人吗？”

由于杨振北的身教言教在孩子们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处处学着父亲的样子待人

处事。小儿子在1989年11月终于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谈到对党的认识时，他写道：“父亲一生清白，一身正气，他是最敬仰的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对我的影响极大。由于有父亲的榜样，更使我决心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加入党的组织更加向往。”

杨振北对于女儿又是一番疼爱。女孩子家生得恬淡文静，平日里总是不多言不多语。女儿要结婚了，作父亲的自然很高兴。但他很清楚，这事一旦传出去，人们看他是厂长，女儿又在分厂工作，那人情礼物还能少得了吗？到时候恐怕推也推不出去。家里人都能理解他的心情，对外全部守口如瓶，置买家具时，女婿原想借用分厂的车，他拒绝了，最后他们用平板三轮自己一件件拉回来。

前次大儿子结婚他也只在家里请几位至亲好友吃顿饭，尔后将两张车票交到孩子们手里，让他们去过甜蜜的旅行生活。

事后人们知道了这些，无不打心眼里佩服他这种清白廉洁、自珍自重的风格。

1990年2月10日
(用欢乐写的一页)

今天是正月十五，星期六。下午参加总厂职代会，晚上观赏总厂游艺节目。冲压、齿轮、动力（分厂）也有高跷，技艺上都比不过我厂。我厂的道具不如人家，明年要投点资。

好热闹的一个灯节！因为报上早就提出要过一个安定、欢快、祥和的春节，所以从总厂到分厂都为这个灯节做了很大的投入。

十五那天晚上，东关分厂的大门口，汽车排成了龙阵，人群汇成了海洋，人们都说，这是几十年来从未见到过的一场灯会。

排演时，厂长也常到场助兴。东关分厂的高跷队功夫过硬，什么大劈叉，鹞子翻身，高空翻和就地十八滚都够水平。去总厂汇演前的那次彩排，厂长看着高兴，从不抽烟的他，专门准备了一条“良友”烟，散给小伙子们。大伙见厂长这样关心和支持，劲头就更足了，难怪在汇演时他们的精湛表演博得了那么多热烈的掌声，虽然他们的服装不如人家的鲜亮。

杨振北决心明年为分厂演出队置办些必要的服装和道具。鲜亮的色彩，也是我们火热的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企业看，厂长对两个文明建设负全面责任。”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现在，人们经常谈到“企业文化”这个词，并对它产生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理解。实际上，“企业文化”就是文明生产。现代化的企业要求企业像个大花园、体育场和展览馆，这既是现代化生产过程的要求，也是现代化产业工人新意识的体现。因为，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过渡的企业，从它的设计构想、市场预测直到新产品推出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生动活泼、永无止境的综合艺术。杨振北作为一个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厂长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他在企业里不仅

积极支持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还带头参加歌咏、拔河、跑步、广播操，在分厂举办的“体育活动百日赛”和“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中，他都获了奖。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全拖厂运动会的入场式中，他是东关分厂的领队，举着牌子走在队伍最前面，仪表堂堂，给人留下好光彩的印象！

新近，分厂又投资建起了灯光球场，一到晚上那里变得十分热闹。过去他也喜欢篮球，两个儿子都跟他学过投篮。一有赛事，他总是揀着书记去参加：“向文，你上场，我给你拿衣服！”

分厂的中层干部看到书记、厂长带头参加文体活动，他们怎么能不走出办公室呢？

在东关分厂的图片橱窗里，有很多幅厂长书记拔河、长跑、打乒乓球和参加歌咏比赛的画面。不过你仔细地看一下，即便是在那些欢畅愉快的文体活动中，厂长的脸上也都显出一副认真的情态！

1990年3月11日

（用心写的一页）

在总厂找尹厂长谈发动机定价问题7060×1.05
到财务处价格科谈108热片暂不付款，王科长在场
和总厂进出口公司阮芳刚经理谈出口产品事宜。

……

这是他牺牲的前一天。

这一天他特别的忙，东谈西谈，特别是涉及到产品出口

事宜，问题就更复杂。等到把这一切都谈出个眉目，天已经黑下来了。

吃晚饭时，妻子见他头发已经长得很长，就说：“你头发长了，该理理发了！”他说：“这两天回来得晚，你也没时间给理。”说来人们大概不大相信，婚后30年来一直是由妻子给他理发的。人间，各有不同的相爱方式，这对夫妻由于平时一直忙于工作，很难有出外散步旅行的机会，而在家里由妻子抽空给他理发，就成了相互间传递体贴信赖、依托诸般感情的一种特殊方式。对妻子的理发，他既满意又满足，常常夸奖说：“真不错，快赶上三友理发店了！”说真的，妻子对她的这项服务也看得特别重。看电视时，她格外留心哪种发型更为适合他的年龄、身分和头型。

妻子说：“这次你就到外边去理吧！过几天你去深圳开会，别叫人笑话你土气。”

杨振北说：“你理得就不错，不用到外边去理了。明天我早些回来，你就在家给我理吧！”他不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了，已经永远永远……

妻子没有再同他分辩，起身收拾碗筷。儿子房间飘出苏芮深情的歌声：“白鸽奉献给蓝天，长路奉献给远方，岁月奉献给季节，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

杨振北站起身来一边帮助妻子收拾房间，一边若有所思地对妻子说：“你的头发也长了，可惜我不会理女式发（两个儿子小时候的头都是他给理的），不然，我就给你理理。”

妻子听了笑着说：“那你就给理理看，管它好赖呢。”

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他，是一种空灵的意识？还是多年夫

妻恩爱的心理感应，让他最后在亲人身上留下更多的回忆？说着话他真的拿起剪子和木梳，让妻子坐到镜子面前，认真地为她理起发来。他的视力不好，有的地方看不清楚，就特意找来个放大镜，一手举着放大镜仔细端详，一手用剪子为她修整找齐，仿佛要把几十年迢迢绵延的温馨、钟爱和情趣一丝丝地剪定，仿佛只有这样才不会留下人世间依依切切的悔憾。

妻子对着镜子觉得理得不错，油然生出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心境和希冀，凝视着他：“我以后就不去理发馆了……”她对着镜子久久地照着，照着。

可惜镜子是平面的，只能照出他们此刻的面容——一对年过半百和睦安详的老夫老妻。如果镜子是多棱的，能够折射出时间邃道的回光，它会告诉人们这对夫妻融融洽洽、心心相印的过去。他们自幼住在一条街上，不远为邻。长大以后，碰巧又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读的中学。许多同学还记得，那年班上演出话剧《一件棉袄》，选的男女主角碰巧就是他们两个，而班上只有他们两个会说普通话。他们又一起参加歌咏比赛，一起参加洛阳市委党校举办的短训班。他喜欢吹口哨，无论是在操场上和小巷里，一听到那口哨声她便常常感到心跳，引起她许多少女的憧憬和幻想。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给在云南部队的哥哥寄去了一封信，告诉哥哥在异地上大学的邻家姑娘和自己相厚，要与自己订下终身大事，征求哥哥的意见。信中还附有一张邻家姑娘陈桃荣寄给他的照片，背后写着：“我只有一颗心”。哥哥看过，寄回了照片说：“人不错，只要她喜欢你，你也真心爱她，就不要错过机会！”他没有错过机会，接到信后就与她

订了婚。

三十年来，他们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一直是手拉着手从那时清时浊的生活激流里相互搀扶着涉过岁月。虽然每个早晨和黄昏都有不同的阴晴冷暖，可他们却始终相爱如初，相敬如宾。凡是体验过深邃爱情的人都知道，这种百年如一日的深情，只能植根于忠诚。

在多年的生活中，她一直赞成他廉洁清白的生活态度，支持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妻子太熟悉自己的丈夫了：他在做人的品格上，追求最高的价值；在事业上，追求最高的效益；在生活中，一直追求最高分的答卷。她总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他的一切。遗憾的是，这个夜晚她却没有从他的话语或行动举止上，体味出更多的东西。

他们的爱既是深厚的，又是朴实的，非常朴实。虽然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对感情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像他们这样互相理发，互相从生活的细微末节以至政治生活给予互相的关怀和体贴，实在是不多见的。人是宇宙之花。生命对人只有一次。无限寓于来去匆匆的短暂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珍惜人生的真谛。一位伟大的诗人曾经说过：“应当将男人同女人的生活，用一个字联结起来，那个字就是同志！”杨振北在生活中记住了这个字，总是用这个字来维系自己的感情。

妻子的风湿性关节炎近来常犯，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疼痛难忍，她很想请假休息几天，而逢到这个时候，他总是耐心地说服妻子，鼓励她尽量克服困难坚持上班去。他坐在她的身旁感情深厚地说：“我们都已经五十多岁了，能为党工作一天就少一天了，咱们还是按过去的那个君子协定办；

你坚持上班，我坚持用车送你到车站。等过两年你退休了，我退居到二线的时候，咱们再一块休息，一块去到各处走走。”

爱情，是回忆的宝库。

他鼓励妻子要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妻子觉得，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求啥进步，不免就有些泄劲情绪。为了启发妻子，他就将他们年轻时互相赠送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革命家庭》拿出来，把许多用红蓝铅笔划过道道的地方重新再读一遍。他恳切地勉励她：“入党不分年龄大小，党的的大门啥时候都是朝我们开着的。你别泄气！你看咱家已经有了四个党员了，你要再入党的话，咱家就可以成立一个家庭支部了。到时候，我第一个选你当咱家的党支部书记！”

后来，妻子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终于在1989年入了党。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他们想往的未来竟然……

尾 声

噩耗传来，东关分厂上千名职工皆被强烈的悲痛所震撼，所笼罩。上山植树的人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人们、开发产品归来的人们闻讯都风疾火速地奔向医院。已经离厂多年的一百三十八名离退休职工全部从故里返回工厂，一定要与他们打心眼里敬重的杨厂长再见上一面。

泪飞如雨，空气凝窒，数不清的人禁不住失声恸哭。那天晚上，东关分厂的闭路电视停机，几座家属大楼里悄然无声。

一个人的死给大地带来如此沉重的震撼力，可见这个人存在的分量；一颗心会紧系住如此众多人的心，可见这颗心的广阔容量。理解群众的人才为群众所理解，热爱群众的人

才为群众所热爱，这是像泥土一样朴素的真理。

石榴树，火红的花朵燃在枝头，又结出累累硕果。

许多人走到二车间门口，去看杨振北栽的那棵石榴树，去看树上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叶子，一遍遍抚摸那包裹着一圈圈年轮的粗壮的树干。

杨振北牺牲后不久，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党委便做出决定，号召全厂职工向杨振北同志学习，学习他不懈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忠于党的事业、为企业的发展和振兴呕心沥血、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勇于抵制不正之风、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监督、坚持党的原则和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六种精神。

洛阳市委作出学习决定，写道：杨振北“既体现了雷锋精神，又体现了焦裕禄作风；既有王铁人那样的工人阶级气质，又有蒋筑英、罗健夫的知识分子特点；既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展现了崭新的时代风貌，是全市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接着，河南省委和机电部党组也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定。

洛阳市委和河南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他模范厂长的称号……

他，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的卫士，正不停地向人们心里走去。

有一颗灵魂向遥远的宇空飞去了。大地回荡着一位哲人的诗——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的休息了！安眠吧，我的脑袋，安眠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经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

台风眼里漏下的小船

在海面上，在无边无际的凶猛地涌起又凶猛跌落的波涛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就像广袤无边的大沙漠里一条蜥蜴，甚至比蜥蜴还小的一个小东西，在可怜无助地缓缓蠕动着，它的背景是剧烈震荡的整个天地。在那高峰倏忽变成深谷、深谷倏忽变为高峰的大自然骤成骤毁的造山运动面前，那小甲虫的蠕动简直算不上是动。

它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可颠覆的，还是不可颠覆的？不管怎样，它的命运结局都是一样的，暴怒的大自然要把它眼前的一切都颠覆捣毁。它，那个可怜的小黑点儿比沙漠里的蜥蜴还要凄惨、绝望。当沙漠里发生风暴整个沙丘都在移动时，蜥蜴还有个小小的洞穴可以躲避，可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却没有针眼大的洞穴可以栖身，只能将一介微躯毫无希望地抛进无边无际的怒涛中。

几只战舰鸟儿叉开长长的尾翼，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响箭似的穿过。它们不知尾逐过哪艘早已驰进避风港的战舰，现在又开始孤立无援地翱翔在暴风雨的前头了。它们焦急，慌

乱、惶惑、恐怖，也如同人类。领头的那只鸟儿不知受到什么诱惑，突然像闪电似的一个俯冲，滑过一排排尖如狼牙的浪尖，它那敏锐过人的目光，立即把滚滚波涛中缓缓蠕动的小黑点扫描了一遍。原来，那是两艘用缆绳捆绑到一块的小艇。小艇用玻璃钢制成，每艘长1丈2尺，宽5尺4寸。在那无际的波涛中，这两叶小舟竟各自承载着12个人，小艇已被压到吃水线以下了。船上没有动力，没有桅帆，只临时支起一张用破毛毯做的风帆，用来兜取一点点动力。怒海狂涛里的这只小蜗牛壳就那么在一层黑似一层的恶浪里无望地顺水漂流着。

这里是海域最宽、海水最深的南中国海，前后左右几百里不见一块陆地。而且更大的风暴马上就要席卷过来。天地间，除了威苏维火山爆发前的庞贝城和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再没有比他们此时所面临的境地更危险更可怕的了。

他们——分坐在两只小艇上的二十四个人，是号称“神秘的宝岛”——广东省台山县下川岛上的渔民。船老大（他们称他老板，也叫船主），是岛上茅湾村里的打工仔，其他二十几个也都是临村近寨里一些拉家带口的人。命运之神将他们驱赶到这只小小的诺亚方舟上，而后将他们推进死亡的浪谷里去颠簸漂流。

十天之前，也就是1989年7月9日的夜里，他们收拾好渔具网具，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淡水，到对面沙堤镇上装满燃料，便告别了家乡驰向广宽的南海。为了增强续航的能力，他们多装了二十桶柴油和二十五桶汽油放到甲板上。远洋捕捞就是一种无后方作战，没有充足的给养弹药，是打不赢那场战争的。可见船主是个老谋深算、海上经验丰富的渔民。

两天之后，他们已经开出五百多里，来到西沙群岛东面石岛一带的海面上捕捞。船，是刚刚从国外购进的，在此之前，总共只出过三次海。船上备有雷达、测深仪、对讲机等新式仪器设备，吨位虽不算太高（64.2吨），但比起他们父辈驾驶木帆船唱着号子出海打鱼，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了。时间，总会给人带来更为明朗的观念和美好的前景。大海，同样也给了人们许多新奇、许多先辈未曾想象过的东西。

开头，他们的运气一直很好，捕捞进行得很顺利，两三天的功夫就捕到了价值十万多元的优质鱼虾，几个船舱都被银色的鱼类充满，人们的脑子里洋溢着愉快的回忆。7月13日上午，船上收到了8号台风的紧急警报，这是第一次当头打来的霹雳。为了躲开这场台风，同时也为了顺路将船上的鱼销售出去，船主黄原亮决定当天夜里就启程前往香港。后半夜两点多钟时，船上的渔民都怀着一个个美好的希望沉湎到梦中了，只有船主黄原亮一个人在驾驶室里值班。他把握着轮舵，把握着方向，把握着价值几十万元的渔船和渔船里的二十几个渔夫的希望。这船是他与茅湾几个渔民联合附近几个村向银行贷款六十五万元购来的。这是茅湾村（在岛上一律把村称作管区）自己购买的第一艘渔轮，这是他们的骄傲。除了向水产局登记“台山62143号”的名字外，他们又给它起了个“茅湾一号”的动听名字。

凌晨5点钟，天空黑如墨染，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掌，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黄原亮突然嗅到一股焦糊的味道。开始他怀疑是烟头烧着了什么地方，他看看烟缸里并没有带火星的烟头，又察看了一下身边，也没有发现什么。他走出驾驶室，在甲板上下转了一遍，依然没有找到异常之处。他

又回到驾驶室坐下来，焦味变得越来越大，直呛鼻子。他再也坐不住了，又出去仔细寻找，几进几出，最后终于发现在机房排气管与船板结合部位有火苗冒出。原来，主机排气管与船板结合处的隔热石棉垫因长期使用没有注意检修加固而自行脱落，在排气管温度不断升高的情况下，与排气管直接接触部位的船板便燃烧起来。船行时风力很大，小火苗很快吹落到机舱里，整个机舱都着了火。

黄原亮急忙用洗脸盆舀水泼火，可是杯水车薪早已无济于事了。烟雾越来越大，灌满整个机舱，弥漫到甲板上。黄原亮见势不妙赶紧叫醒船工，招呼大家快起来救火。不巧，辅助发电机因故没有发动，船上没有灯火照明，漆黑一片，二十几个船工摸着黑胡乱穿上衣服，冲到水压笼头跟前，又因为没有电水泵无法压水，有人搬来灭火器，又因不懂使用方法喷不出气体泡沫。混乱中，一切抢救设施都没有发生相应的效力。

火，越着越大，终于形成熊熊之势。不久，甲板上也爬上了火苗，卷动的火蛇狂窜乱舞，堆放在甲板上的那几十桶柴油和汽油受到严重威胁，再延迟下去不做抉择就将发生更大的惨祸。

黄褐色的火光打破了拂晓前大海的幽暗，焦糊的空气在迸裂和剥落声中骇人地震颤着。

别无选择，只有弃船一条生路了。船主黄原亮命人赶快放下救生小艇。慌乱中，船工们用斧头砍断了几处缆绳，将七条玻璃钢小艇中的两条推放到海面，随后大家又沿着一条绳索依次降落到小艇上。船主站在小艇尾部检查了一下人数，二十四个人均已到齐，这多少使他稍微松了一口气。于是他

便命令船工赶紧从大船身边划开，一刻也不能延迟，迟缓一步，便有全部毁灭的危险。果然，小艇划了15分钟在离开大船近二百米时，便听到了一声巨响，大船轰隆一声爆炸了，火光冲天而起，海面上顿时冒出一座金蛇狂舞、烈焰飞腾的火焰山。

他们伫立在火焰山的旁边，呆望着越烧越旺的大船，心中升起一片沉落无望的悲哀。自打年初购进这条船来，几个月里他们已经与它结成血肉情谊，凭着它几次出没到辽阔的南海海域，乘风破浪千万里，捕得鱼虾几十万斤，今天竟在这莫名其妙的一霎那，让这艘承载着他们全部感情和希望的大船毁于一旦。且不说船体和各种设备仪器加到一起七十多万元都是银行贷款尚未归还，就是船上的鱼也价值十几万元。这一切全毁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并因此也失去了栖身之处，被赤裸裸地抛进茫茫大海，不久还会有可怕的海上风暴袭来。他们愁苦、忧伤、懊悔、惶恐地守望在火光面前。

天已大亮，火光因玫瑰色朝霞和从朝霞后边跃升起来的金光闪闪的太阳而变得颜色黯淡，燃烧的过程一直未停，飘散的火星和迸裂的灰炭纷纷扬扬地洒落到海面上，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溅起就把它统统吞没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大海更为广阔、深邃和威力强大的了，它要高兴的话，能把地面上一切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统统淹没，不留一点痕迹。

水与火在进行一场罪恶的合谋，一件件地掠走和毁掉他们生存的条件。他们沮丧万分、忧心忡忡地呆守在这里，与其说为了痛心的毁灭举行哀悼，不如说为了未来的生活在翘首期待。他们之所以久久不忍心从灾殃的火场前离开，更多

是为了后一种原因。因为，火光和烟柱是最显眼的信号，在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片海上的烽火狼烟。

可是，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从拂晓一直到午后两点，大约十几个小时的功夫。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竟没有一艘路过的轮船或掠过的飞机发现他们，发现这个极易发现的呼救信号。他们被绝望地抛弃到与世隔绝的大海上，尽管万分依恋却又不得不痛心地离开了大船。有航海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大船沉没时水上要形成巨大的漩涡，会把接近漩涡的一切东西都搅进去。那两只小艇如果不及时撤离，就将像两粒砂子被卷进混凝土搅拌机里，变得无影无踪连个碎沫都找不到。但是他们还在留恋，就像子珠不愿离开母珠、卫星不愿离开地球一样。可是，风浪却打碎了他们痴情的依恋，越来越强劲的风浪推走了他们，两叶小舟在沉寂的生和沉寂的死中间无望地漂流着。

抗争是没有用的，他们就像被缴了械的兵，既赤手空拳又赤身裸体地暴露在既蛮横无理又力大无穷的大自然面前，具体来说，暴露在风浪已经刮起、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虐的大海面前。事情就像奥古斯丁《忏悔录》说的那样，“他们被卷入无涯的苦海里，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不易渡过的苦海”。他们低下头，用心检查了小艇所带的东西，简直微乎其微，少得像他们无望的命运。离开大船时过于慌张忙乱了，食物和淡水一概没拿。在一只小艇上边还带有艇尾机，可惜也因慌张没有带来燃料。艇上没有动力，几只轻便的木桨在狂风巨浪里根本起不了作用，只有听任汹涌澎湃的波涛任意将他们推来卷去。为了避免两只小艇被浪涛冲散，三十七岁的老船工黄国庭找来缆绳，同几个强壮的小伙子们一起，用力将两

只小艇捆在一起。

“仁慈的上帝，让我们二十四个人捆在一起，听凭你的神力安排吧！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有谁在默默地祈祷。

小艇随着波涛一步步地由东向西漂去。他们还在留恋难舍地回望燃烧的大船，十个小时之后那座海上火焰山才熄灭，那艘大船才彻底地沉没。好在，现在他们听不到那震耳欲聋的轰然巨响，也就没有陷进大黑洞的危险了。可是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将是跟黑洞一样可怖的命运。

二

他们是7月13日上午10时接到台风警报的，到17日下午3点钟左右终于被台风给赶上了。

开始，他们想尽量避开台风，在老船工谭炽林的倡议下，将一条毛毯从中间裁开做成两条风帆，各自悬挂在小艇的中间，他们努力朝着偏南的方向划着，但却丝毫改变不了整个航向，仅靠这一点动力船是走不快的。在滔滔滚滚的海浪中间这点努力根本算不上是行动，只能给大浪的冲击增添一点小得可怜的自身蠕动，哪里能躲得过每秒钟行走六十米的台风呢！

午后的大海变得一片苍白，白得瘆人，就像铺展着一张巨大无边的裹尸布。海底传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透过小艇底部一直渗入到艇上每个人的耳朵里。可怕极了！说不清是千军万马的集结，还是一团乱吵乱嚷的人群，你吼我喊，你哭我叫，都丧失理智似的在互相攻击、撕打、噪动、狂啸、怒斥、肆虐，里边甚至好像还夹杂着铜鼓声、军号声、长笛

声、喷呐声，浑浑噩噩，嘈嘈杂杂，一团地狱里的声音，让人心惊胆战，万分恐怖。再看那水面上，不断出现的一个个漏斗似的漩涡，一串串白花花的水泡儿，顺着那急速旋转的涡流从海底深处翻腾出来，发出丝噜噜的响声，随后又爆裂成一股股白烟，在海面上迅速弥漫扩散，就像开锅时蒸发出的水蒸气。

天空不断地变幻颜色，由蓝变白，由白变灰，由灰变黑。不久，太阳便被完全遮盖住了，整个天空如同一块压得越来越低的铅板。海浪越拔越高，海水的颜色也随着天空一起变暗，在那锯齿狼牙的浪尖上原先还能反射出一点灰暗的天光，如今全变成墨黑墨黑的了，活像一排排浇铸的钢柱。钢柱的顶端经常破裂，飞溅出一片雪白的水沫，在墨黑的海面上流淌着，就像大兴安岭林海雪原里边飞速滚动的烟泡雪。

它，果然来到了，从东边耸立的一堵顶天立地的云墙后边奔袭过来。好大的一场风暴，是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一场大台风，是风速在六十米以上的十二级大风。稍微做点解释，按照国际上最新规定的标准，只有十二级以上的强风，才能称作台风，而风力在八到九级的南太平洋强风，只能称为热带风暴，十到十一级称为强热带风暴。过去，我们将八级以上的南太平洋强风一律称为台风，是不确切的。

1989年8号台风是一场真正的台风。它是1989年7月12日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形成的，两天后穿过吕宋一带的陆地进入南中国海。它不同寻常，一般的台风通过一次陆地风力就会减弱几分，而它却变得越来越强，在17日清晨接近于我东沙群岛一带海面时已经超过十二级。

最热的地方也最容易产生最凶残的野兽，比如非洲草原

上的狮子，巴西亚马逊河里的鳄鱼，亚洲湿热带丛林中的巨蟒等等；同理，在燥热的南太平洋上形成的热带风暴（也叫热带气旋），也是一种最凶残暴戾的野兽。它一旦奔袭过来，天地为之动容，大海为之变色，顷刻间，怒吼的暴风 and 狂掀的海浪震耳欲聋，撼得整个宇宙发颤，好像对垒的两支强大军队互相争着用猛烈的炮火覆盖对方阵地，使人们的神经超越感受极限，进入崩溃境地。

小艇变成了一枚失重的树叶，不，成了比树叶还轻的气泡，似有似无地存在于疯狂咆哮的大海之中。一个巨浪将它高高擎起，仿佛登到珠穆朗玛峰顶，站到狂风怒吼、雪沫飞旋、即将发生冰裂和雪崩的山尖上，天和地、海和云、整个宇宙都在疯狂地摇颤。很快，它又像从枪膛里射出的子弹，倏地一下跌进浪的谷底，立刻坠入无底深渊，眼前是一片黑暗。小艇在跌落与擎起之间，像箭似地朝前猛冲过去。海水越过两侧的船舷，劈头盖顶灌进艇内，艇上的人屏息敛气紧紧贴伏在座位上，稍一不慎，人就会被风浪卷走，小艇也会因为这点小小的震颤而失去平衡，像颗草芥似的被席卷而去。

可怕的台风力量越来越大，暴怒的吼声越来越高，那种足以摧毁一切、压垮一切的热带气旋使它成为一堵厚厚实实的高墙，它已不再是流动的气体，而成为实实在在的固体。在这强大无比的固体高墙推进下，其它的一切都成了轻微缥缈的东西，成了如烟似雾可以流动的东西，包括那艘像片树叶似的小艇在内。风把一切都紧紧地扼住，牢牢地紧扣在浑厚无比而又狂颠暴动的高墙上。人们如同悬在万仞绝壁，不敢观察，不敢思索，甚至不敢呼吸，意识中是一片空白。

台风总是伴着暴雨，这已是不可更改的规律了。暴雨附着在台风的哪一个部位呢？一般来说，台风的半径足有二三百公里，最大的可达五六百公里。可怕的8号台风就是五百公里的半径。台风是一种热带洋面上水气凝结而成的热带气旋，气旋的中心形成了相对安静的台风眼。在台风眼的四周有一层厚厚的云墙，科学上称之为眼壁。眼壁是热带气旋风力最强的部位，一股每秒钟都在六七十米左右，最快的可达百米以上。那与台风随之而来的暴雨，就附着在眼壁的厚厚云墙上。

被强大无比的风暴狂轰乱炸过一晌之后，当小艇再次被托到高与天齐的浪尖上时，人们果然在东面看到了那堵作为台风眼壁的厚厚云墙，就跟一座黑糊糊的城墙一样，上接天，下拄地，如同整个一片天体迎面压过来；它压到哪里，哪里就失去了轮廓和界限，哪里就陷到一片墨黑的混沌中，一片万物皆已毁灭的死的世界。

没等他们醒悟过来，小艇和小艇上的人们便都陷入到那个乌黑的地狱之中。如注的大雨就像从决口的大堤倾泻而下的洪水，迫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近在咫尺的人被密集的水帘隔开，人影模糊不见。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被雨水淹没了！

忽然，一声沉重的霹雳在他们的头顶上炸开，好像天空的乌云发生了全方位的爆破，那厚厚的云墙和无边的黑暗被炸开个大洞，闪电在那洞口里现出不规则的耀眼的影子，像几条疯狂扭动的金蛇火龙。当闪电的火光照亮了被雷霆炸开的洞口时，就像打开天门似的幽森恐怖，使人怀疑自己的灵魂是否出了窍。接着，又有第二声、第三声霹雳，纷纷击落

在小艇周围。天空中像有一群恶魔与妖怪在逞威肆虐，互相扭打厮杀、搏击撞斗，各自祭起法力无边的宝器，恨不得把对方和整个宇宙销毁。天庭里的火药库被打开了，所有的雷管炸药都被倾倒在燃烧的云堆里。宇宙间存在的一切都在爆炸，都在崩塌，都在毁灭。天和地、云层和大海、狂风和巨浪、物体和灵魂，都处在一团混乱之中。

奇怪的是，两个小艇在这狂暴之中竟没有颠覆崩溃，没有让暴雨、飓风或者随便哪一个恶浪给毁掉。在这无比颠狂的浑浊里，艇上人尽管各自看不见对方的神情面孔，却无需任何人发布命令都齐心协力地做着同一动作——把舱里的积水尽快淘出去。有盆的用盆，有桶的用桶，有锅碗瓢勺的用锅碗瓢勺。几天来，他们因为没有淡水喝，嗓子干渴得冒烟，舌头发肿，嘴唇裂开了口子；现在他们却用所有的器皿不停地将雨水往舱外淘，把唯一能够延长他们生命的宝贵液体泼洒出去。这是不可思议的，却又非常的现实，如不尽快淘出积水，小艇就将沉没。

在二十四个不停劳作的人中，坐在小艇尾部的黄原亮和谭炽林是至关紧要的人物。他们紧紧把握着舵柄，为了躲开风暴的猛烈袭击，预防稍一不慎就会被风卷到艇外的危险，他们都深深地弯着腰，头差不多直扣到脚上。在这非常时刻，要求神志特别清醒，判断非常准确，把舵稍有一点差池，船头稍一偏斜，面对高涌的波峰或骤降的浪谷，那数十吨重的大浪从侧面稍一拍击，小艇立即就会倾覆毁灭。

真是奇迹，天底下绝无仅有的一桩奇迹！这两个小小蜗牛壳竟然在如此猛烈的台风下面度过了一天一夜，一座座几十米高的排空大浪竟然没有将它打翻，最强时每秒达七八

十米的风力也没将它摧垮。简直不可思议！查阅世界灾害史会发现，本世纪全球热带气旋所造成的灾害，无论是死亡人数或者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洪水、地震、雪崩、塌陷、泥石流、火山爆发等其它自然灾害。据统计，在最近六十多年里，一下子造成死亡人数在五万人以上的台风就有十次，其中1970年在孟加拉国，1981年在越南海防和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台风，每次死亡总人数都在三十万人以上。海上船只遇上台风如果不能及时躲避，很难逃脱灭顶之灾，甚至包括那些上万吨级的巨轮在内，有时，连躲进避风港里的船都难以幸免。1954年9月，“玛瑞”号台风将停泊在日本函馆港内一艘四千三百三十七吨的渡船吹到港外，使其触礁沉没，船上一千二百多名旅客丧生。港内另有四艘货轮也相继沉没，死亡总人数达一千四百四十人，造成世界航海史上第二次大灾难（第一次是1914年英国的“铁达尼克号”客轮横渡大西洋时触冰山而沉没，死亡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然而，这两只轻如鸿毛的玻璃钢小艇，竟然能在波涛汹涌的广阔海域里面挺过了这场强台风，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它们是台风眼里漏下来的两只小船！

在这一天一夜里，船上的二十四个人都像一架破损的机器似的，吱吱咯咯简单地重复着一个动作——不停地向外淘水，不知道疲劳，不知道饥饿，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自我，完全变成了机器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算是度过了这场几乎无法战胜的灾难。到了7月18日下午3时左右，8号强台风已把朱庇特的雷火车轮转移到了西北方向，放弃了这两只小艇径直奔向大陆，朝他们的家乡——台山县下川岛附

近一带登陆。

他们暂时被从风神的翅膀上释放下来，但风神仍没忘记对他们的报复，它抄袭了他们的后路，把他们的家乡台山摧残得一塌糊涂：数百里海堤冲垮淹没，数千间房屋倒塌，倒灌的海水淹没了二十余万亩农田，合抱的大树连根拔起，柏油公路被冲成烂泥浆，一百四十六人受伤，三十八人残废，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近三亿元。

世上有许多事情都是无法解释的，上帝好像有意要把那因果联系的链条一端，深埋到永恒的幽暗之中，造成一个永远无解的迷。“台山 62143 号”船上的二十四个人本来是为躲开台风从海上返回大陆的，而沉船又将他们赤裸裸地抛到受台风狂扰的海上，台风却又偏偏在他们饱受惊恐之后仁慈地交还给他们一线生机。

三

他们二十四个人虽然侥幸逃脱了台风的威胁，却没有能力躲开厄运的摆布。饥饿、干渴、寒冷、暴晒、蚊虫的叮咬，一系列纠缠不尽的麻烦，都在痛苦地折磨着他们，就像一条勒在脖子上的死神链子，随时都可能掠去他们的生命。

台风过后，风浪渐弱，小艇的颠簸逐渐缓和下来，人们这才想起该伸腿了，可是两条腿都已僵直麻木，需要互相帮助拉扯才能伸展自如。

傍晚八九点钟，一轮团圆的明月升到了头顶的上空，身边没有一颗星，没有一片云，显得孤寂而凄清，有人想起一个久远的传说：月亮本是地球的一部分，是地球初步形成时期自我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使一大块陆地从地球表面飞离出

去了，而那凹缺的部分，就是今日的大海。如果月亮能够返归地球，人类就全部生活在踏踏实实的陆地上，再也不会经受风波之险，再也不会承受他们今日的煎熬了！海面上泛起一片银色的雾，缥缥缈缈，给人一种极为奇幻迷离的感觉。波浪在银光下瑟瑟抖动，痛楚不安，好像正为日间那场丧失理性的疯狂感到全身乏匮。小船的右侧，有一条银亮的桥正闪闪发光，好像月亮有意要从凄怆清冷的绝对空虚里走过来，先竭力铺好一条由天空回到沧海的路。

飘游在沧海里的二十几个人，首先感到难以忍受的便是寒冷。一天一夜的劳累，耗尽了他们身上的热量，凄凉月色和夜间的海风使他们感到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地凉，灵魂和肉体、理智和情感全都凉透了。坐在船尾给小艇掌舵的黄原亮想起一个主意：“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海水里泡一泡再穿上就暖和了！”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果然好多了！

“真灵验！怎么我们先前就没想到这个点子呢？”刚满十八岁的黄炳坤一脸孩子气地说。其实，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奥秘，只因含有盐份的海水比棉布的密度大，能够相对保住人体的热量。

渐渐，月亮变得模糊了，也许有破碎的云彩飘浮过来将它遮住，也许只是人们发涩的眼睛布满了阴翳，一切都变得朦胧起来。他们太疲劳了，在一天一夜的殊死搏斗中，精神和肉体都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每根神经和每条肌肉都像崩紧的弦，现在台风过去了，海面相对恢复了平静，沉重的疲倦开始向他们袭来。掌舵的黄原亮和谭焱林这会儿却不敢有稍微的松懈。无情的海浪虽说没有先前那么汹涌，但如果不能保持船体平衡，保持船头笔直地对准浪峰涌起的方

向，大海要将这两只小艇掀翻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能够同这两个舵工替换班的，还有谢洪心、黄国庭、黄国大、谢新伟等几个年纪大的老渔民，现在也都因为过度疲劳躺倒了。作为一船之主的黄原亮不想惊动他们，尽管这时他自己也感到实在无力支持了。

天亮了，人们接连醒过来，阳光径直照在他们身上，刺得眼睛生疼，人们身上全是汗，雾似的水蒸气从每个人身上蒸腾起来。天空亮得晴朗，整个苍穹现出一抹钢蓝，水天相接处飘浮着几片缱绻的白云，不一会儿，太阳抖落下火焰一般的红光，海水也被这火焰烧着了，海面上一片绚烂。

他们醒过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肠胃极端难受。饥饿像条毒蛇，在胃里不停地翻滚着，凶狠地啃噬着胃壁、肠内膜，啃噬着人的脑神经。除了饥饿之外还有渴，渴比饥饿更加难忍。此时，人们整个灵魂都在呼唤水，水，水！可是回望大海，却令人气得发疯！非但不能止渴，反而令人倒胃、作呕。有人开始嚼自己的衣襟和袖子，人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干得发肿的舌头即使接触到这一点点水气也会觉得好受一些。

大海是广阔无边的，蕴藏着无比旺盛的生机，可是有时候它看上去又是那么荒凉、单调，无论你行走了多少里，变换了多少个方位，眼睛所能看到的还是那副冷峻阴森的面孔。人们越是长时间地望着这副死气沉沉的面孔，越是感到心里憋闷得慌，绞痛的肠胃越是叫人琢磨着吃的喝的。许多的幻觉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山脚下灌木丛中掩藏着一眼汨汨流淌的清泉，家乡下川岛海湾肥突突的石斑鱼，油滑的身子尺把长，伸手就能捉上一条。这是一种味道极鲜美、肉

极细嫩的海鱼，在香港一条要卖一百多个港币，而其中最为名贵的一种叫“老鼠斑”，一条要卖四五百个港币，谁家宴席上要能摆上一盘清蒸老鼠斑，那可是超过一般规格了。二十四岁的周日洪已经望到桌上摆出的清蒸老鼠斑了，当那盘香气扑鼻的佳肴从他眼前十分痛心地消失时，他只感到舌头干燥得很，特别地大，好像上边长满了细毛，含在嘴里又苦又胀。

有谁实在忍受不住了，饥饿的眼睛一下子看到放在小艇舱底下的那个纸盒箱子。那原是包装松下彩电的，不知什么时候废弃在这里。他伸手扯下一扇，撕成一块块，舀上一瓢海水，等泡成粘糊状时，他就像喝玉米糊糊似地将那纸浆吞咽下去，那像蛇似的啃噬胃壁的胃酸便暂时受到了抑制。

“这个法儿真灵，你们也来试一试！”奇妙的成功震动了两个小艇上所有饿得发慌的人，都伸手去扯那纸盒箱子，舀上海水如法炮制再向肠胃输送这种绝妙的填充物。

谁也想不到，那个包装松下电器的纸盒箱子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挽救了这么多人的性命。不过，进口的舶来品可是不容易消化的，那苦涩的海水和含有特殊味道的松下纸箱，吞咽后给肠胃招来无法承受的折磨。人的小肠内膜上的绒毛，对于草类纤维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早在十几万年以前人类居住在山顶洞的老祖先那个时候就已经退化了，结果很多人上吐下泻，折腾得死去活来。

四

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可怜的俄底修斯，在从特洛伊战场返回自己家乡的途中，不断遭受到海上风暴的袭击，只为不

知什么年月曾与海神结下的宿怨。小艇上的人们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他们在海上顺水漂流了八天之后，在7月21日下午5点钟左右，又碰上了第10号热带风暴。

中午过后，天空变得阴森森的，随后，大团的乌云拥塞过来覆盖住整个天空，又阴惨惨地裹着风的怒号压向海面。海面迅速膨胀起来，海底涌出无数可怕的三角浪。这种浪是行船的致命敌人，它是从三个方向发生作用的合力，很多船都是在它的打击下失去了平衡。

不久，刮得天旋地转的台风便一路呼啸着奔袭过来，紧紧相随的还有云、雨、雷、电。它们像一个庞大的家庭组成的阴谋集团，合伙来肆虐咆哮，决心要把这个世界彻底毁灭。

小艇又像两个蜗牛壳似的在沸腾的漩涡里旋转飘荡。一忽儿，被托到高高的浪尖上，险些与覆压下来的乌云触撞；一忽儿，又滑到万丈波谷，周围是一片地狱里的黑暗。在浪与浪之间，不时从斜刺里窜出狡猾的飞浪，像呲着白牙的大鲨鱼，随时准备将小艇一口吞掉。

现在，小艇同飓风搏斗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人们已经八天没有吃到东西了，仅靠那个纸盒子活命的人能有多大力气呢？不少人一直躺在舱底，连说话的劲头都没有了。可是现在还要靠这些人不停地向舱外淘水，想尽办法保持小艇的平衡，这要做出怎样的努力和拚搏！昨天，家住川东管区的陈池盛便不断地在昏迷中说呓语，眼前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他的喊声闹得人心慌慌，使得本来就颠簸不安的小艇更加不安地颠簸起来。

这天天气特别热，一大早毒花花的太阳便爬到当头，晒

得海水直冒热气。天空湛蓝湛蓝，偶尔飘出几块灰白色的云朵。艇上的人被晒得头昏眼花，脑袋发胀，一个个显得愁眉苦脸。活泼好动的黄炳坤无意之中把衣服脱下来放到水里泡了一阵子，又湿漉漉地戴到头顶上。谁知这种奇怪的水帽一戴到头上便感到好受了许多，好像那湿漉漉的衣服能把扣在头上的烈日隔开一层似的。“唉，这是个好法子！大家都试试看！”他得意地向人们宣扬着。小艇开始活跃起来，人们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地浸泡衣服，学着黄炳坤的样子赶制水帽戴到头上。

就在这时，一直昏迷的陈池盛突然从舱里坐起来，手指着远方大声喊叫：“快看，快看，那边有井架！”人们闻声立即探出身子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尽管人们怀疑那是病中呓语，但还是眼巴巴地希望真的能够看到井架。这里离北部湾很近，石油井架很多，说不定会真的漂流到哪座石油开采平台跟前，他们也就得救了。人们痴痴地望着，望着，水天相接处影影绰绰地有个直竖起来的東西，对这群早已绝望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惊人的振奋。大家顿时鼓起力量，拚命朝着那个方向划去。可是划了半天，那个东西却越来越茫然，最后竟然消失得无踪无影。人们这才醒悟，那根本不是什么石油井架，而是一艘过路轮船的烟囱。

小艇上没有发报机和对讲机，什么通讯联络设备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法跟那早已远去的轮船取得联系。

幻想的破灭，追求的失望，给人们心理增加了更大的打击，原来已经躺倒的人再也爬不起来了，没有躺倒的也相继倒下。绝望，弥漫在每个人的脸上。除了掌舵的两个人还端坐在船尾之外，其他的人都疲倦无力地闭上了浑浊黯淡的眼

晴。

可是陈池盛还在嘟嘟囔囔地喊个不停，此时他连坐起来验证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是井架，绝对是！你们怎么不信，我真不明白，难道，难道过去我什么时候说过谎，得罪过你们？喂！你们怎么不朝那边划呀？那不就是井架吗？……”

人们望着远方，在小艇随风漂去的那个方向，仍然是一片茫茫，除了连天的波浪什么都没有。病人无休无止的呓语，更使他们心绪烦乱，万分沮丧。

到了7月21日上午，也就是10号台风来临之前的那天早晨，海面升起浓雾，灰蒙蒙的气体充塞于整个天海之间，海上能见度很低，视线被一寸一寸地向回压缩进去。通常在这样的气候里行船是极为危险的，极易发生触礁之类的情形。后来雾气渐渐淡了，可远近还是一片苍茫和朦胧。太阳出来了，显出贫血似的苍白，无力地悬在空中，毫无生气。陈池盛又从舱底里爬起来，用手指着远方大喊大叫：“山！你们看，前边有山！”人们再次振奋起来，瞪大眼睛向他指示的方向看去，在雾茫茫的天空底下果然有个朦胧的山形。大家又奋力向那个方向划去。没准是个海岛，也许是片陆地，人们好像都忘记陈池盛是个病人，忘记了他那串儿没边没沿的呓语。可是没有划多久，又都泄了气，那座山形渐渐隐退，轻飘飘地化作一团气体在海风中消散了。

人们再次遭受到失望的沉重打击，沮丧到极点。尽管陈池盛又在那里说出许多似有似无、让人半信半疑的话来，人们再也打不起精神去注意了。他们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愿想，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再次到来的台风，复又把人们干瘪了的腔体里仅存的一点能量调动起来，人们又操起一切

可用的器皿，机器人似的一刻不停地向外淘水。没有人监督，没有人鼓动，求生的本能、狂吼的雷雨风暴召唤着人们刻不容缓地竭尽全力。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二十四个人都在生死线上拼搏，奋力地一下下把水淘出去，哪怕是当下就会昏厥、休克、力竭身亡，断气之前也要去淘最后一盆水。有一个意念在他们头脑里始终清晰：只要小艇不翻，他们二十四个人当中总有人能够活下去，为着那个能够最后活下来的人，他们愿意献出自己身上的一切，包括奄奄待毙的最后一点力气。单个的生命已经无足轻重了，像夜深更阑的万家灯火，熄灭了一盏两盏都无所谓。让天神随意去掐灭哪盏他认为该掐灭的烛光吧！只要留下火种，只要留下能够昭示这里还有人类生存的证明就足够了！

天河中的水倾泻下来多少，云雾中的风火雷电就丢下多少残鳞败甲，这场天上的妖魔混战延续了多长时间，他们被可怕的台风眼及其周围的云墙罩住了多长时间，人们没有功夫也没有精力去留意。有些人确实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耗尽，昏厥在舱里，一任舱里的积水在他们的身底和头部冲来荡去。身旁的人无暇顾及，尚能坐立的人精力都集中到一点：尽快淘水，勿让积水将船淹没！

不知过了多久，乌黑的天空终于闪出一线亮光，它缓缓地扩散着，最后连黑色波涛也泛起星星般的亮光，幽暝的海面露出一丝希望的颜色。远外轰鸣的雷声不似先前那么沉重威逼，多少有些收场前的态势。果然，在它狂嚣怒吼了一阵子之后，凶残的10号台风就带着尚未施尽的余威直朝西北方向奔去。助威的乌云、墨雾、暴雨、沉雷一并被裹走了，余下的成了一团团破碎的、蜷曲的、不断旋转的气体，等待逐渐

发亮的天光将它们一片片收将回去。

这时，正在淘水的谢洪心突然停住：“不能再淘了！这船里的积水应当收留起来，等到口渴时再喝！”他向坐在船尾掌舵的黄原亮望了望，不用任何言语，一切都交流了，什么都明确了。船主黄原亮马上命令大家，将能够盛水的器皿擦洗干净，留下舱里还算干净的雨水。可是令人痛心的是已经有好几个人失去了知觉。虽然都知道那个可怕的时刻无法阻挡地迟早要来，可是当它真的来了，还是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撼，犹如一下子被推进凄怆悲绝的荒原。生命之水贮存下来了，可生命却永远永远地消逝了。人们捧着贮水桶的手瑟瑟地抖动起来。

第一个死去的便是不断喊叫呓语的陈池盛，接着便是川东的谢洪滚和茅湾的黄明波。

人们满含泪水轻轻地阖上了他们不肯闭上的眼睛。现在，天上的风云雷雨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都在他们眼前彻底地消逝了。饥饿、干渴、寒冷、暴晒以及身上的疥疮和水上蚊虫，都不会再折磨他们了。活着的人在死者的脸上看到了一面镜子，在那枯黑焦瘪的脸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那直挺挺僵死在船板上的不是别人，就是几天后的他们自己。

他们一直围坐在死者的身旁守望着，不时有人为他们整理身上的衣服，或用毛巾为他们擦擦脸。一直守坐两天之后才将尸体投进大海，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肃穆的海葬仪式。

命运，就是这样一条窄窄的仅可容身的船板之路。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了！

五

天近黄昏时，坐在船头上的三十三岁的陈平准忽然听到水里面传出几声哭泣的声音，凄凄楚楚，悲悲切切，令人毛骨悚然。他赶忙推了推他身边的谢新伟，惊恐地说：“你听，是谁在哭？”

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仔细倾听，小艇附近水中果然有一种神秘莫测、凄厉哀怨的哭泣声，而且不止一处。在那幽深的海水里好像真有苦难的灵魂发出痛彻心肺的哀诉。

大家面面相觑，一片惶恐困惑。但很快就揭穿了这海底之谜，有经验的老渔民都知道这水下悲泣的动物肯定是那最讨人怜爱的海豹。

原来，小艇正从一片珊瑚礁旁经过。那珊瑚礁盘根错节，犬牙交错，有的露出水面，有的深埋海底。这片珊瑚礁丛是绝对不能靠近的，它非但不能挽救艇上二十几个人的性命，弄不好还会撞坏船的龙骨，造成搁浅。那些海豹就栖息在这珊瑚礁丛一带的海域里，经过方才那场强烈的热带风暴，它们当中有的丧失了幼仔，有的小海豹找不到自己的母亲，便发出了很像人类悲怨的泣诉。在海上捕猎的渔民都很喜爱这种乖巧、有灵性、从水里冒出来时那椭圆的头颅看上去颇具人形的动物。今天，它们好像受谁的派遣特意在这里等候他们，为艇上已死去的人或即将死去的人悲鸣。一声声凄婉的哀啼，令人柔肠寸断。

应该有人生还回去，把船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家里人。可是他们已经十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已经达到生理坚持的极限，可陆地依然遥遥无望！曾经给过他们欢乐，给过他们希

望的大海，现在只能使他们忧愁绝望；曾经生育他们养育他们的大海，现在彻底地把他们吞噬了！

应该有人生还回去，告诉家里人他们是怎样顽强地同两次凶猛的台风搏斗，又是怎样由于没有食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三十三岁的陈平准想到这里，紧紧地闭上眼睛，从怀里摸出一把水果刀，咬了咬牙，便将手腕上的静脉血管割破。躺在他身旁的弟弟陈平省赶忙扑过去夺下刀子，用手将他汨汨流血的刀口死劲捂住：“哥哥，你不能！你不能！”陈平准挣扎着，奋力要将那只胳膊从弟弟的手里抽出来，他语气坚定地说：“弟弟，你把我的血喝下去吧！喝下去，你就能够活着回到咱们的竹湾，告诉乡亲们咱们在海上的事……只要你能生还回去，年老的父亲日后就有人照看了……”

弟弟搂住了哥哥，眼泪簌簌地流下来。他把哥哥的刀口握得更紧了，又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与身旁的人一起强按着把哥哥的伤口包扎住。人，不是吸血的动物，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吸吮自己的同类，更何况是自己的手足弟兄！平准的冲动平息下来了，弟兄两个互相搂抱着，平躺在潮湿的舱底，泪水相对，哀伤无言。

凡是遭过海难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他们受尽饥饿折磨而昏昏欲睡时，总是梦见自己坐在餐桌上吃着最美的佳肴。现在，芙蓉湾的周日洪就正在做这样的梦。这是一场捉弄人的噩梦，因为等他从梦中醒来时更加觉得饥饿难忍。就是在明亮的阳光下瞪大眼睛，有人也还是被那不可捉摸的幻觉缠住。三十七岁的黄国庭就总觉得从大船下来时往绿帆布包里放了两包饼干，现在有一包还完完整整地放在帆布包里。可是他又明白，帆布包里根本没有什么饼干。为了摆脱这种

幻觉，他吃力地坐起来，找到那个绿帆布包，反反复复地看了又看，依然挣不开幻觉的缠绕。

至于二十四岁的陈超合所产生的幻觉更是荒唐。又是一个血色的黄昏，当浑浑噩噩的落日全被苍茫的大海包容进去的时候，水面上泛滥起充血的金色，随着夜色越临越近，金色的光泽越来越淡，而那让人感到苍凉绝望的血色却越来越浓。陈超合突然涌动起一个疯狂的念头，他把那个猪血色的塑料盆抱起来狠命地啃，口口声声说那是一个西瓜。人们从他手里把塑料盆抢下，他却死死地抱着不放，大叫：“放开，放开！干嘛要抢我的西瓜，有这么好的西瓜不让我吃？什么，塑料盆？滚开吧！还给我！那是一个上等的新疆大西瓜，不准你们欺骗我，不准……”他越说声音越微弱，越含糊，后来竟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不久，他醒过来，被幻觉蒙住的眼睛也睁开了，他看清摆在小艇尾部的那个圆东西确实是个塑料盆，这使他又伤心又绝望，好像已经看到生命的气泡马上就要被风吹破了，他抽泣着对大家说：“伙计们，我不行了，已经熬到地方了，再也没有力气熬下去了！他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千万不要把我扔到大海里去！不要扔！我是个胖子，身上有肉，你们就把我吃掉吧！吃了，你们就会有些力气，就可以回到咱们的家乡下川岛。你们当中川东的人很多，都是我的老邻居，求你们能够到我家里去看看，我的父母妻子，还有未成人的弟弟妹妹……”他泣不成声，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可是，这些荒诞的幻觉就像魔鬼附体一般仍然揪住他们不放，他们反反复复地从这种疯狂的幻觉里挣扎出来，耗尽了身上仅存的一点力气。

六

“干嘛都愁眉苦脸的，即使死神掐住了脖子，也得有点笑模样！”川东管区年纪颇大的谭炽林望着艇上二十来个人的脸说。他是老渔民，船板里面是爹娘、船板外面是閻王的风浪不知闯过多少次了。

“说得对，常年在海上转游的人什么阵势没见过？没啥了不起，两次那么强的台风都没把我们怎么样，还有什么闯不过去的火焰山？”年纪稍长的船工谢洪心、戚水松也跟着说。

一群衣衫褴褛、形销骨立的人仍然一动不动，黑得发青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如同一群风雨残剥的雕塑。

“老黄，你到过国外，你给大伙讲讲国外的事吧！”一直闷声不响的谢新伟说。在此之前，他一直低头思念家乡茅湾，思念年老的父亲、母亲、与他同龄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刚刚一岁，是春天出生的，正巧，那两天有燕子来他家屋檐下衔泥筑巢，他便给孩子起名叫“春燕”。有人说这个名字太女气，可他觉得这名字好，喜庆，女气就女气，管它呢！

黄原亮听到有人点名来问，吃力地活动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想尽量露出一个轻松的微笑，可是他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把这个笑脸做好。青紫色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齿太白，衬得黑里透青的脸愈发的瘠人，腮上只剩下一张绷得很紧的黑皮，笑，看上去比哭要难看！“国外有什么好讲的？你们不是在电影和画报里都已经看过了吗！”他想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一些，最好能够带点诙谐感。

是呀，国外有什么新鲜的？谢新伟很赞同船主的话，说起来，哪儿也不如他们的家乡下川岛。四面环海，岛上山岭起伏郁郁葱葱，中间是个坝子，平畴沃野阡陌纵横，绿油油的水稻田一眼望不到边，地上就像铺上个翡翠绿的大地毯。岛上物产丰富，四季花开，四季都有新鲜水果和蔬菜。地理学家考察过，我国除了海南岛之外，能够长出椰子树而又能结出椰子果的地方，唯有宝岛下川。

“喂，黄老板！说起电影，我看《冰海沉船》就很不错！”竹湾的方家晓说，“你看那些英国佬，别看肥头大耳的，节骨眼上真够派的，沉船的时候，他们还镇静地听音乐！十几把小提琴一直拉到他们没到水底下为止。”

“是呀，若是有点音乐就好了！”戚水松感叹道。

“我说老谢，若是真有音乐的话，此时此刻你最想听什么曲子？”茅湾的方东平向他的邻居谢新伟问道。

“我——”谢新伟木讷地摇了摇头，音乐同他好像从来没有打通过关系，一直萦绕他思绪的还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海滩。

他们的茅湾位于下川岛的南面，背山临海，风光秀丽，前面有一弧像个弯月似的海湾，乡亲们的渔船都拴在海边的礁石上。风浪来了，停泊的渔船便在海湾里东一头西一头地漂荡着，就像一群麻栗色的鸭子在水面嬉戏追逐，身边溅起一层层雪白的浪花，甚是好。他小时候就常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一个人躲藏到黑礁石的罅洞里，半天半天地望着那些在海湾里漂漂荡荡的渔船。

“那你，好兄弟，一定想听听《魂断蓝桥》了？英国人在节骨眼上都爱听这个曲子。”方东平转过身对方家晓说。

“去他的《魂断蓝桥》吧！我才不喜欢那些洋腔洋调的玩艺呢！还有那洋嗓子，听起来叫人起鸡皮疙瘩。要来，就来咱们自己的！”

，“什么自己的？”方东平不解地问。

“什么都行！比如《海外赤子》、《我的中国心》……”方家晓歪着头边想边说。“我说，还是唱段‘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好！”戚水松在一旁提醒。

“对，就是它！就是它！往前走，莫回头！管他是青杀口、红杀口呢！老子明天就是掉了头、断了气，也还是中国人、中国心，是咱们自己人里边的一条好汉！”谢洪心在一旁插话。

“什么好汉？”有人问。

“程咬金呗！”戚水松笑道。

“程咬金怎么的？咱就是程咬金！三斧头过去，咱败下阵来……可咱不认输，就是刀砍在脖子上咱也不认输！”他越说气越壮。

人们说着，已经干瘪了的胸膛又有了底气，又有了活力。“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古老的传统的好汉意识，不断地壮起人们的一腔豪气。正当人们说话的时候，坐在船头的陈丙烽看见海面上漂过来一大片呈暗黄色的马尾藻，赶忙捞起几把，分给大家，只听牙齿一咬，咯吱咯吱地响，跟青草一般充满了粗硬的纤维质，人们还是一口一口地咽下去。不管怎样，只要有东西咀嚼，就会使人增强求生的活力。

“嘿，我说黄老板！咱不讲音乐了，那玩艺太虚，你给咱们来点实的吧！讲讲国外的吃食好吗？”方东平又想出个

点子来。

“好，我说！”黄原亮不愿使大家扫兴，便一边掌舵一边绘声绘色地说起自己在国外取得的美食经验。

听着船主的海外奇谈，谢新伟重又低下头去想自己的心事。他好像回到了自家门前，看见老爹正一个人蹲在散落于海滩前的礁石上，咕噜咕噜地抽着现今只有在他们家乡一带还有人抽的竹筒大水烟袋。今年，海湾养殖场里又打下好多水泥桩子，投下了好多幼苗，饲养了大量的牡蛎、沙螺和翡翠贻贝。这种贻贝也是一种上等美食，在香港也要卖几十个港币一斤。它皮薄肉嫩，一咬一包水儿，就是吃饱了饭的人，也能吃半箩。用这种贻贝煮的米粥——贻贝粥，清香鲜美，是一道让人吃过之后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美餐。他老爹是养殖场里的管理员，他最爱一个人蹲在海滩礁石上了望这片养殖场。在老爹身后，耸立着一座兀突突的山，山上怪石嶙峋，悬崖陡峭，有几处岩穴深深地隐蔽在淡云薄雾之中。蓊郁的树木和青藤野草覆盖住通向山顶的各条小路，高大的银桦、侧柏、南洋杉、菩提树，还有近几年栽种的湿地松与台湾相思树，密密匝匝，枝柯纵横，把个森耸虬蟠的山峰遮掩得无比神秘。因为这山的形状奇特，一向便有“峨嵋石”的称呼。他喜欢这座幽藏着无边神秘的峰岭，他自小就揣着一片好奇的心，寻寻觅觅地跑遍峰巅、峰埂，山中的每一条小路都留有他回味无穷的童年脚步。

“喂，你们瞧，往那边瞧！是不是有船开过来！”目光尖锐的陈丙峰几乎惊叫起来。他指着正西方向，在晚霞消失的地方，在尚未完全暗却的绛紫色云堆后面好像有一个烟囱直直地冒了出来。不过，它在流动的淡雾里显得太孱弱了，

太虚幻了，很难看得清楚。

“别又是井架吧！”有人没好气地挖苦。也难怪，自从坐进这只小艇，他们就不断受到大自然的摧残、欺骗和愚弄，十几天来令人失望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那不是井架，也不是幻觉！我敢保证，那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船。你们看，那根烟囱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么？连从里边冒出来的烟都看见了！”陈丙烽清楚地指点给人们看。

他说得一点不错。那根从海水里笔直地竖起来的黑柱子是个烟囱，有一只船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直开过来！人们一阵狂喜，甚至流出泪来，原来一直躺在舱底没有力气坐起来的人也都坐起身来。他们都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由小变大，由虚变实，最后连船身、船上的旗子都辨认出来了。

“它该不会抛弃我们吧？”有人担心地念道。

“当然不会！搭救遇难船，是《国际海洋法》中早有过的规定，最近，又成立了‘海上互救协会’。”船主黄原亮满有把握地说。

那艘挂着某国旗帜的船终于开进他们的视野，离他们只有七八百米之遥。他们摇晃着衣物，竭尽全力地呼喊狂叫，然而那艘轮船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艇上没有对讲机和发报机，没法进行直接联系；身边的衣物可以做成旗帜，可是又没人会打旗语。他们在这茫茫大海中成了真正的聋子和哑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艘救生船失之交臂，从他们眼前若无其事地开过去。人们丧气，堵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又都躺倒在舱底，小艇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

“见死不救，没有一点人性！还参加什么海上互救协会？”

陈丙烽气哼哼地说。由于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因此对他的打击也就特别沉重。

“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黄原亮向人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向他们发出任何呼救信号，他们又弄不懂我们呼喊了些什么，怎么知道我们是些遇难的人呢？往好里想，他们可能把我们当成越南难民；往不好处想，也许把我们当成走私贩或是海盗船呢！”

“什么年代了，还有海盗？”陈丙烽愤愤然地说。

“就在上个月里，一艘菲律宾海洋公司的货船在其近海航行时，就突然被二十几个海盗阻截。海盗手持各种轻重武器，将货船里的三十多名船员赶下救生艇，然后将货船开走，从此偌大一艘轮船就从海上消失了，人们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那个船上装有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钢铁。”船主黄原亮经得多，见得广，知道海上许多事情。

“他们能把那么大的船开到哪去？不是有国际海洋局侦察队吗？”黄炳坤好奇地问。

“天晓得！直到我们出海的时候止，还没有听到那条船的下落。恐怕，这群海盗总能找到个销赃的地方吧！”黄原亮回答。

淡青色的夜雾正笼罩着大海，显得神秘莫测，好像那片弥漫的苍茫里藏着许多死船的磷火和魔鬼的眼睛。谢新伟把眼睛紧紧地闭上，随着船头在海浪上的颠簸他又回到了家乡，走上了那座同样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峨嵋石山，在林深草茂密封裹着的各个岩穴里，在拥有种种古老的传说里，好奇地寻找着，寻找着。

拂晓时分，他们又见到了一艘吨位很高的船，经过他们

身旁时，掀起的波浪撞得小艇没命地颠摇，他们又是大声地呼叫，举着破烂衣物拼命摇摆。可是结果依然如前，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后来他们曾多次遇到国际航线上的外国船只，每次都遭到同样冷遇。一次次像台风一样甚至比台风还要沉重的打击，把他们逼入完全绝望的深潭。

七

小艇自从离开大船之后，一直向西，有时也向西南方向漂流，因为这时的贸易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一天傍晚，正当半轮鲜红的太阳颤抖不安地向海底沉落，西边漂浮着桔黄色亮光的的地平线上，忽然显露出一座浅蓝色的山形，影影绰绰地浮动于一堵云团之上。第一个发现的是黄炳坤。其实，也有一些人看见了，只是他们被幻觉捉弄怕了，不敢一下子断定那就是山。在过去的几天里，许多海市蜃楼的景象把他们弄糊涂了，把山看成云、把云看成山更是常有的事。现在经黄炳坤的提醒，大家又都重新抬起头仔细认真地辨认。遗憾的是，太阳完全沉没了，海面上升起灰白色的薄雾，那座浮在云堆中的山又消失在云雾之中，就像南太平洋中忽地沉没了的岛屿一样。

人们将信将疑地等着，一直过了后半夜，当一弯残月从云隙中吐露出来时，海面上像刚刚洗涤过了似的净明透亮，人们原先看到的那座山形才又显现出来，而且愈加清晰明确，在那山峰的左右还绵延起伏着一些低矮的小山峰，连缀成一条长长的宝蓝色彩带。很明显，那是一片坚实的陆地。“啊，我们回到大陆了！”黄炳坤、陈平省等几个年轻人欢呼雀跃

起来。

“照我们十几天来漂流的方向看，那恐怕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船主黄原亮凭着多年的海上经验，十分准确地判断。

“不管是哪里，只要是陆地，我们就得救了！”陈平省的话语充满信心，人们纷纷表示赞同。

一般人无法想象，在海上长久漂流的人，内心是多么向往陆地、向往泥土，向往能够坚实地将他们支撑起来的大地呀！人的鼻子天生就嗅惯了泥土的芬芳，长期嗅不到这种气味的人，据说会得夜盲症和败血症。人，是大地的孩子呀！

可是，正当人们沉醉在对土地的依恋时，一直把他们推向苦难深渊的天公好像早已打定主意，决心与他们为仇作对到底，完全不顾小艇带着满船希望一步步向陆地漂过去的事实，突然将海上贸易风掉换了方向，变成由西向东了！小艇无奈地将脊背对着那逶迤绵延的宝蓝色群山一点点远去。命运又将他们重新投入苦海的深处，再次经历一番海上炼狱的折磨。

我已经没有适当的言词来描述他们当时的绝望心情了。他们的心和脑子好像都被揪扯粉碎，剩下的只是一团混乱如麻、扭搓变形的思维神经。他们什么也不再说了，什么也不再想了，一切的一切都是空虚的，无望的，上天好像早已安排定了，让一切希望都对他们无缘，让一切土地都与他们隔绝，让他们永生永世漂流在这无边无际的苦海里。

随着神经的麻木，人们早已失去了饥饿感。虽然他们知道，完全不吃不喝生命就要终结，可依然只是一个挨一个地昏昏沉沉地躺着。死，并没有什么痛苦，只有活着才感觉痛

苦，死很容易，活着却很难。死就等于睡觉，等于休息，等于永远地结束，而活着却是无法摆脱的累赘。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到底还是不想死，对死者还是感到悲痛。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要活着，专拣艰难痛苦的事去做；况且，就这样在浪涛里结束也太不甘心。

午夜，天和海都混在一种深邃的漆黑里，没有星星，没有月亮，黑暗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监狱，把一切的一切（包括物质的和灵魂的）都禁锢在里面了。在这一切生灵都感到沉重压迫、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时，躺在小艇前部的黄家一对兄弟正在悄悄地死去。哥哥黄国大三十七岁，弟弟黄国家只有二十三岁。哥哥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弟弟还没有结婚。几天前，他们就昏迷在舱底，半天半天地说着胡话。一会儿呻吟着要水喝，要东西吃，一会儿呼喊着家人的名字。喊得最多的，是黄国大最小一个孩子的名字——丽平。可是，人们能够送到他们嘴边的食物实在是太可怜了——纸盒箱子他们已经不能吃了，海上漂浮的马尾藻他们也嚼不动了。最好的运气是，有时能够碰巧捉到一条蹦到船上的飞鱼。某些地方飞鱼成群结伙地围着小艇乱蹦乱跳，有的一蹦就是一丈高。最有意思的是单个游动的大飞鱼，它们总是等到船头快要压到它们身上时才窜出来，用力地把尾巴一甩，飞到半空做出各种优美动人的姿势，落下来时翅膀发出丝丝的响声。可惜，直到他们快咽气时，竟没有一条飞鱼落到船上。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着痛楚的表情死去。

深沉的夜色阒然无声，只有冰凉的露珠从黑暗的夜空中滴落下来，好像人们心头偷偷流淌的泪水。人们的哀伤就像深沉的夜色，无比浓重。因为，相同的命运正逼迫着每一个

人。

果然不久，拂晓后从东边透过来的亮光和西边残留着的黑暗还没有交割清楚的时候，死神便飞落到川东管区另一对黄家兄弟的头上。他们的年龄同前一对兄弟几乎是相似的：哥哥黄国庭三十七岁，弟弟黄志良二十四岁，哥哥已婚，有一子一女，弟弟还未结婚，原本准备年底办婚事。前一对黄家弟兄死去不久，他们便感到了生命的衰竭，一股阴冷的气团堵住心口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心理上还额外承受着一个更沉重的压迫——这次购买“台山62143”号渔船时，除了船主黄原亮之外，他们哥俩是投资最多的一家了。十几万元的贷款都压在他们头上。就是有幸生还，又拿什么去归还那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呢？

他们陷在双重的绝望里，双重的困压中，于是他们暗中商定，要彻底摆脱出来。当听到黄国大弟兄死去的消息后，昏迷了的哥哥便抱住了昏迷的弟弟，两个人清醒后什么话也没说，相对望了一眼，便双双翻身滚落到大海中去。

难道事情真的就像《圣经》里所讲的，上帝炽烈的手指已经按到船头，船上的人全都“劫数已到，应该完蛋吗？”

不幸得很，恐惧的疑惑正在不断转化为恐惧的现实。不久，川东的谢家兄弟也落入那劫数已定的网中。海上的一天又将过去了，一直是苍白无力的太阳在浓重的云霭后边缓缓地下坠，最后终于悄然无声地沉到海水里边，一抹残照的余晖浮在海面像是逐渐发暗的血水，滔滔的波浪象是有意掩盖大自然的伤痕，飞溅起一团白茫茫的水沫，尽力向漂着血水的地方泼洒涂抹。恰巧一条飞鱼蹦到了船上，海上经验丰富的谢洪心赶忙将它捕住，然后送到奄奄一息的谢洪运面前：

“你就把它吃下去吧！吃了，你就有力气回家了，就能见到爹妈见到你刚结婚的妻子——陈认虾妹妹了。”

洪运紧闭的眼睛又睁开了，无力地摇摇头。现在什么美食他都咽不下去了。自从清晨他的邻居两对黄家弟兄双双死去，他便意识到那个命定的时刻很快就会向他走来。今天的太阳那样苍白惨淡，就已向他预告了一切。他感到全身结构都已松散，每个关节都不再相联，嗓子眼里那一口气就像游丝一般轻微细弱。“洪心大哥，我是不行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这条鱼你就留着自己吃吧，你一定能够回家，你身体强壮，体质好，回去告诉爹妈，告诉认虾，那个刚出生没起名的孩子，就叫他——”话没说完，他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后来，川东的陈超合、竹湾的陈平准、芙蓉湾的周日洪、茅湾的谢新伟又相继死去。最令人痛心的是黄炳坤，才刚刚十八岁。他死得非常安静，只是用聪明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人，含着不舍的眷恋和依依惜别之情，他那原本白皙俊秀的面庞经过半个多月的风雨摧残，已经变得焦黑枯瘦，眼窝塌陷，可最后他还是尽力用一个微笑告别人世。人们俯下身去，在他眼角下面看到了两颗很大很大的泪珠。

无怨无诉的悲哀，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现在小艇里剩下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连串死亡的降临，便都陷到这种无怨无诉的惨痛悲哀之中。

又过了七天，奇怪的是船上竟没有再死人，虽然他们终日昼夜在饥饿、干渴和大自然的严酷煎熬下，极度地虚弱衰竭，但总算坚持着活下来了。在最后这个星期里，他们都神志混乱模糊，只隐隐约约地记得又下过一阵暴雨，刮过一次不算小的强风，还碰到过一两艘过路的轮船，至于在这长天

阔海之中他们又漂流了多久，是两天还是两个星期，就都记不太清楚了。

下暴雨的时候，他们又贮存了一些淡水，把能装的器皿都盛满了，可是最缺的还是食物。纸箱子已经吃光了，只能靠天所赐，从海里能捞到什么就吃什么，除了漂浮的藻类之外，还有海上垃圾——水草、椰子壳、碎木板等，在那些物体上常常附着一些海螺、牡蛎、贻贝等小生物。有时，从捞到的一大把水草里还能找到一些乱蹦乱跳的小虾。他们舍不得一口吞下，总是放到嘴里慢慢地吮吸，直等把水分全部吸干再连皮带肉细细地嚼碎咽下。

偶尔，也有飞鸟落到船上，跟随小艇飞过好一段路程，然后悄悄地飞落下来。谢洪心捕捉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时的飞鸟比虚弱不堪的人要灵活得多。船上十一个人就是靠着一点点漂来之食，苟延残喘地维持着性命。

现在，当海难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应当把透视的焦点直接转到他——从前是“台山62143号”渔船现在是两只玻璃钢小艇的船主黄原亮身上。他，三十四、五岁，正是肌肉结实浑身有力的年龄，虽然从外形上看，他生得又瘦又小，典型的广东人，但只要一脱下上衣，你就会看到他肩上、手臂上、胸脯上一块块凸出来的肌肉。两手粗糙僵直，手掌和指头布满了老茧和渔绳勒破的道道斑痕。干起活来他那笨拙的手又灵巧得足以绣花。他在劳作中磨砺出顽强的韧性、耐力和抵抗力都是惊人的，那性格令人联想到翻耕泥田的水牯和沙漠里枯瘦的梭梭草。

他在比黄炳坤还小的年龄，就到国外当了打工仔。挂着各种国旗的轮船他都呆过，渔船上各种各样的活儿他都干过，船长和老板的各种气也都受过，从而也就养成了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遭的性格。五年前父母催他回来结婚，他才返回家乡下川。

他称不上英雄，也决不是个草包。在海上漂流的二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一直起着个主心骨和定盘星的作用。他掌着舵（只要他不休息的时候），辨别着方向，保持着船体和人心的平衡（当时只要稍有一点躁动、偏颇和倾斜，小艇就会立即倾覆），靠着那两只蜗牛壳似的小艇闯过了两次强热带风暴，他能将两只小艇和艇上的二十四个人平安地从十二级的台风眼里漏下来，毫不夸张地说创造了人间一大奇迹，在世界航海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何况他们是在没吃没喝、艇上没有能源动力、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二十多天来，人们能够在那地动山摇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没有发疯，没有神经崩溃，没有骚动躁乱，在完全没有生的希望中仍能鼓起信心去追求生的希望，就是因为艇上有他这个主心骨。

他精明干练，也有粗心大意之处；他熟谙航海捕捞的各种技术，也有掌握得不够熟练的地方，特别是管理方面（渔船“台山62143号”失事的深刻教训，首先就是值班制度不落实，他一人兼着三个人的职务——大副、轮机长和水手长，以至机舱失火没能及时发现和消除故障；其次，没有对职工进行安全作业教育，失火之后人们行动大乱，有消防器材却不会使用）；他经多见广，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但也有识不准看不透的地方（这次出航他一味贪图续航能力，违章在

甲板上堆放几十桶易燃易爆材料，以至大火一起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闯过风浪有一定的应变的能力，但也有紧急慌乱中调停失当的地方（从渔船下来时，竟没有叫人带走任何必需的逃生物品，以至造成二十多天来忍饥挨饿顺水漂流的被动局面）。总之，他是个很能干的船工，但却不是一个很能干的船长；是个让人称羨的浪里白条，却不是个料事周详的船伙统领。

在海上漂流的二十几天里，他总是找重活干，除了掌舵之外，淘水、调理风帆、捞取海上漂流垃圾、照看病号等等，他都默默无言地尽力去做，总想让其他人多休息一会儿，少消耗一些体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体力消耗的多，谁便容易早些结束生命。他从海上捞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尽量让给别人，他自己吃得最少，可是，他却偏偏地挺过来了，其他的船工却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是叫他最伤心的事，他心灵上所受的折磨和煎熬比他在肉体上所受的折磨和煎熬更无法忍受。每见到一个乡亲死去，他的心就像被捅了一刀似的，特别是黄炳坤的死更是叫他痛心疾首。他觉得，这么些好乡邻的死都是与他的失职有关系，是他给他们及其家属带来了这份惨重的灾难。他感到愧对下川的父老乡亲。

小艇上没有罗盘和六分仪，凭着多年的海上经验，他感到现在逐渐又漂回他们开始漂流的地方去了，小艇正向大陆方向漂去。这时，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海面一直很平静，他便不再操纵舵柄，把它一古脑地交给了谢洪心、谭积林等几个老练船工。他的面孔变得古怪而又朦胧，显现出各种复杂神情：痛苦、欣慰、悲伤、冷漠、沉重、释然、愧疚、坦荡、绝望、期待、激动、安详、怅惘、依恋。很难看到一个

活着的人脸上同时会有这样许多复杂的、互相对立的神情，他好像成了从另外一个陌生世界里走出来的人。

他从早到晚，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船尾一个角落里，有时闭目沉思，有时捧起那个猪血色的塑料盆低着头用水果刀在上面刻划着什么。开始人们没太注意，以为他这些天来实在是太累了，现在海上风浪平静是该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会了，可是后来越看越不对劲了，他的举动，他的神色乖张离奇，诡秘难测，他的内心一定发生了大风暴。后来，有人悄悄地凑过去，才发现他正将这次遭遇海难的过程，以一种《纪事本末》体例详细地刻写在塑料盆上。最后刻上了他们二十四个人的名字和家乡住处。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他要向波涛里投下一片不易传递的信息，以期在渺渺茫茫的大海中间留下一块冲刷不掉的记忆，就像两个世纪前遭遇海难的人，常要投下一个装有书信和字条的玻璃瓶子一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海变得那么温柔，平静得像面镜子，宝蓝色海面如同高远的青天。小艇在这样的海面上漂得悠闲自在，靠船帮上的人对大海甚至产生了儿子对于母亲的依恋。一时间忘记了光滑平洁的海水下面，还隐藏着虎狼般凶残的狂涛恶浪，忘记了它是一个最狡猾的怪物，善于用欺骗的面孔隐藏住它所犯下的一切罪恶。

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船主恰恰就是这个时候迷失了本性。他面向金色的太阳霍地站立起来，脱下身上的救生衣，对大家心平气和地说：“乡亲们，我该走了！本来我是早就应该走的，当大船沉下去的时候，我就应当像一个堂堂正正的船长那样，跟他所管理的船只一起沉没，为着一个船长的荣誉和责任，视死如归地去殉职！”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自从

遇难以来人们很少见到他有心情有力气说这许多的话。现在，他像燃尽前的红蜡烛，突然变得欢跃起来，人们都像傻了似的，直愣愣地呆望着他。

“我没有当即去死，因为我知道马上就要有台风刮过来，靠着这两只小艇在台风眼里平安地渡过去是很不容易的，比我们常说的上刀山下火海还要难。为此，我决心留下来与大家一起经受这番磨难。也许，这样会多少减轻一些我的罪过。当时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使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台风，但我相信我的技术、我的经验，多少会对你们有些帮助。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竟然超过最初的预想：我们两次从台风眼里漏下来。台风虽然躲过去了，潮流却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来马上就可以靠岸了，却又突然转变了风向，让我们大家又在海上漂流了这么多天。看到乡亲们一个个受尽折磨而死去，我心里真是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死去的人，对不起失去亲人的父老乡亲！我没有脸面回到下川，没有脸面见到那些叫人心碎的悲伤面孔。我想了好久，决定现在就履行我的职责，在这清净的大海里洗清我的名誉，洗清我的罪过，让永远压在我头顶上的波涛，来承担我对大家所负欠的罪过吧！”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几个人醒过来忙上前使劲扯住他的衣襟。

“不，你们不要留我！一个人的心已经死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我死了之后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你们应当活着回去，你们完全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你们已经战胜了那么大的两次台风，在海上漂流了这么久，希望是属于你们的，生命是属于你们的！我衷心地希望你们

坚强地活下去，特别是谢洪心和谭炽林几个有经验的人，要好好地把握住舵，照顾好大家，要想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把船平平安安地开回咱们的下川！”说着他挣脱掉人们的阻拦，纵身跳下海去。人们悲恸地垂下了头。这天是8月4日，是他们海上漂流的第二十天。

船上的人眼睁睁地看到，他在水里还随波逐浪地跟着小艇，泅游了两个多小时后才沉没。人们由衷地遗憾，一个具有如此宁折不屈的坚强性格的人，为何不能坚持到底呢？他的故事是在沉船中发生的（而这次沉船又主要是由他的管理不善造成的），又是在沉船的地方结束的，他的壮烈，也就成了他命中注定的悲哀！

九

一个薄雾霭霭的清晨，厚厚的云层塞满东方的天陲，阴阴惨惨的。后来，几道明亮的光线穿过云层喷射出来，随之大自然开始孕育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长天阔海的无垠空间里营造出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不一会儿，尽东边的海水便喧嚣沸腾起来，在翻腾鼓荡的海水中间轰然一声震撼，拱出来半轮火红的、鲜艳欲滴的太阳。这时小艇的船头正好迎向太阳，迷蒙之中昏睡的人们顿时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慢慢地苏醒过来了。

不一会儿天已大亮，高升的太阳洒下耀眼的光芒，平滑的海面迸散出闪烁的金星。温柔亲切的环境唤起人们温柔亲切的感情，昏迷的、干枯的几近于僵死的意识开始清亮起来。人们好像产生了一种预感，一种得到拯救走向复活的预感。有人探出身子向舱外望望，只见海水的颜色和流动的态势都

与过去迥然不同。海面上的漂浮物越来越多：海藻、水草、碎木板，甚至还有塑料瓶子。有人顺手捞起一个椰子壳，颜色浅黄，里外都是新鲜的，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一个让人心跳的事实——离坚实的陆地已经很近了？

蒙难的阴霾好像就要划破，命运即将启开一扇希望之门。果然在9点多钟的时候，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出现一艘很大的轮船，轮船的周围还有几只捕鱼的小艇。这天是8月7日，是他们海上漂流的第二十四天，离船主黄原亮投海自尽只相距三天。

“是艘渔轮，还有打鱼的小艇！”还是眼睛最尖的陈丙烽首先发现。

“为了扩大我们的目标，让他们更容易发现我们，快把两个小艇分开！”经验丰富的谭炽林出了个主意。于是，谢洪心、陈丙烽等几个比较有力气的人动手解开了缆绳，两只小艇很快分了家，像一对鸳鸯似的一前一后在水面上漂流。

海面的澄清是多日来很少见到的，空气干净得一尘不染。对面大船上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两只小艇。船主黄国亨感到有些蹊跷，便命两只摩托艇前去探查。摩托艇围着它们转了几个大圈，只见船里都是些形销骨立差不多瘦成人干似的人，有的趴在船帮上向他们伸手招唤，有的躺在舱底不能动弹。

摩托艇逐渐缩小圈子，慢慢向他们靠近，于是船上人的面孔越辨越真，最后他们几乎惊呆了，那不都是本岛本村的人吗？！

原来这艘渔轮也是下川岛的，属川东管区，注册的牌号是“台山621168号”，他们是三天前来到这东沙群岛附近海

面捕捞的。他们竟能在此时此地相遇，真是大难不死，必有神助！摩托艇赶紧奔驰过来，将受难的乡亲送上了“台山62168号”大船。

船主黄国亨看他们奄奄一息有气无力的样子，在这危急万分的关头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赶忙派出摩托艇将遇难的人送到有国民党军队驻守的东沙群岛的一个小岛上。

很快，海岛的蓝色轮廓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海岛中央有一座很高的山，周围都是巉岩嶙峋的礁石。摩托艇开进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停靠到一个码头的跟前，他们向岛上摇晃着白毛巾要求登陆。孱弱不堪的人们眼前再次出现了奇迹，在梦幻中，他们感到对面正有十几个戴着大沿帽的国民党士兵朝他们走来。他们狠劲地睁大眼睛朝天上看看，天空晴朗，太阳当空，还有一只苍鹰不停地盘旋。这不是幻觉，果然，那领头的态度和气，普通话说得很好，详细地向他们问明了来意。“台山62168号”船上的人代他们一一做了回答，并向对方提出了请求，希望能够尽快给予医疗援助。

国民党士兵走下了摩托艇，认真地查看了十个在海上遇难的人。情况是明摆着的，十个只剩一张黑皮紧紧裹住骨头架子的人，满身疮疥和溃烂的褥疮。还要再问什么呢？共同的语言和肤色引起了他们更多的怜悯和同情。士兵马上用步话机向驻岛上级请示，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病情严重危急，岛上又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他们不能在这里久留，时间耽搁越长越不好治。希望他们赶紧返回大陆找就近的医院治疗。话说得通情达理。

“看看，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将尽量设法帮助解决。”对方又主动地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亟待支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时间又说不出。几位国民党士兵看他们焦急发窘的样子便没再追问，开着吉普车走了。不大一会儿，运来了两箱葡萄糖水和一箱军用压缩饼干，还有一盆大米稀粥。“台山62168号”船上的乡亲帮厨盛了些米汤，端送给十个难友。滋润的暖流穿过肠胃迅速进入全身，他们贪婪地呼吸着从陆地上吹过来的风，山亲，水亲，乡亲，土亲！最重要的是，胸膛里都跳动着一颗中国心！十几个国民党士兵站在海滩上，关切地望着那艘向来路开去的摩托艇。

“台山62168号”渔船船长黄国亨当下做出决定：立即停止一切海上作业，迅速返归大陆，找就近的医院——珠海香洲人民医院就医，争抢时间，抢救十个海上遇难兄弟。他们全速前进，在海上航行了两个昼夜，于8月9日晚上9点多钟到达珠海。

人民医院接到抢救电话，马上将救护车开到码头，将难友送进医院。专家、教授和有经验的医生，全力以赴进行抢救，使用了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医疗设施。开始病人吃了东西就吐，一些人不能说话，看不清东西。三天后，他们全部脱离危险。

住院期间，珠海市委副书记雷于葵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慰问，并代表市政府赠送每人一套生活日用品。中共台山县委常委伍启明率领县委办公室和县府办公室一些同志赶了几百里路，专程到医院看望十位遇难弟兄。

下川岛镇党委和政府一方面组织人力去安抚遭遇海难的人的亲属，一方面由党委副书记罗改法带队，当天就赶到珠海医院去看望，并留下一些人照料遇难者的病中生活。

在一片亲切关怀和照顾下，在祖国广袤坚实的土地上，他们经过十几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一个个都先后恢复了健康。他们的名字是川东的谢洪心、谭炽林、戚水松、陈丙烽、黄日安、赵国整；竹湾的陈平省、方家晓和茅湾的方东平、伍新立。

十个人唱出了一首礼赞生命的豪气歌。

他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用自己顽强的求生毅力，克服了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摧残折磨，战胜了几乎是无法逃避的死亡威胁。他们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二十四天，往返将近千里，在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药物储备、御寒御晒设备，没有海上航行所必需的动力和通讯联络设备的情况下，度过了两次强台风的直接袭击，写下了航海史上不可多见的一页。

生命是可爱的，顽强的生命之歌尤为可爱。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就是生命。”“在人觉得可爱的一切东西中最有一般性的，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命。”这十个人，当然也包括与他们一起拼死搏斗而在中途倒下去的十四个人，都以惊世骇俗的超凡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求生毅力，撰写出一首美好的生命之歌。

他们是真正的强者。因为他们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战胜了死亡，将死亡消灭于凯旋之中。

当死神无可奈何降临的时候

在人间，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自成一个体系；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过是那广袤无垠的大陆的一部分。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你别去
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它将为你、为我、为他而敲响……

——约翰·唐恩

1月14日中午12点40分，在中日友好医院工地的南大门，有一辆十轮大卡车停在那里，是东城区运输公司七厂的，司机有事离开，车门没锁。这时，北京市一建四工区三队的材料工刘志强从车边经过，一时兴起，感情冲动，便打开车门跳进驾驶室里，因对汽车各个部件都感到稀奇好玩，就踩了油门推上离合器，那汽车就像受了惊的野马蹭的一声窜出去。对面马路上，高玉山骑自行车驮着孩子正经过这里，丧失理

性的汽车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孩子被弹出几十米外，高玉山和他的自行车就被无情地碾压在汽车底下，当场毙命。

2月26日上午10点50分，在大观园西侧滨河路畔的351路汽车总站里，2230号汽车停着待发，离开车还有三分钟。司机去上厕所，一向乘此路汽车上下班的经济日报印刷厂工人刘银龙与司机打了一声招呼，就跳进驾驶室里，那爬行的铁甲虫对他产生不可抗拒的黑色诱惑，于是便无知地拨弄着汽车的各个启动部件，结果可想而知，汽车腾地一下奔出30多米，窜上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一对款款而行的初恋情侣，连他们在生活中难得寻觅到的爱情一起，嗡的一下子给击得粉碎，女孩子名叫鲜红雨，当场惨死在车轮下。

3月22日下午5点15分，在白石桥首都体育馆对面的电车总站里，一辆105路电车停在那里待发。车门已经打开，早到的乘客已把座位全都占满，把着扶手站着的也有一二十人。司机和售票员都迟迟没露面。这时，喝得醉醺醺的北京运输公司七厂修理工李桂生走上来，乘着酒兴坐到驾驶员位置上，一拉闸门就把车子开出去。他像暴君似的操纵着车上几十个乘客的生命，轻蔑地看着喧嚣的世界和路上的行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向着命运之神撞去，结果，马路上边的水泥电线柱子被撞倒，残立的桩子整个楔进电车的头部，造成八人受重伤，有一人舌头咬断半截。……

混乱的街头呀，人们好像已被一种晦涩朦胧的天命给笼罩住了。不管他们勇敢还是怯懦，得意还是失意，困惑还是明朗地走出家门，说不定从哪个方向就会突然飞出一辆谁都可以拨弄的灾祸之车，让人觉得失去了安全感。真是太可怕了！

一柄用头发丝系着的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半空中，不知在哪一天里，不知在哪一个时辰，便会掉在自己的头上。这正像《圣经》上说的：“所以你们要警惕，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啊，真是太可怕了！

本来，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带来方便和幸福，给社会带来进步和繁荣，仅仅一百来年的时间它便征服了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商品。可是，连它的发明者卡尔·本茨先生本人也未曾预料到，它又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灾祸。从1885年第一辆汽车诞生到1985年这一百年内，它使世界上三千二百多万人丧命于车轮之下，要比这段期间内死于战场上的人还要多，甚至，连鏖战北非的巴登将军也没躲过车轮的迫害。无怪乎人们惊呼：“汽车与人正在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联邦德国统计局的调查材料说，1987年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四十万，平均每天有一千一百人。

美国《纽约时报》打出通栏的醒目标题：“车祸是最大的谋杀！”

而法制不健全和现代文化生活层次较低的我国，车祸死亡人数就远远大于世界平均数。在美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平均每万台汽车死亡人数不超过一位数，而我国一直是两位数。美国每万台汽车死亡人数为二点八人，我国则为八十八人，比美国高出三十一倍。

以世界各国首都的车祸状况来说，北京只有机动车三十多万辆，而巴黎有三百万辆，东京有五百万辆，北京的车辆只及人家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而北京车祸死亡人数却居各大国首都的首位，甚至高于第三世界。

这就难怪有多少个鲜红雨无辜地倒在血泊中。

多少冤死的魂灵，在马路的上空凄凄惨惨、寻寻觅觅地飘零着。

一、死亡之路

她，一步步地向着大观园方向走去，心里边充满着欢乐、甜蜜和美妙的幻想。一阵阵的羞涩和一阵阵勇气，使她走上了这条寻爱之路。她望着被犹寒乍暖的东风吹得发青的柳条和柳条摇曳中划出的弯曲柔和的弧线，自以为是一步步走向幸福，走向柔情蜜意的爱河，可是她不知道，生命的桅杆已被倒悬，爱情之路早已变成死亡之路。前边等候着她的不是爱神弗洛斯特得，而是死神漆黑的翅膀，是冰冷的坟墓。

她，一个完善的女性，生得纤巧，恬静，一头光洁柔软的秀发围着白皙细嫩的颈子和圆圆的脸庞，嘴角和鼻翼的线条都是那么柔和细腻，下颌上有一颗《望乡》中阿七说的让世上一切女人和男人都羡慕的美人痣。丰满的胸脯和肩部，都呈现出女性温柔多情的线条，就像从古希腊断臂女神的雕像上拓下来似的。特别是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老是充满着笑的涟漪，人们只要遇到那充满灵秀的目光，心头多少烦恼和忧郁都会消散。总之一句话，是一个精巧的胚子，是上帝在他心情最好时塑造出来的。而且，天生又给她一个最好的姓氏，父亲姓“鲜”，作过卫生部办公厅主任的爸爸和身为著名医院里著名大夫的妈妈为她起了个鲜花般的名字——鲜红雨。

她，真的就像一朵鲜花一般，生活在人寰里，生活在父母的慈爱里，生活在年轻的伙伴中。

灾祸累累的龙年终于就要过去了，那些让人烦恼的各种怪圈和死结（无论是国事、家事还是个人的私事），都憋得人们心头堵堵的。多亏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能够承受和消弭，能够运用趣味的思维来解析自己不顺的环境，能够从烦闷枯索的生活中挖掘出幽默的资源，并使之转化成活跃生活的力量。她常用微笑来陪伴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同志，因之才让她比较轻松地送走这个倒霉的龙年。

除夕之夜终于到来了，不痛快的一年就要用痛快的笑声送走了。傍晚，街头上的节日气氛浓烈，人群熙熙攘攘、愉快的笑声、说话声和吆喝声不时地从欢腾的人流里传出来。商店的门口挂着红布横幅，吊着大红纱灯，橱窗里布置得五光十色，光华耀眼，每件商品都充满着喜气洋洋的味道。小孩子们更是开心，撒欢似的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他们鲜艳的衣服和红扑扑的笑脸，像绽开的一朵茶花。爆竹声响得越来越浓，凛冽的寒气和呼啸的北风，丝毫没有把这种显示人间欢腾喜庆的响声冲淡。

餐桌上，摆满了她亲手做的几道菜：叉烧肉、红烧鱼、香菇鸡块……给人印象最美好的是那盆枣饭。雪白油润的糯米饭里嵌着一颗颗红宝石似的小枣，像五月樱桃盛在白玉盘里。

这是性的诱惑，女孩子们天生都喜欢鲜红的颜色！

“鲜儿！”在工作单位里，人们都喜欢亲昵地唤她这个娇嫩嫩、水灵灵的名字，“鲜儿，别在厨房里忙活了，席上的菜已经够丰盛的了！快来吧，让我们一起举杯，切莫错过良宵！”几个被她邀来的女友在屋里一叠声地呼唤她。

鲜红雨系着一条扇面形的桃花小围裙，鼻子尖上聚着晶

莹的细汗珠，又端着一盘菜肴走出来。

“别急，姑娘们！这最后的晚餐总得丰满一些！”她笑盈盈地扮了一个鬼脸，逗着伙伴们说。

“瞧你，鲜儿！大过年的，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女友小贾皱着眉头嗔怪她说。

“送别龙年，这是最后的一顿晚餐。不是最后的晚餐吗？”她仍是笑盈盈地解释说。

“这么说，还有一句吉祥话了！”女友小巫说。

“当然，鲜儿的话总该是吉祥的，因为上帝给她更多的偏爱！”另一个女友小宋说，“我记得我在哪里看过一首诗，说：‘我曾仔细地观察过一片嫩叶，详问生命的奥秘所在和自然的向背冷暖，那片嫩叶的每条叶脉和纤纹，好像都在悄声地告诉我说：我会比别人吸进更多的温暖，更多的阳光！’我说鲜儿就是上帝的宠儿，她会比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温暖和阳光的！”

“对，对，小宋说得好！我们为更多的温暖干杯！”小巫几乎跳起来说。

席上充满了青春的光华，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充满了欢乐的渴望。

这多亏在节前她就同父亲说好，要把单位里的几个姑娘邀到家里过年，看看今晚这样欢乐的场面，用多少金钱能够买得到呢？现在，不正是所谓“良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刻吗？

琥珀色的酒杯都高高地举起来了，杯子里面映着她们一张张兴奋的笑脸，让人陶醉的奇妙小精灵就藏在酒花的窝窝里对她们哧哧地笑着呢。

“该有段祝酒辞！谁来说？”小贾问。

“鲜儿！鲜儿！”两个女友同声地喊。

擎着酒杯的手颤抖了。短暂的沉默，祝酒辞哽在喉咙里。

想起让人沮丧的龙年，内心里便是一片萧瑟。几次感情上的邂逅都不顺利。有一次她曾自嘲地对身边同志说：“西方有艾滋病，我得了‘爱不起来病’了！”同志们一片笑声，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其中苦涩的滋味！社会上也有不公平，民政部公开招聘管理干部时她去应试，各科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口试也顺利通过了，但最后下来的通知却是否定的，理由不好公开言明：“女人，一个未婚的女人。”

默默地等待，又默默地寻索，她曾祈祷过生命的守护神，希望能够让她从迷茫的雾里走出来，能够从晦涩的烦困里走出来。不久前她给友人的信中还情不自禁地暴露自己内心的感伤，说：“我心情坏极了，几个月内大概都好不起来了。龙年给我带来的尽是不愉快，但愿蛇年上帝能够对我宽容一些！”

上帝一定会给她更多的宽容，因为她通体善良，通体温顺，通体是美的和谐。

“为我们在新的—年里，在我们的生命守护神、89年的吉祥物——蛇神的光圈宠护下，我们都能获得幸福而干杯！”她终于说出了祝酒词。

几支琥珀色的杯子清脆地碰到一起。

“为蛇年干杯！为吉祥的蛇神干杯！为我们的幸福干杯！”大家同声说。

“为祝贺你即将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日而干杯！”鲜儿

向着小宋说。

“也为鲜儿能治好‘爱不起来’病而干杯！”小巫、小贾接着说。

姑娘们都欢乐地笑起来。老父亲慈祥的眼里也充满着笑意，姑娘们的笑给他快乐，女儿的笑给他快乐。他的心里，比谁都更渴望她心爱的小女儿能够得到本该属于她的那一份幸福。

电视机里，传出来迎接新岁的钟声。七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姑娘们同站在一个门坎上，守候着这个跨越的时刻。窗外，短暂的寂静，寂静中潜藏着巨大的爆发。果然，钟声刚刚止息，狂飙巨雷般的爆竹声便轰响在天地之间。人们尽情地渲泄着，渲泄他们对过去一年的烦恼的冲破和对新的一年吉顺的渴望心情。

“我们到外面走走去！”鲜儿热情奔放，拉起女友们的手，兴致勃勃地跑到大街上，踏着满地的爆竹纸屑和残骸，嘻嘻笑笑地向前走去，像踏着她们的童年时光。

路灯明亮，像神殿里的明烛在吐着耀眼的光华，照得远近一片通明，宇宙显得格外的生动，神采飞扬。几个姑娘手舞足蹈起来，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最后，竟然高声地喊起来，唱过《跟着感觉走》，又唱《婚礼进行曲》，随着欢乐的歌声又蹦蹦跳跳地跳起圆舞曲来。

路过的行人都停下脚步，被这几个欢乐的生命所感染，含笑地望着她们。她们有理由疯狂，青春给了她们这种合法的权利。

旧的一年终于踏过去了，她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里程。她怀着希望，怀着激情，一步步地向着大观园的路上走去。在

大观园的西角门外竖有一个大木牌子，上边画着一条蜿蜒腾起的蛇，那是己巳年的图腾，蛇年的界牌，她被时起时伏的感情浪潮推动着向那蛇年的界牌走过去，向着那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生活起点走过去。

在越过蛇年界牌的时候，他握住了她的手，也勾住了她的心。她自以为由此而得到爱情的升华，而万万没有想到，由此而走向生命的沉没。

造物主的摆布，真是太叫人毛骨悚然了！颠倒了的命运时差，真是叫人不可思议！

原来，在除夕那个欢乐的夜晚，女友们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像鲜红雨这样的欢乐的女儿、多情的姑娘，不该没有爱情，不该让这样一朵光彩夺目的鲜花自行枯萎。于是，她们就在暗中都留了心，一定要为她找到一个称心的、让她爱得起来的生活伴侣。

也是命运之神有意这样安排的，一个称心如意的爱人过去多年一直阴错阳差没有找到，这次，她凭着直感很快地就爱上了他；同样，他也凭着直感很快地爱上了她。事情就像古代戏曲和才子佳人小说里讲的：是前世安排定的，是月下老人用红头绳系着的姻缘。因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便已约会了两次，2月26日，这已是第三次了。对于这次约会，由于种种原因她不能不看作是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

2月24日，星期五下午3点30分，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她一听到铃声，便止不住怦怦地心跳起来。本来星期四是他的厂休日，按理星期三他就应打电话约会她。可是他没打来。整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她都心情沮丧，罩在一层灰暗的雾里。

幽闭太久的爱情之火被点燃了，爆发出最强烈的光和热；渴望把握的一种心理是难以抑制的；也是人们无法理解的。那骤明的爱火既温暖着她的心，也炙灼着她的心。失落得太多了，让她不敢相信眼前突然闪亮的星光。那是专属于她的命运星辰吗？它会命中注定地坠落到自己的爱河的波心里吗？

猝然而至的幸福，既使她感到甜得噁人，又使她目眩心颤，感到吃惊害怕。不会又是一场梦幻，一团错觉，一番空欢喜吧？他的热情，也许只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一种对大龄女子的安慰？也许这短暂的热情后面，就是降温，就是低潮，就是急流勇退。虽然凭着直感她看清那是一个秉赋优秀的男子，是懂得感情而又不捉弄感情的人；可是，她还是被莫名的烦恼、莫名的疑虑和忧伤紧紧地缠绕着，缠绕着她那颗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心，变得十分敏感的神经。

“和他见面之前，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是一个出国留学的硕士研究生呢？”在无可解脱的烦恼之余，她嗔怪地责备女友说。

“留学生又怎么了？留学生不也是个人嘛！人与人之间只要有感情就行了，其它的都是附加的条件。莫担忧，莫疑迟，我的鲜儿！”女友小巫安慰她说。

“要不要我再给你唱一遍《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女友小宋笑吟吟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她的眼睛又明朗地笑了。小宋送给她一盘苏芮的录音磁带《跟着感觉走》。

她几次走到电话机前，想拨起那个号码，告诉他一个女孩子的心。可是女性的羞涩，女孩子的自尊心，又阻止了她

这种过热的冲动。她欲行犹止，欲语犹休……

正当这个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盼望已久的喜鹊终于飞来了。果然是他的声音，竟像从丁香山谷里吹出来的风那样甜润。她的心扉一下子就全部打开了，能够容进扑过来的一切。

“是我！是我！”对方说，“上午就是我打来的电话，你不在。下个星期四厂休日我弄到两张音乐厅的票，是英国阿尔伯尼弦乐四重奏乐团的演出。怎么样？”他发出了邀请。

“很好！”鲜儿高兴地回答。

“可是——”他欲语犹止，在可是的后边拖了个长长的间歇。在演讲艺术中，最令人懊丧的词莫过于这个“可是”，谁知道他在“可是”后边的一转又转到哪里去了？她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

“可是——这还要等五六天我们才能见面！你不觉得时间太长了吗？”

她笑了：“是长了一点儿……”

他：“这样吧，咱们共同努力，想法子尽量缩短这个间隔！”

她：“怎么个缩短法？”

他：“星期天是你的休息日，星期天你就到我这里来吧！”

她娇嗔地说：“你欺负人！什么都是你安排好的，然后让我来接受！”

他疑惑地问：“那么，由你安排呢？”

她狡黠地笑着说：“由我安排，也是这样一个约定……”

两人都扑哧地笑起来。

几天来的烦恼和疑虑，一下子全都消散了，难以抑制的满足和欢乐使她激动、慌乱，幸福的霞光照得她面孔绯红，眼睛发亮；感情的激流从她禁锢的心房里掩不住地流淌出来。星期六下午，她洗过澡后精心地梳理着头发，并且浅浅地化了一点妆。一个俏丽的身影立刻容光焕发地闪现在人们的面前。同事们都用怜爱的眼光打量着她，欣赏着她。

“鲜儿，今天真美！真漂亮！”

“你们妒嫉我吗？”她狡黠地向同事们眨了眨眼睛，做了个好玩的怪相，“我要好好地打扮打扮，明天要去赴约会！”

2月26日清晨，她起床后略微收拾了一下，连早点也没吃，只给老父亲准备下中午用的饭菜，就奔赴那个期望已久、思之倾心的约会，朝着大观园方向去了。

她看到的是一片甜丝丝的初春的亮光，而不知道，亮光后面却是永恒的黑暗。她的前面，是大观园门前卧着的那对石狮子，而不知道，石狮子后面还有铁门槛外的一座无限凄凉的土馒头。

二、愚昧之子

2月26日早晨9点多钟他才醒过来，揉了揉眼睛，窗外是一片明丽的世界。

昨晚是前半夜的班，两点多钟下班后，回到宿舍里倒头便睡下了。轮转机的活儿，他刘银龙已经干过三年多了，轻车熟路，从从容容，用不着过多地劳神劳力，便能让它顺顺当当地转动，把报纸一张张地印出来。

早晨醒来后，空虚的头脑里钻进来的第一个意识，就是要找几张昨晚刚印出的《广播电视报》，因为昨天351路汽车司机已经向他打过招呼，要他带过几张报去。另外，回家后还要帮助同学刷牙，同学的哥哥下个星期结婚。

他已经二十四岁了，还没个女朋友，至今还是孤零零的一只燕子。当然，他也期盼，谁能不期盼呢？正当那个期盼的年龄嘛！他的生活可不像轮转机的运转那么顺畅。他记得什么书上说过：生活的道路并不平坦。他，就有过这种亲身体会。

去年春天，经人介绍他处了个女朋友，半年多的时间里感情一步步地趋向火热，趋向炽烈，她清楚地了解他的性情爱好、志向乐趣，就像他清楚地了解她一样。他们细言细语、有时也粗言粗语地交换着对人生的看法，怀着极大乐趣地尝试过爱情的甜蜜果子的滋味。本来一切都很顺当，马上就要顺理成章地迈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门坎儿。他已经刷了房子，购置了结婚的家具用品，可是谁知一转眼就碰到了西北风。女方先前有过一个相好的，出人意料地提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正像《汉乐府》的诗中说的：“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女方依然怀恋旧情，怀恋时间已逝而心头难逝的花间月下。于是，她就抛弃了他又回到旧情的怀抱里。新刷的房子和新添置的家具用品，只能留给他一个人用了。触景伤情，心里难免空落落、雾茫茫、酸溜溜的，但有什么法子呢，也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谁让自己的命运不济呢！今年一过年他便系上了一条红裤带，心想换换运气。除夕那天晚上他便对母亲说：

“妈，我同我们那几个哥儿们都系上红裤腰带了。今年

是我们的本命年，不图别的，但图个吉利，平平安安地过这个蛇年。”

他家住在丰台，父亲是丰台桥梁厂的老工人，还没到退休的年龄，他便顶替父亲接班当上了混凝土工人，每天抱着镇捣器过着不容仔细思考、不容低声说话的忽忽隆隆的生活。后来，他嫌这种忽忽隆隆的声音太震耳朵，去医院里检查，发现心脏有点小毛病，于是就托人把工作调到经济日报印刷厂来，干上了看报纸不花钱的轮转工。而且，还不只是自己看报不花钱，还可以带回去一些报纸用它去换得一点好处。

在今天，“以革命的名义”和“向毛主席保证”的誓言早已失灵了，支配着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商品关系，交换原则，是统帅一切的“关系学”。人们都在想尽办法或者有意侵占或者顺手牵羊地动用属于社会的财产，去交换和取得属于私人的关系，用自己能为别人提供的方便与好处来换取别人为自己提供的方便与好处。不过，交换的方法和档次却是千差万别的，产生的效益自然也就极为悬殊。有人能够提供大的方便与好处，有人只能提供一般的和很一般的。这正所谓“人分九级，物分九等”，说到刘银龙用不花钱的报纸去换点方便与好处，那已是等外之事了。别人有权、财、物去交换，他没有，那只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了。在印刷厂里工作，只能吃那几张虽不值钱、但却不用花钱的报纸。

他每天上下班乘车的路线是：坐351路到大观园，然后转乘59路到前门，再转2路到王府井。大观园西侧是个很大的汽车公司，有好几路车的终点站设在这里；因此，刘银龙也就很自然地把交换重点放在这里。经济日报印刷厂除了印它的自家报纸《经济日报》之外，还印其它几种报纸，其中，

可读性强的也很多。因此，他每天总要拿出几份各种报纸，白送给351路汽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们，时间长了，他使用不花钱的报纸换得了一种特权：可以优越于一般乘客在总站里边上车，稳稳当地闹一个座儿。

九点半钟，他匆忙地洗过脸，然后找到几份报纸就上了路。从繁华似锦的王府井大街穿出来，车还很顺，不一会儿就到了大观园。这时，一辆351路正待发，他本可以乘坐这辆车回去，车上的乘客不多，肯定能捞到一个座儿，况且，回去之后还有刷房子的活等他去干呢。如果他跨上车去，那场惨不忍睹的车祸也就不会发生了，热恋中的鲜红雨便真地会找到她的爱的归宿，他也不会被抛到社会的最底层——幽暗的铁窗里。可是，他没有上去，车开走了。

过了十分钟，又一辆351路开到站口准备发车，他仍然没有上去。他是命中注定要留下来充当杀手，充当凶神、充当摧毁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的罪人。他晃晃悠悠地从车门口溜过去，还向车里望了望，他向人打听2230号车，人们告诉他2230号再过十分钟就开。十分钟算个啥？他是从来不把时间当作赌注的，也没有用时间衡量过任何价值。于是，他便漫不经心地让那十分钟在身边走过，专心地等待2230。

果然，很快2230的司机潘三就来了。他们见面很亲热，两个年龄差不多、气质差不多的年轻人，互相之间自有迷恋式的好感。他们常为不甚可笑的事开怀大笑，为不成其理由的事发怒争吵，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地侃着大山，更何况，他们还有不花钱的报纸维系着呢。他们有称作哥儿们的一切条件，因此在上个星期天，刘银龙便把潘三请到家里，从上午十点一直喝到下午三点半，显而易见，他们都有互相逗笑取乐

大侃特侃的无穷精力。自此以后，交情也就更深了一步。汽车到桥梁厂那站刘银龙不下车，潘三还要给他往前送一程，在离他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给他踏一脚把车停住。而他就可在那么多乘客面前脸不红、心不跳，大摇大摆地从“一个人的汽车站”上走下去。

我们的规章制度全泡汤了！什么职业道德、岗位责任、社会良心，都已成为古老的传说，剩下的只有自我方便。只要我有这个条件，怎么便当就怎么做。因此四川人有句俏皮话挖苦这种现象说：“只要是亲朋好友，飞机上都敢给你踏一脚！”

十点四十七分，还有几分钟就该发车了。刘银龙和2230号的司售人员一同从值班室里走出来。司机要上厕所，怕他们在外面等着着急，便一边走一边回头说：“你们先上车吧！”

刘银龙走到2230号汽车跟前，一拉车门就跳到驾驶员的位置上。售票员站在前车门口，刘银龙是老乘客、司机的熟朋友，因之他知道开车门的钮键藏在哪个地方。他伸手到仪表盘下拉了一下，后车门呼地一声打开了。售票员不愿走那两步路，就在外边喊：“呔，是旁边那个钮！”刘银龙听到后又伸一下手，把前车门打开了，售票员走了上来，坐到驾驶员旁边的位子上。也是由于经常看不花钱报纸的关系，售票员没有让他从驾驶员的位子上离开，而是与他并坐在车头的另一个座位上，中间只隔着一个机器拱盖。

犯罪的契机就这样在不见端倪的缝隙中产生了。刘银龙在社会秩序的默认下，坐上了他本无权坐上的位置。这样一个极其细小的违例，便酿成了杀人流血的罪孽祸端。因为，

他那一双无知的眼睛，看不到这是在制造流血，制造毁灭，制造事后他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的惨祸。

他没有思虑，更没有存心去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的念头，只是出于混沌浑噩，出于无所事事，出于难以自恃的自我消磨力量，便伸出了犯罪的手，去扳动他一窍不通的汽车启动部件。先是用手扳了一下操纵杆，汽车只吭了一声，身子却像一条懒惰的老牛一动也没动。

“得踩油门，车子才动！”售票员坐在旁边不仅没有阻拦他的犯罪活动，反而向他提了醒，促进了罪犯的实施。

他果真地把脚踩在油门上，第二次又去扳动操纵杆，这次可大不一样了，车子开始狂颠，吼出嗡嗡的声响。这时，他看见司机从厕所里走出来，心想车子已经发动起来了，该把驾驶室让给司机，自己回到乘客的座位上，谁知脚刚一抬起，车子就像着了魔似的，腾地一下奔窜出去。

他完全惊呆了，眼看着汽车像魔鬼张牙舞爪，暴虐地扑向活的生灵，他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望着犯罪、耻辱、死亡、毁灭的威胁朝着他径直地奔袭过来。虽然总共只有十几秒钟，但是他受到的犯罪与惩罚的恐惧折磨，比用十年功夫拿钢锉锉他的肌骨还要痛苦。恐怖的战栗，已使他的精神破灭了。

可是车子却不管他怎么样恐惧，只是疯狂地运足全身力气，一下子就穿过一条马路，而后又猛地冲向对面的人行道上。它的眼睛都血红了，虽有路边的三角路牌挡了它一下，但却丝毫没有刹减它的威风，径直地朝着人行道上那对热恋中的情侣身上撞去。

啊，可怜的一朵鲜花，可怜鲜花一般的姑娘鲜红雨，就

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

他的杀人之罪，就这样通过那双愚昧无知的手，牢牢地铸成了！

三、爱河之舟

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就发生了这件事。汽车轮子没有轧着他的身体，却把他整个的心都给碾碎了！

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虽然个子不算很高，却生得面目清秀，风度翩翩，举止端庄，气质高雅，谈吐不俗，彬彬有礼，全身上下充满了魅力，特别是他的内心世界。只要求与他谈过几次话之后便会使人感到，那是一个充满着和谐、纯洁和艺术气质很浓的广阔空间。

去年，他从美国加州大学管理学院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被一个有名的大工厂聘任为车间主任。三十岁的人当车间主任，在那个厂子里还是绝无仅有的，开始人们对他还有点怀疑，但丰富的管理学知识，使他很快就把那个几百人的车间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在厂子里，提起他的名字人们不一定记得，但一说起留学回来的年轻车间主任，却是无人不知道的。

由于一直忙于进修学业，再加上生活里的各种不巧，使他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一直错位，至今已经过了三十而立之年，朋友还没有找到。虽然对于一个男子来说这还不算是一个可怕的年龄，但叫人听起来总不是那么爽快。对此，他既在意也不在意，既着急也不着急，他心中也有另一个打算：如果在一两年内找不到合适的人，就不必着急去找了，到那时正好可以无牵无挂地再去国外进修一个阶段。

因此，当朋友给他介绍鲜红雨的时候，他擎着电话耳机语塞了半天没有答出话来。回国一年多来，朋友们走马灯似的轮流地给他介绍对象，他也见了几个女孩子，其中有的条件还不错，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可是没有一个让他感到合适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唤起他的爱的灵性。他有些厌倦了，暗叹自己没有缘分。他手里拿着电话思虑了半天要找出个恰当得体的托词来，可想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还是直接了当地告诉对方说：“我不想见！”

“这样吧，小伊！星期天你到我家里来吃个便饭，这是我和我爱人特意请你赏个脸。晚饭后有个女孩子来串门，如果你觉得合适，就在一起谈一谈，如果不合适就拉倒！你看行吗？”

“嗯……就那样吧！”他勉强地答应了。

2月15日，他们见了第一面。

刚一推门进来时，她还有些拘束、羞赧，但只过了一会儿，她就把欢快、温馨、美妙的气息撒播到整个房间。她活泼纯洁，质朴真诚，说话时俏皮而又得体，望人娇媚而不轻佻，特别动人的是那灿然一笑，甜甜的就像一缕春风，能把人们心头的烦恼都吹净。

伊明一下子就被她的这种风采给吸引住了。于是，一切隔阂、疑虑、生疏的感觉都消除了，剩下的是唯恐时间过得太快，唯恨相识太晚。

他们谈了许许多多，从眼前扯到遥远的空间，从刚刚接管的工作说到各自走过来的生活道路，从社会意识到个人兴趣。当他们谈得最投机的时候才忽然惊奇地发现，彼此的生活道路、价值观念和情趣爱好，竟是那样的相近，简直就像

一个人似的。

他是学管理学的，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有很高的分析、归纳、判断、推理的能力，而同时他又是个感情型的人，因此他对心理和感情方面的预测，其准确程度要高于他对市场行情的预测，虽然感情的发现是悟性中的另一只眼睛。

“难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女子！”他心里这么说。

“她给我的印象很好，坦率地说，非常满意！”他对介绍人说。

当夜阑人静、大地万物都悄然无声时，当感情的冲击波相对地平静下来时，他认真地思忖起来，越想越感到惊奇：寻找的道路有多么漫长，而真正的相遇竟在这一霎那间！这难道真的像佛家的偈语说的，“踏破芒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缘分吗？这就是造物有意创设的机缘吗？

“她，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直觉这样告诉他。直觉，有时比理智判断得更清楚，更准确。

2月19日第二次见面时，她来到了他的家，更确切一点说，来到他的单身汉宿舍，由于他是车间主任，受到优待一人住了一间。但是在暖气供应上却是一律平等，入冬以来一直没有供足过气，甚至除夕晚上都没有温暖的感觉。今天，是他第一次邀女朋友来宿舍，让女孩子也跟着受冻真不好意思，因此头天晚上他就找到主管后勤的副厂长。

“副厂长，你再不把气供足，我就要请两个月假回家探亲了！”

这一招还真灵，副厂长怕他真的请假回家探亲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所以第二天鲜儿来时，屋子里已是暖融融的

了。她脱下外面的夹克衫，露出里面鹅黄色的羊毛衫，衬着她那红润润的脸庞，真像一朵花儿似的鲜艳。

伊明怀疑自己的直觉。有时，直觉能够准确地回答你命中注定的一切；但也并非全都如此。生活中各种情形都曾发生过，一个有点生活阅历的人听够了这类事情。为了给自己找第二层悟性，找一个参照系，他特地把在外交部工作的妹妹找来，还有妹妹的男朋友，让大家帮他认定一下，以校正自己的直觉有多大的误差。他对妹妹说：“看你们会不会喜欢她，能不能接受她。”

事情既像他想象的那样，又不完全像他想象的那样：妹妹甚至比他还喜欢鲜儿。“那是一个真真的可人儿！”妹妹刚读完《红楼梦》，她从那博大精深的红学辞典里信手拈来这么个词儿。

一般来说，女人对女人总是过分挑剔的，可妹妹无论怎么去挑剔，也没有能够从鲜儿身上挑出什么毛病来。眼睛是那么秀气，脸庞是那么端庄，五官是那么纤巧，身材是那么苗条，让人越看越爱看，真就像《红楼梦》中说的：“任是无情也动人”，更何况她是充满了感情的人。她的动作，她的声音，都是一首诗，一首让人永远也不会读得厌倦的诗。

“你还说三五年内找不到合适的呢！”妹妹悄声地对哥哥说，“这不，才刚过了年就让你碰上这百里挑一的人了！只可惜，你把建起一个家庭所必备的物品都送给了人。”

原来，伊明去年夏天回家探亲时，把他留在家里的彩电、录音机、电冰箱等物都送给了弟弟，并对弟弟说：“看样子，我的问题是三五年内解决不了的！”语调里，透出对生活的伤感和失望。他记忆中留下永不退色的印象：生活几度

欺骗了他。

“你们出去玩吧，让我来做！”正当他沉浸在幻梦之中时，鲜儿走进了厨房将他们兄妹俩都轰了出去。她一个人留下来，切菜、烹炸、煎炒、蒸饭，干得利利索索，干得有滋有味。她是那么娴熟潇洒，那么轻松自如，让人看着都产生一种快感，一种艺术享受。

“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他赞美地说。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素养的女孩子，一个事业上这样好强的女性，在生活圈子里也是这样能干，这更使他感动。记得两个月前，他的导师、纽约州立大学国际金融学家C教授来北京时，曾经打电话问过他：“你是否准备再去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如果想去的话，我将尽力为你创设条件。”他想了想后，回答教授说：“想去，也不想去。起码来说，现在不想去。因为在国内还有两件事要我去办。等这两件事都办成之后，再下最后的决心。”

C教授问他是哪两件事。他回答说：“一件事，是与瑞典西巴克公司联合搞一个合资项目，目下正在紧张的洽谈阶段。我想，我要亲自把这项工程自始至终地拿下来。它既是我对国家所做的一点贡献，也是我生活中的一桩美好纪念。”

“那么，第二件事呢？”教授问。

“第二件——我想娶个太太。”

教授听过哈哈地笑了，未加可否。可他自己心里却在打鼓。他的估计：这两件事顶多只能完成一件。回国这一年来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办任何一件事情都不那么顺畅，都不知要兜多少圈子碰多少壁。尽管如此，他想拼着全力那个合资项目也许在一两年内还能办成，至于娶个太太，

他感到那更是渺茫的事了。然而现在，鲜儿却像一颗亮晶晶的星星唰的一下就降落到他的身边，还来不及等他仔细思考，就被她那动人的清辉给攫抓住了。这一下，使他对未来的生活鼓足了信心，心说：“这两件事情我都能够办成了！”

晚饭后，他们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听音乐。演员都是些二、三流的蹩脚歌星，台上台下一片乱哄哄的，吵吵嚷嚷，连吼带叫，但这一切却一点也没有破坏了他们的情绪。他们紧紧地偎靠在一起，身边那个喧哗的世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存在的只有两颗能够互相融通的心，两颗坠落在爱河里的星辰，彼此都能体察到对方脉搏的跳动、鼻息的气流和心底里的声音。越来越浓的感情，像一条温柔的细流，在一片嘈杂的音响中静静地流淌着，流淌着。

他的心恍恍惚惚像在一个美妙的梦境里。在他的记忆中凡是思维能够展现出来的有关爱的思考和幸福的向往，现在都已全部来到他的身旁。使他特别感到惊异的是，从她身上所感受到的这种幸福，竟和他从前在幻梦中所想象的完全一样。因之他不能不考虑，他从前的梦想是否就是一种先知的预感？也许这就是上天赐给他的爱情？也许这种爱情确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早已明确地守在生前的预约书上。

他完全陶醉在和她的厮守在一起的欢乐和喜悦，热切地希望和她永生的相亲相爱，永远也不分离。

音乐会结束了。音乐堂外是一片寒冷的风砂。这是北京冬季经常出现的最令人沮丧的气象。呼啸的北风吹着街巷中灰暗朦胧的屋顶，路边的树都佝偻着身子，像一具具冻僵了的尸体。尘土、砂砾和草根纸屑混杂在一起，直向人身拍打过来。路灯只有一点点浑蒙的亮光，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寒风

和砂上的旋涡里。

她顶风走了两步，娇弱的身子立刻就被寒风给顶回来，像片叶子似的在瑟瑟抖动着。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她摇摇头，一手推车一手挡住脸，企图遮住阵阵紧逼过来的风砂。

“听我说，不要固执！”他抓住了她的车，对着迎面扑过来的风砂，他觉得应当用自己宽大的肩背为她抗住。

“不用嘛！”她娇嗔地说，“你要送，我就不走了！”她停下来，歪着脑袋看着他。她固执着，是因为她知道黑夜、风砂对一个对北京还不太熟悉的人有多大的难处。

两人僵持着，散场的人差不多都走尽了。不能老停在路口呀，她终于忍不住了，笑着说：“那你就送吧，回去迷了路可别怨我！”

他把她送回家。在回去的路上，黑夜和寒风虽然给他不少的麻烦，但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有一团爱之火一直在燃烧着。

躺到床上之后，他又仔细地检查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分析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他下决心使自己理智一些；可是在潜意识中，一个期待却竖起了耳朵。他竭力地按捺住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朝着那个方向流淌。但谁知却更加增强了思念的意识。那种渴望的心情，甚至渐渐变成痛苦的滋味了，一阵阵莫名其妙的烦恼和忧思拂之不去，顽固地抓住他。难道这就是爱的滋味？事情就是这样，她将决定他的命运，就像他将决定她的命运一样。

于是，他在星期五上午给她拨去了电话。为了迎接这位

小天使的到来，他头天就忙活了一个下午：他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她喜欢吃的东西——南味酱牛肉、雪梨、葡萄、可口可乐等都准备得丰盛丰盛。上次来时她特别喜欢喝他自己泡制的柠檬茶，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地浅呷着茶时脸上所带着的满意微笑，真是可爱极了。这次，他将多准备点柠檬茶。

已经是9点40分了，她还没有来，他一直停立在61路汽车站等候。等人，是最能考验人的耐性的一件事。一般女孩子总爱在约会时故意找托词晚到几十分钟，以此来考验对方的忠诚。岂不知也常因此而使得性格暴躁的男孩子愤怒发狂，使得性格脆弱的男孩子受尽折磨而失魂落魄。当然，鲜儿不是这样爱捉弄人的女孩子，伊明也不是性格脆弱的人，再说时间还不到，是他过早出来迎候的，他希望能够赢得更多一点相聚的时间。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迟迟不见她的影子？快到10点钟了，一直在晨风中伫立的伊明感到身上有些凉意，低头看看这才发觉，来时匆忙竟连外衣也没套。

回到宿舍披上了件外衣，又泡上一杯热茶，心想现在总该来了。可是看了看表，已经10点过10分了，还没见个人影儿！他急匆匆跑到大门口，问门卫可曾有个女孩子来找他。门卫用嘴一噘说：“那不，车子就放在那儿！”

“人呢？”伊明心急地问。

“听她说要到商店里去看看！”

伊明赶忙追到马路对面的百货商店里，一进门就见到身穿灰色羽绒服的鲜儿正背着手面对柜台，一本正经地挑选货物呢。

他悄悄地来到她的身旁，很有礼貌地说：“喂，小姐，您需要我提供一点什么帮助？”

她转过身见到是他，忍不住笑起来说：“你这个坏家伙！”

到宿舍一推开门，她便开心地笑了：“还是你这里好，一进门就感到温暖了！”

人们可以想象，一间温暖的房子会给人带来多少快乐，特别是一双热恋的情人。他们在暖融融的气氛里，心儿更加感到温馨、温柔、和谐、甜蜜，就像花儿必定要在适当的温度里开放一样，他们的心花儿都开放了。

“你要喝点什么？”他用探询的眼光望着她问，因为他知道她早起没吃没喝就跑来了，“柠檬茶？我知道你最喜欢我泡的柠檬茶！”

“等以后有时间再让我慢慢消用吧！现在，我渴得很！茶太热，一下子喝不下去！”

“那就吃梨吧？我来给你削皮！”他找来水果刀。

“不，削皮太慢！”她噘起小嘴娇嗔地说。

“吃葡萄？”

“葡萄也太慢，一个粒一个粒地吐籽吐皮！”

“那吃什么？对了，可口可乐！我就去给你拿！”他像发现了一项科学定理，或者是解开一道最难解的数学题，乐不可支地跑去拿可乐了。

10点30分，他们从宿舍里走出来。她怀着最甜美的梦想，挽着他的手臂走上大观园那条路。路过蛇年界牌时，她会心地笑了，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宽慰，心想终于从那晦气的龙年走过来了！但愿新的一年能得到幸福，而且她自信，一定能够得到幸福。

大观园的西侧门到了，园子里锁藏着无限的古幽情趣。恋

人本该走进那历史的情场里去谈情说爱。如果他们真的进去了，那场毁灭也就躲过。可是他们没有进去，在大观园门口踟蹰一会儿，又顺着碎石铺成的人行便道向前走去，自以为是走在诗情画意里边，走进生命最辉煌的时刻。现在，那条南北走向的大观园路走到头了，前面变成东西走向的滨河路。向东是大观园的正门，那里游人如织，景观布局图的牌子前簇拥着人群，都伸着脖子观看大观园的巧妙结构。她的脚步又停留下来。

“你想去看看？”他发觉她有这种意思。

“算了吧，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她不知道，这一踟蹰就使她以后再也来不到这里了！

阴错阳差，鬼使神差，他们转向西边的人行道上。这段路因为紧傍护城河而曲曲弯弯。河边幽幽静静，行人稀少，若不是时有一些赶来上汽车的人，可就是城南少有的一个爱情之角了。过去伊明一个人常到这里来，他喜欢在河边散散步，背靠柳树读几页书，思考一些问题，今天他把她约到这里来，就因为他喜爱这个地方。

可是，正当他们走进最幽静和谐的爱情角落里时，伊明猛一抬头，看见一辆红黄色汽车像一头猛兽疯狂地向他们扑过来。他高喊一声“停住！”还没等他喊出，车子已经窜到人行道上。他刚刚扭过身子，想去拽鲜儿，这时鲜儿，已经倒在车轮底下，卧在血泊之中了。鲜血洒在月季花前的黄土地上，润湿了一大片。

大自然创造的一朵最美好的鲜花，被猝然摧毁了，连同她刚刚寻觅到的爱情！

四、鲜花之神

一声落地沉雷，一下子在鲜红雨生前的工作单位——工业卫生实验研究所里炸开了。2月27日整整一天，各个办公室、实验室、操作室，都是一片死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都呆然木讷地坐在那里，除了泪珠儿滴落的声音和几个女孩子忍耐不住的悲泣，没有一点声响，死寂得如同伦敦的蜡像馆。

整整八个小时，人们都是在那难以想象的无声沉痛中度过的。下班铃响了，不少的人还没走，仍然默默地坐在自己位子上。人们不敢相信，生和死的距离竟是那么近，只隔一层薄纱，只隔一个门坎。人们不敢相信，他们那么喜欢的一个年轻善良的好姑娘，就在一个早晨突然死去，凄惨地卧在血泊里。

沉寂一直延宕到第二天早晨。当黎明的阳光无心地把人们惊醒时，有个青年从宿舍里走出来，怀里抱着一个缀满雪白小花的大花篮，满脸泪痕地走进一楼最里头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种意识被无声地传递出去，人们都随着大花篮走进那间办公室。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很快就为鲜红雨腾出一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空间，让她无所依托的灵魂暂住在这里。人们把她的办公桌子抬来，鱼缸里的金鱼还在游，同事的小女儿为她画的那张稚气盈盈的图画还在玻璃板底下。她是属狗的，那头丝绒制成的小狗摇摆着颈上系着的铃铛蹲在案头。人们取来一张她的放大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边的墙壁上。

3月6日，工卫所为她开了个小型追悼会。

在道德、人性、同情都遭到冷淡，甚至是轻薄、鄙夷的

今天，工卫所里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受到如此众多的人出自内心的思念，确实叫人感到诧异，也叫人感到惊叹！是什么力量使她赢得这么多的爱呢？

我们的社会，曾经有过五十年代的清廉寡欲、人人信奉圣洁的时代；有过六十年代的雷锋和雷锋式人物，人们崇仰一心为公的伟大风格；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和立场分明的阶级感情。到了八十年代‘由于历史的螺旋式发展；由于批判的道德对于道德的批判，使传统道德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由于凝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态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化分与化合，因而，现实中的人多用冷酷的眼光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曾经是严肃认真的事物和严肃认真的感情，来用一种变化的心态来重新调整自我，调整自己 and 他人，调整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比较更多地重视现实，重视现实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真善美，重视普普通通有血有肉、充满着人情味的道德情操。

鲜红雨这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以她的真挚、善良、坦率、热情、旺盛的青春和充满灵性的幽默感，在人群里生活得踏踏实实，富有美的感染力，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好感。她总是在悄悄地做事，为自己做也帮助别人做。她总是笑，虽然心底里也有烦恼、苦闷，但却总是藏到心底里边，送给别人的只是微笑。她像春天的雨丝，把生命的欢乐悄悄地渗透到人们的心里去。有几个姑娘说，每天上班放下书包后就想到鲜儿办公室去坐一坐，哪怕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听听她的笑声看看她的笑脸，就感到满足和高兴。大家有事总是说：“找鲜儿去！”每一天里，人们见到了她就感到过得愉

快，没见到她就感到挺别扭的。

可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却被愚昧和无知给残酷地摧折了。

制做花篮的那个青年说：“我无论走到哪里，把目光投向何处，在空中总能见到她的影子。像平常一样还是那么笑盈盈的，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既亲切又调皮地望着你。有时，又见到她就站在宝蓝色天空里，长长的秀发像波浪似的随风飘荡着。”

她应该是神，是鲜花之神。几个女孩子都这么说。有一本文学名著上写道：“在所有人类的感情中，有一朵原始的鲜花，诞生于一种高贵的热情。”鲜红雨就是诞生于高贵热情的一朵鲜花。为什么她会那样猝然离开人世，那是上帝看到花神活得太累了，出于对她的偏爱又把她召唤回去了。

在工卫所这块“感情的绿洲”里，人们用种种近似神话的幻像来弥补他们生活中突然塌陷的感情真空。

天地间说是没有感应，有时也还有些感应的。就在鲜红雨被撞死的那一天，伊明办公室里一棵南天竺突然枯死了。

那天晚上，他望着突然枯死的南天竺，整个思维系统几乎被悲痛挤碎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既使他悲愤万分，又让他不可思议，一闭上眼睛就是那飞来的汽车，就是血泊中的尸体，就是最后一声惨叫，就是……

他像只木雕似的站立着，望着那盆枯死的南天竺，心头涌出千万种难以理清的思绪。想想方才自己精神上的崩溃和那痛苦的大雷雨，他倒希望碾在车轮子底下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至少上苍应当出于恻隐之心，将他与鲜儿一同召唤回去。

五、罪人之泪

与伊明在痛苦的困惑中备受折磨一样，受愚昧和无知的拨弄而当了杀手的刘银龙在监狱中也承受着灵魂的谴责和梦魇的迫压。那天在汽车上他眼睁睁望着—对情侣被他冲散，那样一个娇巧灵秀的姑娘被他撞倒，自己却没有一点力量去制止悲剧的发生。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步迈进罪孽的深渊里，而却完全无力避开那个可怕的命运结局，那真是最残酷的折磨呀！

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那个无辜的姑娘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向他索取她在人间本应享受到的幸福和权利。她本来有着上天赋予她的一切优越条件，还有她自己通过努力而实现的超越，可是这一切都被他的愚蠢和鲁莽给打得粉碎了，就是万能的主也无法把它重新收拾起来。这一切便铸成了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也无法宽恕的罪孽。他不敢抬起头来看望铁窗外面眨眼的星星，好像那里边就有两颗受害者的眼睛，不时地向他射出幽怨的光。他的悔恨，常常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反复地说着一句痛楚钻心的话：“我两条命也抵不了人家一条命呀！”

有时，他也在自己昏暗的思维中来寻觅那无法破释的因果之谜。那天，他本该同弟弟一起回家的。弟弟是后半夜的班，起来得要更晚些。但他惦记着同学哥哥刷牙的事，便没有等。可为什么在大观园那里一再逗留呢，一连让过两辆351路没有上？随便上到哪辆车都不会发生这事情！难道仅为那几张《广播电视报》吗？如果只为送报，他可以把报纸交到潘三手里就走，甚至也可以让别人转交给他。可他偏偏要等

10点50那趟车，从而作了不可饶恕的杀人凶手！是什么恶魔非要把他与犯罪牵连到一起呢？他原说今年系上红裤带，便可以是一切灾祸躲过去。可是红裤带虽然系上了，但灾祸却仍然是巧而又巧地让他给碰上了！

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在那深奥莫测的神秘因果中去兜圈子。那不是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到的，没有必要强知那不可知的一端。而就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事和 $1+1=2$ 的简单数学推理中，也有多少我们解不开的死结和走不出的怪圈，让我们永远处在无法解脱的困惑中。

他，一个印刷厂的工人，就有白拿报纸的权利。虽然这是既不符合规章制度又不符合经济法则的事，但是谁也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几分钱的报纸算什么？从价值量来看是不算什么，可它却明显地违背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价值交换的基本原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殊不知许多怵目惊心的危害和惨祸，往往就是从那不当作一回事的小事中产生出来的，鲜红雨的血案就是一例。如果我们寻根问底的追究，不是太牵强的话。

他的优势，实际上也就是他的罪源，就在于他有几张不花钱的报纸；司机和售票员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无权授予而实际上却总在暗暗授予人优先的座位。当然，这种优势比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大小官倒，比起通过价差、利差、汇差可以巧取豪夺的人们，比起用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老同乡等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去分取一定的利益好处的人们，这自然是微小得简直不值一提的蝇头小利。可它毕竟也是个利，也能产生一定的动机与效果！于是，刘银龙一个非司机就可以跳进驾驶室，非但进了驾驶室

而且还可以试行驾驶。售票员因为每天也得了几张报纸的实惠，非但不劝阻和制止，而且还提醒他按动哪个部件才能把车开走。犯罪，就是以一般人看起来根本构不成罪的几张不花钱报纸为契机的；因为，没有这种构不成犯罪但却能促成犯罪的交换，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汽车自动奔出撞死人的惨案。

从这一点微言大义来说，凡是背离了社会公平原则的弊端都应明令禁止，防微杜渐，社会的安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的管理功能才能臻于完善。勿以恶小而为之，而纵之，因为其结果必然成为腐蚀瓦解整个社会管理功能的蚁穴。古人有言：“塞一蚁穴而河决息，施一车辖而覆乘止，立法者，亦宜举旨。”所以善治国者，善治社会者，不能忽视这些腐蚀瓦解社会秩序的种种巧占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哪怕是极小极微到白拿几张报纸这类小事。

现在，直接造事者刘银龙锒铛入狱坐到铁窗里边去了，可是与肇事直接有关的司机潘三却照样开车，售票员也只是调换了一下工作岗位。执法者和量刑者以及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们法不当责，虽然也有过失。难道真就无可指责吗？不论是从职业道德来说，还是从岗位责任来说，一个司机能够随便便让一个乘客跳进驾驶室吗？一个售票员能够眼看着非司机拨汽车开关部件试行启动而不加制止甚至纵容吗？在国务院1957年10月26日颁布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规定》的第二条细则中，对于“玩忽职守，贻误工作”者就有明文规定，虽“尚未构成犯罪的，应该予以纪律处分”。何况，在他们纵容下已经构成了犯罪，犯了很大的罪。

在苏联，对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中玩忽职守、违反操作规程的有关人员，从上到下都分别给予了开除

党籍、撤职以至于逮捕法办的处分，其中，总工程师判处10年徒刑。

赏不足奖善，罚不足禁非，怎么能够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呢？

这里，法制的健全和执法的不严厉是一个极大的祸根。在日本仅交通法规就有12个，对交通事故等级和事故赔偿都规定得十分具体，每个交通警察手备法规一册，遇到什么情况如何处理一目了然。他们春秋两季都要举行为期10天的全国性交通安全教育，在学校里有正规的安全教育课，国民都已把遵守交通规则当作检查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我国，虽已在1955年制定了内含六十条的《城市交通规则》，但三十年来交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交通规则》却没做任何修订和补充，那个规则早就显得太不具体、太不科学，太不能适应需要了。

与立法不详同时并存的，还有执法不严的弊病。由于我们缺乏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因之，依情徇法、因私废法的事比比皆是，使得许多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成了橡皮圈随意伸缩，失去了它的硬约束力。

本来通过一次大的灾祸，人类能够总结自己，完善自己，战胜自己，可是我们存在的那些弊病却不能使我们对于灾祸立即产生抗体，形成相应的制约和克制力量。因而，灾祸之后仍是灾祸，撞伤之后仍是撞伤，受到危害的市民仍然受到危害，因为刘银龙、李桂生等浑浑噩噩的人，仍然可以在乘兴而来，在漫不经心的心态下制造出一起起的惨祸，让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鲜红雨无辜地又倒在血泊里，让其亲人遭受着比死还难过的苦痛。

当然，现在刘银龙也很痛苦，坐在昏暗的牢房里受到内心和心外的折磨。一向是大大咧咧、凡是不走脑子的小伙子，也不时地流淌着悔恨的泪。想起死于他的愚昧之手的那个可怜的姑娘，想起她的家中抛下的更为可怜的老父老母，他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六、女儿之坟

在临出葬的前一天，我们来到了伊明的办公室。

伊明坐在办公桌前，一堆中英文资料摊满在桌上。烟灰缸里，堆满一堆烟蒂。几天来的事情，使他如同从平川地上一下子跌进谷底，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颊明显地消瘦了，颧骨尖尖地突露出来，头发不像先前那么整齐了，而是乱蓬蓬地覆盖在深锁着忧伤的眉宇上面。胡子好久没刮，像一丛杂草。

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件又愚昧又恼人的事。半年前他刚担任车间主任时，曾对职工进行了一次规章制度测验。人人都说规章制度重要，违反者应当从严处罚。可是前两天有人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幸而被他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事后他把那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按规定扣了他一半奖金。这个人不服气，闯进办公室来大吵大闹说：

“好了，这月奖金我不要了，算我倒霉！这种倒霉的事儿谁也保不住什么时候碰上，就像有人出门被汽车撞死似的！很明显，他是为了那笔奖金狠狠地向我心窝扎一刀子！”他忿忿地说。

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有人竟会在别人遭受那么沉重打击时如此恶毒地去挖苦和嘲讽，让人流血的心再遭刀戳，好像

一般的道德良心和人际关系都不必讲究、不必恪守了！一片冷漠的心！失衡！失衡！从道德到法律，从理智到感情，整个的失衡！

因而，鲜红雨的悲剧也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了！

他苦涩地笑了笑，眼里充满忧伤地说：

“这一天，正是个星期日。黄昏的时候，行人少了，我又来到那个地方，她无辜地洒祭青春之血的地方。那里已经修起一道护花的铁栅栏，栏内的黄桷、银杏都生出嫩绿的叶子，有的已经婆婆娑娑，摇动着窈窕的影子了。桃花开了，杏花开了，榆叶梅也开了，粉灿灿的，一团让人接受不了的炽烈。只有报春花柔和朴实，能够给我更多的安慰。在我将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借着血色黄昏拍摄了一张照片，拍下了那护花的栅栏，栏内的花草树木，还有那根被撞歪了的三角路牌……”

她的父亲还决定将肇事单位赔偿的一万元钱，用鲜红雨的名字捐献给他们老家的乡村小学，作为开启民智的一点教育经费，以期从人们心中扫除愚昧、粗蛮，浑噩、冷漠。

鲜红雨在父母、亲友和无数个思念她的年轻朋友的泪水中被安葬下去，一块小小的墓碑“我们最可爱的亲人——鲜红雨之墓”露出地面。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几天之后，伊明约会几个朋友一道去到鲜红雨那里，把坟地周围都种上了美国兰草，坟前还种上几株月季。那天是谷雨，老天好像忽然可怜起她来，竟然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的雨。伊明的心多少得到了一点慰藉。有了这雨，他相信栽下去的花草一定能活的，能茵茵艳艳地陪伴她的……

他在答辯之前死去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于诸葛亮壮志未酬的一种同情和叹惜，千百年来，人们常用它形容人才未能发挥最大光和热或是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不幸的是，时至今日，在面临技术革命、知识爆炸的挑战的年代，国家亟需人才的今天，人们仍不免会发出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特别是对那些在科技文教事业中承前启后的中年人，对那些纷纷殒落的尚未发出亮光但必将发出亮光的星辰，人们甚至痛悼地称之为“国殇”。

他去了，他留给人世间的是无边沉痛的深思，深思！

他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虫媒病毒学家王逸民。

这个名字，很容易与“举逸民”，“克己复礼”联系起来，仅此一点人们就可以想象，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受到怎样的冲击。虽然，早在解放前学生时代他就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

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是位颇

有名望的国学专家。由于身受家教的熏陶，目睹旧社会的腐败，他怀着一腔爱国的热血和报国的热忱，共和国刚一建立，就积极地投身于乙型脑炎的防治工作。那时，我国的乙脑曾经猖獗一时，危害极大，令人谈虎色变，犹如今日之癌瘤和艾滋病，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给多少天真活泼的儿童造成痴呆症。年轻的王逸民像个出征的战士，不避危险，不怕脏累，深入到传染病区，同那些害人的瘟疫周旋。他潜心于病毒学、病理学、医学昆虫学、医学生物学的研究，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地出没在深林旷野、农田村舍里，捕捉昆虫，进行血清和病毒的化验分析。经过长时期的艰辛的侦察捕捉和缜密的化验分析，他终于在我国首次分离出乙型脑炎病毒，明确了病源，揭破了乙脑这个魔鬼王国的秘密。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首次向我们国家提供了预防乙脑的较好的疫苗毒株，将征服乙脑魔窟的进军推进到决胜的地步。

和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他也艰难竭蹶地度过了这几十年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现在，终于天开云绽，山水清明了，他朝夕期盼的喜讯也在耳畔响了。

1988年10月15日，一张盖着卫生部大印的硬壳铜版纸通知书落到他的眼前：

“经有关专家初审，你单位的申报项目《我国乙脑主要传播媒介和主要宿主动物的确定》，被推荐为卫生部1988年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项目。根据有关规定，推荐一等奖的项目需在终审会上答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答辩可用录像、幻灯等，请将所需的工具及答辩人通知我们；

2. 每项答辩时间为40分钟，情况介绍部分务于20分钟内

完成；

3. 答辩时间为1988年11月18日，你单位的项目安排在上午8点20分。”

面对这份通知，他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心底里就像决了堤的滔滔河水，流淌着无限波折的已逝时光和蓄积已久的辛酸苦辣的感情回流。这一天他盼望得太久了，太久了！为了这个日子，他付出去的太多了，太多了，其中包括着他的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机体里的每个细胞。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个时间来得太晚了！王逸民在接到这个通知之前，已经接到了死神的通知。晚期肝癌已使得他容颜枯槁，形销骨立，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闪跳着生命的最后一点火花。

但即便如此，当所里的同志来看望他、同他商量答辩之事时，他还坚持说：“还是让我自己上台去答辩，别人不好代替；那些学术委员不知会提出什么问题，别人一时不一定就理得清楚，而它们却都装在我的肚子里。”他说得颇有道理。在涉及到一个人的科学荣誉和最终评价的大事上，代替的人若是稍有差错，将在科学历史上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最后，大家商定了一个折衷的方案：答辩那天用手推车将他推上台去，论文介绍由同事来宣读，学术委员提出的问题由他本人答辩。

这时，他被病魔折磨得已经变得浑浊了的眼神又明亮起来，已经快干瘪了的血管又流动着欢畅的血液。他聚集起生命机体里能够聚集起来的力气，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他要拼死拼活地走上那个庄严神圣的科学讲坛——答辩会。

可是，他终于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夙愿，没有熬过寒星抖

落的霜晨，没有闯过病魔的封锁区，没有能跨过生死的大限。尽管卫生部门的领导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尽量地把答辩会提前，并按照他的请求，把他的答辩安排在最佳时间——上午8点20分；但是，他终于没等到这个时刻的到来，没有能够看到那个庄严的场面。

戏剧还没达到高潮，就突然落幕了，这让生者和死者都感到锥心的痛楚，终生的遗憾。

二

他匆匆地走到地平线下，留给世界的只是一个背影。

他去了！可1988年11月18日这个日子，依然按照时序更迭准时地走过来。那天，在京郊怀柔县龙山宾馆礼堂里，坐满了医药卫生界的专家学者，连卫生部长陈敏章也拨冗赶来，听取这场学术史上极不寻常的答辩会——发明者本人不出席的学术答辩会。

答辩的课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国乙型脑炎主要传播媒介和主要宿主动物的确定及其在疫区区划和流行病学监测中的应用》。这项科研成果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因之得到世界各国医、药两界的高度重视。这项成果的发明人王逸民，早已被国际虫媒病毒委员会聘为中国顾问，并多次向他发出请柬，让他出席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可是，他因担心出席会议要占用所里为数不多的科研经费，一直没有出国。

今天，远隔重洋的国外学者，国内的生物学、病毒学、医学界的许多专家和科技人员，都失去了同这位科学家见面的机会。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人们越是感到它的珍贵。因

此，当会议主持人走上讲台沉重地宣布说，答辩人王逸民已不幸于10月28日去世，答辩只能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其他人员代为进行时，会场上是一片冰冻般的肃穆；而当主持人让死者的妹妹和儿子走上讲台，代表家属宣读他们写给答辩评审委员会的信“他不能到会了，21天前他离开了人世，匆匆告别了他为之献身的科研事业”时，场内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十余名专家学者中，竟发出了抑掩不住的忍泣之声，那些具有冷静头脑的科学家，也禁不住感情热流的冲击而流出滚烫的泪水来。

答辩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代他答辩的是他的科研伙伴和他指导的研究生。幻灯片打出乙脑传播者——三带喙库蚊和染色的病毒形状。

科学，在严肃的不容丝毫宽恕的气氛中经受着审查。

这个答辩的日子，来得太迟了！它早就应该到来，不是在1988年，而是在1978年，或者更早一点的时间里。应当是在他风华正茂和血气方刚的时候，在他可以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地走上答辩讲台的时候，而不是在他病入膏肓、走进坟墓的时候。

我们这块土地对于知识层一向是吝啬的，苛刻的。它不喜欢对天赋的才华和案头的疾劳给予过多的宠爱，不愿意让科学、艺术享有应得的荣誉和奖赏。它深思熟虑的智慧就是如何保持中庸的均势和犬儒的平衡，用大家都不伤体面的感情来维系我们的群体意识和协调我们的公共关系。社会调控机制的失灵和运作程序的僵固，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应该重赏而没有重赏、应该重罚而没有重罚的机会。而赏罚不明，则是启用人才推进社会进步的大忌，正像武侯祠前的对联所讲的

那样，“不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由于赏罚不明，曾造成多少人才流失、阻搁和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损失。

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封闭自守的生活，又造成群落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窝里斗”的卑劣习俗和心理缺陷。自己不能出成果，也不愿别人出；自己不能攀登上去，也不愿别人上，特别是对于和自己一般高的人，就更为厉害。嫉贤妒能，已成了人们对于自身利益进行保卫的一种手段，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也需要维系这样一种均势。原来我们早在建国初期，在各个学科里就已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形成了自己的宝塔式等级结构和权与位的分配关系。那些在本学科领域内执衡的人物，对于我国后来的科技发展和学术繁荣是起着重大作用的；但也无庸讳言，其中也不乏心地偏狭的人，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来压制后起之秀，巧妙地利用不健全的社会意识，制造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他人的均势倾斜。不幸的是，王逸民恰恰处于这种权威的影响之下。

三

蚊子属于哪个种类，在一般人眼里看来简直毫无意义，不论是什么蚊子叮人一口，都是刺痒钻心，火辣辣地疼，只求一巴掌把它打死，谁还有心思看它长个什么模样。可是在科学家的眼里，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蚊子有一种生活习性和繁衍周期，不是每种蚊子都是瘟疫的传播者，更不是每种蚊子都传播乙型脑炎。

自从乙脑病毒分离出来之后，摆在医学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出谁是这种病毒的传媒者。如果把

乙脑病毒的传播者和宿主都找到，人类对于乙脑的防治就更有主动权了。

病毒学界一位权威学者提出一种权威说法：乙脑病毒的传播者是黑斑蚊。人们都还记得，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曾经发动了一场全民性的翻倒坛罐运动。那场运动的理论根据，就是权威学者的黑斑蚊说法。黑斑蚊是一种家蚊，宿居在坛坛罐罐的积水里，只要把积水倒掉，它们就没有生存和繁殖的场地了。

遗憾的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来了个翻倒坛罐运动，乙脑瘟疫并没有控制住。可见，黑斑蚊的说法并不准确。

一番挫折，便是一番飞跃的基础。王逸民在控制黑斑蚊而控制不住乙脑的启示下，专心致力于另一条新的寻求之路。他通过大量的侦察、捕获和科学分析，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乙脑的传播者不是黑斑蚊，而是三带喙库蚊。这种蚊子不是生活和繁殖在坛坛罐罐的积水里，而是在野外池沼和水稻田里。王逸民和他的助手把功夫都下到野地里，因之他们控制乙脑的办法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59年，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三带喙库蚊是乙脑传播者的科学论文。在这稍前一点时间，他第一个提出猪是乙脑的主要宿主的论文。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国医学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原来，这三带喙库蚊的长长尖嘴上有条环状白纹，将尖嘴划分为等距的三节，故此唤来这个文雅的称号。在台湾一带，它又叫“三斑蚊”或“环纹蚊”。这种蚊子多生于夏季，身上带着乙脑病毒，叮人后就将病毒传染给人。秋后，蚊子无法过冬，它们就将病毒宿留在猪的身上。第二年夏季蚊子孳生，又把病毒从猪身上吸出，再传播给人。蚊、猪、

人，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乙脑病毒的黑色锁链。

把握住了这条锁链，便把握住了主动。王逸民向国家提供了防治乙脑的科学途径。哪个地方六、七月期间三带喙库蚊繁殖迅速，哪个地方便成为乙脑流行的危险地带；采取集中的灭蚊措施和其它防治手段，便可以控制住乙脑的流行和蔓延。王逸民和他的助手们多少年来便运用这种方法，在我国幅员广阔的领土上进行着长期的乙脑监测和控制工作，效果越来越显著。八十年代初期，他曾负责主持了北方八省乙脑监测工作会议，会上大家对他提出的乙脑监控系统方案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王逸民花费毕生心血的科研成果却一直未能申报上去，虽然大量的事实和数据都给予了最充分的证明。每次提出申报时，那位权威学者总是说：再研究研究，一直未做最后首肯。1984年，王逸民又用最新监测方法做了实验，获得最新的材料和数据来证明他所做的结论，但仍然被告知还要多做实验。直到1986年那位权威学者去世，他的科研成果才从压力杠杆的巨臂之下解脱出来，1987年由所里正式申报上去。可是这时已经太迟了，还没等他的成果被评审委员会最后鉴定，他自己却已为先进的科学仪器CT鉴定出来：肝区有一个 4.5×3.6 厘米的肿瘤硬块。

四

在万象颠倒的十年动乱期间，王逸民这个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北平解放前夕被捕入狱在狱中一直坚贞不屈的好同志，竟被无中生有地扣上了几顶帽子，罢官撤职蹲牛棚，遭受百般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连实验室也不准他进的情况

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只要能找到涉及到病毒领域的机会，不管活儿有多脏多累，他也要不顾死活地争着去做。他曾主动地要求去大兴安岭森林和内蒙古草原去蹲点调查，为防治森林脑炎做监测和免疫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不顾危险在地震余波未平的情况下，就跑去参加灭疫、防疫工作。

他是瘟疫的死对头，只要听到哪里有疫情，便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哪怕是在对瘟疫一方极为有利对他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要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拼死拼活地去堵住防疫堤坝，就像战场上那些敢用身体去堵住敌人枪口的勇士一样。

然而，他毕竟是个血肉之躯，不是用不锈钢制做的机器人。正当他用自己的身子掩住群众免受瘟疫侵犯时，他自己却被病毒给缠绕住了。当他在肝炎流行地区忘我工作时，肝炎病毒便趁机侵入了他的机体。

他没有分出一点时间顾及自身，顾及体内被病毒攻溃的健康防线和一块由隐至显的沦陷区。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常常是一个人躲在屋子的一个小小角落里，用书本遮住灯光看书写作，因为他只能在家人都睡熟的时候偷偷拧开台灯，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享受到宁静环境可以帮助脑力劳动者迅速接通思路的快乐。

他是一个卓有成就的虫媒病毒学家、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可是人们很难相信，有十多年的时间他竟是祖孙四代十口人居住于二十八平米的两间住房里，每天吃完晚饭就要收拾碗筷抹干桌面，因为有人就要铺上被褥睡在那里。至于睡在沙发上、行军床上和吊板上的人，那更是比比皆是了。1984年单位给他落实政策，才改善了居住条件，让他搬进了

高知楼。但一套小三居室的房子住老少四辈也不宽裕，仍然要有人睡在沙发上、行军床上，而给病毒学家本人留下的空间，则是狭窄而又狭窄的。

几十年来，他一直是靠149.5元的工资过着不算清贫也不算富裕的生活。上有老，下有小。老的，无话可说，应当享受到晚年的一点福份；孩子小，多破费一点也在情理之中。轮到他自己，只能同家里人一样大锅饭大锅菜地过日子，虽然他付出的劳动要比别人多得多。好在，他一向替别人打算和着想惯了，对于自己是从来不放心的。他一年到头总是一身布裤布褂，冬天一件对襟棉袄，脚下一双老头乐棉鞋。从外表上看，谁也猜不出他是个研究员、科学家，还只当是个老农，而且是个尚没有摸到致富之门的老农！老伴心疼他，从生活费用里为他节省出一笔钱来，给他做了一套藏蓝色纯毛料子的中山装，挺括整齐，穿上之后立使人显得精神多了。可他却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穿，总是说等有重要场合再穿吧！

可是，如今他再也不能自己把这套衣服穿到身上了。是他死后，家里人把那套衣服给他套到僵硬的尸体上。他不是穿着这套衣服走上神圣的学术答辩讲台，而是走向火葬场的。

五

本来，去年4月份他便感到周身不适，频频地收到从生命危区发来的预报。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日记上常常有这样的记载：“今天身体不适，发烧……吃不下，睡不好”，“服药烧退”，“晚上再发烧”，“下午又发烧”等等，可

是他还是抱着虚弱多病的身子，到海南岛参加了“全国登革热防治工作会议”。

为了开好这个会，他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整理会议资料，写大会发言稿，一连五、六天都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仅发言稿他就写了三份，除自己的一份外，还代两位领导人起草，本来这些事情照理都是年轻人干的，家人劝他不必越俎代庖了，可他总是一笑作为回答。他怕别人对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会议不熟悉，不能简明扼要地阐明会议精神。

登革热也是蚊子传播的一种疫病，在东南亚一带流行得很广泛。传播这种疫病的蚊子叫“埃及斑蚊”。王逸民对于这种病毒也研究多年了，曾多次带助手到南方各地去监测疫情，前年还带领几个研究生到海南岛捕捉这种蚊虫。他六十多岁了，每天晚间还跟青年们一起，拿着手电筒和捕蚊吸管到水稻田里去捕蚊子。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他却总是不肯。

蚊子捕来，他又指导研究生们做实验室里的工作，做理论分析方面的工作。他指导青年们写学术论文，不仅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大段一大段地口述，甚至有时要为他们动手重新写一遍。他的研究生们先后在《病毒学报》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登革热发病几率和预测方法》、《登革热减毒活疫苗的培制》等文章，虽然每篇他都起了中轴作用，付出的劳动最多，但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边。他想用自己的肩膀多为青年人开开路，多为青年人创造一个表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他常说：“青年人虽然现在尚未成熟，但他们将来肯定会在各自的方向上做出成就，成为专门家的！因此，当先生的应当在学生们开始做出点成绩的时候提携他

们，而不是要等到他们有了成就之后！

在海南岛，那忽冷忽热的天气已经让他吃不消了，可他回来后还是像个苦耕残阳的老牛一样，一步不停地向前拽拉着，很怕一停下来生命的钟摆就停止摆动。又是一连串的夜晚以继日的工作。整理材料，向院里和部里汇报会议情况，同室里同志一道讨论和部署下一步的科研方向。此外，还要指导研究生的学习与科研，帮助他们修改参加“生命之春”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

7月份，又是周身不适。大家都劝他休息，可他还是到大兴等地参加了虫媒病毒专业会议。等从会议上返回去医院检查时，肝区那块不祥之物已经清清楚楚地印在X光片上了。8月23日他正在所里开会，医院里下来了强迫住院的通知。

不过，这时还不是晚期。如果他在病院里能够潜心静养，也还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速度。可他一辈子已经养成了无法更改的习惯，永远也不会停止工作。在病床上，他还翻阅有关登革热的科研资料，设计和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自从接到答辩通知书，他的精神便获得一种极大的鼓舞力量。他要尽力地聚集起生命的活力，尽力从死神手里争夺走进那扇冷酷门板里的大限日期。他自信有力量争得这个期限，走完他的人生最后一段里程，也是他最辉煌灿烂的一段里程。因此，尽管他已经气喘吁吁、没有多少精力了，还是在那里做答辩的种种准备。

不过，他从日甚一日的虚弱中，已经预感到他最后离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在以一个科学家的纯洁良心，向上苍祈求奇迹。他一生中，还从未向社会和自然界做过任何祈求，他想上苍这次一定会满足他的这个小小心愿。给他一个短短

的期限，让他能够最后走上答辩讲台。这对他来说，比生和死本身都更为重要，更为珍贵。

为了求得这个奇迹，他甚至想到乞求医、药。他知道，名医贵药可能帮他争得个短暂的生的期限。可他一生中从未向人开过口，尽管现在这种期望已经烧到他的胸口了，却不肯向人透露一字。以至有一次妹妹来看他，闲谈中说起前卫生部长黄树则同志向他问候对他的病很关心时，妹妹注意到他的眼神突然闪亮起来，里边露出一种急切的盼望神色。妹妹看他嘴角嗫嚅了一下，想等他说出什么，可他终于没有说出来。年轻的妹妹还没有对人的复杂心情体察入微的能力，她事后非常内疚地说：“我真后悔，真后悔！当时竟没有去追问哥哥藏在心里想说而未说出口的话，现在才明白，他是想让我去求黄部长，求他在这个紧急关头帮他一下。可是，他一生作人的品格决定了他，这种求人的话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奇迹终于没有得到，大自然的运行是没有感情的。妹妹没有在有哥哥生前代哥哥去找黄树则同志，但在答辩会开过一周之后却收到了黄部长的来信，告诉她：“逸民同志的成果项目经答辩受到全体专家们的同意，因而定为一等奖的第一名。我怀着对逸民同志的敬佩和怀念心情告知你此事。我想，逸民同志献身于人民保健科研事业的精神，将鼓舞着青年一代更好地学习和上进。”

令人心酸的是，这个喜讯来得太迟了！这时妹妹和她的嫂子、侄儿们，正在为哥哥寻找墓地呢！

人们常要发出这样的喟叹：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追悼会上才送去荣誉桂冠，为什么不能把那些追认和追封，提前到正点的时候呢？为什么这类感叹的话，说过一遍又一遍呢？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一周年祭

在遼密幽深的额木尔河边，有几点微弱的火光闪动着，像河水中沉落的星星，闪着迷离的光。

那深黑色的荡荡漾漾的额木尔河，人们都称它为生命河，救命河，因为它在那惊天动地的“五·七”炼狱之夜里，曾用它坦荡的胸怀和清凉的河水拯救了在河两岸居住的上万人的生命。

人们默默地来到了河边，摆了几样果品，有人甚至烧了几张薄薄的黄纸，祭奠一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和在那个夜晚里丧生的亲人、故友。

好多人都说，那个夜晚是一场梦。梦一醒，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大火焚烧尽了，甚至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亲人和孩子们。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呀！它突然之间，把人们推到生与死的河流两岸。

人们默默地走到墓地上。在大兴安岭北麓缓缓倾斜的山坡上，并排摆列一百九十三座掩埋着被火焚焦的尸体的坟墓。花圈和果品摆放在野草萋萋的坟头上。

一年前我曾来到这座倾斜的山岗，看过那并排摆列的尚未掩埋起来的一百九十三具小小棺柩。我掀开棺盖，看到烧焦的尸体都收缩得很小很小，一具成人男尸只有婴儿一般大小，都被盛殓在一个大塑料袋子里。

如今，棺柩已经掩埋起来，那些痛苦的灵魂不再脸对脸地望着天上的孤星冷月和泣血残阳了；但是，却怎么能够掩埋住那些痛苦焚烧的记忆呢？每一座坟头里，都掩埋着一部焚烧的历史，都有一段摧魂裂魄的故事。

据说，流逝的时光可以冲淡记忆底板上的一切影像，可以冲淡心底里蕴藏着的一切悲欢离合的感情色彩；但是我敢绝对有把握地说，它决不能冲淡坟头里掩埋着的焚烧记忆。

阿木尔林业局副局长杨福成来到了妻子的坟前。男子汉的腮上也挂上了人间最酸心的泪。那天晚上他不在家，正在加格达奇开会，等他知道消息赶回家门时，眼前只有一片残砖碎瓦，邻人告诉他，妻子和两个孩子都烧死在大火里面。现在，他只剩下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同他一道来到坟前的，有特地从千里之外赶来的岳父和内弟。他岳父用手拍着坟头悲痛地说：“桂兰呀，桂兰！你死得好惨呀！你十八岁来到大兴安岭，在林子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想不到一朝竟带着两个孩子全走了！全走了！哪怕留下一个呢，也让我再见见亲人！”

晚风飘散老人哽咽悲怆的声音！

在轻轻浮动的雾中，走来一个中年妇女，手里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她挨个地把供品摆到八个坟头上，那坟里躺着的是她在一个夜里失去的八个亲人。她的父亲赵喜荣是劲

涝贮木场的党总支书记。老人在失火的那天晚上没有睡觉。老年人的觉一向很轻，何况肩膀上又压着贮木场里几万米的上等木材。他看到火来时，本可以唤醒家里人从从容容地逃出门去，自寻一条生路。可是他没有自顾自地逃走，他知道家里人都已醒过来，而邻人还都在梦中。于是他便跑出来挨门挨户地去呼唤。等到他把邻人们都唤醒再回去领家里人时，门口已是天崩地裂一片火海，逃生的门被堵死了。他无奈，只好领着家人躲进地窖里；后来大火把房子烧落了架，一家八口人都惨遭不幸。今天，到这八座坟头上洒泪的，不止是这个远嫁到外地的女儿，还有多少被他从梦中唤醒的邻居。他们都眼含热泪地说：“老赵啊，老赵！那天晚上若不是你来唤醒我们，我们早就烧死了！你用自己的命，救活了我们大家的命！”在老赵的坟头上，堆放的花圈最多。老赵啊，老赵！有多少人走过来亲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虽然从此之后，天地间再没有了你呼唤人们的声音，但却久久地响着人们呼唤你的声音！

我跟着那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十几年来一直握着方向盘的老司机孙忠超，一道走向坟地。他的脸像夜幕一样的颜色。这个硬汉子没有一滴眼泪，就像当年返回家门看到烧成焦人的妻子和孩子仍然搂在一起时一样，没有滴下一滴眼泪。他的眼泪都是在心底里流的。脸上的肌肉被岁月的风霜吹得太粗糙了，经不住热泪的浇烫。去年，在大地流火的那个时刻，他还在山上打火，家里只留下老婆、孩子，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妻弟。等他们从梦中惊醒时也顾不得下地穿鞋，推开窗户腾地一下就跳出去。妻弟跑了，可是妻子却突然想起了孩子。她从窗外探身回来来到炕上去摸孩子。等她摸到孩子向外拉

时，大火扑过来，母子便活活地被烧死。老孙驱车赶回家里时，看见妻子拉着孩子的手，一个站在窗外一个站在窗里，尸体都没倒。那情景太凄惨了，让铁石之人也要心酸落泪。他收敛起妻儿的尸骨，又开车扑火去了。

一年来，他的心只有握着方向盘时才觉得平稳、沉静、踏实。行车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客观驱使他的目光永远只能盯住前方，朝着他奔去的方向看，其它的一切思虑都排空了。因此，他总不愿意离开汽车，离开那间狭窄的驾驶楼，不愿意给自己留下过多的空闲时间，因为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去想，去思念！他疼爱孩子，他常常看到那双稚嫩的小手向他伸过来，准备扑到他的怀里。可是，他到底没有拉住孩子的手，不幸地竟被妻子拉到那个世界里去了。

他在那个坟堆前久久地徘徊着，默默地踱着沉重的步子，踏得草梗下的碎石咚咚地响。他烧过几扎纸之后突然停下了脚步，然后慢慢地蹲下来，从怀中掏出一支胶皮熊猫和一把铁皮制的小手枪，俯身放到小坟头上。尔后，便是默默地、默默地伫立着。

薄暮中的雾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是什么表情，看不清……

二

大兴安岭在反思。

今年5月6日，大兴安岭地委和林管局确定为整个大兴安岭林区的反思日。全民的反思！整体的反思！

这天，各林场职工、家属、机关干部和中小學生都组织

起来，收看电视台播放“五·七”大火的实况录像，收听地区和各县、局领导在电视中发表的讲话，然后进行座谈。

大兴安岭人，为大兴安岭一方水土所养育的大兴安岭儿女们，看看有什么对不起大兴安岭的地方。

电视荧光屏上再现了去年大火纷飞、天地赤红的场面。火旋风鼓动着冲天烟柱，抛着流星似的火球，狰狞咆哮地扇动魔鬼的翅膀，飞速地把一片片森林，一栋栋房屋卷进火海里去，然后把它们摧毁，吞没。排山倒海，势如雷电！大火过后，地上立刻变成一片废墟！砖瓦烧成酥土，玻璃化成稀水，铝锅变成面团，水泥的电线柱子东倒西歪，外面的水泥一块块剥落下来，里面的钢筋烧得弯弯曲曲，像一条条乱爬乱窜的红蚯蚓。最可怜的还是大兴安岭的树木，一棵棵都变成了流泪的红蜡烛。

大火又燃起人们心头的痛楚、激愤和焦虑，激起人们局促不安的万千感触和万千思绪。历史的镜头再一次曝光，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在大火的炽烈强光下，所暴露出的许多过去未曾看到或未曾注意到的东西，社会内的和社会外的，心灵内的和心灵外的，意识内的和意识外的……

大自然是无情的，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惩罚也是威力无穷的，有谁违背了它的运行规律，它就会对谁举起无情的惩罚之手！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经过了扭曲人们灵魂的十年灾难之后，人们多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变化和个人的升迁荣辱上来，而对于大自然却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关注；错误地以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人际间的交换关系，不知道还有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因而，许多人只关心上级的

脸色，而不去关心大自然的脸色；只注意长官的脾气，而不注意大自然的脾气。

人们透过这场重大火灾，看到了我们制度上的弊端，工作上的失误，条例上的漏洞和思想上的陋习，在错位、越格的林火行为中看到了我们自己行为的错位和越格。

去年火灾后不久，我便去北京和平里访问已被撤职的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他是个学者，有着丰富的林学知识，当时虽然已赋闲在家，但却很豁达开朗。他很有远见地说：“这场火虽然烧去了很多林子，但也烧出了林业的希望！你看吧，自今而后国家才肯把钱花到护林防火上。过去，总是把钱口袋扎得紧紧的。我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向林区要木头，却不肯向森林进行像样规模的投资，不知道去抚育它，防护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把火也有它积极意义，它可能烧出我们林业的希望来，就像火中能够烧出一只新的凤凰来一样！”

这次我去大兴安岭前，没有再去看这位前副部长，但在大兴安岭林子里，却果然处处见到了这种新生的希望。

过去，国家给大兴安岭每年拨下的护林防火基金只有几百万元。拿它去修防火公路，只够修十几公里长，让蜗牛去爬行倒是足够了。拿这钱去建瞭望塔，建不了几座；买通讯设备器材，装备不了多远；购买灭火机械，购买不了几台，更不要说去添置灭火飞机了。因之，当山火来了时，绝大部分人还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桦树条子去抽打火。今年国家对大兴安岭下了大注，投资五千万元；林业部又从其它方面增拨了二千万元，一共是七千万元。阿木尔林业局一位干部说：“这一把火，把大兴安岭的防火工作向前推进了二十

年！”

在有林地面积达六十六万公顷的塔河林业局，组建了一支有点有面的、配备合理的扑火队伍，其中：基干灭火队一百一十人，快速灭火队四百一十人，普通灭火大队三千七百人，与驻军进行联防的有二千六百人。他们增添了电台三十四部，水上巡逻艇五艘，对话机二十六对，往复式水枪一百支；而且，对冬季集材、夏季很少使用的50型拖拉机进行改装，后边都给配上一个能装三吨水的水箱，经过试验，灭火能力极强！

在去年扑火中发生了重大威力的风力灭火机，虽然伊春老工人郭耀尊早在1981年就设计出来，1983年正式投产，可是到了火灾前才只生产出一千多台，有的还在陕西，扑火时现用飞机把它们运来。那时，在整个北四局里边只有几十台，现在每个局都增添一、二百台。去年，阿木尔林业局只有十台这玩艺儿，而绝大部分扑火队员不会使用，结果打火时发挥不了威力，只能把它摆在一旁用树条子去抽火。

修筑防火公路，是保护森林最重要的措施。有了路，既方便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而且一条公路又是一条防火隔离带，打火人员又可以公路为依托进行打火活动。因此，经济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修筑林中公路。据统计，全世界的林中公路平均每公顷为6—8米，联邦德国最高，一公顷竟有100多米。而在大兴安岭，平均每公顷只有1.1米。

现在国家已经下定了决心，决定在大兴安岭林区里大修防火公路，去年已经修筑了700多公里，今年计划再修270公里，合计为1,000多公里。此外，还要修建瞭望塔四十余座，加强通讯设备的建设，逐步形成森林防火灭火的信息通

讯、传输和指挥的有效系统。同时，还在着手改装运—7、运—8的大中型飞机和中型飞机，用作为森林航空化学灭火的主要飞机，逐步建立起空中优势。

每年的4月15日—6月初，为春季防火期；10至11月，为秋季防火期。我来到大兴安岭时，正赶上春季防火期。我发现，大兴安岭人已睁大了警惕的眼睛。他们把去年被大火烧红的眼睛对准了潜藏的火源，对准了可能引起林火行为的一切蛛丝马迹。不论是在瞭望塔上，在防火岗卡上，在防火日志上，都可看到那双瞪大的眼睛。

我在林中乘车行驶，常被岗卡将车拦住。他们过来仔细地检查我的入山证，还要毫不客气地搜查随身是否带了火柴、打火机、香烟等火源物。发现了便立即没收。

今年，大兴安岭地委和林管局的十五位主要领导干部，都下到各县、局里来，分片包干协助地方做好春防工作。我在几个地方都见到了这些地委干部，他们都已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一直要到防火期过才能回去。

三

树！树！树！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密密匝匝遍地丛生着树。这里是密林的山，密林的谷，连崖头和山褶，都是用树组成的世界。

我是从森林的东北边缘，沿着昔日淘金者之路走进林区的。这里过去虽然也经过了几次堵截林火的著名战斗，但是，火烧的痕迹已经留下的不多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掩盖住焦黑的伤疤，有些被火烧黑的枯树又复苏了，萌发出嫩绿的像猫耳朵大小的新叶。今年的雨水特别勤。一场接一场的春

雨，催生着转机，催生着萌发的力量，催生着绿色的希望。

可是越往里走，烧焦的迹象越是显眼，越是沉重，进而出现了一片片目不忍睹的凄惨景象——森林的墓地。有的林子就像经霜的衰草，东倒西歪，凋零破败；有的像一排排倒插在地上的烧火棍，焦黑的一片。在靠近公路的岗峦和谷地里，有的地方已经把树木像剃头似的给一抹而光了，露出了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像一个老年妇女，悲凉无助地袒露着皱皱巴巴的黑胸脯子，一任刚劲的风和荒冷的雨去吹打浇淋。

去年六、七月份，林业部组织了三十多人的专家综合考察组，对灾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测定过火面积占全部有林地面积的55.3%，其中受灾严重，将要造成死亡林带的地区约占43%左右。因此专家们提出建议，要赶快组织力量采伐烧死木，因为这些木材尚还可用，如果困在山里时间过长，不仅材质腐朽，而且会招来虫灾。

现在看来，去年的估测偏重了一些。今年，勤快的春雨帮了大兴安岭的忙，原来判定必死的枯木竟出人意料地复活了一些。在去冬今春抢伐的那些火烧木中，有许多留到今天必定会活的。

地区林管局在组织这场抢伐时，在提法上、规划上也有不少失当之处。专家综合考察组向国务院提出的《考察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大量烧死木需要清理利用。”但是林管局在组织抢伐工作时，误把“烧死木”改为“火烧木”，而且还专门组织了个“清理火烧木办公室”。不仅组织大兴安岭北麓四个受灾林业局抢伐抢运火烧木，而且还调动其它没有受灾的林业局去那里包采包伐，甚至许多与林业完全无关的部门也去承包，结果，许多过火林便被无情地砍伐一光。

了，看到那袒裸的丑陋的光秃地面，让人心疼！现在那些空地上连一棵母树都没有留下，哪有种籽实现天然更新呢？而且，日久还会出现沙化与沼泽化。

四

“人间大火最无情，
烈焰滚滚天地懵。
半生积蓄顷刻尽，
当日失火当日穷。”

这是去年火灾后我在漠河的一片烧焦的颓垣上，所见到的第一首不知是谁用粉笔题写的诗。

这里居民的生活都很富裕。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户都是万元户。富饶的大兴安岭，对于在这严酷条件下劳作的人们，给予了很高的酬劳。因之，当那场可怕的大火烧来时，多少人家的积蓄和全部家用电器的家当，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地上，流着的是金水、银水。

此后，大兴安岭人便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度过那艰辛的一年。

地处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北麓，是个高寒区。大火烧毁他们家园时，河里还漂着冰凌，林子深处还有没化的雪。夜里，有刺骨的寒风在等待着几万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是，大火无情人有情，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很快就有了家。去年，党和政府动员一切力量，专门组建了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指挥部，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和施工队伍，在入冬前的短短几个月里，就建成了五十万三千平方米的房屋，使70%的灾民搬进了新居，余下的也是两

户暂居在一套住宅里。今年开春之后，又开始了续建工程，准备再建三十九万平方米的房屋，使灾民都能住上比灾前更为宽敞方便的房子。

我走进几家住宅院子里，一栋栋红砖灰瓦的新房，好气魄呀！为了防冷，都采用了双墙和双窗结构。棚顶上铺设珍珠岩防寒层，地上铺着木制地板，室内装有煤火炉子、土暖气、手压水井、地窖，在院子前边还统一地给盖了一个种菜的大棚和装零用东西的小仓房。

政府给每户灾民发了一张圆桌、四个凳子、一个碗橱、二个皮箱，这被称作为四大件，此外，还有面板、擀面杖、菜墩、斧子、锯、锉、锹、镐等日用器具。

5月6日晚上，阿木尔第二小学六（一）中队的孩子们，坐在由废墟堆里新建起来的教学楼前，举行《党啊，亲爱的妈妈》中队会议。额木尔河上吹过来湿冷的晚风，拂摸着孩子们激动得涨红的脸。一年前，这些孩子跟随大人从火的陷阱里逃出来，焦黑的小手，焦黑的小脸，除了身上那身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连书本和红领巾都在火中烧了。学校也烧毁了，昔日摆放他们小课桌的地方变成了一堆瓦砾。他们失去了读书的地方。可是没过三个月的时光，一间间更明亮更可爱的教室建成了，里边的桌椅、黑板、教具都是新购买来的，都亮得发光，亮得照见了人影。孩子们爱惜这些新的课桌和椅子，有人竟带着扳子上学，见到有松动的螺丝就上前去给拧紧。今天，在大火发生一周年的晚上，他们面对着火一样鲜红的队旗，汇报他们向附近灾民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

“在我们调查的三百五十九户灾民中间，不仅都搬进了

新居，过上了正常生活，而且已有 81.6% 的户添了电视机，38.1% 的户添了录音机，31.7% 的户添了洗衣机，47.1% 的户添了缝纫机。灾民们同声地说出一句话：是党在关键时刻给我们送来了温暖，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党的恩情！”

一无所有的人们，又逐渐地富裕起来！

在大兴安岭这块土地上，既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大火灾，也出人意料地发生着大变化，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复建速度！

五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已成为历史，然而，这场山火的火行为特点并未全部被人们所揭示、所认识。这场大火灾留下了许多重大课题：火灾区的生态及其森林、植物、动物演替；土壤、永冻层、地下水、气候等在新环境中的变化；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论证等等，都有待于诸多学科、诸多门类的专家们研究，并应以其宝贵的成果以飨后人。”

这是塔河县县长、林业局长荆家良最近写出的一篇探讨林火行为的科学论文。他写的几篇对林火行为的科研文章《历史罕见的大兴安岭林火》《小根河火烧迹地考察报告》《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行为特点》，不仅在专业性的报刊杂志上一再地转载发表，而且还被邀请到全国林业历史研究会年会上做了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们的普遍重视。他最近还整理出一部《火场实况》的电视录像，里边有火旋风、火爆、飞火、对流柱、热流等特异林火现象的真实写照，据说在世界上也都很难得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荆家良是去年扑火时期远近闻名的打火英雄。军队里一个大胡子师长，地方上一个塔河县长，被人当作了传奇的人物到处传说着。有一次，大火凶猛地扑向铁道线，几百名职工眼看守不住时，忽然有人喊了一声：“荆家良来了！”人们立即重新振作起来，又像下山猛虎一般与烈火拚搏起来。从远处赶来的荆家良，奋不顾身地用喷灯点起迎面火，很快把林火给攻下了，守住了保卫塔河的一条生命线。在大火燃烧的二十八个夜与昼里，他跑了将近十万公里的路，磨坏了三个汽车轮胎，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好由别人代他传达命令。

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过去了，这个被称为降服火神爷的神话人物，在紧张繁忙的千头万绪工作之余，偏能挤出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对大兴安岭这场特大森林火灾依据丰富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升华。这个东北林业大学的毕业生，自有这种功底和志趣。

把火的惩罚，转化为火的教训，火的知识，人们开始正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国家计委、林业部和黑龙江省科委都已拿出很大一笔科研经费，进行控制特大林火能力的开发和研究。

我们对林火科学的研究，尚处在襁褓中，虽然在这方面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掏空了整整一块绿色的宝库。

荆家良不仅对林火行为进行探讨研究，而且对于林业经营管理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开拓性的试验。他提出的塔河林业局鹤形经营模式发展战略和大兴安岭东部林地木材江运的可行性分析，对于大兴安岭北麓林业的开发与改革，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

在去年灾后抢伐抢运火烧木过程中，为缓解铁路的运输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此，在去年11月3日，获得了黑龙江省林学会木材采运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科技成果技术鉴定证书》，并被选为省里的“科技精英”。

历史，是一个多角形筛孔的筛子，它能同时筛出不同类型的人物来作我们生活的代表。在那次特大森林火灾中，除了荆家良之外，人们都还记得他的邻县的几个领导人的名字，现在也都饱含浓郁兴趣想知道他们的近况。

人们不能不首先想起漠河县长兼林业局长高保兴来。这也是一位能人，尽管他在“五·七”大火中因为全县唯独保留了他家住的那栋房子而声名狼藉。在我临离开塔河去漠河的时候，荆家良还对我说：“高保兴在这次火灾中虽然负有责任，但他过去的工作做得一向不错。漠河林业局经营得很好，1986年还是万两黄金县。去年，黄金产量不仅大大下降，而且产出的黄金十有八成没有收购上来，都走私了。国家对于高保兴处理得是否重了一些？”

“可他是火头呀！因为他的管片失了火又没有打住，才烧了北三局一大片呀！”我说。

严格说，去年5月6日漠河着了两把火，他领人打的那场火，还真叫他打住了，是另外一场火没打住，遇上5月7日一阵大风把火烧进城里，又殃及了毗邻的几个城镇。他是一县之长，造成如此大祸，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更何况有拍马屁的人独独保留了他家那栋房子，因之怨声载道，人群中甚至发出“枪毙他，枪毙他”的呼声。

可是，时间却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它能使人淡忘一些情绪，也能叫人改变一些情绪。我在去漠河的一路上，听

到人们对于这位县长不但没有太多的怨恨之词，不少人竟然对他说了好话。

我一到漠河就想去拜访他，去年火灾后我曾见到过他：50多岁，面孔红润，说话利落响亮，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精明、干练，但却未免有些世故。这次我去找他竟然没有遇到，家里人说，去外地已有一个多星期了。

漠河的人今天完全用另一种口吻在议论他，说不上是褒贬、讽谕、不满，还是赞许、同情、羡慕：“上级撤了他的职，开除了党籍，人家作个平民百姓也是个大能人，倒腾买卖照样能够赚大钱，十个八个好小伙子赶不上！前些日子贩来一车皮啤酒，就赚几千块！”

陪我同去的一位县委干部对我说：“高保兴曾经非常感慨地对我说过：‘我在林区干了四十年，到大火灾前才积攒了一万零四百元，在大兴安岭林区连个中等户都算不上。今天当了老百姓，跑了几趟买卖，就赚了三四万元！’”

他现在倒真是无官一身轻了！

人哪，人！说到了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为官，为民，干什么都看你怎么去干！

在县招待所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争议纷纭的人物——原县委书记王招英。

去年失火时她在县里坐镇指挥，几次贻误战机，最后大火烧到家门时慌得哭出声来，并让电视台播出一个错误通令：不组织居民立即疏散，却让干部职工到西山集合准备打火，妇女老幼在家不准乱动。结果，有不少的人就在这不准乱动中丧失了生命。

她也受到了处分，降职去县建委当主任。听说，原来她

曾被提名为当十三大代表，并预备擢升到省里去作妇联副主任。这一把火，把她的宏图好运都烧掉了！

谁知道，老天会怎样摆布一个人的命运呢？

听地委宣传部长对我讲，去年9月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来大兴安岭采访火灾实况。他曾专门找王招英谈过话，并让人们介绍她在大火进城时处在什么位置，做了些什么事情？人们告诉他，在大火进城时她坐在县医院的救护车上用喇叭呼喊，让居民往西边小山根下的公路上撤，后来又去邮局、银行查看了一下通讯设备与报表账册的保管情况，去学校里检查了师生们撤离情况。她还冒火冲进一所部队大院，去察看弹药库是否能够守得住。大火稍稍过后，她便立即召开和主持了县委常委与科以上干部会议，号召人们要面对现实，做好救灾工作。当时，她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便有了清醒的认识，曾对人们不止一次地透露过心里的想法：做好了削职为民的思想准备。

索尔兹伯里听后很受感动，他爽直地说：“对于她的历史功过，我不想评论；你们的党和政府追究她什么责任，给她什么处分，我都不想过问；但根据她在大火进城后的所做所为，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也可以说是个英雄！”

一个人在那突然闪亮的强光面前，是会有各种得当的与不当的、上策的与失策的、明智的与不明智的、坚强的和脆弱的举止和闪念，是个凡人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她，一个由插队知青提拔到这个领导岗位不久的年轻女子，自然也不会例外。

人生是个多棱镜，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便能看出不同的形象来。生活是一部不断演进的电视系列片，什么时候都不能定格、定位地去看！

寻找储安平

五十年代，鼎鼎大名、曾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惨遭羞辱，自杀未遂。绝望后失踪了，传说他死了，但不见遗体。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有人在江苏省一座寺院碰到一方丈，形象酷似储安平，上去问讯，那人摇摇头消失了。亲爱的读者，你说笔者还要不要找下去呢？……

储安平哪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1966年。

怎么死的？

自杀。

这是社会上的普遍说法。

—

1985年夏末秋初，一位负责人要编辑《新观察》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念册。因为这本刊物是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组而创建的，而且据说这本

老《观察》在解放前影响非同寻常，以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被查封。

从这位负责人言谈中知道，储曾经作为《新观察》的特派记者，赴新疆进行过连续报道，这在《新观察》还是首例。特殊的背景，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贡献，找储安平——了解关于他生前的经历和死后的结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很荣幸，这次“外调”任务，交给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我。

到哪儿去找？储安平是哪个单位的？一概不知晓。

每张介绍信的开头，接待单位都是空白，内容却都准确：“了解储安平。”多亏储氏是不同凡响的名人，很快有人提供了线索——他曾是《光明日报》总编辑。

抓住这根稻草，我赶紧就上。

虎坊桥前门饭店的对面。我兴冲冲地走进那座米黄色大楼。但是，很快我又茫然地从那座楼里走出来。因为，我去访问的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储安平其人其事，知道的比我多不了多少。

“储安平与本报没有多大关系。”那人接过来我的介绍信说。

“他不是你们的总编辑吗？”

“是，是，不过——”

“怎么？”

“他只在这里呆了七十天，以后就不知道去向了！”

只有七十天？！这是怎样一个七十天呀？而他在这七十天里又是充当了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角色呀！

后来，有一大摞子落满灰尘的材料铺到我的面前，我翻

看那些材料，虽然都是历史往事，都已见诸报端，但却依然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那七十天，可不是寻常的七十天，而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玉石皆焚的七十天；而他，储安平，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走进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光明日报》，并当上了那里的总编辑的。有人说，他将和胡风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才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他就被人们彻底地遗忘了，连让他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舞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模样了。

从材料中我得知，储安平是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因为二三月份，毛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央研究决定，将原为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以常芝青为首的中共党组从《光明日报》撤出，由各民主党派协商推出一名民主人士充任总编辑。当然，这个协议也是征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的。

4月1日上午9时，这位新总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走马上任。章伯钧向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介绍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这句介绍实际等于没有介绍，因为储安平是个作家，而且颇有些名声，是尽人皆知的事。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位旧社会办《观察》出了名的老报人，今后打算怎样办《光明日报》，怎样带领大家办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张民主党派报纸。形式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路子该怎样走，大家都没有经验，都想听听总编辑的施政方针。

储安平很坦率地向大家亮出底牌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没有告诉大家，是胡乔木事前到了他家，请他出来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乔木同志知道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过往甚密，由他出面约专家教授撰稿，《光明日报》会办得更加有声有色。接着，他十分得意地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最后，他踌躇满志，稳操胜券似的向大家宣布说：“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这样，这位解放前在知识界中颇享盛名的总编辑，一上任就给一百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让他们为《光明日报》写些有见解、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来。他还计划请人来作主笔，为一些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等等……

他的这番热情饱满、大刀阔斧的行动和设想，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摆宴庆贺，费孝通先生说他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名记者子冈甚至还要写一篇《新总编辑上任记》。遗憾的是，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在几十天后都成了右派，这又从不同的侧面逆向地证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储安平这时更是全力以赴地扑到大鸣大放、鼓动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的工作上。用他当时的原话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于是，他便派

出了大批记者，到上海、武汉、南京等9大城市去找那些专家学者采访、座谈，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他唯恐人们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多，提得不尖锐，还指名道姓地提出几个他认为意见最多的人。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说：

“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但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如遇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储安平说：“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有的记者对他这番热情的话打了折扣，没有找那些最有意见的人，但绝大多数按照他的意见办了，而且还进一步做了发挥。例如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却开了三个，没布置他写通讯，他却写了三篇，而且字字尖锐辛辣，诸如什么“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等等。后来，这些记者一一地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这样，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发表了22块整版将近十三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最后，事情走向了高峰，也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达到顶点”。储安平在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已经接近尾声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毒草（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事情自然也就因此而走向其反面，储安平便由各民主党派公推出来的、受人青睞瞩目的总编辑，一下子变成了个大右派。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江苏组的会议上，许多代表揭发批判他是“江苏组

三个右派中最坏的一个”。人们认清了储安平的真面目，口诛笔伐的烈火遍及报社内外、全国各地，使得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悔恨交加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邮递员给他送信，在门口喊储安平的名字，他不敢出去接，怕邮递员当面同他辩论。到医院里看病不敢说是姓储。储氏姓寡，怕人一下子认出他是储安平来。最后，他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长达4000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几乎是用基督教的虔诚检查自己的罪恶说：“我今天在这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要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

6月8日下午2点，他向社长章伯钧提出了辞呈，不再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此，他的生命旅程由沸点降至冰点。

“从那以后怎么样了？”我在《光明日报》问那位中年人。

“以后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是民盟的人，你可到那里去问，他们也许知道。”

二

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找到了民盟中央，填好空白介绍信，急匆匆地走进院内。

还在路上时我便想，这回一定能够找到储安平的下落。因为，这里曾经是在“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指示下，在中央一级民主人士中仅存的5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仕炳、储安平的所在地。毛主席当年曾经指名地批评过它：“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我看到过的那一厚沓子揭发批评材料中，人们都说储安平是章罗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当初，就是章伯钧将他领到《光明日报》并推荐给编辑部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他在事前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并让他看过发言稿的，还有人说，他是罗隆基、张东荪的得意门生等等。

不问可知，有章罗的地方，也必定有储。

然而，向对方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截然相反。接待者一句话就把我挡住了：“储安平在我们这儿只是挂个名，他的活动都在九三学社，你去那里问问吧！”

这时我才想起，在看过的那些材料中有人揭发说：储安平在民盟中只是一般的成员，在九三学社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可他6月1日的发言稿没有向九三学社的任何人征求意见（主持会议的许德珩气哼哼地说：“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可却去到民盟那里交给罗隆基看。可见，他是有意违背九三学社的宗旨，有意躲避学社的监督的！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要一下子参加两个民主党派呢？

历史退回到北平刚见黎明曙光的时刻。各民主党派为了迎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而这时，又正是储安平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1946年4月，他断然拒绝了南京方面的“高级公务员荐委”，只身躲在上海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开始创办《观察》杂志。由于这份杂志都是由社会名流、民主进步人士撰稿，敢于

抨击国民党政局的昏暗腐败和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很得一部分知识界读者的喜爱，很快便由创刊时的四百份上升到几万份，到1948年底国民党查封时，已经发展到十万零五百份了。一个发行到十万份的杂志，在当时的出版界中，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刊物了。

12月21日《观察》被查封时，储安平正潜藏在北平忙着搜集材料，准备发回一些透视这场使中国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的平津战役的文章。他有幸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不幸的是，却连累到杂志社另外两位同事锒铛入狱。

北平解放后，他从藏身的北平府学胡同里走出来，一下子就搬进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专门到饭店里来看望他们。使他感到特别荣耀的是，周总理亲自走进他住的房间，饶有兴致地同他谈了话。

正是在这种得意的心情下，他才一改平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的素志，而且不参加则已，一参加就参加了两个。因为两个党派都争取他参加，两边都有他所尊重和交往密切的师友。他对朋友解释自己的这番举动说：“两边都请，不好意思拒绝，就两边都参加吧！”说话时，眉宇之间不无得意的神色。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际，中共就首先想到了《观察》的复刊之事。中共党内两位主管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乔木和胡绳，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总理。得到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果然，11月份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复刊后办了一年多的时间，《观察》杂志改组成为《新观察》，储安平离开杂志转到新华书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改任出

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他便常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到全国各地采访和视察，写回的系列报道不仅登载在《新观察》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转载。储安平的名字在一个时期里还是挺响亮的。

在此期间，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也确实是比较热心，因为主席许德珩是他尊敬的师长，其他如袁翰青、楼邦彦等也都是他多年交往、无话不谈的老友。他在九三学社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负责主编学社的机关报《社讯》。中共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归还民主党派主办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让他们各出一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代表九三学社出任社务委员的，便是储安平。

这样看来，储安平确定是九三学社的人。

三

在北京西四颁赏胡同，我找到了九三学社，见到了一位有关负责人。

“自从打成右派之后，他便一直挂在我们这里，直到自杀时为止。”那位有关负责人对我说。

“他自杀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准确的下落。

“自杀过，但没有死，他被人救上来了。”

“那么说，他没有死？”

“不——”

“死了？”

“不——”

“那么，到底是死，是活？”

“怎么说呢？他被打成右派后，就回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每月发给他100元的生活费，没让他干重体力活，没让他按时画卵，也没训斥他。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开头两年里随着机关下放人员一起到西山农场里放过羊，干过一点零活儿。回来后他便一直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就是他那房子，也还是学社帮助他从街道上讨还回来的。”

“他的家在哪儿？”

“厂桥棉花胡同，他一直住在那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日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为了遣散闲暇，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只羊。红卫兵走上街头时，他被横扫出去，作为专政对象，让他拿扫帚打扫街道……。”

1966年深秋的一天，储安平扔下象征扫街的扫帚，不远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想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当时已是深夜11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当晚栖身。重返人间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检讨书，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儿？”最后要求把一些银行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结果是——“不行。”

于是他消失了，在10月份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回家来看他时，家里的东西被抄得乱成一团，在房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那是他从九三学社刚背回来的。女儿找不到他，便汇报到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汇报给中央文革，也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指定公安机关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组，叫他们一定要把储安平找到。调查组足足找了两年，荒山野岭，

河湖港汊，这么说吧，凡是有人迹到过的地方和人迹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

两年之后，调查组做了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康生看到后极为不满地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能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样一个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人寰中消失了，杳无踪迹，犹如一丝清风，一缕荒烟？……

“以后，他家里人再没有到这儿来找过他？”我一片痴心一片茫然地问。

“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来过，要他的银行存折。”

“他们有没有就他的问题，请你们找上级部门，要求重作结论和解决？”

“没有，这儿多年没人来为储安平说过话。”

“你们有没有为储安平问题的解决，做过努力？”

“当然没有。”

“如果连储安平都平反了，不就证明1957年反右搞错了吗？”对方非常不满地反问。

“《新观察》正在编辑创刊35周年纪念册，储安平作为本刊前身《观察》的主编，《新观察》第一位特邀特派记者，你以为可以在纪念册中提到他一笔吗？”

“当然不行。”对方态度十分明确。

我终于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了。

后来，在那本装帧精美的35周年纪念册上，果然没有任

何笔墨光顾到储安平身上。

时光荏苒，一转眼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了。

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颇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询：“请问，您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

我闻之，即发异想。

储安平消失已经二十多年了，公安机关为此事专门组成了个调查组，一访就是两年，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点点线索。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可是，有人听说后立即驳斥了我的论断，说：“储安平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决无这个本事隐遁二十多年，不等他做什么修炼，早就饿死了！”

可是也有人说：“也不一定！他虽然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但既已出家，便自然习惯于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山菜野果，清泉甘露，也可充饥。更何况，他早有过超脱的悟性和淡泊尘俗的念头。”

我记起1957年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揭发材料：6月8日，储安平到社长章伯钧那里递送辞呈。

章伯钧问：“你的负担重不重？”

储安平答：“不重。”

章伯钧：“有以下几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我没有。”

章伯钧：“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他真的在深山古庙里皈依佛门，修身养性，以超脱物质束缚的悟性去研究、思索人生哲理、天地玄黄和佛门的种种禅宗法事吗？

这可能？

这不可能？

……可江苏的山不只一二，该在哪座峰？

山中庙宇比比皆是，又是哪座佛门呢？

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

（本文系与王逸馥合写）

风云十载 两世情谊

“我同南老是世交，在我们之间维系着两代人的情谊。西安事变时候我年纪还小，在中学里读书，对当时的情景不大清楚，都是后来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他详细地对我讲的……”笔者见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同他谈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国后第一任行长南汉宸时，他这样饱含深情地开始自己的叙述。

“我是1938年，西安事变后第二年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一年之后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王明，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想学习。学了一年，《资本论》还没读到，《联共党史》也没学完。王明听了说：‘好吧，那你就再去学习吧！’于是我又进了抗大，在那里又学了八个月。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南汉宸到了延安，在中央统战部里当副部长。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跑过去看他。统战部在杨家岭后坡，离抗大很远，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经常去看他。他们高干吃小灶，来了人还可以加一份客饭，我便可以常在那里改善一下生活。

“1940年冬，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农村调查》，1941年

初毛主席又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这时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抗大发了调研提纲，让学员们调查和编写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纪实。当时在抗大里学习的就有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弟，我是抗大第二班的，张学思也在我们班里。记得一班学员徐海东将军一天开玩笑地说：‘嗨，张、杨都来了！’学校当时分配给我的题目，就是编写《杨虎城将军纪实》。我对父亲的事迹不很清楚，于是便去找南汉宸。那时统战部的工作也不忙，他便半天半天地给我讲父亲的经历，讲他与父亲的结识、交往和深厚的友情，讲他们几次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合作，特别是西安事变的那次合作。我便根据南部长的讲述，编写了七、八千字的《杨虎城将军纪实》。交上去之后还受到了学校的表扬，说我写得很详实。实际上，都是南部长的功绩，是他一桩桩一件件说给我听的。可惜我的那份调查报告没留底稿，不然现在拿出来看看，更有意思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与南老可以说是情深谊厚的，历经风雨狂澜，始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正直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同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为革命大业可以捐弃一切私己之念的一斑。

“我父亲同南老早在二十年代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就已彼此知名，只是没有见过面。那时，他们都在靖国军里奔走和实战。直到1927年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兵进陕，帮助父亲解了西安之围后，他们两人才见了面……”

笔者约略地记叙了杨拯民同志涵概深广而又生动有趣的讲述。

那时，杨虎城是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为了配合广州方面的北伐形势，他率领五千子弟孤守西安城长达六个月之久，成为民国史上著名的守城名将。南汉宸当时是国民军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在五原誓师后，随同冯玉祥的部队由甘入陕，赶跑了北洋军阀刘镇华，解了西安的围。两人见面畅谈起来好不投机，就像久别多年的亲兄弟似的，唯恨相见之太晚。

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竟被接连不断的几次反革命勾结给葬送了：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接着便是汪蒋合流、冯蒋合流，他们都在自己控制的地方进行清党活动，使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天低暗，雾迷濛，革命征途歧路纷纭。杨虎城这时困于惑谷，苦闷徬徨。他不愿意再追随冯玉祥，但也不愿意附蒋。因为不知该何去何从，便从陇海路正面战场上退下，撤到皖北太和县境内休整东征中创伤严重的军队。

正当他处于“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之际，突然有一天传令兵进来报告说：南汉宸来了。这消息如同酷暑之中的一股凉风。原来这时南汉宸正在国民军联军东路军里任政治部长，冯玉祥很怕杨虎城离开他去附蒋，知道南汉宸和杨虎城私交深厚，就委托南作为他的代表以劳军为名，去挽留杨虎城。但实际上南汉宸是另有所谋，有党的任务在身。

杨虎城一见到南汉宸，就倾述了多日郁积在胸的苦闷。两位老朋友剖肝沥胆，竭诚相见。杨虎城明确地表示：“希望能作第二个贺龙！”愿意将带领的国民党第十路军逐渐改

编成工农革命军，由共产党来领导，启用一批共产党员来改造这支旧式军队。他自己也表示要参加共产党，希望南汉宸能作他的入党介绍人。

南汉宸心里非常地高兴：一则喜革命增添了这样一股雄厚力量；二则喜老朋友思想上有了这样的进步。他的多年革命生涯，主要在旧军队里活动，把那些有正义感的军人争取到革命路上来，至少是将他们团结到革命力量这方面来。因此他听到杨虎城的这些话，由衷地高兴。

然而，当他回去把这些情况向河南省委汇报时，得到的却是绝然相反的答复。那时八七会议刚刚开过，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推行的是一套关门主义、盲动主义的极左路线。他们要求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纯粹又纯粹。因此，对像杨虎城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便认为是不可靠的，不能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同时，他们却要求对第十路军进行改造，以其为依托组织皖北暴动。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河南省委于1927年10月做出决定，任命南汉宸为皖北特委书记，带一批共产党员到十军那里去，发动群众，着手筹备起义之事。

1927年冬，南汉宸等一行十数人到了太和县，见到了第十路军总司令杨虎城。杨虎城非常高兴，虽然明明知道他们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但却都委以重任。按照杨虎城的构想：先在军队里培养出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作为骨干，然后依靠这批力量逐渐地改造这支军队。于是，他便任命南汉宸为第十路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从十军中抽出四百多名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到军校里受训。学校里的一切课程和任课教师都由南汉宸自主安排。南汉宸很同意杨虎城这个想法；于是便

聘请了大批共产党员作教官和政治指导员，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精神等课程，并且，在这批学员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很快就有一百多人入党，还组建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民运工作队等各种组织。

在民运工作队中有一个人要特别提出的，就是谢葆真同志。她是十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中共地下党员，在这段时间内便直接归皖北特委领导。特委以十军中的党员为骨干，组织人力到太和、亳县等地的广大农村里去发动群众，已经先后进行了几次抗捐抗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谢葆真参加了民运工作队，负责妇运方面的工作。由于工作上的接触，她同杨虎城之间产生了感情。谢葆真向组织上做了汇报。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南汉宸专门组织特委开了一次会讨论这个问题。南汉宸深知杨虎城的为人，虽然没有被批准吸收到党内来，但是从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耿耿忠心于革命事业，现在又积极地与我党配合，进行着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合作，他在关键时刻是决不会出卖革命，出卖朋友的，因此南汉宸提请特委批准杨、谢这桩婚事。

在举行婚礼那天，南汉宸和在十军里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都出席了仪式。席间有人问杨虎城，为什么爱上了个子不高并非花容月貌的谢葆真。杨虎城笑着望了望大家，坦率地说：“我知道她的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她，当然罗，也很爱她。结了婚之后，她可以帮助我！”

南汉宸带头鼓掌，既表示欢迎，又表示祝贺，高兴地举起了杯子为他们祝酒，说：“祝愿你们鼓瑟相助，百年和谐，同舟共济，白头到老！”几句话说得深涵厚蕴，意味深长，人们不住地点头，都会心地笑了。

婚后，谢葆真照常做她的妇运工作。她对南汉宸是很敬重的，常到他那里去请示和汇报，让南汉宸帮助她出主意想点子。杨虎城对此毫不介意，看见也只作没看见。有时党内开会，为了便于保密，谢葆真也常建议到她的房间里开，杨虎城每次看见了，也佯装毫无察觉，笑着连忙避开，说：“你们谈！你们谈！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由于皖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得轰轰烈烈，很快，蒋介石那里就闻到了风声。他怕十军被共产党赤化了，便找来反共大同盟成员、原来也在西北军里混过事的韩振声，派他携两万元巨款去皖北劳军，一则劝说杨虎城离冯归蒋，另一则就是让他立即动手清除部队里的共产党员。

特委知道消息后，想出了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想把韩振声引开不让他到十路军里来。于是南汉宸就与杨虎城商量，让他以休养为名暂时驻扎到亳县去。韩振声是扑奔杨虎城来的，果然一到皖北就直奔亳县去了。杨虎城在那里接见了，想一直把他缠在那里。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韩振声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的嗅觉灵敏，对于十军里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他指名道姓地点出了南汉宸，让杨虎城下令逮捕，将他押送到南京去邀功请赏。而且示意杨虎城，只要他忠于南京方面，今后的升官晋爵是不成问题的，军队改编所需的经费也会从优补发。杨虎城是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硬汉子，他丝毫不为韩振声的那些话所动，柔中有刚地对韩说：“你我和汉宸都是老朋友，你同他的关系比我还早，既是山西的同乡，又一同去过苏联，关系不能说是不厚。现在，政见上虽然有了分歧，但朋友总归是朋友。一个‘义’字，是千古不移的！我想你韩老兄，也不会干出那卖友

求荣的事吧？”

几句话，说得韩振声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在美味筵席上吞了一个朝天椒小辣子，当着主人的面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但他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反革命，不见杨虎城有清党和对南京方面效忠的意思，就硬是赖在皖北不走。南汉宸很了解韩振声这个人，为了不使杨虎城夹在其中为难，便同特委几个同志商量，决定与一些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暂时从十军里撤出。

从杨的本意来说，他是支持农民武装起义的，他也想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工农革命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几次提出入党都遭到了拒绝，心里边也就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想法。无论怎么说，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以一个党外人士身份拉起十军去参加皖北暴动。况且，他对当时的形势看得清楚，现在举行暴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当时驻扎在皖北的军阀队伍很多，地方豪绅势力也很嚣张。从主观上讲，十军内部的中下级年轻军官还没有培训出来，上层军官思想都很保守，决不会同意参加暴动的。他把自己的想法几次同南汉宸说，南也十分为难。一方面，他不能发展杨虎城入党，因而与杨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难处；另一方面，他对举行暴动的条件也感到不够成熟。但是，他作为一个下级党组织的成员，对于上级党委的决议又不能不坚决地执行。在此情况下，他再次找到了杨虎城，同他一起商量将韩振声引走的办法。杨虎城思忖了半天，最后果断地对南说：“为了不影响暴动的及时进行，现在看来只有一条道好走了，我陪同韩振声一块去南京，他不是让我投靠蒋介石吗？我就假作依他所言，马上进京与军政部门商谈队伍改编事宜。韩振声看到他来此

的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跟着我走了！”

南汉宸沉吟了一阵后，说：“看来，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不过，你去南京虎狼之穴，担的风险可不小呀！”

“要干事业，总是会有风险的。怕风险，就什么事也别干了！再说，我是去归附他老蒋的，官不打送礼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杨虎城说。

两位老友就此说定。为了引走恶狼，杨虎城于1928年2月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家，同韩振声一起同奔南京。

杨虎城到了南京，并没有真地奔走于那些军政部门，也没有去拜会党国要人，他把一只恶狼引走了，心底里就已经平静了。因此，每天只在鸡鸣寺、普陀山、杭州西湖和苏州园林等风景名胜之处闲逛，偶而也去听听梵语佛经，真如古人所说“意在山水之间也”。

有天，他正在莫愁湖边走动，忽有人送来家中拍来的急电，得知皖北暴动已经失败，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于两军交战之中，余下的已由南汉宸带领返回河南去了。一腔热血的杨虎城，这时禁不住潸然地流下滚烫的热泪来。

二

1930年初夏，早已合流了的蒋与冯又分手了，非但分手，而且重新操戈，发生了震动南京朝廷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都派人去游说杨虎城，让这支半独立的队伍归附于己，甚至连小军阀唐生智，也几次发电报和派人来过，这其间的封官许愿、馈赠银两的事，更无法一一述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又迎来了老朋友南汉宸。杨虎城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莫非，你南汉宸也是来

作说客的？”想不到，南汉宸真的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正是，我就是为这个目的被派遣来的！”

杨虎城听后一阵愕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原来，南汉宸这次来是奉了鹿钟麟之命，替冯玉祥作说客来的。自那次皖北暴动失败之后，南汉宸因无处栖身，便又回到鹿钟麟部队。中原战争爆发，鹿钟麟知道他与杨虎城关系深厚，再次让他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去劝说杨虎城。

两位老友携手走进密室之后，南汉宸对他纵横捭阖地分析了当前局势，说：

“现在虽有阎、冯的联合，外加桂系军阀的暗中支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也说要予以配合，但这都是些极其松散的联盟，各怀鬼胎，貌合神离，一遇到挫折便会顷刻瓦解，绝对成不了气候。纵观今日之中国，哪个军阀也敌不过老蒋的，用你们陕西人的话说，都缠不住他的。能够缠得住他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当今之计，你切切不可归附于阎、冯任何一家，相反，倒是可以利用他们混战的机会，拥兵于宛、洛之间，一旦形势有利，便兵叩潼关，进军西安。我们一旦拥有了陕西这块地盘，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割据一方，不断地扩大革命力量。不管他蒋介石，还是冯玉祥、阎锡山，谁也莫奈我何！”

杨虎城听得入了神，情绪高昂，不断点头称是，说：“跟我的想法一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况且，我们的军队都是陕西的子弟，回到陕西正是如鱼得水，占尽了地利人和的优势。”杨虎城用拳头捶了两下南汉宸的胸脯，说：“你可真行！看得高，谋得远，让人听了心悦诚服。今后，能有老弟在我身旁助我一臂之力，何愁大业之不成？”

1930年9月，张学良带兵进关，公开表态支持蒋介石一方。这样战局立刻明朗，阎、冯之败已成定局。杨虎城乘机沿陇海路西进，追击冯玉祥所属的宋哲元部队到了陕县，离潼关只有百十里路。蒋介石知道这时极需借用这支劲旅，便立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一面嘉奖他的战绩，一面嘱托他当下即可着手筹建陕西省政府班子。接电后，杨虎城命令南汉宸，马上随同先头部队入关进陕。

10月上旬，南汉宸随同先头部队攻克潼关。捷报一传出，蒋介石就拍来电报，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委托南汉宸具体着手筹组省政府事宜，并任命南为秘书长。几天之后，他们就将宋哲元部队赶跑，占领了西安。蒋介石见局势已定，不好收回成命，于是在10月24日正式做出决议，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虽然也清楚南汉宸的政治倾向，但碍于杨虎城的荐举，在此亟需依靠这股劲旅清除冯玉祥残余势力之际，对南的任命也只好默认了。

历史，就这样掀开了杨、南开明治陕的一页。

杨虎城对于南汉宸是言听计从，委以全权处理陕西政务的权力，可以代杨签署省政府的一切文件。所以，当时陕西的报刊上曾有人写文章说：“陕西是秘书长专政”。据杨拯民回忆，那时每天早起一开门，第一个进来的是杨的私人医生，为他检查一下身体；第二个进来的是私人秘书，送上公文信件等物；第三个人便是穿着笔挺西装的南汉宸，商量亟需办理的要务，一直到10点钟吃早饭时为止。

南汉宸辅助杨虎城在陕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学运赶跑了反动的教育厅长李范一。李范一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人，他撤换过一大批思想进步的教育工作者，还向国民党省党部

提出了一百余人的黑名单,要求把这些人逮捕法办。南汉宸到任后便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了一场驱逐李范一的运动。李范一偷偷地溜回了南京后,南汉宸乘势推荐了进步人士李百龄任教育厅长,在文化教育方面开了禁令,实行了学术自由的方针,使陕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内文教昌明、思想活跃的一个地区,马列主义著作可以公开阅读,进步言论可以自由传播。南汉宸又以潼关行营名义办了个《西北文化日报》,任命地下党员宋绮云(后同杨虎城一起被害于重庆白公馆里)为社长兼总编辑。接着又创办了两家私营报纸《新秦日报》和《民意报》,也都由进步人士主持笔政。因此一段时间里,西安的舆论界很活跃。

南汉宸还有一桩特殊政绩,是别人绝对办不到的。他一入陕,就以秘书长的身份和杨虎城授予他的权力,释放了一大批关押在西安监狱中的政治犯,其中有一些是在我党内担负重要职务的地下党员,如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

有一天,他突然接到谢葆真传递过来的消息,说十七路军骑兵旅苏雨生那里抓了个陕北苏区的人,已押送到西安监狱里来了。南汉宸听到消息后,立即以视察监狱为名到里面去看虚实,待他走到犯人跟前一看,大吃了一惊,原来被捕的人竟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他只作不认识,什么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后经查实才知道,原来刘志丹在陕北搞武装斗争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他被逼南下,把队伍拉到靠近关中的朝邑、彬县一带。在势孤力单的情况下被苏雨生的部队包围,他们把刘志丹等几个领导人抓了起来。

南汉宸虽然已经掌握了确实情报,但要释放像刘志丹这

样名声很大的苏区领导人，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他知道，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先征得杨虎城同意。为了说服杨虎城，南汉宸专门请来了杨虎城陕北时期的老友、陕西著名教育家、刘志丹的老师杜斌丞先生来，一起向杨讲述了刘志丹的为人，和通过他与陕北方面取得秘密配合的重要性。把杨虎城说通了，便采取了先转移，后隐蔽释放的办法。

后来，陕北苏区的另一个创始人谢子长秘密来西安时，南汉宸又征得杨虎城的同意，赠送给他们大量的武器弹药。

正当杨、南在西安有声有色地推行开明政治之时，突然南京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来了。谁都知道戴季陶是蒋介石的亲信，有名的反共专家，来者不善。戴一来到西安，便提出要给学生训话。杨虎城很作难，便把南汉宸找来秘密商量应付的办法。

南汉宸仔细想了想，说：“他是中央派来的大员，他要给学生训话，你不让他讲不好。他若是自己不识好歹，非要自己惹出事来，让学生们教训教训他也好，对南京那些只知道卖国不知道抗日的人，也该给点颜色看看！”

杨虎城想了想，觉得南的话也有道理，于是说：“不过，他是党国要人，事情不能闹大了，还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好，否则不好交待！”

南汉宸向杨笑了笑，说：“这个你只管放心，我会掌握火候的！”

于是，这位考试院长真地登上了讲坛为西安五千余名学生训话了。他攻击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受到共产党煽动，有违总裁的治国方针，越讲越凶相毕露，结果引起公愤。台下起了一片“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声，接着石头瓦块便纷

纷掷过来……南汉宸赶去“解围”，戴季陶不见了。他问身旁的学生，有人告诉他说，已从后门溜进后小院里去了。南汉宸走进后小院里，只见戴季陶已吓得魂不附体，躲在一角，浑身缩成一团。他一把拉住了南汉宸，如同见了救命恩人，又是作揖又是打恭地说：“南秘书长，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南汉宸见他那个样子，脸上不露任何表情地说：“戴院长受惊了，请跟我走吧！”戴季陶有些迟疑，又别无它法，只好硬着头皮哆哆嗦嗦地走出去。

戴季陶在西安吃了苦头，回到南京便向蒋介石告了一个恶状。蒋介石对于西安的事也早有所闻，对于杨虎城这个异己力量也早就不放心，现在又加上个红色秘书长更是十分危险了。于是，他便派他的“最高幕僚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去陕。

陈立夫到西安后，单独会见了杨虎城。杨虎城知道陈立夫的用意，便一再为南汉宸解脱，陈立夫知道与杨虎城谈不拢，便单独找南面谈。

结果，陈立夫又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闷了一肚子火气返回南京。他向蒋介石汇报说：“南汉宸是个共产党毫无疑问，现在就应下命令让杨虎城把他逮捕起来！”蒋介石笑了笑，说：“你想杨虎城会逮捕他吗？”蒋介石看得清楚，杨虎城是不会逮捕南汉宸的，于是他便又派胡逸民到了西安。胡逸民不再转弯抹角，一见南汉宸的面，就掏出蒋介石亲自签署的两份公函：一份是委任南汉宸为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份是对他的通缉令。胡逸民皮笑肉不笑地望着南汉宸，然后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汉宸兄，都想好了吧？何去何从，就请你自便了！不过——时机可不容错过呀！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呀！

南汉宸鄙视地望了望胡逸民，然后，毫不犹豫地伸手取过了那张通缉令，冷冷地说：“我想好了，就走这条道吧。你可以通知杨虎城把我抓起来吧！”说过，转身就走了。

杨虎城已经等候在门外，他知道这一见面凶多吉少，两天之后，他派人把南汉宸请来说：“看起来，我们这第二次合作又将结束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形势的变化是半点不由人呀，我们现在只好分手了！你不肯去南京为官，极又不肯把你逮捕起来，剩下的只有一条道了：把你护送出去，到外面暂时回避回避！”“可是，那要连累到你呀！”南汉宸心情沉重地说。

“经过这多年的考验，我们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了。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呢？你去到外面所需一切费用，我都会想法派人给你送去，你只管安心地避他一段时间吧！但愿，我们还能有第三次合作的机会！”两位老朋友热血衷肠，再次心情沉重，久久地握着双手告别了。

当天，便有宪兵营护送南汉宸及其家属急奔潼关，然后由潼关上火车到了天津，由天津乘船去了日本。

杨虎城放走南汉宸，使蒋介石、陈立夫、胡逸民等大为恼火。不久，便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以突然袭击方式通过一项决议：撤销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这项举动使全国上下都感到惊愕。因为按照惯例撤换一个封疆大吏，总要经过一番辗转周折，先是授意或暗示当事人让他自己提出辞呈，然后上边还要作一套官样文章，表示慰藉和挽留，后经一再坚辞，才算“勉允所请，予以照准”。这一次，连这套官样文章都不做了，可见蒋介石恼怒之深，对杨虎城不满

和不放心到了什么程度！

三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1936年12月25日下午5时30分，亲自抓获蒋介石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又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临登机前，他用铅笔匆忙地疾书了一道手令：“着杨虎城将军代吾执行一切职务”。

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占有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现在他突然离去了，军内立即发生了混乱，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中下级军官要求向南京开战，救出他们的统帅；高级将领认为应当遵照与中共三方面已达成的协议和平解决，于是内部发生了分裂。

就在这风雨如晦之际，一天早晨，谢葆真笑眯眯地引进一个人来，杨虎城一见几乎当成是神经过度紧张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揉了揉眼睛再细看了一下，终于忍不住乐得高喊：“汉宸，真是你来了？这可是雪里送炭、嫂溺援之以手呀！”谢葆真听了嗔怪地说：“看你胡乱地比喻些什么呀？”杨虎城哑了哑味道，也觉得失了言，不禁笑道：“我是高兴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不过也没差了辈儿，那就改成兄溺援之以手吧！”

原来早在12月16日，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之约到达西安之后的第二天，周副主席与杨虎城单独会谈时杨便提出：能否把南汉宸调来帮助他处理一些内部事务。周副主席慨然应允。南汉宸一回来，关中很多人士都感到慰藉，人们互相传告着：

“秘书长回来了！”

一天，他正在杨虎城处商量处理善后各种事宜，忽然有60多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闯进办公室来。为首的便是号称“西安事变三剑客”的李铭九、苗剑秋和应德田（他们都是双十二那天亲身带兵抓蒋介石的人）。他们一进屋便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地向杨请愿说：“蒋介石背信弃义，我们现在别无所求，只求杨主任率领我们出兵潼关解救少帅，我们死而无怨！”他们说便将联名的请愿书递上来，有人竟然跪下。这种场面固然使人感动，但是杨、南却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这些年轻军官都是血勇盛、识料浅，对杨虎城，特别是对南汉宸甚至声言要进行血的恫吓，用枪逼着他们开战。

一天傍晚。南汉宸正在新城大楼里面办公，谢葆真突然满面愁云、惶惑不安地走进来说：“你今天不要回止园去了！”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南汉宸问道。止园是杨虎城的公馆，南汉宸来到西安后，杨虎城夫妇就让他住在那里。

“他们要杀你！”谢葆真低声说，“有人看见名单上有你的名字。”

对此，南汉宸早已估计到了，所以他笑着宽慰谢葆真说：“没有关系，我不怕。”

“你何必一定要回止园？就住在新城吧，我告诉他们给你安排住房。”谢葆真劝道。

南汉宸考虑：新城是杨虎城总部，戒备森严，住在这里自然比较安全。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住在止园，他若不回去，夜间周副主席和其他同志以及四面八方的朋友有急事要找他，就不方便了。再说，他如果听到风声就躲开了，在人们的心

目中便会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于是他坚持说：

“不行，我还是要回止园！”

谢葆真见状说：“那么，我就去告诉虎城，让他多派些宪兵跟着你。”

“那更使不得了！”南汉宸劝阻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虎城的事情太多，你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了！”

谢葆真走后，南汉宸继续埋头批阅公文，直到深夜才离开新城返回止园住所。他躺在床上刚睡着，便听到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他警惕地立即跳下了床，没有开灯，在黑暗中问道：“谁？”

“汉宸，是我。”

南汉宸听出是杨虎城的声音，这才放心，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还不休息？”

“睡不着，也顾不上睡呀！”杨虎城说，他脸上的气色不大好，在灯光下显得特别苍白，眼窝深陷进去，眼角布满了血丝：“汉宸呀，形势是越来越恶化了，我真感到回天无力呀！东北军的主战派态度顽固强硬，可是他们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不仅是东北军里，西北军里也有。”

“虎城，你不要过于焦急，我马上就去找周副主席，求他给指出明路！”说过，他回身便穿好衣服，匆匆地赶往中共代表团住所。

周副主席听完，认为情势严重，便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先告诉虎城，让他在这关键时刻一定要沉住气，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稳住军心，千万莫要在内部发生裂变，那就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了。”

南汉宸回去后，立即到新城找到了杨虎城，传达了周副

主席的意见，并且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的，不但顾全大局，也不会丢开朋友于不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但鉴于当前的形势，东北军主战派的激愤情绪，还有十七路军里边一些人的支持，如果最高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要打，周副主席说我们在保留自己主张前提下，也会配合你们作战的，而且会开进主要战场。”

杨虎城感动地说：“为了开创一个抗战局面，把十七路军这个乱摊子纵然摔掉了，也摔得响，摔得值！”

杨虎城当下就给宪兵营传下命令，让他们把东北军几位主和派高级将领妥善的保护起来。后来何柱国为了感谢杨虎城的竭诚相助，赠杨一块银盾，上面刻着“恩同再造”四字。

会议于1937年1月31日晚举行，由杨虎城主持。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但在周、南、杨的调停下，结果，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

列席会议的东北军主战派军官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看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全体成员一致主和，心中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安事变，最后终于通过和平的办法解决了。

杨虎城将军为此做出了重大的牺牲。5月下旬，他离开西安去上海，准备出洋去国外考察。临走之前，他请求周恩来和南汉宸来西安再见上一面。南汉宸随同周副主席届时来到西安，畅谈之后，于5月27日赶到机场为他送行。

临行前，他当着周副主席和南汉宸的面，对十七路军的

几位将领孙蔚如、赵寿山等人说：

“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捉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靠你们了！”他的面部表情深沉凝重，停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部队的处境，北部是朋友，南部是冤家，北部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

飞机就要起飞了，人群里发出激动的“嗡嗡”声。南汉宸赶上一步与杨虎城紧紧握手。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就像预感到什么似的，他望着老朋友略带倦容的眼睛，一阵伤感袭上心头。他们之间的第三次合作，不，也许是最后的一次合作，就将在这一刹那之间握手告别了。

后来的一切，都证实了他的预感。历史留下来的，关于一个正直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三次真诚合作的永恒的记忆。

杨拯民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二弟拯中和妹妹拯贵随父亲被害于重庆渣滓洞里。还有一个小弟弟拯仁，早在西安事变那年就已病逝。另外5个姊妹拯坤、拯美、拯英、拯汉、拯陆现仍健在。

杨拯民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做过米脂县委统战部长、米脂市委书记、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曾任玉门油矿矿务局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农机部副部长等职务。

不论是在延安时候，还是在解放以后，他与南老一直过

往甚厚，一有方便机会就去南老家，听南老一节一节地给他讲述革命历史，讲述他与父亲的一生友好，三次合作的经过，当然也谈论着当前的革命形势。1953年斯大林死后，他有一次对拯民说，现在可以对你说了，七七抗战爆发之后，你父亲原是打算途经苏联回国抗战的，但是苏联就是不发签证，在巴黎等了好久，最后没有法子才转道香港，结果被国民党特务给控制了。如果苏联当时政策对头，你父亲是不会死的。

南汉宸也经常带着拯民去看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北平解放后不久，一次拯民由西北来北京看他，一进家门他就说：“走，我带你去看冯钦哉去！”冯是杨虎城部下的一个师长，当时正在家里赋闲。南老也常带他去看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总之，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感情、很念旧的一个人。

杨拯民每次去到南老家，南老都要用他们家乡山西的刀削面、苦垒或者是陕西的羊肉泡馍来招待他。这种深厚的两代人的革命情谊，一直保持到文革期间南汉宸被迫害致死时。如果从1927年杨、南在西安初次结识算起，他们两家的友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半个世纪的革命风云，两世的深厚革命情谊，堪称革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位伟大作家曾经说过：“民族也好，个人也好，他们的效能应该得之于伟大的情操。”杨、南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应该说得之于他们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得之于光明磊落的伟大的情操。

（此文系与韩小葱合写）

又见莫斯科，又见喀秋莎

又见到了她，又见到了莫斯科！

我的心脏止不住激烈地跳动起来，嘭嘭的响声连自己都能听到。已经阔别三十多年了，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到她。虽然早已记不清她的面庞了，但是她的影子不管什么时候从未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因为那是我生命之旅的开头，我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所产生的种种认识，都是在她的身边形成的。莫斯科，不管她以后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陵谷交替，可她在我记忆的时刻表里，永远是早晨10点零5分，永远是那样一副不容改变的面容。

一出机场，洁净宽广的柏油马路便笔直地延伸在一片片树林中间。土地潮湿泥泞，覆盖着欲化未化的积雪。林中丛生着椴树、榕树和白桦树，金色的、橙色的、褐色的叶子挂在枝头，还没落尽。

穿过树林，便是一幢幢撑天拔地的高楼大厦，结构新颖，造型精巧别致，有许多惊人的构思和匠心独运的线条，透着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神韵。我惊讶这些楼群是在什么时

候建筑起来的。在我的记忆里，这里的过去只有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列维坦的风景画，是由优美的自然景观统治着的。不知是哪年哪月，发生了这种转换？

我们不能不重新好好地认识认识这不同寻常的、被第三次浪潮冲击的三十年！

“看起来您很激动！您对莫斯科好像并不陌生？”汽车司机坐在我的身旁，他从我的神情举止猜测到我的不同一般人的感受。

“是的，你说得很对！她对于我来说，是很陌生但又不陌生。已有三十多年没有过来了！”

“变化很大？”

“是的，应当说世界任何地方变化都很大！但是——莫斯科毕竟是莫斯科！”我一下子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感情。

许多已经褪了颜色的梦，又恍惚依稀而又非常现实地浮现到眼前来，特别是当汽车经过红场又听到克里姆林宫塔楼上传来那深沉古老的钟声时。阳光，是太阳对大地的凝视；青春，是时光对生命的凝视；回忆，是人们对往昔的凝视。当我凝视着这古老的城堡、古老的塔楼、古老的时钟时，我感到了时空的绝对的神秘和奥妙。三十年来，世上发生了多少数得出来的和数不出来的变化呀，虽然古老的城墙和石块砌成的路面，仍如过去那样呈现着凝重、湿暗、阴郁、冷峻的色调。

一直燃烧的，只有克里姆林宫苍褐色城墙下那座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的圣火。那天天气阴冷，北风凄厉，街上行人很少，且都匆匆而过，听说，莫斯科的年轻人结婚时一定要到这里来献上花圈，穿着结婚礼服在碑前留影纪念的。可惜今

天天气不好，没有人选择这样的日子结婚，因而来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他们的面孔是严肃的，同时也满怀着虔诚和期望。碑前有一块空地，火焰从地心里喷射出来。钢蓝色的火花映照着参谒者严肃的面孔，也映照着碑前的两行字：“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业绩万古长存”。

“八千卢布！八千！”中国倒爷在人群中兜售皮茄克。可惜俄国人不懂两指一撇的八，因而倒爷只能伸出一个巴掌外加另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有时他们也用电子计算器示价，对方还价也把数字按到计算器上。他们大多数不会俄语，有人闯东欧已经有二三年了，却至今连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说。

我们在一个民贸集市上，又见到了离境办理托运时见到的两个倒爷。他们一个是北京某高级宾馆的厨师，另一个是街头练摊的眼镜王。厨师在那样一个单位里挣的钱自然不会太少，但是拿死工资、受人管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后来他听一个表弟说，去国外闯的人都已经发了，不是一般地发了，有的已经海了。别人能出去闯，自己就不能？于是他向经理提出辞呈，托人情去申办出国护照。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论哪个人要把全部手续办下来都得耗个一年半载，都得付出相应的铺路费，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当那红本子一拿到手，他便感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解脱，就好像是花钱赎了个自由身似的。

他们把两个大编织袋摆在一起，一个人两手捂着袋子，一个人连说带比划地同顾客侃价。他们不得不这样严加防范，因为围过来的人太多，稍不留心便有被抄走一件的危险。需要特别加以防范的是吉普赛人（在俄国叫茨冈人），他们惯于在杂乱的集市上做手脚。有一次，上海来的两个倒爷在

这摆摊，过来一群吉普赛人七手八脚地翻着衣服，七嘴八舌地同他们侃价，女人的大裙子在编织袋上飘忽来飘忽去，急得他们也不敢多说，忙用双手按住编织袋说：“不卖了！不卖了！”可是等那些人走后，发现下边那个编织袋还是被人给划了个大口子，从里边抄走了两件皮茄克。

“现在的生意不好做了！”闲下来时他们对我说，“好时候已经过去了！去年开春以至于今年七八月份，那是黄金季节，赶在那时候出来闯的，都把钱挣下了！可惜，我们没能赶上那个好时候！等我们拿到护照出来，好戏已经散了，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背影！”

我问他们：为什么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出来的人太多了！开始，人们跑匈牙利，有二三万人，接着又去波兰和罗马尼亚。后来匈牙利采取了收缩政策，在那里不好混了，现在又赶上俄国经济政策开放，就都返回莫斯科来了。再说，人家的倒爷也成群结队窜到中国来。在秀水街里你仰脸去看一看，每走十步就是一个俄国人，他们也是来回地倒呀！”

“你们这次倒得怎么样？”我问。

“别提了！叫警察给讹了一下，损失了二十多万卢布！”厨师不住地咂嘴叹息说。

“怎么会呢？”我半信半疑地说。

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当时，他们俩正在市场上练摊，忽然过来两个警察，都是身材高大、膀大腰圆、胳膊伸出来像牛腿一般地粗。站在你身后就像站着两个黑铁塔似的。哥俩一看这架势没说的，赶紧听命吧，让上哪儿就跟着上哪去。否则，让他抓住脖领子还不像拎个小鸡似的。警察将他

们带到派出所里去，问他们有无证件到此来卖货。接着，又让他们把手举起来面对墙壁站着，然后伸手搜身将其兜里的钱都掏出去。以后，警察又问了他们一些别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没听懂。他们比划着说，他们是卖皮茄克的，进市场大门时付了交易费，并把护照和收据翻找出来给他们看。警察看了那些证件和从他们身上搜出的钱，然后气哼哼地将原物甩给了他们。开头他们很高兴，可把钱拾起来一数，发现短了许多张五千卢布和一千卢布的大票，加到一起足有二十多万卢布。他们急了，与警察据理力争，要求把扣下的大票还给他们。警察蛮横无礼，硬是把他们推出到门外。

“黑社会的人暗算我们还情有可原，现在，警察也出来公然洗劫了。你说这天底下还有个理字吗？”厨师越说越有气，用木棍敲得栅栏嘭嘭直响。

二

我们踏着一路泥水，去看我们读书时的学校。方位还是那个方位，街名还是那个街名，可是昔日印象中的景物已经完全变了。一住五年的大学生宿舍楼，连同它周围的栅栏、庭院、庭院后边的面包房、水果蔬菜店、书报亭和亭子后边的体育场，都连影子也找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摩天高楼，在两面高楼对峙之下的街道也显得比过去窄多了。那座小教堂，昔日荒凉破败，很少见到人的影子，今日却金碧辉煌，远远就看到它那闪闪发光的圆顶子了。学院就在教堂附近，找到了教堂，自然也就找到学院了。向人一打听，果然附近新建的那座高耸云天的大楼便是。

我们激动而又惊奇地走进大楼里。我在怀疑，这就是我

多少年来一直梦寻的那座庙宇、圣殿，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教室、课桌和试验室？我今天被人称作为经济学家，不就是从那张课桌上获得的知识开始学习走步的吗？可惜，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子。虽然教室还是教室，课桌还是课桌，可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批青年。他们挟着书本走出来，在楼梯口跑上跑下，丝毫没有介意在走廊里站着—一个毫不相干的老年人。我从来没有感到生活会变得如此的陌生和孤零，如此的不可思议。

我们走到课程表前，细心地阅读着各个系所排定的课程。这里，同样使我产生陌生之感。一是今日的课程完全不同于昔日的那些课程，不用说《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这些政治课没有了，就连过去的那些主体课程——国民经济和各部门经济的计划学也都没有了；普遍设立的是另一门新课——《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预测和计划》。二是讲课教师完全是一代新人。我努力地在课程表上去找寻，虽然我明明知道三十多年过去那些知名的教授和副教授早已走下讲台了，但我还是固执地搜索着，期望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然而奇迹却真地发生了，我简直不大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在一大群陌生的名字中间，居然还列着一个多年来我一直尊敬的名字——玛丽娅·阿特拉斯。不知道她现在该有多大年纪了？可她却还在执教，课程表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而且讲的是主课，课时也很多，几乎每个系里都有她的课。

我望望身旁的刘工，刘工望望我，两个人都像从梦中走出来复又进入梦中似的。

这时，一扇用人造革镶包的门打开，从里边走出一个姑娘，一手提着硬壳书包，一手捧着一大摞子刚刚借到的书。那

一闪而过的背影，立即使我回想到了一个人，而顺着她打开的门缝我立即看出这个房间就是学校的阅览室。那些桌子的排列，借书柜台的摆放，资料的陈列和学生伏案读书的神情，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我毫不迟疑地跨进门去。

“你猜，我看到方才开门走出来的那个姑娘想到了谁？”我悄声地向身边刘工说。

“谁？”听声音他好像也产生与我同样的感应。

“喀秋莎！”

他沉默着，很明显他早已知道了我的答案，因之没有任何震动。

“你还记得，就是在那个座位吧？”我指了指紧靠窗户那排最后一张桌子说，“是喀秋莎每天同你坐在那里，帮助你抄写课堂笔记的。”

他两眼呆呆地望着那个已经空了的座位。往事如烟，朦胧迷惑地飘忽过去。

他俩（刘工和喀秋莎）不是坐在课桌前一起复习功课，而是坐一张木板床沿上做十天一次的时间被限定得很短很短的会面。为了防备他们谈话时串通消息，特派懂俄语的红卫兵在一旁监听。因之，夫妻俩虽然还能会上一面，但却只能默默厮守，连一句带感情的话都不能说，说了，便会被扣上不知是什么罪名的帽子（那时候“政治罪名学”最为发达，稍微罗织一下便可构成一顶压死人的帽子）。这还有什么夫妻生活呢？他被关押在牛棚里已经有两年多了，而她因为还保留着本国国籍，造反派不敢动她，但因此比对于任何阶级敌人更恨，更刻薄。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有愤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威吓的眼睛。还有些不懂事的孩子会不时地从背

后飞过来小石块，举起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拳头。“打倒苏修！”“打倒苏修特务！”的口号随时都会在你耳畔响起。后来，就是这样一种苟且偷生的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有一天，喀秋莎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女儿娜佳来看他时，他满脸悔愧满脸忧伤地拿出一张纸来，怯生生地递给了她。她一看惊呆了，浑身颤抖，脸色像纸一样的苍白，说：“刘，你发疯了？平白无故为什么要离婚？”

他的脸色更加阴暗，神情更加沮丧，空气像凝固了似的窒息。他无力吐出一个字来，只有转过脸去把哀怨痛绝的双眼盯向窗外。可窗外立即射过来凶狠严厉的目光，逼得他惊悸地抖动了一下，不得不忍着酸楚背着良心地说：“为了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永远脱离关系为好！”他没敢对她说出，这纸离婚书是造反组织下达的命令。

她满腔悲愤、一脸泪水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1968年冬，有几百个像喀秋莎这样的女人，差不多都带着一两个孩子，乘坐199次国际列车离开了北京。不幸的是，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那样一纸离婚书。当列车一开过满洲里离开国境时，车厢里是一片啜泣之声，有的人甚至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有多少日子她都不敢想象这样一个现实，她都无法忍受那啃噬灵魂的痛楚。每当深夜醒来，发现身边空落落的没有了他，没有了构成一个家庭、一场爱情的重要角色时，她的心便像刀扎一般地难过，全身痉挛地收缩到一起。漫漫长夜，惨淡人生，她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人生旅程该怎么走下去？很长时间内，她都觉得身边的东西都在飘动，黑夜和白天都恍惚成为一种颜色。直到女儿娜佳会喊妈妈，可以在她膝前牙牙学步时，她才算稍微地清醒过来一些。但

清醒的理智又使她陷进另一种境界的无边酸楚里。

以后，她使用那只一直颤抖的手抚摩着娜佳的一头乌黑卷发，带着半是凄凉半是温存的目光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

三

我，还有身旁的几个人，沿着一条在积雪中踏出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前走着。“真没想到，今天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身边的瓦西里无限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我们要来寻找的贸易伙伴、今天与我们进行洽谈的，竟是我们往昔的校友。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年级里彼此不认识，但却是一个学校一个系里的，毕业证书上签着同一个系主任的名字。他俩毕业后长期在经济部门里工作：国家银行、外经部、外贸部、国家计委。去年国家计委撤销，他们便和机关里其他同事一样，仨一群俩一伙地各自集资办起了公司、商社、银行、基金会等中小企业。现在两人共在一个企业里，一个任总经理，一个任副总经理。瓦西里曾经到过越南、朝鲜、印度，两次路经中国，这次洽谈时阿列克便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瓦西里都去两次中国了，而我……”

“不是去，而是路过！”瓦西里校正他说。

“反正一样。你到过那里，而我没去过！”我很清楚，他是想让我们邀请他来中国，那是他久已向往的。

“我想，我们总经理会邀请你去的，只要我们合作得好，生意做得顺利！”我向这位既是新交又是旧友的贸易伙伴说。

这次双方洽谈进行得确实很顺利，从开始坐下来起草拟出意向书，双方在上面签字，总共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真是巧得很，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合作！”在他们送我

们返回的小路上，我深有感触地说。

“这也不偶然！我们能够坐到一起洽谈，还不是因为有个喀秋莎！有她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从中给联系的吗？”阿列克说。

喀秋莎？当然是她！有谁比她做这种中间人更具备有利条件呢？现在，又是该感谢她的无私帮助的时候了。

“卡吉诺！”“卡吉诺！”在莫斯科各大饭店里都见到这种怪房子，门口的霓虹灯管盘曲成扑朔迷离的图案，像是美女和毒蛇扭绞在一起，闪烁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之光。

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所在，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赌场。

赌场，好像已在现代化的高雅文明生活中抢占了一席之地，虽然它过去是、现在也难免还是那么肮脏、污浊、邪恶、罪孽、酿成许许多多流血和堕落的悲剧的地方。

现在，它已用闪光的色彩冠冕堂皇地招徕四方游客了，好像已与文艺沙龙、摇滚乐舞、卡拉OK厅并列在一起组成那种让人唾弃不得又垂涎不得的生活旋律。进进出出它的门口的人都是些衣冠楚楚的头面人物和腰缠万贯的大款。在那些比较讲究的赌场里，衣冠不整的人是禁止入内的。领带要打得直，皮鞋要擦得亮，起码要穿着法国或意大利的时装。要有绅士风度，不准有小家子气，不准带寒酸相。鬼知道现代文明怎么会在这里着意地涂抹颜色？！

“可惜，像我们这把年龄的人还从来没有迈进过这个门坎！”刘工不无感慨地说。他抬眼望着那由美女与毒蛇扭曲成的图案，出神了好大一阵子又说，“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我们不妨也进去看看！”我倡议说。

“那怎么行呢？”刘工像被蛇给咬了一口似的，立即把头缩回去说。

“那有什么，我们只是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又不是去真赌。说实在的，要想真赌也赌不起来，各种赌法我们都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我说。

刘工也不禁哑然地笑了。说实在的，别看他当了教授、高级工程师，能够看懂各种图纸，编制各种程序，可是连中国土著的牌九都不会计算点儿，就更甭说那些洋玩艺了！

我们在那霓虹灯下踟蹰了半天，最后终于乍起胆子走了进去，像偷了谁的东西似的，心里怦怦直跳。进门掏五美元换赌场码子（这是最低的门票，低于五美元的赌注是不让进的）时，手直颤抖，好像手里攥的不是码子而是火炭。

赌场大厅豪华气派，设有好多的赌台，几种赌具同时进行，钩心斗角，各占其势：有押宝的，抢五子的，争二十一点的，但最多的是轮盘赌。那是一个很大的方盘，上面用等分线划成了三十二个格子，其中十六个格子为红区，十六个格子为黑区，中间还有一个空档。你可以把码子押到任何一个格子里，如果轮盘指针正好转到你的格子上，押一赢三十，一百美元就可赢三千美元。如果指针没有落到你的格子上，而是落在你押的小区里（每四个格子又组成为一小区），庄家就要赔你三倍；如果落在你押的大区里，押多少赔多少。

赌场有条规矩，你买的码子必须在场上赌过，见过输赢，剩下的出门时才能换回现钱。很明显，这是闲人免进，光看热闹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只好把五美元的码子胡乱地押了押。赌场果然欺生，没出几个回合就都输光了。好在事先

是打定开眼界付学费的，所以输也就输了，没有什么悻悻不快的感觉。谁知回去之后经人一说，倒有些后悔起来，原来这里还有许多名堂。

有个去过德国的人对我们说，德国的赌场比俄国的讲究，档次也高，场面也阔，有警察和黑势力的人维持，绝对保障你的安全。你赢了钱，会有保镖送你回到住处。不过话说回来了，赌局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捞的。他不怕你赢，只怕你不下大的注赌，左右有输有赢，按照一般的概率计算，有利的机遇主方大于客方。他们最讨厌的是看热闹的，不，准确一点来说是看门道的。前年，曾有两个中国人在德国赌场里看热闹，看了几天之后竟看出了个门道，找到了一个十拿九稳的办法，准赚赌场的钱，当然只是几个小钱。按照德国赌场的规矩：进门换码子时赌场给你让出一些利来，出十马克换给你十五个码子。当然，这十五个码子必须在赌场上见过输赢方可换回现金。两个中国人合到一起产生一个没有多大浪漫味道的狡黠。他们每次走到轮盘赌前比任何算卦先生都灵（也就是比任何人都笨），他们约定各把十五个码子分别押到黑区和红区里。轮盘一转，百分之九十几的机遇就被他们给保住了。因为指针在三十二个格子上旋转，不是落到红区就是落到黑区。我说的是百分之九十几而不是百分之百，因为中间还有个空档。不过，落到空档上的机遇太少了，只有三十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这样，他们便总是一输一赢，不是红区的赌注赔给黑区，便是黑区的赌注赔给红区。只要指针不是落到空档上（我说过了，可能性很小），他们每天都能从赌场赚到一笔钱（虽然只是个小钱），因为，用十马克换进来的十五码子经过输盘赌上这么一搏，出门时就可以换

回十五马克了。这样，两个中国人每天都有五马克的收入。据说，这五马克足够一个人的一天生活费了。

“这样一来，赌局不是要赔光了吗？人们都要跑去净赚那五马克了！”我问。

那位朋友笑了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开始，赌局没有防备这一招，因为在德国没有人花那么大功夫绞那么多脑汁去赚那五马克。可是日子长了，人们便起了疑心：怎么这两个中国人每天都来赌场，每天只赌一次便换了码子就走。后来经过察访才知道，他们就是靠吃这五马克码子过生活的。于是在一天黄昏里，当两个人乐呵呵地揣着赢得的小钱从赌场里走出来时，有一个穿得非常绅士的人从他们身旁经过，在他们身上各捅了一刀，两个人还没等走回家便都咽了气！”

四

“为喀秋莎干杯！”

签订了意向书后，大家约定一起到喀秋莎家里欢聚一次，一来祝贺我们这些校友重逢；更重要的是，为刘工和喀秋莎创造一次见面的机会。

自从两国关系改善以来，喀秋莎一直在努力寻找重新见面的机会。她曾以旅游者、访问学者和贸易团组翻译的身份多次来到北京，最后托人在师范学院里寻到一个俄语教师职务，一住就是半年。她总在寻觅，但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

刘工已重新娶了妻子，妻子又为他生了子女儿。妻子担心这种会面会引起旧情复发、旧梦复圆。即使是一场伤心的话别、无可奈何的叙旧，她都感到是一种侵犯、一种割爱、

一种难以忍受的刺伤。刘工无法违背妻子的意愿，更不愿意因此而引起家庭的纠纷与不合，已经尝过家庭破裂的痛苦的，绝不敢再尝一次这种痛苦滋味。

也许，她是有道理的！

也许，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更多的人却是同情喀秋莎，认为她完全有权利去寻找，有权利去追回被痛苦淹没掉的一切。

“娜佳，把做好的牛排再端上一份来！”母亲对在下厨的女儿吩咐道。

女儿的今日，就是母亲的昨日。

娜佳好像很害羞同爸爸说话，虽然看得出来，她是很想同爸爸多说几句的。

她的未婚夫米沙坐在我的身旁，蓝眼球，栗色头发，留有短短胡髭，是个典型的俄国小伙子。

“你的未婚夫很不错，是什么时候选定的？”我有意地逗她说话。

她没有回答，只是满意地望了未婚夫一眼。

“是去年，快一年了！”母亲代她回答说。喀秋莎虽然是望着我说，但看得出她的眼光更多地分散到刘工的脸上。“前年大学生夏令营时，她结识了一个捷克青年。小伙子长得很帅，从言谈举止中看出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可是我坚决地反对，硬是软硬兼施地给搅黄了。我不能让女儿走我这条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都不能结婚。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谁也说不上，今天两国好好的，明天就可能吵翻了。而国家的事又常常要波及到家庭生活上。多么深厚的爱情，多么牢固的结合，都抗拒不了政治上的地震……”她用两手捂住了脸，声

音啞啞，身子在微微地顫抖。

“我们为今日的欢聚干杯！为我们能够再次见面干杯！为我们善良的女主人干杯！”我为了打破这痛楚尴尬局面，首先把杯子举起来，并转了话题。

“我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你们那个公用电话！”我笑着说，“街头电话都是投进十五戈比通话。可现在连十五卢布都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你还上哪儿去找十五戈比？有时在街上为打一个电话憋得团团转，前后左右也找不到带硬币的人。这种新鞋旧袜子的不配套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

“你看，你们外来的人一眼就看到了这种失衡，我们住久了的倒习以为常了！”喀秋莎接过来说。

“莫斯科的地铁，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方便的一种交通工具了。八条线纵横交错伸到市区各个角落，随便你到什么地方坐地铁都可以达到。可是乘一次才一个卢布，折合人民币才二分钱。现在各种物价涨得都很厉害，几天一翻番，就是地铁不动，这真叫人感到困惑不解！”刘工说。

“还不如干脆免费乘车算了，大家都省得麻烦！收那一卢布也等于没收！”我说。

“听说你们的农村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是的，还是在大拨轰地干活，农民没有积极性！”瓦西里说。

“为什么不把土地分下去呢？”我问。

“那些农庄主席、总会计师、总农艺师想不通呀！当然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下子也说不清！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还是为我们难得的见面干杯吧！”阿列克说。

五

真是巧得很，在回国的途中，我们又同离境办理托运手续时见到的那几位倒爷见面，而且又同坐在一个车厢里，还多了一个挺机灵的矮个子和他的搭档倒姑。

说起“倒姑”这个名字，还是她自己起的呢。前次大家在一起议论倒爷的酸甜苦辣时，她谈笑风生，讲得最多。有人开玩笑地说：“你口口声声倒爷长倒爷短的，可你是个女的，应当叫倒奶奶！”她说：“什么倒奶奶？难听死了！就叫倒姑吧！”

倒姑发表宏论说：“开始人们都去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呀，东京的中国女人呀，轰动一时，那股热潮搅动了每个年轻人的心。可是最近几年变了，人们逐渐东移：由美国到西欧，由西欧到东欧，由东欧到独联体。现在，人们都纷纷转到莫斯科来了。去美国和西欧的人，奋斗了几年之后终于发现，他们尽管已经积蓄了几十万美元，但还是得给人家打工。可到东欧来就大不相同了，只要一两万美元就可以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当老板，雇上好几个伙计！”

我已经开始认识到她的性格、勇气、价值取向和内心世界。后来，果然听到了这样一段冒险故事：

“有一天，我卖完货炒回了美金，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住处，顺路买了两个大西瓜和其它一些好吃的，准备为自己好好庆贺一番。黄昏时候，我的傍肩儿出外办事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数钞票，突然门被踹开，进来两个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哥儿们，一屁股就坐到桌子上。一边糟塌那些吃食，一

边骂骂咧咧地朝我来浑的。有一个说：‘他妈的，今晚上我不走了，就睡在你这个床上！’在这个时候，我若是稍微一软下来，便什么都完了。我知道对这些人不能来软的，但也不能太硬。我便毫不相让地对他们说：‘你们想要睡在我的床上也可以，你们也知道我是练过武功的，别一脚把你们踹到地上去！’他们多少知道我一些底细，知道我不全是拿大话吓唬他们的；同时，听到我又报出了几个名字来，那几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自知惹不起便退缩下来。我看他们退下来，便给他们个台阶说：‘你们如果缺钱花可以说话，我怎么也想法子给你们凑个过河钱！’就这么软硬兼施，算是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我听着，好像眼前又出现了个阿信，自己开饭馆的阿信。

“你方才说的‘傍肩儿’，是什么意思？”我问，出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对于新鲜名词的无知。

“我在这里，也是个借用名词，不是小青年讲的那个意思，而是泛指。”她说，“像我们这些女的出来，总要结个伴儿合伙来搞。当然也有两个女人搭伙的。不过两个女人在一起，是弱点加弱点，短处加短处，有许多困难不好克服。如果是一男一女在一起，就容易采长补短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了。女的精细，选货和算帐比男人要经心、细致，不会丢三拉四出大纰漏。而男的呢，力气大，能吃苦，背背扛扛大有用处，而且男人肩膀宽扛得住歹人的暗算。所以有个道士给我们算命说：你们肯定会发财，发大财！因为你们懂得阴阳互济、刚柔互进的道理。阳刚过胜，易暴殄；阴柔过胜，易沉溺。你们俩合伙搭档是深得阴阳之道的。财运还有个不兴旺的？！所以，我就寻了这个傍肩儿。”说着，她望着那个机

灵的矮个子笑了笑。接着又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找个好的傍肩儿也不容易，彼此要完全信任、信赖；不然常年在外，有许多事情很难说得清。最好是我们这种结构——大姐姐配个小弟弟！”

“你们出来几年了？”我问。

“快两年了。”

“那你们赚的钱已经相当可以了？”我说。

他们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六

过了赤塔，火车离开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干线，开始南下向我国东北方向奔去。到了俄国境内最后一站后贝加尔湖（过去叫奥得堡）已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多钟了。旅客都要下车去等候，列车要重新编组并将车厢从俄国境内的宽轨吊到我国境内的窄轨上来。

人们都走进了候车室。列车编组的时间好长呀，我们等了很久很久。按规定是两个小时，可是我们等了四个小时还不见火车退回来。怎么捱过这烦闷的时光呢？我又找到倒姑和她的傍肩儿，想再听听他们不同寻常的倒爷生活。

“你上次说过，每个倒爷都是一部惊险小说，不知你能否讲它一两部，趁着火车还没有开过来！”我说。

“这可是仰俯皆是、说不胜说呀！就说我们车厢里那位王大哥吧！”我知道她指的就是那位练摊的眼镜王。“人够精明能干了吧，论块头和智谋哪一点也不比人差！可在上个月便吃了一场大亏。那天下午五点多钟，他从车站把托运的包裹取出来，雇了辆出租车往回开。没走出多远，就见后边

有辆小汽车紧紧地尾追上来。走了一段来到一个路静人稀的地方，后边那辆车加速超过了出租车，并横在它的前面。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想下去问个究竟，前边车里立即跳出两个人来，一个用手枪顶住司机，一个用枪顶住王大哥，让他将包裹全部送到前边汽车里。这还不算，最后他们还叫他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扒下来扔过去。可怜王大哥，赤身裸体地站在天寒地冻的西风里，央求出租车司机说：“请你将我送回旅馆去吧，总不能让我只穿着个裤衩站在大街上！”司机还挺通情达理，一直给他送到旅馆前，临走还向他招手说了声：“拜拜！”

“这个司机恐怕与那伙歹徒有些瓜葛？”我说。

“岂止是瓜葛，明显他们就是一伙人！事前已经把扣子都做好了！”机灵的矮个子气忿忿地说。

“就说我们这位老弟吧，他也上了他们一次大当！”倒姑说着望了望傍肩儿，见他没有阻拦的意思就接着说，“有一天，我见他一身泥土、衣服撕得破碎地走进来，脸上、手上和腿上全伤得像血葫芦似的。我扶他坐下，惊慌地问他怎么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气得浑身发抖，鲜血仍在不住地流出来。我赶紧找来红药水和药棉花之类的东西，帮助他擦洗，一直忙活了小半天。等到傍晚吃过晚饭后他才告诉我说：兑换的绿钞票都被抢走了。我惊得目瞪口呆，忙问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将换回的几千元美钞都放在密码箱子里，乘坐出租车往回赶。司机可能早有了底线，车开到半道就停下了，假装机器坏了，他打开车盖这鼓捣，那鼓捣，捅了一阵之后就让小老弟下去帮他推车。小老弟信以为真，便走下去帮他推去。谁知刚推了几步，司机立即加大油门嘈地一下

把车开走了。小老弟一见急了，马上扑上去用双手拽住汽车后屁股的横梁，想把车子拉住。他一边拽住车，一边高声地喊叫。司机根本不管这些，只是拼命地向前猛开。你想，人怎么能够拉得住汽车呢？结果，将他拖出去二十多米远，全身都拖破了。最后手一软，汽车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你没有记住汽车号码？”我问那个小伙子。

“记住了又能怎么样？你想，凡是要干这种事，他事前肯定要把车牌子换了。就是不换，你去告他，他一口咬定没有此事，你又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再者说，我要去打官司就得找律师和翻译，又要花一大笔钱！”小伙子气哼哼地说。

一直等得人们从烦躁中平静下来、又从平静中烦躁起来之后，那列编组的火车方才开过来。人们像得救了似的，急匆匆地赶回到自己车厢里。

等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后，人们才醒悟到了一些，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久？因为皮箱、口袋、提包等物都错了位，有些东西还散落到地上。是车厢吊起来时震动的？不像，震落的不就是这个样子。

不久，海关人员便走进车厢里来检查。官方法令规定：出境不准携带武器、金、铂及其制品以及卢布和外汇。离境的人不能超过入境时所携带的美元数目。但实际执行中又常常不限于这三类物资。有些东西得看海关人员的情绪而定。他们认为不宜带走的，或者是不想让你带走的，便都以各种理由或者不讲什么理由便把这些东西拿走。因之，人们一旦逢到这个关口，不管你是否带着违禁物品都忐忑不安，心境都不易保持平衡。

“本车厢里有翻译吗？”一位四十多岁身穿深蓝色呢子制

服的海关人员高声说。

“我会说几句。”我听见有求之声立即主动应承道。海关人员让我跟他一道走进第二包厢，里面坐着二老二少。两个老的看样子都是公出人员，穿得整整齐齐，西服扣子一个也没敞开。两个年轻的是一男一女，看样子是一对夫妻，自称是回国探亲的留学生。

“小茶桌下面是什么？”海关人员漫不经心地开始了边检工作，看得出来，他是有意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他指的是个破旧牙刷缸，里边装着两把牙刷和两筒牙膏。他指这个干什么，恐怕离题太远了些吧！

“你拿过来我们看看！”他仍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年轻女人将牙刷缸递过去。他看了看牙刷缸内外，随手抽出一筒牙膏而将其余的递了回去。

我心想，这算什么呢，牙膏有什么好检查的？虽是中国产的，但已只剩下了半筒，恐怕也不会惹起他的喜爱的。可是他却饶有兴趣，半天半天地看那牙膏，用手捏了又捏。

“谁有刀子？请借用一下！”有人递过一把刀来，他仍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好，现在我们解剖一下，看看里面有啥？”说罢，就将牙膏倒卷部分展开，底部露出一个开口，他将刀子顺着开口处一豁，里边立即露出馅来。我大吃一惊，原来里边不全是牙膏，在牙膏中间夹着一卷绿钞票，钞票外边用塑料纸包着。

“你瞧，这怎么说呢？法律规定外汇是不准带出国境的！”他仍然没有改变那种幽默的口气。

两个年轻人显然有些紧张起来，女的连忙解释说：“那牙膏不是我们的。是谁放的，我们不知道。”

“那能是谁的呢？那好吧，请你们穿上衣服收拾好东西，一道下车去探讨探讨吧！”说罢，他便得意洋洋地拿着半筒牙膏和一卷钞票，领着两个年轻人走了。

列车员立即将那两张铺位收拾起来。

在别的车厢里也有收走羚羊角、毛皮大衣的，也有收走照像机和意大利皮靴的，甚至连万宝路香烟也带走了两条。

“我们车厢里全部安然无恙，除了那两个年轻人之外！”眼镜王轻松地嘘了一口气说。

“主要是他们发现了大目标，才把其余舍弃了。”饭店厨师说。

“哪里，哪里，把我全身上下都翻了个遍！”倒姑神采飞扬地说。

“怎么搜查了个遍？”有人问。

“他们让那女列车员来，先搜我的上身，接着搜下身。让我把裤子一层层地脱掉，直到最里面的衬裤。你别看他们那么搜，硬是什么也没搜查出来！”

“你什么都没带，他们搜查出什么来！”我说。

她狡黠地看着我笑了笑。她可真有本事！

“对他们的搜查我看的太多了。有个老头把金子放在茶叶盒里，也有用胶布贴到袖口上的，都被人家给翻到了。牙膏筒和手纸卷，更早已成为人家注意的目标了！”火车进入我国边境，时间立即转换成北京标准时间，由原来的晚八点一下子进入到凌晨一点。人间岁月在一皱眉的时间增加了五个小时。我总有这种奇异的感觉：每出一次国，经过一番时间差的大转换，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许多。

一进国境，便蓦地增加了许多自豪感、亲切感和安全感。

心便不知不觉地向她紧靠过去。身在异乡为异客，不论得到了怎样的礼遇和敬待，但仔细咀嚼一下总不如在自己的国门里、家门里是滋味。月是故乡明呀！这是我小时候就唱的歌儿。

“这一趟算是亏了！”厨师对他身边的人说。

“我们也不顺，至少有几千元贴进去了！”上海人也遗憾地说。

“再也不去了吧？”我问他们。

“怎么会呢？好容易起下了护照！”厨师立即回驳我说，好像我提出个不可思议的怪问题。

“你们不是都亏了吗？而且大家都说，那边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我说。

“亏几千，这没啥，权当付了学费，或者是花钱出国旅游了一趟。这年头，干什么不得花钱呀？再说了，哪丢了哪找回来嘛！”厨师说。

我再打听一下，那些说是生意不好做的、遭暗算的、被洗劫的、受敲诈的、被勒索的，竟没有一个说是从此罢休，下次不来了。

莫斯科，最新的一个经济热点嘛！

在北京下车时，我见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像位凯旋归来的将军似的得意洋洋地向前来接她的父亲指点着几个大口袋，一面骄矜地说：“详细情况，等我回家后对你们细说！”

多少人，都把更多的情热倾注到莫斯科。那里潜藏着许多的渴望与追求。

北京——莫斯科；莫斯科——北京。

被割裂开的心愿

大雪从清晨起便悄悄地飘落下来，一天没停，黄昏时候变得更加稠密了。接着，凄厉呼啸的北风也趁机刮过来，搅得远近一片苍茫。

夜里十一点多钟，孩子们看过电视都睡了，只剩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写字台前，握着一杯滚烫的浓茶在漫无边际地遐思。我觉得这么坐着沉思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它能使我从喧嚣的世界中走出来，寻得一个宁静的只属于我自己的天地。

“好像有人敲门？”睡在床上的妻子醒过来，警觉地向我投过疑惑的目光。

是的，那嘭嘭的声响果然越来越大，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很明显那不是风声雪声，而是敲门声。唉，这么大的雪夜还有人来登门作客？我有些惶惑不安地走到了门前。

一股冷风像把利剑嗖地一下劈刺过来，随着那股冷风走进来一个臃臃肿肿的大雪人，只有睫毛后边的眼珠子是黑的。他在门厅里摘掉帽子，又把大衣脱下，抖落掉上边厚厚的雪

花，直到这时我才把他辨认出来。

“老天爷，你怎么会在这样天气里赶来？”

客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嘿嘿地憨笑着，两颊通红，眼睛里射出异常兴奋的光彩。

“找到了！找到了！你万万不会想到，那件已经失落多年的一半儿，又终于被我们找到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满脸胀红。

“啊，找到了？！你说什么？把那一半儿又找回来了？简直不敢叫人相信！”我霍地站起来，兴奋地走到他的跟前，两手搭住他的双肩，脸对脸地望着他说。

“真的，当然是真的！这叫老天有眼！”

“这么说，那一半儿已经落到你的手里了？还不赶快拿出来让我看看！”我急着问。

“别急！别急！暂时还没有回到我的手里，只是有了下落，有了个准确的下落。不过很快，已经割裂开多年的这两半儿就要归合到一起了！不然，我为啥要冒这么大风雪，连夜跑到省城里来呢！”他说。

“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讲给我听听。”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忽然收到省公安厅拍来的电报，通知我说，有人从海外携带来那一半儿，并主动捐献给国家。电报催我赶快到省城里来，随同省公安厅和文物局的同志一道去四川认领那一半儿。你想，我听到了这个消息还能坐得住吗？当下就买了车票赶来，天晚了，只能打扰你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公安厅。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还用说！”

“好，我们就一道去！”

二

我与他结识，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次，我去一个名叫河口的小镇采访。镇子虽然不大，但因背山临海有舟船渔盐之利，市面也挺繁华的。再加上离市镇不远有座远近驰名的金盆山，山上风光秀丽，古刹禅深，来此寻幽探胜和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心里也很得意。谁知，恰在这时我的老毛病犯了，风湿性关节炎害得我赶不了路。这时，有人介绍我去找他——小镇里颇有点名气的中医大夫顾怀先生。

他神奇地治好了我的病，腿不疼了，能赶路了，而且不止于此，我们还交上了朋友。我们有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水墨丹青，喜欢线条的韵律美。他对国画的造诣比我深得多，不论是高山流水的旷达，还是花鸟虫鱼的意态，好像都能够采纳到他的《药性四百味》里，融解到他的生活哲理之中。可能他见我说话文绉绉的，有一股子怎么也改造不好的书呆子气，于是就把我当成了小镇里难以遇到的知己，我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

“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诡密地向我眨了眨眼睛，稍嫌臃肿的身躯变得灵活起来，拉着我的衣襟领进他的卧室。

他打开了一扇日本式的壁橱，橱里按照高低顺序衔着无数搁板，每个搁板上都摆着一些漆盒、坛罐、瓷瓶和书画之类的东西。他径直地够向最上边的那层搁板，由于他个子不高，不得不费力气地跷起脚来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哇，可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他把古画一展开，我的眼睛陡然间明亮起来。

这是一幅明人沈周画的《青藤揽舟图》，从那气势和笔力、神采和韵味，一下子就看得出来是传世的真品，而非什么第二流、第三流手笔的赝作。青山在白云缠绕中间向清虚冥远之处淡淡地隐去，溪水从意境朦胧的林莽之中潺潺地流淌出来，风应该是很轻的，水应该是很平静的，因为用青藤揽着的扁舟前边只有微微的几线波纹。望着那虚无缥缈的云痕、烟痕和水痕，你的身子好像也不由自主地移到那山也静谧、水也安娴的幽雅境界里。

“怎么样，你见过这么好的画吗？”他憋不住一腔得意的神情，不无卖弄地瞧着我说。

“嗯！嗯！”我理解他的心情，便顺口答应着。

“慢着，顾大夫！”一个想法触动了我，使我的思绪像被反弹出去的物体一样，飞快地产生了一个让人发抖的判断：

“这不是一幅完整的画，不是的！它被人割去了一块！”

他的脸唰的一下变了颜色，由红润变成紫青，又由紫青变得像纸一样的苍白，整个身子瘫软无力地倚坐在床沿上。

“你，你，你看出来了？”他嘴角颤动，声音像游丝一般的细弱。

我也像他一样地震颤，被破坏的意境使我的感情受到极大的揉搓和拧挤。我差不多发怒似的喊道：“是的，我看出来了！不仅是看出来了，而且还看到了那一半儿！”

“什么，你看到了那一半儿！它在哪儿？”他腾地站起来，差不多用哀求的声调询问我。

“不，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割裂开的！”我更增添了愤懑，把声调提高了八度。

“你还是先告诉我，那一半儿在哪儿？”他急得额头汗

珠直流，说话变得口吃起来。

他这一连串的态度变化更增加了我的怒气，使我显得异常冲动和固执：“不，你不讲清楚它是怎样被割裂开的，我就决不会告诉你那一半儿的下落！”

他见我如此，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又重新坐下来，神情黯淡沮丧，仰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

这个遗憾故事的开头，是在日本刚刚投降东北刚刚获得解放但各方面军队都还没有开进来的那段政治真空时间。河口小镇在那几天里展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畸形繁荣，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虽然这种繁华还是土里土气的，杂乱无章的，就像乡村里的野台庙会，但总归让人感到心里欢畅。日本鬼子打败了，满洲国倒台了，困在人们身上的紧箍咒地一下打开了，过去在日伪统治时期一些属于犯私和违禁的商品，不知从哪个渠道里全都涌现出来，摆满小镇的每一条街道上，货色齐全，琳琅满目：有中国人用的，日本人用的，甚至还有西洋人用的，都统一地摆到地摊上。好不热闹哩！

一天，穿过这些闹闹哄哄的街道走过来一个青年，他皮肤黛黑，风尘仆仆，瘦长的脸庞更加显得刻削，只是眼角里还藏着兴奋和喜悦的光芒。他穿着一身青布便服裤褂，草绿色军装早已脱下去了。怎能不脱呢？他现在已经不是皇宫门前的卫兵了，十几天前，皇帝就带着皇后、皇妃悄没声地从皇宫里逃走了，抛下一个偌大的皇宫仓皇溃乱，六神无主，里里外外像一团乱麻似的。多少贴近的人已将宫中一切能够搬动的东西，都明里暗里裹带走了，弄得堂堂皇皇的亲民楼

和勤政殿就像刚被抄了家的大观园。河口的这位青年卫兵驻扎在皇宫外面，不像皇宫里面的人那么方便，因此等到他知道消息时，那些明晃晃的珠宝玉翠和贵重的家具器皿都已被人洗劫一空了。他在空荡荡的皇家宫阙里左寻右找一无所得，最后，总算在缉熙楼的一间内室里，找到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画面残旧灰黯，两端的画轴也脏兮兮的。也许它太不显眼了，所以直到这时还依旧挂在那里无人过问。于是，他就将那幅画摘下，卷好之后带了出来。

青年卫兵一边望着街道两旁摆着的货物，一边快步流星地向自家门前赶去。他离家已经两年多了，自从挑上国兵就长年在外，除了逢年过节给家捎回一封干干巴巴的平安信之外，别的再没有什么联系了。现在，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着自家的门，正所谓“近乡情更怯”呀！幸喜老天有眼，二老爹娘还都健在，结结实实，没灾没病。鬼子倒了，河口小镇里又多了一份阖家团圆的欢乐。

卫兵的姨夫曲志明就是听到这类喜庆的团圆故事才主动上门来贺喜的。他是孤身一人的老鳏子，喜欢亲属中的后生晚辈，对于在他身边长大的和不在他身边长大的孩子都感到亲切。

“外甥，你是从国都来的，是皇宫的卫士，这要在前清时候就是圣驾前的御林军呀！这次，你一定会从宫廷里带回来什么皇家宝物了？”土画家瞪大两只略带褐黄色的眼珠子，怀着一种说不上是崇敬还是羡慕的眼光望着昨日的皇家卫兵说。

“嗨，姨父，看你说的！我不过是看大门的一个卫兵罢了，够不上什么御林军、宝林军的！平时根本进不到皇宫里

面，等我能够进去时，值钱的东西早已被人家拿走了！”

“总不会空手回来吧！”曲志明兴犹未尽，在他多年形成的意识里：皇家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价值千金的宝物。

“只在缉熙楼里找到一张画。”

“什么画？”曲志明褐黄色眼珠子瞪得更大了。

“拿来给你姨父看看！”卫兵的父亲在一旁对儿子说。他知道曲志明是个精细人，又是个画画的，让他给识断识断，说不定儿子带回来的皇家之物真是件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呢。

卫兵从柜子里找出那幅画来，爷儿俩一人拿着一个画轴将画展现给曲志明看。那绝妙的传神佳品，一下子就把曲志明给震慑了。他仿佛是在梦里，那泼墨的皱纹和流畅的曲线，都在闪烁着诱惑的亮光，若隐若现，明灭不定，甚至林杪深处鸬鹚的声声啼叫都听见了。足有半个时辰，他两眼发直地凝视画面，几乎是身入其境忘记自己是在哪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从画中走出来，他怕别人看出刚才失神的窘状，便假装捂嘴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你看这画还值俩钱？”卫兵父亲再一次催问。

“一幅普通的画，普普通通的画！”曲志明巧妙地掩饰自己的心情说。

爷俩泄气地对望了一眼，随即将画卷起来。

“不过，这画有的地方还有些独到之处！”说着他又将画展开，随手指点了几处说，“借我带回去临摹几天，过后我就给你们送来！”

父子俩没有在意，满口应承地把画借给他了。

四

腊月年关，卫兵去看望姨父。

爷俩唠了一阵子家常之后，话题又转到了那幅画上。土画家伸过来长长的下巴，睁开那双过份光亮看起来有点像玻璃球似的眼睛，笑着对外甥说：

“现在我想和你做一点小小的交换，说不上谁吃亏谁占便宜，只要两下里都觉得合适就行了。我想把你这幅画留下来，因我一直没有把它临摹完，就像有个鬼打墙似的，一拿起笔来总是有这事那事给挡住了手脚。我用一幅伏禅和尚的画来换，另外再补上一件大皮袄给你爹。”

“什么，一幅伏禅和尚的画，还外加一件大皮袄？！”外甥吃惊地反问道。

“是的！是的！伏禅的画，外加大皮袄！”土画家说得斩钉截铁，嘎嘞溜丢的脆，尖尖的头还不断地向这边伸过来，下巴颏子差不多快够到外甥的脸了。

原来，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曾经出了四个远近闻名、人人皆知的画家，被称之为关东画坛四杰。他们是——朱蝻子、石猴子、宋瞎子和伏禅和尚。

说起这四杰来，那是人也怪画也怪，而且各有各的怪法，各有各的怪的路数，全都怪得出奇。朱蝻子是专画爬在葫芦叶子上的蝻蝻，石猴子专画痴痴呆呆的傻猴子，而那个宋瞎子就更怪得出奇了，他画的人物都是没有眼睛的，从不作点睛之笔。据说，他这是出于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感情，是一种扭曲了的心态反映。他是清末秀才，曾几次进省城去报考

举人，但几次都被瞎了眼的考官给刷了下去，白落得一肚子的经纶学问和锦绣文章。因此上，他便把这个世道看穿了，天底下没有几个人是有眼有珠的。于是他抛弃了功名前程，背着个褡裢走乡串户做起卖字卖画的先生来，画上的人物就一律没长眼睛。任凭你是怎样有权有势的人来求他，画出的人来也还是这个模样。爱要不要，休想再让他给你点出两个眼睛来。然而世界上的事也很蹊跷，他越是这样狂傲怪戾，来求他写字画画的人越多，久而久之，那没有眼睛的人物画倒成了珍品。

如果要与这三个人相比，伏禅和尚则可以说是阳春白雪更高一筹了。如果说前面三个还是只凭得一些聪明的怪癖博得世人的好奇心的话，那末，伏禅和尚则可以说是大智大慧大手笔，是有意隐没的一颗慧星。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很早就去日本留学，跟随日本著名画坛大师学过画。回国后，他因不满现实，披上袈裟皈依了佛门了。他虽然每日里对诵经打坐等功课丝毫不废，但凡世间有人来求他作画的他都有求必应。由于他的功力非凡，加上这样慷慨善施，因之，伏禅和尚的名字很快就远播四方尽人皆知了。遗憾的是，他圆寂得过早了一些，好像佛国里非常需要这位彩绘高手，急着要把他召回去似的。因此，他留下的墨迹不很多，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字和画也就更加珍贵。

因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曲志明提出要用伏禅和尚的画来换沈周那幅画时，青年卫兵一下子就动了心。他答应姨父等回家问明父亲之后，马上给他一个准话。

五

“什么，一幅伏禅和尚的画外加一件大皮袄！像你姨父那样精明的人能出这样大的价钱，那就肯定地说，那幅旧画是件值钱的宝！”当青年卫兵回家把姨父刚才的话转告父亲时，老头子立时就转过味来。

“那怎么办？”青年卫兵没了主意。

“你就去跟他说：我爹不同意换，要把那幅画拿回来过年祭祖时用。”老头子转眼就想出了个点子。

“好吧！”

第二天，他又去姨父家里，按照父亲教给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曲志明知道这招棋是走不通了，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酸疼酸疼的。表面上，他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又将那幅画找出来铺展到条桌上，信手指点着画面上几个突出地方褒褒贬贬，用别人听不大懂的行话术语说长道短地评论了一番。

“这样吧，我就再用几天时间抓紧把它临摹完，然后还给你。”

“什么时候能临摹完？”青年卫兵也学得机灵起来，他怕姨父一拖再拖。

“快！快！很快就会临摹完！你家不是要用它祭祖吗，我看一过小年你就来取吧！”姨父变得非常痛快，当下就定下了归还日期。

可是等到外甥一走，曲志明心里可就七上八下地犯起嘀咕来了。整个神经系统像是一团被搅乱了线的麻，乱纷纷的。他重新把画卷展开，再一次倾倒在那神品里面。这简直就不

是一幅画，而是勾魂摄魄的符，是一个充满着风云雷电的大千世界。在它的每一丝线条里，都能读出美妙绝伦的神韵来。

原来，这幅画就是我国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青藤揽舟图》。远山近水，悠悠白云，青藤古树，一叶扁舟，无处不是天然趣成的妙境，而这些景物凑到一起，就更加意境深远，妙趣横生，韩潮苏海的大块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更可贵的是，在画的尾部还有画家用他那遒劲的笔锋题写的诗：

扁舟系缆清溪侧，步入云山路欲迷。
林静澹然足音响，藤花零落竹鸡啼。

题诗下边还有两方铃印：“白石翁”、“石田邨人”，风流潇洒，挺秀俊逸。

曲志明越是忘情地欣赏这幅杰作，心头越是燃起贪婪的火苗；越是爱不释手地把玩观看，越是生出许多欲望妒嫉的邪念；越是感到无法把它占有，越是产生出迷人心性的诱惑；特别是当他把眼光停留在尾端的题诗部分时，诱惑的虫子就更是紧紧地把他的心口咬住。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沈周这位明代著名画家在某些地方与清代的扬州八怪郑板桥颇为相似：诗、书、画样样皆佳，都是旷世的神品，尤其是他的字更为叫绝，最初是仿黄庭坚的笔锋笔体达到乱真的程度，后来又从黄的筋骨中脱化出来自成一家，端庄劲秀，凝重深沉，一身的洒脱都蕴含在严整的形体之内，倜傥的神韵全融铸在严峻的风骨之中。如果单从画的角度来评品，他与同时代的唐伯虎、文徵明、仇英等

齐名，并称为明代画坛四大家；如若单从书法角度来看，他的字可以说得上是出类拔萃更胜一筹的了。

曲志明爱画也爱字，他知道这首题画诗再加上那两方铃印，要比那画更有价值。当他头脑中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时，一个罪恶的魔鬼就侵占了他的心头，就像浮士德博士一做起化学试验就遇到魔鬼梅菲斯特一样，由此而萌生了毁灭了自己灵魂的念头，做出了以后再也无法弥补的过失。他糊里糊涂地从抽屉里找出剪刀，又糊里糊涂地把画卷尾部的题诗齐唰唰地剪断下来。他自己又是个裱糊匠，将剪掉一段的画重新裱糊好，两边的画轴使用的还是原物。他私藏下来的，只是画卷的一小部分。

过了祭灶的小年之后，青年卫兵便到姨父家来索画，曲志明把画卷平平展展地打开，从头至尾地让外甥看了个仔细，然后满脸带笑地说：“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完璧归赵了！你拿回去交给你爹好好收管吧！”

一幅名画，就这样地被割裂开了！

六

“那末，这幅画又是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我望着我的朋友顾怀大夫问。

“你还是先告诉我，那一半儿现在在哪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它的？”我的朋友满脸焦虑地问我。

“我是在一个退休了的图书管理员家里看到的。他把那一半儿镶嵌在一个很大的镜框里挂在墙上，所以，没等你讲完，我就已知道那题诗写的是什么了！”

“请你赶紧领着我去找那位图书管理员！他住在哪里？”

“你这么着急？”

“这你难以想象！为了使这割裂开的两半儿到一起，恢复它的原貌，我耗尽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头。”

“你为它——”

“是的，为了它！为了这被割裂开的心愿！”

噢，想不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缘由，这么多的苦衷！看到我的朋友急得两眼冒火、两鬓流汗的样子，我才知道事情的严肃性和紧迫性。

“那好，我们马上就动身！”我拉起他来就往外走，飞快地奔到火车站去。

我们乘上了火车，而且幸运得很还居然都捞到了个座儿。虽然都是靠着过道只坐上了半个屁股，但总算有个坐的地方，直到这时他才轻松地舒了口气，掏出了手帕擦着脖颈上的汗。

“现在，你可以接着说下去了！那幅画是怎么到了你的手里？”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追问他说。

他望着窗外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又说——

多少个年月，在不知不觉之间匆匆一闪地过去了，就像家乡门口外边淙淙流淌的小河一样。人们留不住时光，就像留不住河里的流水一样。土画家曲志明就是带着这种心境走进了自己的晚年。现在到了最后的一站，眼看人生的旅程就要画上一个句号。在这最后的一个站上，人们总不免再回想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看看自己给生存的这方土地留下了些什么？遗憾得很，他曲志明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而唯一留下来的，只有良心上的那个沉重的负担。是他曲志明亲手将那件稀世之珍的国宝给割裂开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中医大夫顾怀先生。

由于行医看病的关系，顾怀常到他家里来。曲志明从与瞎病大夫的言谈话语和举动行为之中，看到了一颗真诚的心，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和依托的人。能够把自己从愧疚与谴责的苦海里拯救出来的，只有眼前这个人。于是，当一次顾怀大夫俯在条桌上为他开药方时，他没有伸手去接药方却抓住了大夫的手，说：

“顾大夫，你的药方已经治不好我的病了！可是你本人，却能把我从地狱里救出来……”

顾怀大夫惊得发呆了，他行医多少年还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病人。足有半晌功夫，他才有所反应地说：

“你是想说……”

曲志明明白过来，知道现在该说什么了，他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既治病又救人的顾怀大夫，最后又把自己无法实现的遗愿衷心地托咐给顾怀说：“我希望你能成全我，在不损害我的名声的前提下，想法儿把这幅画归合起来，只有这样我在九泉之下才得安心。”

不久，土画家曲志明就抱着难以偿愿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死前，他将割裂下的那段沈周题诗交给了顾怀。

顾怀接过来那一半儿画，也接过来一件让他十分作难的嘱托。既不说出曲志明的隐私，而又能将两半儿画儿天衣无缝地归合起来，谈何容易！他当然不能径直地去找青年卫兵将这一半题诗交给他，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将那一半画儿索求过来。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又是十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顾怀大夫一直惦记着老友嘱托，想着法儿要把那个荒谬的

割裂弥合起来，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两半画儿孤零零地保留在两家人手里。

一天，机会的闸门突然神秘地启开了，青年卫兵主动地找上门来，请顾怀大夫到他家里去为病痾沉重的老娘瞧病。顾怀去了，为卫兵的老娘瞧了脉诊了病开出了药方，并亲自为他们配齐了药。后来，每隔两三天他就来一次，瞧脉诊病开方子取药，甚至有些属于护理方面的事情也做了，他用的药全是好药，有的极其珍贵，在一般药铺里买不到只有他家贮藏着那么一点点。不论是行医还是抓药，他都分文不要。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顾怀大夫风风雨雨朝朝暮暮，不知从诊所到病人家往往返地跑过多少次，费尽了多少心费尽了多少力！由于他这样精心地治疗，青年卫兵老娘的病竟然被他完全治愈了。

病人全家对他感恩不尽，给他送去钱他不要，送礼也不接，只急得卫兵和他父亲在家里团团地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顾大夫，您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说不尽，我们就是来生作牛作马整天为您效劳也报答不了万一。顾大夫，今天请您来我们当面要表白清楚，我们家里就这么一堆一块，您想要什么您就说话；不说话，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

顾怀吓得一身是汗，急走上去扶起青年卫兵，慌慌张张、结结巴巴地说：“快起来，别这样！我治病不是为了什么，绝对不是！治病救人，是我们作医生的本份！”

“可您也不能赔上家业来干这营生呀！”青年卫兵父亲在一旁说。

争过来争过去，最后两下里说定，顾怀大夫用一笔很大的价钱买下来他家里挂在堂屋中间墙上的那幅画。事实上，青年卫兵父子两个也早已看出医生对那幅画特别地喜爱，他每次给病人看过了病都要在画前面站上十几分钟。

七

火车一站又一站地向前开，我的中医朋友的脸上显出一阵比一阵紧张的情绪。

“你不是说，题诗的那一半画儿曲志明已经交托给你了吗，怎么又会遗失了呢？”沉默了一会之后我问他道。

“我也正想问你，那位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得到它的？”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到了那位老人的家里。有一次，我在那个城市里挤公共汽车，不小心把一个皮夹子挤掉了，里边有钱、粮票和一些报销单据，还有一个记者证。发觉后我急得一身冷汗，赶忙去公安局和汽车总站报告。后来传来了消息，说是有人拾到了那个皮夹子，通知我到失物招领处去取。当那皮夹子失而复得又完完整整地回到我的手里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失物招领处的两位同志。他们笑着说：“您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就去谢谢那位好心的拾主吧！”我问拾主是谁，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姓名和住址。

那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生得干瘦干瘦，但却很有精神。他说话声音清润柔细，好像很怕刺激了什么的听觉神经似的；而且无论对谁，总是谦逊地陪着一张笑脸。

他很客气地将我让到他的屋子里，在里屋房子正中间的山墙上，我见到了镶嵌在镜框中间的那幅沈周题诗的字画。

我当时只感到题诗的条幅有些宽窄失调，不当不正，倒没有想到它是从一幅画上裁下来的。

“你是说，那一半儿还完好地挂在老人家的山墙上？”
我的中医朋友担心地问。

“是的，完完整整的，看不出有什破损之处！”我回答。

“阿弥陀佛！我还只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它了呢！”

原来，我的中医朋友自从在卫兵那里用可观的价钱买回沈周的那半张画后，高兴得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觉。青山有缘，黄土有亲，该聚合的终久要聚合到一块儿，不该分裂的总归还要破镜重圆！他马上备下了几杯水酒，两道纸箔，偷偷地跑到老友曲志明的坟头上祭奠了一番。现在，经过了十年的苦心孤诣他终于可以告慰于地下的孤魂了。

医生准备到省城里去请一位高明的裱糊匠，求他好好地将两半画儿裱糊到一起，尽量做得精密细致天衣无缝，使后来的人根本看不出这中间还曾发生过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分裂。谁知还没等医生动身，那场能够淹没了整个大陆的狂风暴雨便袭击过来。医生顾怀在这巨大的“政治灾害”面前变得晕头转向失魂落魄，还没等他转过向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到牛棚里去了。他的家也被抄了两遍，那幅画和题诗自然都被当作“四旧”给抄走了。

他在牛棚里受尽了折磨，不仅是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悔恨也成了他沉重的负担。那幅割裂开的两半画儿现在不知落得什么结果，如果早一天把它们归合到一起，不论是被谁拿走，总归还是一件完整的珍贵文物，可它现在还是分成两半儿，放在那堆乱糟糟的抄查物品里边，这不就永远对不上碴口了吗！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他所担心的事。当洪水渐渐消退他从牛棚里走出来时，政府给他落实政策送回了被抄走的全部财物。但是遗憾得很，那幅画儿只剩下了一半儿，题诗的那一半儿又不知哪儿去了。

心愿再一次被割裂开了！

八

我们又找到了那座为高楼阴影覆盖着的两间平房。它比先前更破旧了，墙壁脏兮兮的，窗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块，糊了一张破报纸。我急匆匆地走上前去正要伸手敲门，却被一把破旧的铜锁给挡住了。

我们踟蹰徘徊，在门前走了一圈又一圈。黑夜的影子越来越重了。忽然从夜色中钻出来个小男孩，一蹦一跳地走到门前从脖子上摘下钥匙去开铜锁。这小男孩定是老人的孙子！

“你爷爷出去了吗？”我俯下身子问。

“什么，爷爷？我没有爷爷呀！”小男孩瞪大眼睛吃惊地问。

“你不是孙树本——那位退休了的图书管理员的孙子吗？这里不是他的家吗？”我问。

“啊，啊，你说的是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位老爷爷吧！他，早就搬走了！”

“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又惊又急地望着小男孩的脸问，“你知道吗？”

“噢，对了，我爸爸的本子上记着他家的地址，我去帮你们查一查！”

我们抄下了老人的地址，便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蜗壳小屋，在苍茫的暮色里穿过了几条灯火闪烁的街巷，很快，就找到了孙树本老人的新居。

开门的正是老人自己，他还是那样精神那样利索，只是脸上的皱纹比几年前更深了，铅灰色的头发比以前更稀落了，连尖尖的头顶都覆盖不住了。

“谢谢你，还记着我这个闲居的老汉！你是出差来的吧？快请进屋里坐！你看，政府给我这老骨头也改善了居住条件……”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我们的来访显得额外的高兴，大概一般过份清闲下来的人对于有人来访都会有这番心情吧。

到屋子里一坐下去，我就感到有些不大对头，一种不祥之感马上冲到脑门子上来，因为，挂在三屉桌上边正中间墙壁上的是一幅《五谷丰登》年画，而不是镶嵌在镜框里的沈周题诗了。

果然，我们听到了老人一番苍凉悔怨、感触万千的述说。

原来，在横扫的那年老人还没退休，每天还是准时地提着个饭盒子到图书馆里去上班，虽然那时候图书馆早已封闭了，绝大部分图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戳印给封存起来，但他还是照常地上班，照常风雨不误地躲在图书馆的一个灰暗角落里。

一天，有个带红袖标的头头把他从灰暗的密封箱里叫出去，授给他一项据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革命任务，具体的不说，只说是让他看管扫四旧扫来的古董文物。这些有毒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扩散出去的，否则毒害了广大革命群众责任可就

重大了。革命组织给予他这样的信任，不能不使他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坚守在这个重要的革命岗位上。

老人从一间灰暗的屋子里走到另一间灰暗的屋子里，从前面是面对着一架架蒙着灰尘的书，现在是面对着一堆堆同样蒙着灰尘的古董文物。

有一天，他正翻到“红宝书”212页中的那一段话：“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忽然抬头见到墙壁正中间贴着一件东西，他的眼睛呆呆地停留在那里足有五分钟的时间。那是一张不算太大的字画，字画的背后是个不知啥年月掏出的大窟窿。

老人呆呆地望着字画出神，怎么过去他就一直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个洞，洞上糊着这张字画呢？他再仔细地端详那字，虽然他对书法不甚在行，但那端庄遒劲的笔锋，越看越有吸引人的地方，好像就要从灰黄的纸上凸出来似的。从那两方钤印和纸张的颜色来看，知道是古代一位名人的手笔。他心里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苍凉感和失落感，这倒不是为他自己，像他这样一个从来不值得一提的人心里头压根就没有过失落的感受，方才他这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心想这沈周在古代不知是怎样显显赫赫名噪四方的大人物，而今他的字画连同他的钤印、署名，都成了糊墙窟窿眼子的纸了。这真像宋诗里说的：“何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

寒来暑往，那个触灵魂也触皮肉的岁月终于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许多颠倒了的东西又慢慢地恢复了原样，其中，也包括屋子里那一堆封存起来的古董文物。有些已经归还给了原主，最后剩下来一些就被搬到真正的库房里去了。老人又回到图书馆。而这间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成了无人占用的

空房子。

有一天老人忽然想起了那张字画，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寂寞无聊地躲在那间大屋子里。他便趁天黑的时候偷着走进那间空房子里，情况正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那张字画果然还凄凄凉凉地贴在窟窿眼子上，有的地方边角已经张开了，瑟瑟索索地在风中颤动着，让人看了真有些伤情。一片恻隐之情使老人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他站到一个小凳子上小心翼翼地将字画揭下来，又回家找了张白报纸涂上些浆糊，照原样贴到那窟窿眼子上。

从此，那张字画便镶嵌到他家的玻璃镜框里，成了他退休后闭门索居的伴侣。他常捧着一杯清茶默默地对着那字画出神，让那一勾一撇一横一捺来撩拨他那早已像死水一般平静下去了的心弦。

想不到的是，有一天老人有事外出，等他回到家来再往墙上一看，那幅沈周的字画竟然不翼而飞了。他连忙去问在厨房里做饭的老伴。老伴见他失魂落魄的那个样子大吃一惊，还以为他在外面闯了什么大祸或者身子骨出了什么毛病。及至知道他是为着那张字画着急，才缓缓地吁了口气，噗哧一声地笑了说：“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呢？原不是张纸呀，它叫我给卖了。你说怪不，那个收破烂的进屋就看好了那张纸。我说不卖，他就一个劲的提价。后来你猜他出了多少，足足地掏出一张大票！”

“什么，你把它卖了？！”老人瞠目结舌，呆成了个木头人。

听到这里，我和顾怀大夫都呆了眼，呆得就跟老人当年刚知道这消息时一样。

九

我们跑遍了市公安局、检察院、文物局、废品公司、还有派出所、街道委员会等单位，通过各种渠道费尽各种周折，最后总算把那个巧占便宜的收破烂的人找到。不过，这时已距事情发生之日快近两年了。

“这有什么说的？那张字画是我买下的，后来又把它卖了。都快两年了，我还能一直把它压在手裡！”他眨着两只灰黯得像老鼠颜色的眼睛，若无其事地望着我们说。

“想想看，你把它卖给谁了！当然罗，两年了，一下子不一定就能记得起来。”我们坐在他对面的一条木凳上，忍着焦渴的期望耐着性子地望着他的脸探问。

“卖给谁了呢？一下子可说不清楚了！这两年来我接触到的客商实在不少，国内的，国外的，本省的，外地的，啥人都有，谁能记得那么清楚！”他一边说，一边盯注着我们的脸色，“嗯，有点印象！好像是卖给了一个广东仔，二十几岁，人挺精明。我曾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不过，最近一年来却再没有见过他的面儿！”

“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我们高兴终于有了点线索。

“他姓胡，人们都称阿四，一来就住在那几家有名的大宾馆里。人家财大气粗，阔气得很，咱好意思追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他说的也有些道理。

这样一来，顾怀大夫和他画家朋友的心愿，甚至也包含我的心愿，就变得完全渺茫了。那一半儿会流落何方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了！

但是我的朋友却一直不肯死心，他仍尽一切力量想尽各种办法要把那一半儿找到，从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小的线索，即使明知是无望的事，他也不肯轻易放过。执著的追求让他跑遍了半个中国，仅是广州就去了三次。可是每次带回的都是一个结果——失望，越来越叫人沮丧的失望。可他一直不改初衷，始终不肯放弃那个心愿，一直记着画家老友的话：“割裂开的画如果不能再合起来，九泉之下我是不能安心的！”抱着满腔痛悔而死的曲志明，临终前曾给顾怀留下遗嘱说，安葬他时要将一块白布蒙到脸上，他将一件国宝毁坏在自己手里，是无颜见先人于地下的。

死者的心，生者的情，编织成一张遗憾的大网，只要这两半画儿没有归合起来，这张网就一直罩在他的头上。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了！割裂了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归合了，难怪他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雪，深夜里闯进我的家门。

第二天清早推门一看，雪已经停了，天边乱云堆里甚至还露出太阳一半通红的脸。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早早地来到公安厅，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顺利，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已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们呢。他见我们来后又打电话找来厅里的一位杨科长和省文物局的一位楚同志。

“事情是这样的！”副厅长坐在皮转椅上，两只发胖的手松弛地摊在办公桌上，一边仔细地端详我俩的面孔，一边像是征询意见似地说：

“这位从台湾归来的刘老先生，祖籍四川人，是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去的一个下级军官。几十年的离乡背井生活，使他尝够了孤零海外的愁思苦绪，因之下了决心要趁着身子骨还硬朗时回到大陆来，到生养过他的故乡——

四川去度过自己的晚年。回国后，他向国家捐献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就包括沈周的那一半题诗画。顺便提一下，刘老先生本人也很喜欢书画，晚年时候因乡谊关系得以接近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聆听过张大千先生的一些指教。刘老先生将沈周的题诗画交上来时提出个条件，说这是被人割裂开的一幅画，他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将那一半画儿找到，使其归合到一起，破镜重圆，完璧归赵，还国宝于其本来的面貌。他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也是他居于台湾的一些亲朋好友的一桩心愿。”

“噢，是这样子！事情很生动，也很感人。难为刘老先生的这一片苦心！”我凭着记者的敏感，对这件事情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含义，都感到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真想不到，想不到！这位刘老先生也有着跟我们完全一样的心，一样的感情！”顾怀大夫激动得落下了泪，衷心地赞佩那位刘老先生。

“为了郑重地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准备请您——顾怀大夫，亲自到四川去一次，由我们的杨科长和文物局的老楚同志陪同，携带着沈周的这一半画儿到那里当面去辨认，让两幅归一！”副厅长具体地交待了任务。

“我……”顾怀大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真巧，想不到你也来了！”副厅长又转身向我说，“那可是一个非常庄严而又生动的场面，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镜头，你如果能跟去做点现场采访，肯定会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来！”副厅长不仅懂得文物，也懂得文学，他想的同我想的完全一样。自从昨夜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就一直不能平静，这位刘老先生的义举着实感人。作为一个记者，我当然

更关心那些细节。

我决定与他们一路同行，去天府之国会会这位品德高尚感情真挚的刘老先生，亲眼见见那个庄严生动的场面。

十

我们见到刘老先生，已是午后四、五点钟的时分了。冬至前后白昼最短，看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暮霭苍茫，远近一片朦胧的烟雾了。

刘老先生六十多岁，他说话嗓音饱满宏亮，举止彬彬有礼，待人热诚坦率，而又不失谦逊礼让的美德。特别是当他得知杨科长也是四川人时，谈起话来就更为亲切了。

由于天色已晚，省里的同志提议先在一起共进晚餐，待饭后再进行那庄严的交接与归合仪式。但是刘老先生比我们更为心急，当下里就打开了皮箱，从里面找出一卷捆扎得严严实实的画卷，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展开，铺到我们面前的桌子上。

哎呀，我的天神，这不就是我在树本老人家里看到的那张字画吗！横横竖竖，撇撇捺捺，都还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一眼就可以看到那遒劲的笔锋和雄浑的内涵（当然，它现在裱糊得更为精致典雅了）。再回身看看我的朋友，只见他浑身瑟瑟抖动地俯在字画跟前，嘴巴子张得再也合拢不起来了。

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过题诗字画之后，又把眼光集中到顾怀大夫身上来。他意识到这一点后，赶忙转身过去，打开了省文物局为我们准备的硬壳皮箱，从里边将那半幅画儿拿出。他因为激动两手有些发颤，忙了半天也没有把捆着的

绢带解开，最后还是杨科长帮了他的忙。

两幅画儿慢慢地凑近，接合到一起，大家的眼睛一下子都亮了，又一下子都呆了，在顾怀大夫的眼眶里甚至还溢出泪水来。两幅画儿接到一起是那样的天衣无缝，就像从来没有一个刀痕和剪痕在里边似的，天地间的一切障碍空间都在对接中给压缩掉了。两幅画儿单独存在时的空落、缺陷和不足，一下子全都荡然无存，而合起来后所增添的光辉、风采、神韵与完整和谐的美，都油然而生，清清楚楚地从纸面上活跃出来。

刘老先生也很兴奋，黑里透红的大脸庞更显得红润了。而当晚餐之后我们回到房间里向他回赠一幅伏禅和尚的画时，他就更加激动了，喜得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鞠躬致谢，像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太使我高兴了！这么高贵的回赠礼物，真叫我不敢承受！”

“哪里，哪里，一点小意思！”杨科长彬彬有礼地说。

“这可不是小意思！你们不知道，伏禅和尚的画对我有多么大的意义！说起来还是伏禅和尚的画牵动着，才觅得这半幅沈周呢！”

什么？又是伏禅和尚！又是由他引出来的奇迹，简直是不可思议！

刘老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的海外生涯和逢到沈周这半幅画儿的经过。他靠在沙发背上，脸上还有些泛红，看得出来，今天的兴奋使他多贪了几杯，现在他端着那杯酩酊的铁观音茶，尽量地想用茶的苦劲冲淡酒的醇劲。

有一次，他从美国卡麦尔城回来，正巧与国画大师张大

千先生同一班机，而且就坐在大师身后的一排座位上。因为已经知道前面坐着的是谁，他与身旁的人便都有意地凝神敛息，轻声言语，尽量给大师一个舒适恬静的休息环境。

正当他们说得来劲时，大师忽然回过头来仔细地向刘梦庐先生望了望，并用纯熟的四川口音问道：“你是四川人？多少年没有听到家乡的话了，听起来真叫人感到亲切，比听什么音乐都更叫人开怀！”

这正像古人形容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一样，真是太有幸了！梦庐生在不期而遇的乡音碰撞中得遇大师，得遇与他同乡同里同口音的画坛巨子，使他感情的潮水狂奔侵袭地涌上来，闸门再也控制不住了，两位老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临下机前，大师望着老乡依依不舍，最后说：

“谢谢你刘先生！你使我的乡情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巴山蜀水，好像一下子就都拉到我的眼前了！”大师带着强烈的感情说，“为了答谢你——我在异乡相遇的同乡人，我想赠送你一件礼物！不过，现在它没有带在我的身边，请你到台北后抽空到我家来一下，我要当面把它送交给你！”

真想不到，就这样一个路途邂逅的场面，竟然得到了大千大师如此的垂青与厚爱。

十一

一天下午，刘梦庐先生早早地来到了大师在台北的家——外双溪摩耶精舍。来之前，他为大师寻来了四件礼品——蜀绣、薛涛笺、竹编的花篮和一只节竹手杖。这些东西都是他费尽了很大的功夫，精心为大师挑选出来的。

大师见到梦庐先生进来很是高兴，立即抬手让他坐到自

己身旁。梦庐先生恭敬地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几件礼物，大师很感兴趣，细心地把玩着。

大师缓缓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梦庐先生说道：“前次途中我曾说过要送你一件礼物，昨天我已经把礼物备下了，现在我就去给你取来！”

他转身走进里屋，功夫不大捧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来。到了条案前，他又小心翼翼地将纸包打开展示在面前说：“前些时候有人从蜀中来，带来一包蜀中土，几经辗转到了我的手中，我一直珍藏着如同至宝，闲暇时常常打开来看看。噢噢。我真想多闻一闻生我育我的乡土气味呀！前日感你一片思乡之情，才决定分赠一半给你，让我们共同来享受这珍贵的礼物——难得见的家乡红土！”

一包乡土，万缕情思。梦庐先生望着那抔赭红色的土颗粒散落地摊在纸上，仿佛看到了家乡红土上的绵延丘陵、沃野平畴、瓜棚豆架和流水人家，十载风雨，十载炎凉，十载思乡的梦，都被这一抔家乡的红土给勾惹起来，他竟有些不能自己，咽喉梗塞，心头酸楚。

大师默立了良久，眼望着条案上的那几件蜀中的工艺品，不由得深沉地吟哦起来：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吟过之后，随即伸手提过笔来，立即在桌上铺着的一幅画着几叶擎雨残荷的画上，题写了这几句诗。书过把笔信手一丢，将身子靠坐在藤椅上，仰天叹了一口气后对梦庐先生说：

“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闲谈中，有人提到前个时期他去香港时曾见到文物店里摆着两张伏禅和尚的画儿。这个消息对别人尤可，而对梦庐先生则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前面说过，他的叔父年轻时曾跟随伏禅大师学画，后来又跟随着他皈依佛门。伏禅其人其画对他家的影响可以说是太大了。前两年他叔父还托人捎来信说，如果见到有伏禅的画流落在外面，无论花多少钱也要帮助他买回来。

梦庐先生虽然听到消息后立即起程赶到香港，但却刚好晚了一步，那画已在几天前卖出去了，转落到何方已经不知去向。这事很使梦庐先生烦恼和懊伤。有一次，像是鬼使神差似的，他来到一家很不显眼的店铺面前，他那惆怅迷茫的眼睛像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下，突然一阵发亮，在七尺柜台上见到了沈周的这幅题诗字画。好像当时他也没顾得讨价还价，立即就把这字画买下来了。

回去之后，他将那幅字画拿到大师那里。使他最感到震动的，是大师当时的面部表情：既有震惊、喜悦、赞赏、爱慕，也有气恼、惋惜、痛恨、谴责，万千感情和思绪，都在那一瞬之间触动、凝聚和迸发出来。

“这不是一幅完整的书画，是被什么人愚蠢地割裂开了！”说着，他用手指着右面的边缘对大家说：“你们看，仔细地看，这里不就是明显的裂痕吗！”

“这个人真蠢，他必是把画当成一块木头，想分家各自锯取一半就是了！”有人在旁议论说。“黄金有价宝无价！这无价之宝怎么可以随意毁了！”另一个议论说。

“也不知那一半画儿现在落到什么地方？”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谴责那个割裂者，都为这件珍贵的艺术品惋惜，忽然座中有人提议说：“梦庐，你如果能把那一半画儿找到让它们破镜重圆，可算是做了一件于国家于后代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梦庐先生听到这话受到强烈的震动，像夜空中突然划开一道强光闪电。

“是呀，完璧归赵，这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们传颂为至善的美德！”

梦庐先生回去想了想，人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心愿，就是一种力量，众人一致的心愿，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决心下定之后，他立即就去见大师，告诉大师说他决定趁现在身体还健壮，定要把那一半画儿找到，好让一件珍贵的国宝重新归合起来。大师对他这番决心非常地赞赏，除了说些嘉许和勉励的话之外，还感触万千地吟了两首诗：

女儿香色自堪夸，兰蕙由来是一家。

总觉涪翁无意识，强分独萼与多花。

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

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

就这样，梦庐先生便带着大师的深情厚谊，带着沈周的那一半画儿回到家乡。等他望到了日夜思念的巴山蜀水之后，事情真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海捞针也终于捞到了。

十二

四月末，在江南恐怕已经是花老春深的时节了，可是在北方却刚刚见到春的影子：杨树吐着一卷卷毛茸茸的绒球儿，滴里嘟噜地挂在返青的枝头上，白桦披散着刚刚绽开的又尖又细的嫩芽。

我陪着我的老朋友顾怀兴致勃勃地走进省城新近举办的“我国历代名画展览室”。我们的心都像春天的风一样飘逸轻盈。我们绕过了人群，绕过了一幅幅各领一代风骚的名画，最后终于走到了它的面前——那幅完整无缺的《青藤揽舟图》的面前。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像这样地看到它，这样完完整整、精精神神地悬挂在画廊雪白墙壁上的它。过去，两半的画虽然都已见过，但那是分开的两半儿，全然无法与这完整的艺术品相提并论。虽然同是一张画，但分开来与合起来的效果是绝然不同的。你看，那依附在古树上的青藤，那溪水潺潺中的扁舟，再配上那绘情绘色的题诗和铃印，它所生出的能够容涵万千的意境和旷极八荒的联想，都是人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这正像俄罗斯伟大评论家、美学家别林斯基在《谈论一座女爱神雕像的欣赏体会》时说的那样：“这个形象使我惊赞，是凭它的整体和一般表情，而不是凭某些部分的线条和突出点。生命不在眼睛上，也不在唇上，也不在腮上，也不在手上和脚上，而是在面貌和整体形体上，在那身体上的一切线条、突出点、轮廓的圆满以及四肢各部分的和谐上。”

我庆幸，我们终于寻觅到了一座女爱神的完整形体上的美的和谐。

毛泽东与三记者谈 话的前因后果

你读过毛选二卷上那篇《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家喻户晓、不断为人传诵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当初，这三位记者是怎样闯入毛主席在延安那间办公室，提请这位巨人在历史转变关头发出这震撼历史的声音呢？

说起来，三位先生都是当代的名记者，都有着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记者生涯。先说中央社的刘先生吧！他本名刘尊棋，193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曾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一起蹲过北平陆军监狱。他在狱中用机敏巧妙的手法，将狱中的黑暗统治和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受迫害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封信，辗转递到人权保障大同盟宋庆龄、蔡元培的手里。宋、蔡见信非常气愤，立即派出代表，并邀请中外记者一道去北平监狱探视。在同犯人见面时，刘尊棋用英语揭露了国民党监狱中的种种弊政。1933年他出狱后，先与范长江等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后又与孙伏园等创办中外出版社和《文化周报》。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联合日报》

和《联合晚报》。解放后担任过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主编，《中国日报》主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审。

耿记者名坚白，是位老先生。当年去延安采访时，刘、张二位都在英姿勃发的二十几岁年纪，而耿先生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与张国焘、朱自清等同在哲学系里读书。在建党初期便受李大钊的委派，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去发展党组织，曾一度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27年后脱党，但仍倾向进步。解放后任民族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宁夏大学教务长等职。

张先生名西洛，四川人，1936年入党，去延安时才只有二十一岁。他一生只干记者一种职业，一生都是与报纸打交道的。除了在《新民报》任职外，还创办过《星期快报》、《工商导报》。解放后，在《光明日报》任国内部副主任、《人民政协报》任副总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1939年，历史宏恢而沉重。日寇侵略的魔爪已经伸进神州大陆的深处，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的周恩来、郭沫若等提出倡议，要组建一个“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赴到各个战区去慰问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全军将士，这个总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任会长，下设南北两个慰劳团，张继随北团行动。

北团由贺衷寒领导，行动路线是重庆、成都、西安，然后由西安再辗转到各战区去。刘、张二记者随北团活动。耿坚白是《扫荡报》驻西安的记者，8月中旬，慰劳团由襄樊

老河口第五战区回到西安后，他也参加了北团的活动。随团同行的还有文艺界代表老舍先生和两名摄影师韩仲良与徐剑秋先生。

8月下旬，北团从宜川过黄河到了山西吉县古贤村，在那里会见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然后又渡过黄河返回陕西洛川。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路线是过延安，去榆林，因为邓宝珊将军的晋陕绥边区司令部设在那里。

在临出发前，团长贺衷寒突然将三记者找去，告之明天去延安和榆林，要他们不必同行了，可回到西安等候，俟慰劳团返回后再一道去甘肃、宁夏等地。很显然，那个被称之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是在捉政治迷藏，他不愿意记者去解放区采访报道，要想尽办法封锁边区人民抗战的真相。

这对三记者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延安是敌后抗战的中心，也是他们久已向往的地方，作为记者，神圣天职就是不避艰险去报道人民最关心的事。于是，他们与贺衷寒据理力争，申明他们从重庆出来一直与团同行，没有理由中途将他们甩掉。贺被诘问得无话可答，只好退让一步，允许他们同去延安，但必须遵守一条纪律：不准报道一个字。

9月5日，慰劳团和三位记者离开洛川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郃县。这是国共两个地区的交界地，县城南部是国统区，县城北部是解放区，两个县长都出面前来迎接，两个人身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作风。国民党县长穿的是料子服，大皮鞋，点头哈腰，虚与委蛇；共产党的县长只有二十来岁，穿着灰粗布制服和布鞋，但却显得朴实大方，忠厚干练。过后，老舍感叹地对记者张先生说：“从两个县长身

上，就看到国共两党的一个缩影！”

晚上，他们到达延安。延安群众和各机关、学校、军队代表数千人已列队迎候。谭政、肖劲光、高岗、滕代远等领导同志也都出来迎接，轰轰烈烈的场面使国民党元老张继老先生很受感动，他从汽车里走下来，用手摇着帽子向群众致意。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亲自出面接待慰劳团，并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参加了有千余人欢迎慰劳团而举行的大会。毛主席那天情绪很高，他在欢迎致词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正在酝酿发动的反共高潮而进行的阴谋活动和蓄意挑起的磨擦，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和批驳，告诫国民党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并明确地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致辞后，国民党元老张继老先生情绪十分激动，他在讲话时声泪俱下，抚今思昔地说：“我听到毛先生的欢迎词后，非常感动。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这也就是总理领导我们革命的精神。我参观抗大时，我问抗大校长，一个学生每月吃多少钱？他说每天每个学生只有一斤半小米和六分菜钱。我听了非常感动。过去在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是第一个。今天的情况改变了，国共两党正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之间虽然有小磨擦，但是通通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共同打日本的，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我的脑筋很简单，现在我简单地来讲救国道理：我们中国人只要战、战、战，只要打、打、打，就够了。只有战，

国才能不亡；不打，讲什么主义也是无用！”

接下来，文艺界代表老舍先生也被请到台上讲话，他特别强调文化界在团结抗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介绍了大后方文化界在“文章下乡”口号的动员下所取得的成绩。他那幽默的言语、真挚的感情，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有很多人要求他演出文艺节目。老舍先生也不推辞，当下就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下有人知道三记者中的张先生曾是抗战宣传队的，也欢迎他上台表演节目，张记者大大方方地唱了两支陕北民歌。会后是文艺演出，有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鲁艺首次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11日清晨，慰劳团动身北上，乘车奔赴地处塞北的榆林。谁知道到了榆林后便风云骤起。9月17日晚上，在榆林各界于榆林中学大礼堂开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并欢迎慰劳团莅榆的晚会上，贺衷寒走上讲台大放厥词，叫嚷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攻击陕甘宁边区。榆林地方本来就复杂，反共分子慑于邓宝珊将军坚持国共合作的坚定态度不敢冒然肇事，现在，听到贺的讲话便都轰然而起，首先跳出来的是边疆通讯社的社长、中统特务赵尺子。他在会上公然大叫说：“抗战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的指使，靠唱歌和喊口号闹起来的”，是“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是基本国策的流产”等等。这一派胡言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都站起来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表达了怒火中烧的愤怒感情。

这种丑事在榆林地区还是第一次发生，邓宝珊将军心里

很是不安。这时，正好他的老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同志驻在榆林，于是他便去找南商量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南的意见是针锋相对，必须态度明朗地给那些反共分子以坚决的回击，打退逆流。他们当下商定，马上就把手尺子作为靶子，在《陕北日报》上将他的讲话公开发表出来。赵尺子的讲话一见报后，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唾骂之声。慰劳团的三记者也很愤慨，他们找到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先生，还有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分社记者段复生、孙承佩等，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赵尺子开除榆林新闻记者协会，并发出呼吁书，要求当局将赵驱逐出境。榆林市的商界、学界、文化界和市民群起响应，各处都在开声讨会，把呼吁书一封封地递到邓宝珊将军的司令部里。这一下子赵尺子不得不像一条丧家之犬，灰溜溜地夹起尾巴从榆林溜到西安躲起来。

9月21日他们又返回延安。这时，正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二次来延安，三记者在继续参观延安各工厂、机关、学校之余，还专门去拜访了斯诺，并同斯诺先生做了交谈。其中，刘尊棋的英语最好，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翻译并出版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威文基10万多字的论著《天下一家》一书，因之与斯诺先生谈得比较深入融洽，受到了斯诺先生的很大启迪，再加上他们一路上的感受和激发，当时三人晚上躺在窑洞的炕上久久不能入睡。彻夜议论着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交换着各自的心得体会。他们都深刻地感到反动派封锁边区消息所造成的危害，特别是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所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统区反动报刊上天天充斥着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种种造谣诬蔑，更是

令人气愤，作为一个有良心，有历史责任感的记者，完全有必要将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做出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事实真相，揭穿和打退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共高潮。

然而作难的是，贺衷寒事先已经有了禁令：“不准写一个字”，怎样才能突破他的约束呢？大家反复商量，最后终于找出了一个好办法，决定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讲话。这既突破了贺的不让记者写一字的禁令，而且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出面讲话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为有力的。热情的激励使他们马上从炕上爬起来，立即讨论和草拟出一份采访问题表来。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将问题表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几位负责同志。很快，交际处长金诚同志就告诉他们：毛主席说，他十分欢迎记者们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那天下午，他们去延安郊区参观了一个工厂，五点多钟回交际处时，远远见到窑洞前面土坪上站着一个人，高大的形象使他们立即辨认出那是怎样一个人物来。他的穿着正是人们在照片上经常见到的那样：一套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衣服、布鞋、灰布八角帽，满脸笑容地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三个记者赶快奔过去同毛主席相见。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来！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毛主席把他们让进交际处五孔窑洞中间的一座，里面有一张长桌和十几个凳子。节气已近中秋，不到六点天色就已发暗了。交际处同志点燃了两盏油灯放到长桌上，另外摆放

着一些茶水、香烟、瓜子之类的东西。主席热情地招待他们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先生们。我们延安不像你们重庆，但是延安的葵花子是很不错的，我们就一面嗑瓜子一面谈话吧！”他谈话时总是带着从容的微笑和愿意交流思想的眼神，声音有时和婉，有时高亢，甚至有时激愤，但不管谈论什么问题，都让人产生一种不可磨灭的信赖、慰藉和向往的感觉。

毛泽东首先向三位记者打听来到延安后的观感。这倒使他们想起在边区大门口酃县所见到两个县长的事。他们还把老舍先生当时说的那句话也给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在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专门做了阐述，他详细地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县长，有些是民众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接着，毛主席又看着三记者提出的问题表，按照顺序，一一地做了答复。当谈到国民党在抗战队伍中制造磨擦、闹分裂、大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他的态度严肃起来，坚定有力地挥动手臂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接着，毛主席就讲出了那句为人广泛传诵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的名言。

那天，谈的时间很长，当大家送毛主席走出窑洞时，已是满天灿烂的星斗，远山现出一片朦胧的影子了。

第二天上午，在他们将要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来交际处看望，与大家一道合了影，给每个人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签名。

慰劳团在9月23日离开延安，过了不久，10月6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就将这次谈话记录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的题目发表了。10月1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转发了此文，各解放区的报纸也都做了转发。至于三记者所处的报社，虽然他们都寄回去复写的稿件，却都压到总编辑的抽屉里，没敢让它与广大读者见面。所幸的是，他们同时又将稿子寄给范长江同志主办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将谈话稿发到香港、南洋等地，有几家华侨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出来。这样，这次接见三记者的谈话，就在中外发生了震撼历史的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编纂《毛泽东选集》时，便将这篇文稿收入到第二卷中。1991年出第二版时，仍然全文保留，而且将注释由原来的3条增加到9条。这也足以证明此文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至于三记者呢？耿先生1968年病逝于宁夏银川。刘先生1993年9月5日病逝于北京。年纪最轻的张先生现在仍然精力旺盛，为繁荣祖国的经济、文化事业做着有益的工作。

重奖的震荡

广西柳州市去年产值突破了百亿大关，成为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大中城市中第一个进入这个档次的城市。而且利润率、资金占用率也都居于全国之先，经济效益显著，成为依靠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带动国民经济高速高效发展的一个先进典型。前不久，朱镕基副总理到该市视察后非常高兴地说：“柳州市的形势非常好，工作做得不错！”

去年初春，在小平同志谈话精神鼓舞下，柳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各企业凡是年增利税100万元，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市政府给予企业领导班子一次性重奖。政策既出，就要兑现。今年新春一过，市里便召开了隆重的颁奖大会，让功臣们胸带红花走上颁奖台，四十四家获奖企业的代表捧着507万元奖金，在军乐伴奏声中荣耀地走下台去。

一石激起千层浪。像柳州这样用巨款奖励企业家的还不多见。因之在大街小巷，班前饭后，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一时间重奖成为最热门话题，触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要不要重奖？怎样颁发和分配这些奖金，包括受奖者本人在内，都各有各的认识。记者为此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做了广泛的采访，感受到了人们因这件新生事物所产生的不同心态和

不同反响。

大多数党政机关干部认为，市委、市政府重奖四十四家效益增长显著的企业领导班子，路走得对，拉开了档次，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既体现了按劳分配政策和原则，又引进了竞争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动脉里注进了新鲜血液，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个有力措施。

但也有人认为，奖金发得太多，差距一下子拉得过猛，既加重了市财政的负担，也使广大职工心理缺乏一个调整过程，一下子承受不了。

企业广大职工和中层干部对于重奖厂长也还是服气的，他们说：“一个厂长管的事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企业的产供销，还有职工生活福利等事，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厂长干的活决不限于一般职工上班的8小时。他们是昼夜奔忙，干出了成绩应当重奖！”有的工人态度鲜明地说：“没有个好厂长，工厂就没有好效益，也就没有职工的福利。重奖厂长实际上也是与职工的利益密切相关的！”

许多市民听到重奖厂长也都感到振奋，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兴旺发达的显示。企业有了前途，人民生活也就有了奔头，照这样走下去，小康必到，四化必成。

但是也有人认为，企业成绩的取得是全体职工同心合力干出来的，只重奖企业领导有些偏颇，不太公平。

几位领奖的企业家，则另有一番感受。他们既感到这是对他们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鼓舞，但同时又有许多难言的酸楚。在重奖中拿到头奖的柳州钢铁厂厂长褚朝元对记者说：“拿到重奖说明企业家的地位受到了重视，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过去群众只看到科技人员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发

明创造是有形的，而企业管理是一种软件，不容易被人看到。”

柳州工程机械厂厂长张沛说：“市里重奖政策一出台，就对我们工作起到强大的激励作用。为了在各方面赶上去，我们在去年5次调整年产量。说实在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奖金本身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感。”

谈到心里的酸楚，柳钢党委书记林善似说，“我们刚拿到奖金，有些人便风言风语地说：柳钢去年的产销量和税利的大幅度增长，全是靠钢材涨价得来的，靠的是走大运，要不要厂长和书记都无所谓，谁当厂长、书记都一样。这话讲得很不公道。我们去年虽然是沾了大气候的光，但企业班子付出的心血那是实实在在的，人们是有目共睹的。”柳州微型汽车厂厂长金振华也对记者说：“市里对企业班子发重奖，我们感到是件好事；在市里重奖的启示下，我们也注意到对厂里职工的重奖。去年，厂里做出贡献的职工都拿到相当数量的奖金。但有人看到领导班子受到重奖还是议论纷纷。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不到有米之炊也不好做呀！”

带着这些不同反映，我走访了副市长陈明贵和市委秘书长于开金，他们态度鲜明地说：“看重奖好不好，关键看它是不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我们去年重奖政策一出台，全市便掀起了增产增收的热潮，许多厂都提前完成年度生产任务，创造出今天这样的辉煌成果，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奖出去的是507万元，而多增收的税利是4.2亿元，从这个简单的算式中谁都可以算出重奖政策的效应来。”

市长刘炳焯对记者说：“有人说，没有重奖政策，照样能完成任务。这话固然是说出了一种可能性，说对了一半

儿，但并不全面。如果没有重奖政策，国有大中型企业内部就缺乏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企业做好了只能是个常规的发展，决不能出现超常的发展。去年柳州能够创造出那样好的经济效益，正是因为我们引进了竞争机制，加速了企业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至于说，‘换谁来当厂长都能照样得奖金’，更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轻率判断。他们把事情的关系割裂开了，孤立地看问题，完全抹杀了企业家的汗水和智慧。同样的大气候，为什么有的企业能够超常地发展，而有的企业不能呢？一个企业搞得怎么样，领导班子是关键。朱镕基副总理视察时的一段话讲得很透：搞好一个工厂，光靠厂长一个人不行；但搞坏一个工厂，靠一个厂长就够了！”

柳州重奖的震荡还将震荡下去，而且还将扩延，因为今年柳州市委和市政府决定：不仅要继续坚持重奖政策，而且还将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精神文明领域。

追 捕

“啊，朋友，我年轻的朋友！我知道，你们也像我一样，在看书或者是听人讲故事的时候，总是喜欢抛开对风景环境和衣着服饰之类的描述，径直地去追逐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因此，我在叙述我的悲惨往事、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的苦难一生时，我将尽量抛开那些氛围方面的铺展，直截了当地去讲述事情本身，讲述那些荒唐诡秘、离奇古怪的遭遇。但即使是这样，故事也将是长而又长，像一条扯不到头的神秘锁链。因为，这中间的历史跨度实在是太长了，足足有四分之一世纪。压在我背上的岁月残骸太沉重了，隔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广漠的、铺着纵横交错的历史辙痕的时空。因此，当你们恳求我敞开心怀、原原本本地按照时光流逝的轨迹讲述那迷茫的往事时，我的心几乎因为颤抖和惊悸而炸裂。我抬起头来望到你们那一张张真挚的、洋溢着青春光彩的面孔时，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将永远感激你们给我的慰藉，使我通过对回忆的梳理与钩沉，尽量将仍然披在我身上的坟土和征尘以及枯草败叶的碎屑抖落掉。不过，我很担心

你们会听不懂我的话，把每一桩事都当成是洪荒的沉船和远古的桨声，像听天方夜谭似的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因为，你们毕竟太年轻了！你们当中最大的一个，也只有我一半的年龄。当我那不幸的故事开篇时，你们的稚嫩的生命还没有沿着晨光的溪流漂浮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是这样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们的心情变得和他一样的深沉、浓重而又幽邃旷远，无边的思绪像是在飞升，又像是在沉落，沉落到什么地方，沉落到哪里，谁也说不出来，只感到有一层迷茫而又发着亮光的雾，从心头荡荡地浮起，又在眼前飘飘地闪过。

他，五十多岁，但并不显老，挺拔匀称的身板和潇洒自如的举止，仍然保留着一定的风采和气度。当然，脸上有皱纹，后背也有些佝偻，但不管怎么说，他在我们眼里看来，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种苍老的痕迹。我们都叫他史老师，实际上，他既是个老师，又不是老师，他在教师的编制里，而且又得了个副教授的头衔，但却从来不讲课，每天只在家里作画。画呀画，每天每夜地画，素描、写生、油画、板画、暖色的、冷色的，什么都画，而且，产量相当地高（虽然艺术品主要不是用数量多少来衡量其价值）。只要一两个星期不来，便会见到有一两幅新的作品摆在他的房里，而且每一幅又都是那样的精彩、动人。

我是在一个多月之前才认识他的。那时，我正因为期末考试中间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烦恼着。

考试已毕，放假之前，是学校里气氛最为活跃的日子。学生们如同经历了一场十分险恶的困战，现在总算是冲杀出来了，虽然疲惫不堪，但是心情却宽敞明朗得很，一身的轻

松，看啥啥有趣，看哪哪鲜亮。要办的事情嘛，当然很多了，但是眼下却不急着去办，要愉快轻松、轻松愉快一阵子。然而，这一阵子又是异常的短，刚一轻松下来，马上又想起许许多多要去做的事情。青年人的心，真是不可捉摸！青春的火焰闪烁不定，但永远不忘燃烧，这是这个物体的固然本性。

于是，大学生宿舍里又忙碌起来，往来如梭，凑成各种论坛。校团委、学生会、任课的教师、还有学生们自己，各条线都在结网，忙着建立假期里的各种各样活动组织。有的结伴要做半个中国之游，有的要去农村搞调查研究，但大多数人则愿意去开拓一项事业，报名到各种咨询公司、服务公司、开发公司的人特别多。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自有他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大学生都不相同。不知有人做过这类民意测验没有，但据我的观察，现代的大学生大多数人的意向是想成为一个实业家、实干家。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的时代，生产信息、整理信息、传递信息、利用信息，已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人们对于知识、事业、价值、荣誉等观念的理解，已与过去有所不同了。我们是信息时代里的人，总要学会在信息时代里生活的本领。这是无法阻拦的大趋势。我们要与世俗的传统观念做多么深刻的决裂呀！这是我们上一代人进行痛苦的决裂时无法想象的，也无法比拟的！

他们也来邀我，而且是一拨走了又来一拨。我羡慕他们，但却不想答应他们。心中的烦恼是一回事，趋向不一致又是一回事，我是属于对信息感应不够灵敏类型的人。“哼，书呆子！”“看吧哥儿们，人家是研究生的竞选人！后补硕

士！”今天，这些话已经不含任何讽刺意义了。俄国的一位大作家曾经说过：人生总的趋势在于划分。而当代大学生的划分趋势却是更为明朗化，成熟得更早些。一般来说，读过两年大学之后，这种划分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便已形成了：实业型的、政治型的和学问型的。三种显然不同类型的人才，已经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心目中，被有意识地选择与被选择了。我，早已被人们看作是后者。据我了解，像我们这种甘愿在书堆里找陶醉、准备做最没出息的爬格子生意的人，在大学生中只占一、二成的少数；就像只做超低空飞行（只求六十分及格通过）的人一样，是均衡的少数两极。

星期天，一早起来天气就很闷热，空气湿漉漉的，抓一把都能攥出水来。浑浊的雾凝滞在树梢和楼群中间，浓密得连燕子都飞穿不过，我夜里没有睡好，各个活动小组都活动得很晚，热烈欢畅的冲击波冲及到各个角落，你想睡也睡不好。早饭后，我找出几本与我选攻的课题有关的书，正准备寻个安静地方去摘录一些卡片，307寝室的田滕走进来，按住我手里的书本说：“唉，苏小泉，老泡！”同学们都这样叫我，因为我老是泡在图书馆里，阅览室里和教室里。“走，跟我去看一个人去！不，准确一点说，请一个人去！团委准备在放假前为美术爱好者组织一次报告会，因为有不少的人想在假期里游历名山大川，搞点野外写生哩！”

我对绘画一道，多少也有点兴趣，虽然这种兴趣时浓时淡，就像盛夏的天气时阴时晴一样。田滕单单来找我，不是因为我在业余摄影绘画展览里每次都能拿到一项不太靠前的名次，而是因为我们俩平日里满谈得来，有那么一点点感情交流的友谊。

“到哪里去？”我问。

“去请一个画家，一个命运悲惨的画家！”

“这与命运有什么关系？我们请他讲的是艺术，不是请他讲命运！”

“没有关系？那当然了！唉，也有点关系！不是命运，我就遇不到他；没遇到他，也就不会去请他！”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画家老师。他给我的印象是感情浓烈，喜欢谈吐，而且思路敏捷，饶有风趣，不论是对谁，谈论任何一个话题，他都会产生浓郁的兴味，而且能说出一些精辟的见解来。他同我所见到的那些披长发、留胡髭、不苟言笑、目光冷漠、经常浸沉到无边深邃的内心世界里的画家们，是不大一样的。他是个外露型的人，喜怒哀乐全都见诸于言表，对身外事物的万千变化，随时都产生感应。他不大像个画家，倒像个社会活动家。我的理解，太多的言词不是造形艺术家的气质。可是，外表的印象总归是外表的，他到学校给我们做过报告之后，从外表上得来的印象就给冲得淡淡的了。他在谈论艺术问题时，洞测之深是惊人的，提出的问题也是极为大胆的，感染力浓于最醇的酒。那次报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因此从那以后，我与田滕还有几个年纪更轻的同学，假期中间常到他家里去。

与他接触越多，越感到他有许多与人不同之处。他与人谈话时是随机的、敞亮的、无拘无束的，可是一拿起画笔来却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神情肃穆，目光灼烁，执著地追求，不肯纵容丝毫的随意。这时，他完全沉陷在激情的奔流里，不给自己留下一点转身和喘息的余地。他作画的方法是很特别的，常常是同时画两、三幅画，画室的每个墙角上

都支着一幅画架子。他在屋里来回地走动，轮番地到各幅画前去作画。一忽儿，扑到这个画架子前面画上几笔，等到把心灵中捕捉到的那点新鲜感受都涂抹到画布上之后，他就像一只倒空了的酒瓶子，腾地将自己抛在对面的沙发上。疲倦地点起一支烟来，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一边仔细地去端详另一幅画，另一幅题材完全不同、风格不同、表现手法不同的画。有时望得出神，竟会完全忘记指间夹着的香烟，直到烧疼了手指，他才把烟头掐死在烟缸里。等到凝思中又产生了什么灵感，他便又跑到那另一幅画前，把灵感中的印象都铺陈到画布上。而后又是静坐，凝视，沉思，又是奔跑，挥毫，涂抹……

使人感到更为诧异、稀奇、困惑不解的，是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独身者。按理来说，不论是从哪一个方面，他都不是找不到一个合适对象的人。可是，他却自始至终一个人。我们都想知道原因，但却又不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唯恐有刺伤他感情的地方。但是后来接触多了，不知道是谁，在谈话中还是有意无意地把这个疑惑表露出来了。我们都很担心惶惑、局促不安地望着他，他却毫不介意地耸了耸肩头，坦然地笑了笑说：

“青年人关心老年人的婚姻与恋爱？哈哈，有趣！这个问题不应当是你们来问我，而应当是我来问你们！”

大家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屋里的气氛是尴尬和沉闷。他好像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只停了片刻，便又寻找话题打破这个僵局：

“你们可以想象，如果我有繁重的家务在牵累，我能够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如地挥洒画笔吗？如果有个爱人睡在我的

身旁，我能够半夜里忽地爬起来，打开灯匆匆忙忙地把我捕捉到的一点灵感，三笔五笔地涂抹到画布上吗？或者是像个夜游神似的，通通通地跑到楼下去，到林荫路上去感受黑夜的朦胧颜色？等到露水湿透了全身，两个膝关节像被锉刀锉断了似的酸痛，我又会在别人都起床的时候，蒙上被子睡下去。你这样一折腾，还让不让别人睡觉？所以，俄罗斯大画家卡尔·布留洛夫只结婚一个星期便离婚了，受不了那沉重的枷锁！”

“可他终究是个例外，不会由此得出任何结论！”田滕打断了他的话。

“布留洛夫当然是例外，我，也是个例外。我和别人不同，命运只能让我做这样的选择！”他沉默了一下，接着又说，“我要想在生活中抓住点什么，就只能不停地作画，不停地……我遗失的东西太多了！遗失的岁月，太多了！现在能够寻找回来的，只有画，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拚命地去作画！我放弃了选择婚姻家庭的权利。决心放弃了！因为，留给我的时光不多了，让我能够多拿出几幅画来吧！”

“您的画已经不少了！”我们说。

“什么，不少？少得可怜！张大千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少幅画？毕加索、柯罗、劳伦斯、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布留洛夫，留下了多少幅画！而且，篇篇都是不朽的杰作。我，唉，太晚了……”他默默地低下了头，没有哀怨，没有惆怅，没有感伤，只是默默地坐着。

我们不好再问什么，便一个个相继站起来，悄悄地从他身边离去。

使我们对他更为感到惊异、感到神秘、感到兴趣的，是

那幅最近在美术馆里展出的画。一天傍晚我们见到他时，田滕拿出一张晚报指着右上角的一条消息说：“报纸上还专门评介了您的那幅画！我们怎么没有听说您搞这么一幅巨作呀？”他笑了笑，说：“那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你们都看过了那幅画？”我们点了点头。

那确是一幅不寻常的画，在展览馆里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它立意的深远恢宏，构思的精湛奇绝，表现手法的不同凡响，都是惊人的。画名叫作《自述》，取材于我国历史上那位功名显赫的元帅。画面上的光线极为黯淡，就像黑夜里的梦，因此，一切背景都是模糊不清，让人无法辨认的，一切时空的痕迹，都消逝在那黑色的梦魇里。元帅披着战士穿的那种棉布大衣，没戴帽子，露着宽阔而秃顶的前颅。明显这不是在户外，而是在比户外更为阴冷的地方。那是一张非常典型的面孔，在每一条皱纹和神色里，都刻画着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各种痕迹：宽厚的嘴唇和稀疏的胡须，不用仔细端详就可看到农民的质朴，温厚，那高耸的眉棱和倔强的下巴显示了敢争敢抗的骨气和宁折不弯的性格，而那宽阔而又饱满的前额和那深沉睿智的目光，又明显地流露出大将军的风度。元帅手里正拿着纸笔，写他那太行雪暗、黄河冰寒的《自述》。但他当下没有写，只是紧紧地握着那管笔，捏着几张得来不易的纸，陷入深沉的凝思中。他的目光凝聚，头部微扬，神情端庄沉重而又豁达洞悉地望着前方，透过黯淡的光线，望着人们还看不大清楚的前方。

我们都被这幅画给震慑住了，久久地停立在那里，连气都喘不过来。艺术召唤来神圣的感情和凛然的正气。千秋的功罪、荣辱、毁誉、褒贬，都浓缩到这五尺见方的画面上。

透过那些线条、折光和彩块，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敲击、心灵的痉挛和时代的回声。有人说我们这茬大学生是最嫩的一茬大学生，没有历史的眼光，不重视历史，就其主体思想来说，是未来型的，眼睛只望着下一个世纪，只望着第四次浪潮，只望着海外的和国内的大趋势，只望着别的星球上的物质文明。这是一种误解，一种肤浅的测试，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断层的深度。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毫无疑问，我们更多地关心未来学，关心着下一个世纪的事情，关心那时的产业结构和生态平衡，关心那时的污染程度和消费心理。但这是一股激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激流之中，重要的是，要看到我们奔放之中的浓重，追求之中的固执，渴望之中的回瞻。有人说：他们身上没有历史！这是不对的！我们虽然只有小小的年纪，却仍然是历史的儿子。我们民族所负担的沉重历史，我们从血液中、感情中早已继承过来了。但与我们的父辈、祖辈不同的是，我们更正视历史，注意从历史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为历史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污染毕竟还是轻的，不像我们的父辈和祖辈。

“你们听到人们怎样议论这幅画吗？”他仔细地环视了我们每个人的脸，无疑，他从我们的眼神里看出来不同的反应，看出来有极欲隐藏起来的感情。

“我耳朵里早就装满了！”他不等别人说，自己先开了口，“众说纷纭，褒贬各半。有人说，背景太暗，这是给过去的年代抹黑，会把我们自己都否定了。有人说，整个气氛太冷酷，让人的心灵承受不了，产生的效果肯定是消极多于积极……”

“也有人说，历史的成份太重，艺术应当着重表现当前，

孤立地渲染历史片断，会冲淡了时代精神。”田滕将我们听到的议论告诉他。

他的脸色明显地阴沉下来，嘴角剧烈地抽搐着，晃动着颀长的身子在屋子里不停地走着，留给我们一个略微有些佝偻的背影。他为何这样激动？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大家都要有个历史的眼光；但我们应当正视历史，应当把那些让我们感到痛心、感到焦灼、感到悔愧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这对未来是有好处的。让每一个掀到这页沉痛历史的人，心灵都感到战栗。而且我还认为，常把历史的沉痛拿出来回味回味，能够使我们今天的现实看得更清晰，更冷静。勾践不是常叫人向他提醒国破家亡的历史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每一件沉痛的往事，不论是大事件还是小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大人人物身上还是发生在小人物身上，凡是深沉一点的，都有借鉴的意义，都是我们的珍贵遗产，在建造新的生活中，都是一份价值很高的材料。

“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属于未来型的人，就不看重历史。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不管是第几次，也都要从第一次说起。没有第一次，哪来以后的第几次呢？多知道我们昨天是怎么走过来的，看看人们在那场噩梦中丧失掉的都是一些什么，你们这些嫩得一掐就要流汁的小青年们，就会明白我们今天更应当珍惜什么！过去的，固然是已经都过去了；但是，过去的不应当让它白白的过去，起码应当让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启迪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常说付学费，而付了学费又没学到什么，那倒是可悲的！”他坐到沙发上，两手抱住了头，深深地埋藏到两膝中间。沉默，拘锁住他更多的激动

感情。

他一定有一番沉痛的经历，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今天更加得到了证实。不然，那幅《自述》他是画不出来的。艺术，要求有真正的感情，不是用大红大绿的颜色就能涂抹出来的。我们对他越发感到奇异和兴趣。我们自己经历到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因而很想知道上一代，上两代人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而特别像他这样有过沉痛经历的人，就更有吸引力了！我们有时也说忧烦、苦恼，像我在考试中发生的不愉快的事，田滕和他女朋友的关系，……然而与他的沉痛经历来比，也许我们叫作忧烦、苦恼的事，未必真个就是忧烦、苦恼，也许，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忧烦和苦恼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静静地期待着，期待他从感念很深的沉埋中回转过来，给我们讲讲他自己，讲讲画家自己的命运。这是画外之音，但与画的创作不无关系。艺术的本质在于揭示人物的命运，而作者本人的命运可能更为动人心弦。我们都无法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是上帝所绝不容许泄露的，因此人们都爱看书看戏，喜欢艺术，喜欢看看别人的命运交响曲是怎样演奏过来的，想从别人的命运中，找到相异之中的相同之处。

夜，悄悄地走来了，它不紧不慢地用极其含蓄的颜色涂抹着天空和四野，让差异很大的各种物体逐渐消失了突出的个性，消失了界限分明的楞角，消失了强烈的对比度，最后完全溶解在一派和谐与温馨之中，溶解在让人神经轻松下来的柔静和恬淡之中。清凉而又有点潮湿的风飘忽地吹过来，窗外高高的白杨树轻轻地摇动婆婆的影子，下决心把日间的强烈阳光给予它的刺激都抖落掉，用窸窸窣窣的绵绵细语来

贴慰人们过份急躁的心情。弯弯的影子从云隙中露出来，洒下一片清辉，地上印着斑斑剥剥的迷离影子。几声胆怯的虫鸣，隐隐约约，时断时续。寥落的星星在遥远的天际眨着眼睛，大地显得比白天要更为旷远和深邃。

他坐在我们中间，伴随着清凉的夜风讲述着他自己，讲述他那让人无法相信但确实有其事的经历，讲述着似乎已经是很古老的事情。

二

“年轻的朋友！我的故事跨度太长了，中间的波澜和曲折，丝毫不用夸张和渲染，便一层紧似一层，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一天无论如何是说不完的了！好在，现在正在假期里，你们如果感到兴趣，我们就分十次来谈，不妨也仿照意大利古典作家薄伽丘的先例，来个新‘十日谈’！”

我们都笑了，屋内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夜不断加深它的魅力。

“当我也像你们这样年龄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一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有两条生命：一条是自然生命，一条是政治生命。前者是肉体的，后者是灵魂的。二者同样重要，没有肉体，生命便无以寄托，但从一定意义来说，后者尤为重要。二位一体的生命必须二位一体地保存下来，才能够顺顺当地生活，顺顺当地工作，获得正常人所应当获得的一切。如果不幸而丧失了后者，就会坠入自我毁弃的深渊，远远超过了肉体生命的沉落。不幸的我，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不幸地丢失了后者，丢失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

“我的天啊！从此，生活中狂怒的风，无情的雨，便随意地抽打着 我赤裸裸的心灵和肉体，我只有佝偻着腰，趑趄起起地在一条没有出路的胡同里踽踽独步，艰难地捡拾着上帝抛给我的沉重的岁月石块。我仿佛被逐出了人群，无论走到哪里，人们一看见我头上带着一顶肮脏的帽子，就厌弃我，憎恶我，咒骂我，远远地离开我。我像一条散布瘟疫的狗，连最好同情最好布施的门口，对我都紧紧地关闭起来。‘别接近他，危险！那是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尽量同他站得远一点，沾上他身上的腥味可不是好玩的，一辈子也抖落不掉！’我命中注定要孤独地生活在忧伤的河谷里，不再幻想去寻求含情的笑靥和温柔的目光了。”

“你们可能一定要问：既然政治生命是这等重要，你为什么不慎审地保护好它，像你身旁大多数人那样，靠着二位一体的生命去渡过人生的溪流，采撷更多的欢乐的果子，而且明显地看得出，你并不比别人愚蠢和怯弱？你们问得多么有道理呀，我的不同龄的朋友！可是，你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丢失政治生活的过程是那样的离奇，怪诞，那么多的偶然因素编织到一块儿，就像后来它们又用同一的程序、同一的因子来编织我以后的命运一样，使我度过了既充满着痛苦又充满着童话一般离奇的多半生。如果我认识一位像大仲马那样的朋友，他一定会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像《基督山伯爵》那样惊险离奇的书，让读者看时把心弦紧紧扣住，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我不再说别的了，就从我丢失政治生命那件事情说起吧！那一年，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像你们当中最年长的那一位一样。也跟他那样有一张无忧无虑的脸，眼睛里流露着探

索者的光芒，嘴角常翘成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那年，我刚从全国最好的一所美术学院毕业，拿着一张全优的毕业文凭，骄傲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张开一双幻想的翅膀飞向绚烂瑰丽的艺术世界。正当春风吹绿嫩柳枝头，细雨润红桃花蓓蕾的时候，我背上了画夹子，一个人悄悄地走到黄海边上的一个渔岛上去写生，一住就是三、四个月。

“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容易迷醉的性格，况且那里的景色美妙得简直叫人惊奇。每天早晨，天刚拂晓我就登到在海面上突兀耸立的黑石礁上。辽阔的海面上，是一片迷蒙的雾，水鸟还没有展翅，天角也没有亮起玫瑰色的晨曦，但我已经凭借心灵的器官敏锐地感觉到，大地上的万物都已经苏醒，都已在伸展着腰肢跃跃欲起，欢快的气流从朦胧的山坳和渔民的屋檐上升腾起来，生命的交响乐和大海的潮声一齐奏响，一齐迎着喜孜孜的黎明。我很慌乱，不知道该用什么颜色来表现我所感受的一切，那气流，那声响，那迷蒙中苏醒过来的物体，都应当用什么线条和投影将它们展现到画布上？我对着像雨滴似的唰唰陨落的星星，对着不断变幻颜色的海面，苦苦地追索，执著地探求，不断地祈求无垠的天空和浩瀚的大海给我的灵感带来一点启示。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也忘记了身背后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若不是那个顽皮的孩子，我在海岛上结识的一个最最要好的伙伴常来看我，给我送些吃的，或者提醒我该是回去休息的时候了，我也许定立在海滩上，化成为一块痴情望海的石头。在这一点上，我真要感谢这个小家伙；但是同时我又不能不埋怨他，气恼他，正是他，把那件使我永远也无法摆脱掉的祸根带给了我。

“有一天，小家伙赶着羊群，吹着只有他那么大的年龄的

孩子才能吹响的、鬼知道是什么调子的口哨，一蹦一跳地从山坡上走过来。还离老远，他就大声地喊着：‘老史！老史！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他故意将两只小手藏到背后，瞪起一双狡黠、神秘、但却丝毫也无法掩盖他那天真、顽皮的神气的大眼睛。我禁不住笑了，说：‘不用猜，一定是煮红薯和烤鱼片，不然，还有半小瓶你爸爸喝剩下的白干酒！’他不断地摇头，最后终于得意洋洋地把一封暗蓝色的信交给了我，他自以为立了大功，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然而他不知道，他稚嫩的手给我送来的不是甘泉和甜果，而是藏着毒火的袍子，从此让我永远被裹在魔火里燃烧而又抖脱不掉。

“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信，是一个母亲对他远方儿子的怀恋。她在信中说：‘你好，我的孩子，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就是你的信，我收到的也很少。你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地留在海岛上呢？你不感到生活的寂寞吗，特别是像你那样年龄的人？孤寂不应当属于年轻人！当你孑然一身留在那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小海岛上时，你也许还没有留意，我们的国家正经历了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我们党开门整风的机会，猖狂地向党进攻，阴谋推翻我们的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好了，党和人民已经戳穿了他们的画皮，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个个地揪了出来，批倒批臭。在这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时刻，孩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平时就爱说，喜欢叽哩呱啦地发表议论。你在政治上又很不成熟，这段时间里，你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小孤岛上，而是在自己机关单位里，在广大的人群中间，我想你很可能受到蛊惑，迷失了方向，说出对党和人民不利的話。如果真

是那样，你的母亲，一个半世寂寞孤伶的女人，该要承受多么沉重的打击呀！也许，她会因此而失去生存的力量。这几个月里，噩梦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常常在半夜里惊醒，枕角上浸着一片潮湿的泪痕。等到天亮之后又觉得自己太可笑，真是孤僻成性的怪女人！我的孩子不是好好地在渔岛上画画吗，而且，我相信你抵抗自然界中大风大浪的能力，会远远超过抵抗政治风浪的能力。这样一想起来，我又觉得宽解和欣慰，觉得你这次离群索居倒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许是慈母的爱和你对艺术的一片虔诚所得到的感应（我这是随便说说，是不伦不类的比喻，你也知道，我早已不信天主教了，也不是一个唯心论者）。好了，我的孩子，安心地在那里画你的画吧！不要拒绝，爱你至深的母亲对你的祝福！’

“这就是我母亲寄给我的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信，看过之后，我也就随手丢在一旁了。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她是一个医生，一个在旧社会滚滚浊流里洁身自好的女性，她靠着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依靠着要自强不息的坚强信念，争得了一个男人也不容易得到的职业、学识和尊重。当然，她为此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欢愉和一个女人所应得到的一切。她把追求都放到事业上去了，留给生活方面的实在少得可怜。她在三十九岁时候才结婚，还是几个好心的同事竭力促成的。父亲是一个已逾不惑之年的性格古板的教书先生，一个典型的书痴。我真不知道是哪些人这么爱捉弄人，让这个命中注定只该和书本结成终生伴侣的人，去到纷纭繁杂、冷酷无情的现实中寻找配偶？这个戏谑般的拉郎配，铸成了他和他的亲人们之间永远难以赎回的悔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我真不该，

真不该去结婚！’1954年，他几乎是带着圣徒的忏悔之心站在母亲身边，同意了母亲的离婚要求。他在半年之前，因为两篇文章，被株连成胡风分子。一生刚强、孤傲、自信的母亲，怎么能让眼睛里揉进这样的砂子呢？医生，是个清白的职业，对于她来说，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白健康的身心，绝不能让灰尘和细菌将它玷污和感染。你们想，像我母亲那样一个刚强自立的女人，那样一个在旧社会浑浊世道中尚能洁身自守的女性，她已经为了职业的神圣做了那么多的牺牲，现在还会为儿女情丝把自己缠裹住，能把一块不洁净的污斑留给自己，留给自己的孩子吗？‘我已经够痛苦的了，不能再把痛苦留传给孩子们！’她含着盈眶的热泪对父亲说，‘我知道这样的手术，对于你，对于我，都是太无情了，太残酷了！可是，现实的冷酷要比心肠的冷酷厉害得多，……’

“亲爱的朋友，我从母亲那里多少继承了一点冷酷，或者说是理性，虽然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更多的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沉醉和痴情，用难听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迂阔和傻气。正因如此，我虽然在生命旅途中刚一迈步就受到了沉重打击，就遭到了天大的不幸，但是我却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不被霹雳暴雨给击昏击垮，能够承受住上帝命中注定要降临到我头顶上的灾难。不管身外是怎样摧残凌辱，身内是怎样的冰冻火烧，我都能够忍受，能够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照常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甚至连一丝凄苦的愁云都没有印到我的双颊上。因此，许多同学都叫我‘乐天派’，‘贪食的小鸭子’！‘你看他，还是呆头呆脑像个鸭子似的，一天只知道低头觅食和嘎嘎地叫！’

“在接到母亲来信的第二天，我给母亲回了一封信，告诉她不要自寻烦恼，不要为那些噩梦纠缠，我一直宁静地住在小小海岛上，身体和心灵都很愉快、坚实，什么委屈都没有受。而且，我还带着男孩子常犯的通病，不愿意让母亲总把自己看成是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地夸耀自己说，我完全有在大风大浪中自御的能力，不管是自然界的风浪，还是政治上的风浪，都不可怕。朋友们，你们只要听听我这些话说得多么轻松，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的幼稚和浅薄了。像这样的大话在我跌了筋头之后，就是用一百万吨级的水压机来压我，也不会再从我的嘴里吐出来了。

“给母亲写完了信，还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兴致，等待我去排遣。于是我又乘着余兴，接着给罗兰写信。罗兰是我中学时候的同学，现在又在一个单位里工作。我自己觉得，在我们同龄人中间，最能够无拘无束地交流思想和倾心畅谈的，莫过于这个罗兰了。她比我更懂得生活，更懂得艺术，懂得艺术在生活中，生活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她性格开朗，有说有笑，但不失文静秀雅的气质；她不画画，但对于我的作品，从主题、结构、风格，到笔调、神情和气韵上，理解得比我自己还深刻，甚至我的一些朦胧意识，她也能够清晰透彻、准确无误地揭示出来。我不仅能够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就是从她的眼神、眉语以及嘴角、鼻翼的些微变化的表情中，就可以得到改进我的创作的启示。她常常带着像春天阳光那样明媚温柔的笑容，半天半天地坐在我的身边看我画画，默默无言，不声不响，我仅仅从她呼吸声音的急促或均匀的变化，就知道她的思绪完全和我的创作激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就如同上帝将同一颗心安置在两个不同的腔体里

一般。不消说，我是很愿意找她去谈心的，就像我的肉体愿意去找我的灵魂说话一样。我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学者的宴会》上讲过一个寓意很深的故事。他说，从前人们都是生着两个头、四只胳膊、四条腿，走起路来像风一般地快。奥林匹克诸神非常妒嫉，于是就让宙斯用剑把人们劈成两半，从此，在有情人之间就产生了强大的生命磁场，永远吸引着一方去寻找另一方。实际上，这并不是男人去寻找女人，或者女人去寻找男人，而是，身体的一半去寻找自己身体的另一半。朋友们，你们完全可以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在我身上产生的强大的爱的磁场，决不亚于被神剑劈成两半的人。自从来到海岛之后，虽然海蓝、墨绿、鸭青、桔红、荷灰等颜色一直迷住我的视线，长空和大海所调配出的折光一直支配我的神思，但是她的清秀的身影，端庄的面庞，不仅没有在我的眼前淡去，反而超越了时空的阻隔，变得越来越清晰，连须发的轻拂、鼻翼的歛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定期地收到她的来信，当然，我也把自己的感受不避纤细琐碎，零零散散、一枝一叶地写给她。

“那天，我在爱的波涛的冲击下，又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几大篇信笺，说了些聪明的傻话和呆傻的聪明话，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轻率，却是我终生难以忘记的。因为它把我引进了地狱之门，仅仅这一点疏忽，就使我跌进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里。我在那封滚烫的情书里，随手把我母亲的来信也装到里面，就像往日随手将我创作的草图、构思的片断，或者是从山坡上采撷下来的花瓣、草叶装到里面一样。我还以为，这是在做爱的积累呢！谁会想得到，这是在锻铸永远难赎的罪过，正在打下出卖自己政治生命的一

张欠条。以致后来过了多少年，只要一回想起它来，心就不能平静。

“这封信发出去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学校里打来的加急电报，通知我马上返校参加政治运动。这是一封什么电报，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反右斗争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给我？如果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人会马上提起警觉的，可惜，我对政治斗争这门课是个文盲。本来这次出来是为某个军港赶制一幅大型油画的，据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们不知道在我们那个时候，政治是高于一切的，什么事情一联上政治两个字，就显得特别的神圣，光荣，可以使一切其它任务为之让路，因此，我这次出来写生是经过学校党委特殊批准的。现在，为什么要突然中断呢？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在搞，别人没有插手，我一离开就意味着工作的中断，而家里的政治运动却有千万人在搞，没有我参加也已经搞得轰轰烈烈，大获全胜了，有什么必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变更呢？我本来应很好地思虑思虑，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可是我却连一个问号也没打，就匆匆地收拾起行囊和画笔，第二天一早就买好车票返回学校了。

“我刚走进校门，老胡，我们系里的秘书兼支部委员，就迎了上来。他好像在那里已经等候很长时间了，一面和我握手，一面打着哈欠说：‘你回来了！到宿舍里收拾收拾，就来参加运动吧，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的脸面糊糊的，厚敦敦的腮上堆着不冷不热的笑，眼神也是含混的，人们永远也别想从那两个小窗口里窥见他的心灵。我望着他的面孔，听他说话的语气，想看清他们召我回来的理由，但这是办不到的。更何况，我心中根本没有任何怀疑，任何戒心。因此，

根本没有注意在这张没有刻度的温度表的脸上去体察气温的变化。

“下午，刚刚睡过午觉，系里就来人通知我去小会议室开会。我问：‘开什么会？’来说：你去那里就知道了。我略微拢了拢覆在前额上的蓬松散乱的浓发（你们不要笑，那时候我的头发浓密得像一头狮子，可不是今天这样秃光光的），就轻松愉快地随着来人走到会场，就如同到朋友家里去作客，而不知道这是走向埋葬灵魂的墓场。

“小会议室里，用大小沙发布置起一个方阵，沙发上坐满了人。我看了看，系里边政治上精明干练的人几乎都出席了，一向被人们认为涵养最深的老胡也坐在不偏不正的地方，脸上的表情和我在校门口见到他的时候一样，含糊而不可捉摸。我被安置在方阵中央的位置上，刚刚坐定之后，老胡就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对我说：‘史复生同志，在你出外写生期间，我们学校也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每个人都受到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政治思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为了不使你失去这个受教育的大好机会，特地把你从海岛上叫回来，帮助你补一补课。今天，你就敞开思想向党交心，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平常对一些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出来，组织上会帮助你，同志们会帮助你！’

“这是个帮助会，或者叫交心会，气氛是异常的浓烈。你们还都没有参加过学术答辩吧？我在那个会上，简直就像通过博士论文的学术答辩一样。人们从各个角度向我提出问题，要我一一说出自己的观点。那些问题，那些观点，我明

明知道近些天来报纸上已经开始反击，进行了批判，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组织上专门召开此会来帮助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为我补课，我怎么能讳疾忌医呢？况且，我一向没有养成隐讳自己观点的习惯。我过份相信书上的话：既然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史复生同志！你对苏联出兵匈牙利怎么看？’

“‘我认为苏联把坦克开进别国的领土，不管它有什么理由，也不能摆脱侵略者的罪名！’

“‘史复生同志，你对肃反问题怎么个看法？’

“‘肃反的成绩很大，这是主要的；但有扩大化的地方，伤害了一些好人，尽管受冤枉的人数量很小，但也很使人痛心，因为，即使一人受屈，他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想到了我那被株连成胡风分子的父亲。

“‘你对人口过多影响建设速度的说法怎样看？’

“‘这个说法有它的合理性。人多固然是好事，但也有困难的一面……’

“我这些貌似机辩、实则是不识时务的回答，清清楚楚地暴露了我的幼稚无知而又喜欢夸夸其谈的毛病。我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像初等代数一般的简单。我丝毫不会掩护自己，动不动就像许褚一样裸着半身上阵。这种愚蠢的豪爽，使得许多与会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也使老胡感到喜出望外，以致使得他那双一向如同蒙着窗帘的眼睛，闪露出异样的光彩。

“当我答辩完毕、若无其事地从小会议室里走出去时，外面的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三十度，猝不及防的侵袭，使我膝盖发抖，浑身打颤，头晕得像斗一样的大，简直不敢相信

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在走廊的两面墙壁上，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贴满了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大字报前站满了围观的人。我的前脚刚刚跨出门坎后脚还没有从会议室里迈出来，人群里就喊起了一片口号声：‘打倒右派分子史复生！’‘坚决打退史复生的嚣张气焰！’‘不准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啊，多么可怕的陷阱呀！多么卑鄙下流的圈套！我悠悠晃晃、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宿舍，立刻用两手抱住了头，陷入到苦痛、悔恨、暴怒、羞辱的黑色狂潮里！”

三

画家的故事打动了，第二天睡过午觉之后，我想邀田滕再去。

走在路上，田滕仍然是神情抑郁，沉默寡言。在寝室里，我看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外国杂志《美国大学生活》，思想完全浸沉在里面，室内的喧声笑语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他在里边寻找什么呢？那些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一对对青年，还有他们那高大的楼群，宽敞的图书馆，设备先进齐全的实验室，他产生了什么特殊兴趣呢？那恍如隔世的西方生活，尽管同样都是大学生的生活，他又能够理解多少呢？嬉皮士，颓废派……不，不，听说现今一代美国青年，特别是美国的大学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社会倾向，被称为讲究求实和进取的一代。可是，这些终究是一些陌生的东西，只是从书本里、画报上能看清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吗？更何况他们与我们，有着那么多的不同，那么多的……可他还是专心致志地翻看那些杂志，一本一本，是什么东西这样吸引他呢？我知道，他房间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想在那里寻找一

个人的影子，虽然那些画报、那些文字里肯定不会出现她的影子。可是他总是不会放弃这种寻觅的，他的一颗心已经被人给带走了，带到了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带到那陌生的人群中。他就像画家老师讲的那样，时时刻刻在寻找自身的另一半。

可我总觉得，周围不少的人也都这样认为，那一位是田滕身上的另一半吗？好像不大贴乎得上。他们思想的脉络、感情的色彩和性格的基因，好像都不是属于一种类型的。自从前年她去美国留学，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替他担心，手心里暗自捏着一把汗。当然，没有一个人肯当着他的面说。不说，他心里也会明白，眼睛里也看得出来，难道他自己就没有这种悬念吗？爱情，是生理功能中最敏锐的一种感觉。

“最近没有收到来信？”我问。

他摇了摇头，苦笑地说：“我不避讳你，我们的通信现在是按照递减速度进行。”

“你看，又是一道难理解的数学问题，真是恼人！要不要在电子计算机上去算算？”我说。

他沉默不语，我看看他的眼神，他有意把脸转向一边，凝视路旁一株层次异常分明的雪松。不知怎的，我对他产生了怨恼和怜悯的情绪，于是，想下决心狠劲地戳他一指头：

“你别那么太痴情了！依我看，最好还是做好两手准备！”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惊悸了一下，两眼呆呆地盯着我。

“你没看见过夏梦主演的《白领丽人》！”我告诉他，那里面有个打字员，她把辛辛苦苦赚得的工资，供自己男朋友

去美国读书。结果，那个男朋友毕业回来之后，还是同另一个门第很高的女子结了婚。”

“胡说！”他有些生气了，“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爱情是有深厚基础的。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插队，又一起考进大学……”

知道！他们的这些经历我自然都知道，可是，一切都会变的，心，就能永远不变？他举出的种种理由，无疑都是神圣的，无可辩驳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可以举出一千例，一万例，从古到今，人们都在举，举不胜举，用以勉励别人，勉励自己。可是娴娴，就是田滕的那个她，我总觉得有些未必。

“她怎么？”田滕追问我，我没有回答，他的敏感稍微安定了一些。

“你知道不？”我说，“在我们班女同学中，曾经流行过一句话：‘花褂子是我们的旗帜！’她们说，只要看看娴娴，就知道现在最时髦的服装样式。她，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她是很有追求的！”田滕说。

“可是，你没感到她这种追求太强烈了？”

“这是个性问题，什么也不能说明……”

是呀，什么也不能说明。但爱情还要什么说明呢？人们从来都无法说明这种神圣而又微妙的感情。古今中外，多少古圣先贤已为爱博下过一千种定义，但而今而后几千年，人们还是要不断地再给它下定义！

我们不再言语，只是沉默地走着。树上的蝉像谁给它下了一道命令，齐声喳喳地叫起来，叫得空气更加燥热和沉闷。太阳火辣辣的，树的影子很短，都直接地暴露在阳光下，每

一个枝叶都在渴求生命的感应，寻找一片绿色的梦。

我们终于走到了画家老师的家，他样子看起来很安闲，正倚靠在沙发上小憩。他可能是刚刚完成了一幅画，神经由跳跃趋向安稳，由激动趋向松弛。他好像正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准备继续前天刚刚开始的故事。

“前次，我讲到什么地方来着？”他点燃了一支烟问。

“不是说，你突然被围困到垓下了吗？”田滕回答。

“对，就是！就是！我被突然地、意想不到地打成右派，简直就像沉雷轰顶，一下子就把我炸蒙了。我踉踉跄跄回到宿舍，两手抱住了头，陷入苦痛的、恼恨的、暴怒的思索里。是谁，这样卑鄙污浊，灵魂上长满了癣疥和毒疮，设下了这番魔鬼的计谋。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那张面糊糊的脸。我很早就觉察到，他对于我在艺术上闪现出的才华星火，对我在美术展览会上多挂出几张习作，隐藏着妒意，在他那温和含混的笑脸后面。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的一张《儿时的歌》获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三等奖，系里的同学都跑到我的房间来祝贺。大家说说笑笑，逼着我拿钱买来点糖果和红葡萄酒助兴。在欢乐中有人开玩笑地说：‘老胡！老史！你们是我们系里的两个天才，这次老史拿出来一幅，什么时候看到老胡的那一幅呢？’这时，我清楚地看到面糊糊的脸绷起一根跳动的筋，含混的眼帘也像照相机按了快门似的，倏地闪出一条妒火的光。但很快就闭上了，不留神的人是注意不到的。

“后来，大家轮流演唱节目。该老胡头上时，他很勉强地笑了笑说：‘你们什么时候听到我唱歌来着？鸭子不是天鹅，是怎么赶也飞不起来的！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人

不答应，但多数人还是通情达理，允许了他这一变通的做法。老胡的故事含义颇深！他说，从前有两个画家：一个年轻气盛，才气横溢；一个年高稳健，功底深厚。有一次，他们一道去某个高贵的伯爵夫人的沙龙，在宴席中间有人提出建议：请两位画家各自拿出一幅得意的作品，让大家评判谁的手笔更高一筹。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一致的通过，两位画家自然也无法推辞。个把月后，他们的作品果然都拿到沙龙里来。大家请老画家先揭开罩在画面上的布帘，老画家说：‘不，不，我的水平很低，不要先扫了大家的兴，还是请年轻画家先揭吧！’年轻画家毫不推辞，得意洋洋地用手揭开了布帘。大家一看都惊呆了，那是一幅何等精彩的画呀！画面上是一篮倾倒的苹果，人们不仅立刻感到眼前泛起一片红宝石的光波，仿佛嗅到了馥郁清香的果味，而且，那红润香嫩的苹果就好像要从画面上滚出来，滚到你的脚下。真是维妙维肖，传神之笔。大厅里响起了一片赞贺的掌声。伯爵夫人用温柔的小手端过来一杯美酒。这时，有人对老画家说：‘这回该看你的了，请你拉开你的布帘吧！’老画家谦逊地说：‘不必了！不必了！正像你们大家所看到的，一件真正的天才作品已经诞生了，没有必要再把一幅平淡乏味的画亮出来，让大家扫兴！’无论大家怎样要求，老画家执意不肯掀开布帘，并且一再表示他已认输，不必再让他的老脸臊得发红了。可是年轻画家不肯，他一定要让老画家揭开自己的布帘：‘这成什么道理！不揭开你的布帘，两件作品怎么能比高低呢？’老画家被逼无奈，只好慢吞吞地说：‘如果你一定要看我的画，那么，就请你帮助我揭开我的布帘吧，我自己实在没有勇气献丑！’年轻画家听说，马上伸手就去揭老画家的布帘。

谁知，他的手刚一接触到画布，就像触了电似的佝偻了一下，马上把手缩回来，脸上得意的神情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连声对老画家说：‘我输了！我输了！’人们一阵愕然，半天之后才都围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年轻画家羞愧地说：‘我和你们的眼力一样迟钝，根本就没有看出他的布帘就是一幅画！’老胡绘声绘色地讲完了故事，同学们哈哈一阵大笑。可是我听得出来，故事是给我听的，故事里年轻的画家，就在暗喻着我。

“还有几件类似的事情，也一幕一幕地涌现到我的眼前。眼看一件用因与果的珠子穿成的项链就联系成了，可是，突然一个有力的巴掌又把那串珠子统统打散。全是无根无据的臆想，无稽之谈！为什么这些事情过去连想都没想过，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想得那么坏？他为什么要来伤害我，算计我？难道仅仅是为了我的笔端暂时较他的笔多得那么一点运气吗？不成其理由的理由！那么，为什么我将母亲的来信寄回学校不到一个星期，便把我召唤回来，演出了这么一场捉弄人的卑鄙丑剧呢？难道我和罗兰的关系，使他的思绪产生什么不安吗？我只知道他是罗兰的同乡，而且解放初期，还跟罗兰的哥哥在一个机关里同过事。他常常以兄长的身份关心罗兰，在生活上、工作上都给予有限度的、恰如其份的指点和帮助。有几次，他在罗兰的房间里见到了我或在我的房间里见到了罗兰，他总是用几句十分得体的闲话凑凑趣，然后便彬彬有礼地退出去。‘真是一位厚道的兄长！’罗兰常在背地里这样夸奖他。

“可是，罗兰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回来之后还一直没有见到她。这时，突然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像一条毒蛇嗖地

一下钻到我的心头，一阵难言的剧痛震麻了我的全身。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她，她决不会出卖我，决不会做出损害我的事情！不论凭我的良心，凭我的理智，都不允许我朝这方面去想。但是，真可怕，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一张大字报上，专门提到母亲的来信，以此来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早就心怀不满——连他母亲都知道他，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就必然会跳出来。这当然是蓄意歪曲。可是，他们到底怎么知道这封信呢？难道是她……这不可能！这太可怕了！我宁愿相信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右派，真是个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肯去相信那是真的。那绝不会是真的，绝不会……

“我好像站在老式的照相机的取景镜面前，宇宙中的一切景象全都颠倒过来：一个水晶一般透明的灵魂，会变得像一滩脏水一样的污浊；一张端庄秀媚的脸，会变得像童话中老妖婆一般的丑陋；一个苗条俏丽的身影，会变得像条毒蛇一般盘结扭曲；一只温驯善良的小绵羊，居然能够伸出豺狼的爪子，凶狠残暴地来撕裂我的灵魂和肌肉？我的头快胀开了，眼前飞舞着无数滴着毒汁的问号。到处都是那个???太可怕了！恐怖的湍流滚滚地奔袭过来，我像一片凋零的叶子，无望地跌落在那湍流里，无望地被卷裹到黑漆漆的远方。‘太可怕了！’我凄厉地叫着，绝望地叫着。我用手摸了摸额头，竟像火炭一般地烫人。我发着高烧，像在一锅开水里煎熬着。我狂喊着，说着可怕的话，从内心到躯壳，彻底地垮下来。

“年轻的朋友，你们也许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怪病：有的人得了伤寒，病好之后，一头浓发全部脱落了，变成一个秃子；有的人得了肺炎，病好之后失去了听觉，变

成一个聋子；有的人受到惊吓，从此丧失了对往事的记忆，成为一个没有昨天的人。而我的这场大病就病得更加荒诞奇怪，更加令人凄惨沮丧。等我稍微康复、可以像常人一般出外走动时，我吃惊地感到，我丢失的不是头发、听力或者是对往事的记忆，而是更为宝贵的东西，是我的政治灵魂。一夜间，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

“你们都年轻，经历过的事情又少，因此你们想象不到，在那个时候，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该有多么苦恼。一个人如果丢失了金钱，他可以再挣回来；如果在某件事业上遭到了失败，他可以聚集起来更多的毅力和勇气，在以后的奋斗中去争取成功；如果是断了一支胳膊，他可以锻炼着用一支胳膊担起两个胳膊的劳作；如果是断了一条腿，他还可以安上一条假腿；丢失了最宝贵的爱情，也还可以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找到解除痛苦的慰藉。然而我，一个丢失了政治生命的人，却是有腿不能随意走路，有手不能随意摘取本来应当属于我的东西，有勇气和才能也无法进行探索与追求。如果我丧失了记忆，成了一个没有昨天的人，像日本电视片《命运》中的大竹由美子，生活可能还要好过一些，而我却熄灭了一切希望之火，变成了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早晨，我从屋子里走出来，路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不上是嫌弃还是可怜，是憎恨还是恐惧，或者是各种成份都有那么一点儿，总是远远地躲开我，偶而狭路相逢，也马上低下了头，或者是把视线转到另外一边，装作没有看见我而急匆匆地走过去。过去，有几个青年学生也像你们似的，总喜欢到我屋子里来聊天，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围在我的身旁看我画画，也顺手帮助递过颜料、刀子、画

笔或者做些其它杂七杂八的零碎活儿。因为我是个乐天派，又单身一个人，喜欢与青年人交朋友。可是现在，却连一个影子都见不到了。有时，他们正在路上热热闹闹地说笑着，一见到我走过来，就好像在草地里碰到了一条蛇，在黑夜里撞见了可怖的幽灵，立即收住了笑语，脸孔绷得紧紧的，像石膏的塑像一样，冷冷冰冰地从我身边走过。有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小淘气，是邻居家里的孩子，平时总会拉住我的衣襟让我给他学布谷鸟叫，学夜莺叫，学百灵鸟叫，你们不知道，我的口技还是各种晚会上的保留节目呢。可现在却常躲到我的背后，叽叽喳喳地告诉他的小伙伴：‘这个人是个大坏蛋！大右派！’很快，招来更多的顽童，我感到无数稚嫩的小手都戳着我的后背。“嘻嘻，大右派！”每逢这个时候，我便得立即快步走开，否则，无情的小石头和土块，会像雨点似的飞过来。

“我很想见到罗兰，但又没有勇气。我想找她去证实这一切，但又很怕证实了这一切。不论她悔恨的泪水或者是反目成仇的目光，都使我受不了，都会使我周身战栗，感到无比的侮辱和厌恶的恐惧。我怕一旦见到了她的面，就控制不住自己，胡乱地做出丧失理性的事。

“然而，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在意料之外的时机发生了。有一次，我到学校的小卖部里去买香烟（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会抽烟，而且一根接着一根，把屋里喷得烟雾迷蒙，和我心灵的色调一致），在柜台的前面头碰头地遇到了她。啊，真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一瞬！我的眼睛里是充满着怜悯、羞愧或者是怒火，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可是她的眼睛，那双一向是一汪秋水似的明眸，却变成了……怎么说呢？如果用一句

唐诗来形容，那就好比是‘巴山夜雨涨秋池’，晶明清澈的秋水，完全被焦虑、忧伤、懊悔、羞辱各种感情的雨水浇灌得浑浊不堪。如果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在一单位时间内，人体可以产生多少感情的流量，那么我敢说，此时此刻罗兰的眼光喷射出来的流量，决不下于一万个安培。她和我，几乎都被这个巨大的光束灼伤了。人的血肉之躯，是无法忍受这超负荷的压力的！她的嘴角不住地颤动，噤住了几句没有音符的话，然后一转身就走了。直到她离开我的视力网膜时，我才注意到她憔悴多了，丰盈的体态、优美的线条，全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一个羸瘦的随风飘摇的影子。

“从此，我就把自己深深地锁藏在屋子里（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尽量不见任何人，不让我的可怕影子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特别是罗兰。我千百遍地祈祷上帝（虽然我是不信神的，但命运这样摆布我，我的灵魂便自觉不自觉地皈依渺渺的苍冥），不论是为了可怜她，还是为了可怜我自己，都千万别让我们再见面，哪怕是一瞬也够可怕的了。每一个夜晚，她那喷射十万伏特电火的目光都在梦中把我烧灼，心灵的抽搐和肉体的痉挛都使我疼得喘不过气来。我想，她的日子也绝不会比我更好过些。

“我从食堂里一次买回十个馒头，买回足够一个星期所用的零星用品，然后就穴居起来，这样，我的心情还轻松一点。我用生活的清苦买回一点心灵上的安宁。但是，这宝贵的安宁也是不可多得的，老胡他们不放松我，总是想尽办法把我捆到耻辱柱上，恣意地向我身上泼污水，借用神圣的革命大批判的名义，施行人格的侮辱和灵魂的作弄。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母亲拍来的。她说

要随一个医疗代表团来京，参加一个什么学术性会议，让我届时到车站去接她。我冰冷的心又开始溶化了，混沌的宇宙到底还为我天开一角，世界上毕竟还有疼爱我的人。有伟大的母爱温存着，体恤着我，我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摒弃。我提前两个小时到了火车站。在那你拥我挤的人流中我感到特别的松快，因为他们看不到我头上戴着的那顶可怕的帽子，认不出我是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因此没有人躲避我，厌弃我。甚至当我向靠着柱子站着的一位穿戴十分气派的中年人走过去，要求点个火的时候，他还嘭的一声很客气地为我打亮了精致的打火机。

“当母亲走下火车时，我竟像个小孩子似的，一下子把母亲的脖子搂住，若不是与母亲同来的还有那么多人，我简直无法忍住烫得眼睛发红的热泪。我接过母亲的手提箱，把她一直送到预订的旅馆里去。母亲像我一样高兴，我的举动，可能使她又回忆起我童年时的种种琐事，使她孤独已久的心灵中又荡漾起幸福的母爱的涟漪。一路上，我没有容她有一刻功夫来问我的情况，我简直像个贫嘴滑舌的小孩子，不停地问母亲以及她们医院里种种使我感到有兴趣的事。直到进了旅馆房间，母亲换好衣服坐在沙发上，让我陪她吃茶的时候，我才终于忍耐不住，向她倾述出我隐藏着的全部秘密。当她听到这件最最不幸的消息时，不亚于当头一声霹雳，震得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像一个木头人毫无表情地呆呆坐在那里。我怕她当真会要石化，就像童话里常讲的故事那样。可是后来她还是苏醒过来，而且痛苦的意识一旦涌上面孔，眼泪就像泉水一般簌簌地流出来，一方洁净的手帕很快就为泪水所湿透：‘我的命真苦呀！不，孩子，你的命真苦呀！’她用

手抚摩着我深深埋下的头，让冰冷的泪珠不停地滴落在我的头发里，颈子里。

“凭着她手的颤抖和空拳，我感受到她的心在苦痛中挣扎的程度。我悔恨极了，不忍心由于自己的存在而让母亲经受这种敲骨吸髓般的痛苦折磨，于是，站起身来径直地向外走去。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把我叫住，万分痛惜和怜爱地对我说：‘孩子，你以后的路不好走了，一切人间的苦难都会落到你的头上！妈妈虽然无力挽救你，但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尽可能地给你送去一点援助，母亲的心永远不会为子女关闭的。不过，最近一些日子里，特别是我在北京开会期间，你一定不要来看我！’”母亲就是用这样挖心割肉的话送走了她的孩子。后来我再去找她，旅馆的人告诉我，她早已搬走，至于迁到何处，没有留下地址。

“从母亲那里回来，我失声痛哭，多少天来憋在肚子里的泪水都倾泻出来。我真的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被厌恶的人，连最爱我的母亲也要设法避开我，害怕我身上的祸水会沾染她洁净的袍子。我不能埋怨她，不能！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一生一世苦熬苦撑才挣得一身洁白的她，怎肯到了老年再去沾染一点污尘呢？我的天呀，我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幸呀！前面等待我的，将是怎样一条艰难之路呀……”

四

雨，缓慢而又执著地下着，从朝到暮，从晦到明，一直是那样不紧不慢、欲停不停地下着。

田塍走来问我：“今天，我们就不去了吧？”

“是因为雨吗？”我问。

“不完全是，不过——”他的声音含糊，游离着过多的无可奈何。

我看了看他的脸色，与阴雨的天气相差无几。我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递过一把伞说：“那就毫不犹豫地走吧，增添一分新的悬念，会相对地减弱旧的悬念！这是相对论的命题吧？”

田滕没有说话，默默地随我走出去，消逝在一片茫茫烟雨里。

不久，我们来到了画家老师的家，接着又像昨天那样，继续讲起了那个悲惨的故事。

“年轻的朋友，我累赘的叙述一定使你们觉得腻烦了？你们还叫我说，我就把那段让我忍受内心痛苦折磨的时间跨过，跳到另一个比较清新的环境里来讲述我那近乎传奇的故事。

“早春二月，我们国家进入了火红的大跃进的年代。我和系里十几个同志，下放到北郊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去劳动锻炼，当然我的身份与人不同，别人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我是接受监督改造，我的头上有一顶黑色的帽子。

“回到大自然，早已是我灵魂的渴望。不用说，那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给我多少抚慰，增添多少生机，仅仅是乡民们淳朴的风俗和流汗的气息，就已使我血液变得欢畅，心境变得安闲。人，是大地的儿子，只要你紧紧地向她偎靠，就一定会从她身上汲取生活的力量。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这种感受，但我确实体验到这一点。尽管有人监视我的劳动，限制我和心地善良的乡民自由来往，但我还是不断从泥土的芳香中找到了乐趣。

“但不幸的是，老胡，后来还有我最不愿意见到的她——罗兰，跟着也来到了这小小的山村。天啊，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别扭呢？顺心的事总有各种各样的阻拦，不顺心的事却通行无阻，接踵而至。美的东西常是一闪即逝，而丑恶的东西却偏偏要久住一方，不肯轻易让位。我真怀疑，当初造物主在造物的时候是否看错了方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为什么变得如此刻薄，好事怎样寻觅也没有我的份，坏事想绕也绕不过去。他们接踵地来到我的身边，把我从大自然那里得到的一点安闲也要打碎。

“我们下来的这些人，身份是各不相同的。老胡原是系秘书兼支部委员，这次反右斗争中又立场坚定，反击有力，经过运动的考验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干部，可以信赖的左派，革命需要将这样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现已成为系里的总支副书记。这次他又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主动要求下放锻炼，因而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我们下放干部组的组长，负有管理我们生活、劳动和思想的使命，其中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我这个右派分子进行监督管制，只许我低头认罪，不许我乱说乱动。

“罗兰呢，她比我们晚下来两个多月。有人说是系里的运动有些扫尾工作没完，要她帮助整理一些材料。有人说是因她身体不好，留下来治了一段病。还有人说，这次下放本来没她，但因她在反右斗争中一直软弱无力，思想右倾，直到今天还对某些右派怀有同情心，因此才把她补下来。根据我的观察分析，病可能是主要的，其它原因也可能兼而有之。她红润的面颊已经失去了昔日光艳的色彩，眼窝深深地塌陷下去，一双眼睛变得黯然失神，像干涸了的清泉，精细

得像哲理一样清晰的嘴角，再也看不到一丝笑纹，走路也失去了从前那种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弹性。

“她总是静悄悄地跟在别人后面，埋着头儿干活，默默无声的像一个幽灵。加上她的身体过于孱弱，因此生产队长派活的时候常常把她忘掉。她不大同人们说话，对我更是没有一言；我当然也尽量地回避她，不使我们都处在心寒胆战的尴尬中。现在我对于她，与其说是抱怨、忿恨、不满，不如说是怜悯、忧虑、伤心。我自己的命运已经够惨的了，但我感到她可能比我更惨。我已不再可怜我自己，更多的时间却去可怜她了。

“不久，大跃进的浪潮便滚滚而来，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壮烈场面。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虽然地势偏僻，也无法例外，更何况有下放干部在这里，有政治热情和革命觉悟都很高的胡组长在这里。深翻地、修渠、搞密植，直到捉麻雀除四害，样样工作我们在整个乡里（后来变成公社），一直走在前面。表示我们工作进度的指标，好像都添了神奇的翅膀，一个劲地往上升。那个时候，人们特别喜欢用乘坐的各种交通工具来表示工作成绩。结果呢，每一次到乡里去评比，我们坐的都是火箭；那些乘坐火车、汽车以至牛车的队长和支书，望着我们都吓得头晕目眩，暗恨自己水平太低，没有学到列子御风而行的本事。

“当然，在这种从未有过的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下，我们的劳动强度也从未有过的加重了。胡组长经常提出苦战几昼夜的口号，大干了还要大干，苦战了还要苦战。血肉之躯的庄稼汉，一下子都变成了钢筋铁骨的机器人，只有劳作，没有休息，黑夜白天连轴转地干。据说金属也有疲劳，超过负荷

也会发生断裂；奇怪的是，我们现在居然超过金属的硬度，无论怎样干，也不产生疲劳，也不断裂。真是奇迹！可在那个飞跃的年头里到处都产生奇迹，这个奇迹也就不成其为奇迹了。

“我们下放干部陆陆续续都被抽调走了，有的到了指挥部，有的到了作业区，有的到了公社。待到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是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不能参加那些政治工作，只能用劳动来赎买我的罪恶。过度的疲劳已使我瘦得像个纸糊的人，身心都承受不住这过份沉重的压力。原先返回大自然的欣喜，天光云影在我心中所激起的美好感受，现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我得尽力控制住自己，不在不停顿的劳作中摔倒下去。在我的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奢望，就是能够听到一声哨子响，可以让我坐下来歇一歇快要散架的肢体。但那哨子却硬是和我做对，不管我对它怎样期盼，它却硬是忍着铁石一般的心肠迟迟不肯到来。

“我的年轻朋友，在我们那个时候，不论作诗还是写文章，总喜欢用‘白天红旗如海，夜晚灯火通明’这样夸张的句子。实际上也并不夸张，在我们苦战几昼夜的时候，到处确也都是这个景象。不过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别处可能也是这样），夜晚田野里是一片灯火通明，但人们却从灯火通明的田野里悄悄地溜回到家里去睡觉，只留一两个人在那里打更放哨。等到上边有人下来检查，放哨的就嘟嘟地把哨子吹响，人们又从梦乡里被唤回到战斗岗位上来，轰轰烈烈一番。在这种兵不厌诈的战斗中，最苦的就是我了。我没有社员们那种可战可走的权利，因为我头上的帽子把我牢牢地钉在监督劳动的岗位上，乱说乱动，只能加重我的罪行。我多

么羡慕你们呀，那些没有丧失政治生命的人们！

“但是，社员们这种可战可走的游击权利，很快就被政治嗅觉敏锐的胡组长给取缔了。他现在已经兼任了公社党委委员，当他发现这层秘密之后，便领着几个民兵偷袭到人家被窝里去‘抓懒汉’。有谁不幸被他在被窝里给逮住，谁就倒了霉，他要给你穿上个黑背心，作为懒汉典型给拉到地头上去批判。也有一些机灵的人，听到有人推门就从后墙逃出去，在外面跑过几圈累出一身大汗之后，还迎头赶来找他说：‘胡组长，你快到地里去看看，今天大伙的干劲可高了！’胡组长不仅在社员中抓了懒汉，后来竟然因为几件事情，把老支书也当白旗给批判了。

“原来关于深翻地，关于拔了谷秧栽红薯等做法，老支书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等到后来发生了苜蓿问题时，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那天老胡传达公社的指示，要把地里的苜蓿统统犁掉种上粮食，这样，粮食产量就可以猛翻上去，放一颗卫星。老支书嗑烟管摇头说：‘拔不得呀，同志哥！牲口要吃的哩！’老胡听了怏怏不快地说：‘眼下是粮食要紧，产量要紧！牲口又不在跃进指标之内，放到后边再说吧！’老支书进一步提醒他说：‘没有苜蓿，来年牲口就会饿死的。没了牲口，粮食想增产也增不上去！这不是杀了母鸡抠蛋吃吗？’就这一句话，被老胡给汇报到公社里去，老支书便成了右倾保守的白旗，大会小会点名批判。此后，老胡便掌握了村里的实权（名义上是大队副书记），他把大跃进推得一浪高似一浪，速度和指标都高到把死人都能吓活了的的地步。在这样的苦战中，我会累垮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幸好没过多久，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也使我这个没有政治灵魂保障的负罪肉体得到了解脱。大队里要画一幅《山区跃进图》，要把老胡脑子里边无知的勇敢和愚蠢的大略宏图，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老胡又看中了我的才能。据说，我这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也可以有控制地使用，关键是控制。这样，我就站到二米多高的画架子前，风吹日晒地用油彩和画笔去描绘老胡脑子里的跃进宏图。

“年轻的朋友们，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地叙述我在画面上所画的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什么用三匹马也拉不动的一棵大红薯，比骆驼还要高大的肥猪，密得在稻穗上可以站两个孩子的稻田，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那时候都想到了，都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我想说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那是在一个闷热的中午，人们都回家吃晌去了，山村在强烈的阳光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宁静。调色板上的颜料不足了，我回到大队部里去找颜料。刚刚走到窗下，一段意想不到的对话把我惊呆了，使我一年来一直无法解开的谜，得到了一点启示。只听老胡在里面振振有词地说：“你爱过他，这我知道。这不能怨你，因为他把自己伪装起来。现在他跳出来了，一切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向他打过招呼，希望他不要走这条路，但是不行呀！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是非跳出来不可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嘛，有什么法子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他有才华，这就更坏，就更有一张迷惑人的画皮。没有正确思想，才华越高就越糟。这一点你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你要丢掉一切怀念，斩断柔情，不要再在感情的丝巢里作茧自缚，痛苦不能自拔，那会毁了你的！我说

的不仅仅是肉体，而且包括你的政治生命。这一年来，若不是有我给你作一面挡风的墙，在各个方面遮护着你，你自己也看得清楚，运动的浪潮早就把你卷去，像一根残枝败叶给冲到泥沙里！’对方没有回答，难忍的沉默中有轻轻的啜泣之声。我想转身走了，但在沉寂哀怨之中突然喷出一股愤怒之火：‘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你的袒护！让我继续滑下去好了，也许滚落到右派的泥潭里比现在吊在悬崖上还要好受一些。我受不了这个折磨，就让我自我毁灭吧！’这是罗兰的声音。‘你没有理由自我毁灭，没有理由为了痴迷的感情和一钱不值的精神忏悔，毁掉你妙龄的青春和美好的前程；同时，我作为你哥哥的同事，你的忠实的朋友，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只要你能振作起来，没有谁会比你能赢得更多的幸福！’

“‘幸福，什么幸福？自从你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封信，我就永远毁了自己的幸福！’罗兰声音颤抖地说。‘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我拿走的，是你主动交出来的！’老胡说。‘那就更坏，因为你用欺骗的手帕，蒙住了我思维的眼睛。’‘这是你的幼稚，你愚蠢的偏见。为了正确的政治目标，什么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更何况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向组织交心应当是毫无保留的，包括你的私生活在内。’‘我没法接受你的逻辑！’‘可是你当时却偏偏接受了它！’老胡拿出宰割人们灵魂的残酷。‘这正是我的不幸！我不知道你们会用它来整人，把他整到今天这个可怕的境遇。我真恨我自己，真恨……’呜咽的声音挡住了语言的泉流。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受不了这自我毁灭的声音，这种最残酷的剖白。它对我的折磨比对她本人还要厉害。

“后来我有几次找机会接近她，想给她一点安慰，设法

减轻一些压在她心灵上的忏悔的重负。我有权利让她忘记过去，忘记那永远无法吞咽下去的痛苦的去。可是我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受到监管的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到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更何况她一如既往，总是尽量想法避开我。”

“你说的这个老胡，叫什么名字？”听得出神的田滕突然插问道。

“他嘛，他叫胡正兴，听说现在是某个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画家摘下了眼镜，用手绢擦拭着。

“噢……”田滕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你怎么了？”画家戴上了眼镜，仔细地望着他。田滕的脸红了一下，连忙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

恍然之间，我好像也联想到了一些什么。

五

据我所知，田滕和胡娴娴的关系，一进学校时就已明确了。

在我们这几届大学生中，有的来自应届中学毕业生，有的是来自社会青年。这两类学生差距很大，无论是在年龄上、智力上，阅历上和社会经验上，都是无法相比的。平时谈话里，他们常称我们为“小同学”，这个词里含有多种叫人感到不是滋味的滋味，不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们。胸前挂着同样的校徽，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可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对于生活的态度，确有极大的不同。我们都很尊重他们（实际上也没法不尊重），羡慕他们，有的也就跟着学他们一言一行的风度。有一定阅历的胡娴娴，更是成为一些女

同学眼中的片子。她多少有那么点傲气，一出口就是“他们那帮小孩！”她有足够的气魄和风度，引得人们注意她，跟着她、羡慕她。她的交际也特别的广，社会联系特别的多，校门口的那个公用电话，她使用的次数最多，占用的时间最长。她传递出来的信息，特别是高干子弟层里的信息最多，这自然也在“他们那帮小孩”中间引起极大的兴趣。她的这些才能，在班里组织什么社会调查和生产实习时，便能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不论是到工厂、商店抑或某些科研单位去联系实习地点，她会比任课老师还有办法，能把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圆圆满满，把实习的项目安排得踏踏实实。她自己的调查报告也会写得有声有色，提出一些颇有深度的见解。嫻嫻嘛，是个干才，女强人，八十年代的新女性！

田滕却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是个学究，只要看他那瘦干的长脸上架着那副度数很深的眼睛，斯斯文文的动作，便使人联想到一个典型的形象。他能画画，而且写得一笔好字，他那潇洒风流的草书，真让人感到有点怀素的味。他自然也是某些“小同学”的景慕者。他从不对谁发出号召，不对什么事情强烈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可是，总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依照田滕的思路去思考问题，照他的方式去办。同学们私下里，有时当着他的面议论他和嫻嫻的关系。有的人说：“他们俩人结合，是嫻嫻赚了！”有的人反对：“不，是田滕赚了！”但更多的人认为，他们俩谈不上谁赚谁不赚，完全是两种气质的人，其价值是不好互相比较的，就像拉飞尔不好和巴尔扎克相比一样，各有千秋，各有所长。

前年，胡嫻嫻通过关系联系到了一个名额，到美国某所大学读书去了。据说，是她那位很有本事的父亲给办妥的。

那位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在与外商洽谈的几百件进出口贸易公事中，只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有意无意地洽谈到一项小小附加条件，便是资助娴娴自费出国留学问题。娴娴是个有能力的人，爸爸也是个有能力的人，这种机遇自然首先要落到娴娴的头上。消息传来时，同学们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惊异，好像娴娴出国那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换了别人，那倒要引起一番小小的议论和猜测。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不足议论的事也渐渐产生议论了。有人猜测田滕早晚也要到美国去的。没有《追鱼》这场戏，鱼便肯定会溜掉，不再属于田滕的了。可是人们看看田滕，却从未见有出国的意识和举动，好像他正准备考我们学校里名望颇高的白教授的研究生呢！对于白教授所招收的那个专业，他抓得也很紧。于是，舆论又纷纷朝着另一个方面转移：娴娴和田滕早晚要拉吹，爱情的深度和地位的落差，构不成相应的同位角。而且事实，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黯淡的趋势，就像是一张相纸，曝光的时间越长，显现的影子越黑。就在昨天，田滕收到了娴娴的一封信，言语的疏淡，已超过了一般人的观念所能接受的程度，一滴醋酸稀释到一千倍。田滕毫不避讳地把信交给寝室里的人看，我也在场。人们的眼里不免流露出些不公平的目光，但谁也不好说什么。有些事情，本来就无法衡量是非曲直的。

偏是迂阔的文克生文博士，这时又想起了一桩往事，还说是他插队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他说，事情是个悲剧抑或是个喜剧，先不急着去评议，但故事的逻辑性却是非常的强，一二三四五排列得极有秩序，因此，我们村的插队知青，都把它称为爱情的逻辑系列。这个老文，总是那么学究

气，讲故事也要带着穷酸气味！老文说，他们知青点里有个青年，小伙子长得十分英俊，与大、小队干部处得不错，上下左右关系搞得都挺好，那自然便是个凤毛麟角的人物了。后来，他与大队书记的女儿谈了恋爱，两个人好得形影不离，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还要留在农村修理地球、没有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变化的话，他们很快就会结婚的。可是不久就出现了新的情况，公社给我们大队一个保送大学的名额，而且是全国一流的名牌大学。这事在支书家里，立即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支书女儿坚持要父亲推荐那位英俊少年（也就是她的对象），老父亲却深明世故，认为万万不能这样做。他警告女儿，小伙子一旦上了大学，就会把她忘记。女儿不听，他告诉父亲，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海誓山盟，非寻常可比。老父亲对她说，他走的桥比她走的路还多，吃的盐比她吃的米还多，流的汗比她喝的水还多，这种事情只靠那点感情是维系不住的。女儿不信。争论的结果，父亲自然执拗不过女儿。但为了折衷起见，他们把小伙子找上门来，让他当面表态，日后会不会变心？如果他肯当着全家人的面发誓，保证天长地久，海枯石烂，就推荐他；如果没有这个坚定意志，这个名额只好让给别人。小伙子自然是表现了一片忠诚，一片感人肺腑的忠诚，感动了支书全家，多情的女儿还流下了泪。自此，小伙子就离开了茅屋住进了高楼，胸前挂上名牌大学校徽。而且以响当当的工农兵学员的身份，直接参加了学校的上管改。后来事情的变化，就沿着必然的逻辑有秩序地发展下去了。支书的女儿名叫王秀珍，她开头收到的信，都是用“珍”字的称呼，半年之后就改用“秀珍”两个字，后来就用三个字“王秀珍”，再后来就是四个字“秀珍同志”，

等到快毕业时，就变成了“王秀珍同志”五个字。结局不用说了，用简单的数理逻辑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嘿，这个体系博士，在这样事情上还讲体系呢！大家揪住老文不放，哈哈一阵大笑。可是我回头看看田塍的脸，却是灰遍遍的十分难看，眼睛阴沉得没有一点光亮，比雷雨前的天空还要黯淡。

我不想让他继续留在这种空气里，便把他拉了出去，走向我们常走的那条路。也许画家老师离奇的故事，能够分散一些他心头的烦闷。

“感谢你们常来看我，听我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年旧事！”他点燃了一支烟，好奇地望了望我们说：“你们怎么会不感到烦絮呢？”

“对于过去的年代我们是一无所知，我们很愿意知道像你们这样命运的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田塍感情真挚地说。画家点了点头，手中翻着一本画册继续说：

“那好吧，我年轻的朋友，我就继续讲我的故事吧！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过分为我的命运忧伤，下面我将要讲的一段波折，还仅仅是我那无边的苦难历程的开始。

“一天，我正在田里劳动，有人把我唤回到大队部来。屋里已经冷森森地站着几个陌生人。有人急匆匆地宣布了我的几条罪状之后，我便被塞到一辆封闭得很严的吉普车里，随后，天旋地转地将我押送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

“走出车门，我已经站在一座古罗马废墟一般的破窑洞面前。周围一片荒凉零乱，除了残砖碎瓦之外，就是一堆堆垃圾。窑洞里面暗极了，在五十多米长的地窑里，只有一支十五瓦的电灯，灯泡外面还套着铁丝罩子。等我的瞳孔扩大到

足以辨别周围形象时，我看清中间是一条通道，靠墙两面是一溜用木板搭成的大炕，炕上齐鸦鸦地坐着一排剃光了头的人。盘腿打坐，两手一律放在膝上，像一群参禅诵经的和尚。他们的面孔都像雕塑一样的呆滞，冷漠，缺乏人的表情，甚至当我突然闯入他们眼帘、东张西望地从他们眼前走过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脸上露出任何一点反应。

“在对面的木板炕上，靠墙倚坐着几个穿戴整齐，留着分头的年轻人，眼角里流露出威严的目光。他们正在审讯一个小偷，让他交待自己不光彩的行径。有个年轻人从炕上跳下来，将我安排到对面大炕的第一排，让两旁的人为我闪出三十公分的空位。这次，他们呆滞得像瓷人一般的面孔都显露出人性的反应，表现老大的不高兴。因为，空间的压缩对于他们保持的姿势，无疑地要增加更大的难度。

“审讯席上，一个带着宽边眼镜的年轻人，一摆手让站在他前面的小偷停止交待；然后他走向了我，以保持着人类社会全部尊严的神态，向我宣布了劳动教养所的纪律。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走进了怎样一个禁区。我已成为一个与世人隔绝的劳教犯人，同我并排就坐的都是一些小偷、流氓、赌棍和淫乱的刑事犯，都是为世人的清白良心所耻恶的一群。天哪，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唾弃的角落里来？

“为了使你们弄清我这次突罹灾殃的原因，我不得不回过头来，再讲讲我与那个丑恶灵魂的纠缠，虽然时过这么多年，说起这件事来还是叫我情绪败坏，忿忿不平！

“自从那幅《山村跃进图》画好之后，我的名声在僻远的山区里一下子就传开了。虽然画中物体的比例是那样的失真，那样超越正常的理性，但是淳朴的乡民还是很喜欢它，

称赞它，把它当作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来欣赏。附近的几个村子，有人成群结队地跑来看画。不知道是油画逼真的质感，还是画中的猪与牛的傻憨憨的神态，使他们产生特别亲昵的感情，每次观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有人也跑来看我，同我友善地、亲切地交谈，邀我到他们村子里去，也为他们画一幅类似的画。至于本村的人，虽然早已发现我与一般下放干部的身份不同，处于受管制的地位，但仍然喜欢同我谈谈家常，时不时地流露出同情和关怀之意。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虽然犯了错误，但依然是个干部，遭贬的王子依然是个王子。殊不知，我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而是丢掉了政治生命，没有权利被称作为同志的人。

“老胡对我得到的这些同情很感不安，出于革命的义愤他大为光火，让一个右派分子受到这样的待遇，太不像话了！阶级界线的混淆，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为此，他召开了一系列拉紧弦的会议，除了布置下放干部、农村党团员、民兵、治保主任和生产队长，对我加强监督和管制之外，并且召开了全村批判大会，当众宣布了我的身份，也就是说，把那顶拿在手里的政治帽子，明晃晃地戴到我的头上，让人望而生畏，见了面就像躲避瘟疫似的避开我。同时又给我宣布几条纪律，让我只干沤肥、清厩等脏活，不能参加群众性劳动。我又处于绝对隔离的状态中，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孤寂和忧伤了，正像我已经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希望一样。我看见眼前是冷酷的、不可改变的现实，思绪反而冷静下来。眼泪已经干了，心肠也就硬了，物我两面都变为毫无感应的冷漠。甚至对于罗兰，我也不再去想她了，虽然我天天看她在

受苦，在自我折磨，或者说在进行懦弱的反抗。她日渐消瘦的影子虽然有时也在我的眼前闪过，但已不再震撼我的心弦了。我要走进的，是一个冷酷的、无声的内心世界。

“正如辩证法所揭示的真理，矛盾是无所不在的，一切都都很顺利的老胡也纠缠在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他对于罗兰的钟情，虽然日趋炽烈，日趋成熟，但是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反射到罗兰那里去的电波，都好像碰到了绝缘体上。她日渐枯萎的心灵，已经不能流出一滴露珠可以用来滋润爱情的种子了。老胡对于我也感棘手，虽然明知我是他幸福的一个障碍，但却也没有办法把我的影子消除。他憎恶我的政治灵魂的堕落，却又贪吝我的可用的技能，特别是当县里指名要我去画一些宣传画时，更加深了他嫉妒的感情。因此，每次我应邀出去画画时，他不仅都要给我带去详细的身份证，而且还要给我派去一个助手（实际上也就是我的监视人），明确地向下交待：不论我走到哪里，站到哪个岗位上，都不能放松对我的管制。

“秋天来了，金黄的秋天所展现的景色是迷人的。它以撩拨人心的诱惑力，召唤人们赶紧去收获地里的庄稼、树上果实、心头的希望和让人眼馋的荣誉与锦旗。老胡在这些天里，简直就像喝醉了酒，面糊糊的脸上泛起了红光，可以清晰地看出他那得意的神情。当然他也忙得不亦乐乎，脚后跟直打后脑杓子，从田头到场上，从公社到县里，有数不清的大小会议要他参加，有数不清的报告、传达、指示要他去听，数不清的汇报、传经、送宝要他去讲。我想，这时他已从心头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正在踌躇满志地去拥抱着即将属于他的美好的一切。甚至连我也被他这种美好的情绪所感染，看

天格外的湛蓝，看到露珠感到格外的清亮，看到谷穗感到格外的金黄。老胡又让我给他绘制各种成绩表，用一支支腾空而起的火箭，来表现山村在火红的大跃进中所创造的惊人奇迹。

“有一天，他让我去参加一个最后核实产量的会，以便立即将这个最能击中目标的火箭发射出去，当然我只能坐在一旁记录，绝无发言的权利。会上，各生产队长都争得面红耳赤，显然，他们都经过了良心与荣誉之间的反复较量，求实和求荣之间的严峻斗争，最后只好硬着头皮互相比着胆量，一步步地将产量核实上去！一向能够保持冷静的老胡也无法再保持冷静了，他常常在关键的时候点人的名，敲人的胆，拚命追求最理想的数字。然而就是这样，最后核实下来的产量，依然没有达到老胡理想的地步。他有些愠怒，手端着茶杯站起身来不停地踱着步子说：‘这不可能！不可能！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特大的丰收，才只有这么多的产量？你们一定是没有算准，不然就是右倾保守思想遮住眼睛，有了粮食你们也看不见。再不然，就是想瞒产私分！哼，这些我心里都有数！’有人想插话，老胡即刻止住他说：‘我知道，我都清楚，没有必要再往下检查了！地里能打多少粮食，全装在我的心里！我看这样吧，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把产量50万斤后面，再加上一个0。各队报的数字呢，也就原封不动了，各在后面加个0就是了。这也是跃进声中的跃进办法！’

“我是学美术的，按说应当把几何、投影等数学学好，遗憾的是先天不足，报考美院的时候数学不及格，许多求证与假设的推导关系一直闹不很清楚。经济学家孙冶方曾自谦地说他是个‘教育’，如果与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家相比较，我

更是个数育中的数育了。可是，不管我对数学知识是怎样的贫乏，但对于十进位的阿拉伯数字中的0，还是能够弄清它的功能和作用的。因此，当老胡布置我赶制一幅产量增长速度表时，我的良心立即向我提出警告：艺术之神不能为这种丧失理智的狂诞欲望涂抹颜色，不能亵渎艺术之神的真善美的灵魂。我已经毁弃了自己的灵魂，不能再去亵渎神祇的灵魂，如果那样，我倒真正成了圣坛面前的罪人了。不错，我春天时候画过比例失真的《跃进图》，但那是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大胆的追求而采用的一种夸张手法。艺术的夸张和现实的浮夸是两码子事。我的良心颤抖着，丢下了画笔回身就走了。老胡气得浑身发抖，抓住了我的衣领，几乎是变了声调地说：‘你敢这样猖狂？你，你，太猖狂了！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一种侮辱的感情像火炭一般灼烧着我，我喘着粗气说：‘没有忘记，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眼睛径直地逼视着他，是不是有一股威严的光束射穿了他，我说不清，反正他马上松开了手，向后退了两步：‘你，你，你要怎么样？’‘我不能用艺术来搞诈骗！’‘你现在没有资格谈理论，谈艺术，那是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你是一个右派分子，只有接受监督管制的权利，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是个人！’我把人字说得特别的响亮，而且高昂地扬起了头。‘你不是人……不，你不是人民中的一员，你，你……’他着实地发怒了，有些语无伦次。‘什么，我不是人？’我气得浑身颤抖。‘不管怎么说，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后果，我当然知道。摆在我面前的，将是向更深一层

的沉落。但是，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难道还怕下地狱吗？既然前脚已经跨进了那个可怕的门坎，就决不犹豫动摇，再把后腿拔回来！该走的路，就冒死地走下去，更何况，生与死何者更为痛苦，在我的脑子里早已模糊了界限。

“从老胡的屋子里出来，我不但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拿起画笔去画那个尾巴续了个假0的产量增长速度表，反而铺开信纸，向县委写了一封揭发老胡虚报粮食产量以及在生产上的瞎指挥、损害农民利益的信。我的年轻朋友，我的命运注定，一切灾难都要和信联在一起：前一次因为母亲的一封来信，我丢掉了政治生命；这一次，也没有让我摆脱开那神秘不祥的因果锁链。因此，拖累我的命运的信发走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被吉普车押走的事件。

“我在窑洞的木板炕上还没坐到两个小时，两条腿就麻木难忍，腰椎骨也像断裂了似的疼痛。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侮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会堕落到这样一个身心都感到龌龊的角落。嗓子里像堵了一块东西似的，又噎又疼，憋着一口上下都不能通的闷气，以至晚饭送来时，一口也吞咽不下。

“尽管晚饭时候我什么也没吃，但谁也不作理会。可是晚上睡觉却不同了，是强制性的，哨子一响，便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操着河南口音、生得厚敦敦的中年汉子，手里拿着一个卷了边的练习本。犯人就地排成了一行，垂手立定地站着，中年汉子翻开了练习本，按照顺序点名。人与名核实妥当之后，他发出了一声上炕睡觉的口令。顷刻之间，木板炕上便齐鸦鸦地睡倒了一炕的人。等我回身去找我的地方时，不禁大吃一惊，竟连个针孔大的空隙都没有了。中年汉子动了火，对我痛骂了一番，责问我动作为什么那样迟缓？骂

过，他只好又吹响了哨子，把犯人都喊起来，重新列好队伍，然后由他喊了一声一、二、三，采取机器大工业协同动作的方式，一齐倒下，一齐进入睡眠状态。这次，我总算找到了个位置，但是其他的人却不得不因此大大地压缩了进入睡眠状态所必不可少的空间。每个人都必须侧着身子睡，而且是头朝里与头朝外的颠倒而卧，就跟罐头盒子里排列的沙丁鱼一般。奇怪的是，即便是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还是连眨眼功夫都没有，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人，真是奇妙的生物！不过，也有的地方叽叽嚓嚓地争吵起来。中年汉子走过去不耐烦地问：‘怎么回事？’‘报告大组长，他的脚太臭！’‘臭！什么香？全聚德的烤鸭香，你倒是别到这里来呀！’大组长的河南口音虽然说得严厉，但我听起来却觉得含有难得的幽默感。

“我怎么也睡不着，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窑洞顶上那支十五瓦的昏黄暗淡的电灯泡。听值班组长轮流地在我头前走过，他们披着的大衣衣角也常擦到我的脸上。灯光是通夜不灭的，为了防止犯人自杀，灯泡外面罩了一个铁丝网子。也为了同样理由，这里面禁存一切铁器和锐物。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想自杀。不存在自杀的理由，因为我不是罪犯，我倒要弄清楚这荒诞的瓜果，是从哪根无理的藤上结出来的？”

“身旁的两双汗脚，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而且又都像铁钳子似的，紧紧地把我钳住，让污秽在缓慢地窒息我。无法转身，无法回旋，紧紧把我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奇怪的是，正当我怀疑身上的血液是否能够顺畅地流通时，我的饥肠却辘辘地响起来。生命这种东西，真是顽强呀！为了回避

眼前的窘境，我尽量把思绪引到过去的回忆中。我想到了美术学院那些闪耀着天才和智慧之光的画廊，想到了飘着海鸥和晚霞的倒影的大海，想到了一位穿得洁白衣衫站在手术台前的女医生，想到了为我而掉进痛苦的深潭里面的罗兰。真奇怪，虽然她不能再爱我，我也不能再爱她，这已成为命中注定的事，但为什么在这钳得紧紧的木板炕上，还摆脱不掉这个影子呢？

“很快，我被押进这个污浊角落里来的谜，就被揭开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叫到中队长办公室去。中队长是个长得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虽然满脸严肃，但是红润的两腮还是透出几分孩子气。他把桌子的中间抽屉拉开，从里面取出一摞子档案材料。不知他是要寻找什么线索，还是让我知道他已掌握了我的命脉，低头不语地翻看那些材料。呆了很长时间，他才把目光盯到我的身上：‘你叫史复生？’‘是！’我立正地站着回答。‘你在进来之前，干什么工作？’‘搞美术的。’‘犯的什么罪？’‘不知道！’老天作证，我想问他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你不老实认罪！’他拍了桌子，脸涨得更红。‘也许因为我是右派分子吧？’我疑疑迟迟地望着他问，‘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不老老实实接受监督管制，又猖狂地跳出来攻击三面红旗。真是反动透顶，老死顽固！’天哪，我才只有二十五岁，就已成了冥顽不灵的老死顽固了！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鲜艳红旗，你哪一面不反对呀？’说着，他用手拍了拍一个白色的卷宗。我知道了！那里边一定有我给县委写去的那封揭发虚报产量的信，里边是否谈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十个大字，我记

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丝毫没有褒贬的意思，更不要说是恶毒地攻击了。但是冷酷的现实再一次地提醒我，命运之神让我注定要背负一部无罪的罪行录。那无智的良知，你在冥冥之中给我的惩罚真是太无道了，太荒唐了，又太苛刻了！它逼着我在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做无法选择的选择：一方面让我承受罪恶的惩罚，一方面又让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赎买我本来无罪的罪过。甚至，在我即将走进另一个世界的门坎时，都无法向上帝忏悔，请他宽恕我的罪过。因为我感觉不到我的罪过，这也就是说，我的灵魂是永远也无法解脱的了！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女厕所里去掏粪，然后挑到菜园子后面的化粪池里。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黑大汉。他因为犯了什么罪而进来的，我记不大清楚了。他每天把我领到女号的院子里去，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先喊一声报告。门口有个瘦骨零丁的女人在洗衣服，那是女看守。她头也不抬地说：‘等一等，现在正放茅！’这时，院子里叽叽喳喳一片热闹嘈杂的女人声，我透过栅栏向里看了看，有三十多岁只穿一件背心、面孔污黑的女人，也有穿着花格连衣裙梳着油光水亮的头发的苗条少女。但是，说起话来却都是叫你意想不到的粗野。那些连男人都说出口的骚话，她们竟像爆豆似的噼噼啪啪地扔出来。好像这些话可以帮助她们舒展一下坐得僵直的筋骨，舒散一下憋在心里的闷气，因此，说得越多越欢，心里越畅快，越解气，越解渴。‘这帮臭货！’老朱（跟我一道挑粪的黑大汉）低声地骂了一句，我没有听清他的话音是欣赏还是厌恶。

“等了好长一阵子，女犯放茅的时间过去了，我与老朱走

进厕所里去掏粪。污臭熏天，蝇蛆满地。两只一百多斤的粪桶往肩上一压，使我踉踉跄跄迈不开步子。步子越迈不开，粪桶越摇，那粪便溅得满身都是。门口的女看守看我的狼狈样子，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揶揄地说，‘又是一个臭知识分子！早知这样，念那些书干啥？还不如这些氓爷，乐得吃个够，玩个够！’我的感情也被溅上一身污浊，心口像灼烧一般地疼痛。我真想大哭一场，不是因为那活儿脏，不是因为那超过我体力负担的过重劳动。劳动是不会刺伤人心的，刺伤人心的是把这又脏又重的劳动作为惩罚。

“挑了几担粪之后，老朱和我坐到化粪池边休息。他告诉我，每天要挑四十担粪，否则晚饭就要定量供应。啊，大粪和粮食竟是这样地转化，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直接，更清楚。为了能够吃到一点粮食，我就不得不顾满身溅污地拼命挑粪。但遗憾的是，我不论怎样努力，也挑不够四十担，因此晚饭只好按定量供应了。所谓定量，就是比别人少吃一半。别人是两个窝头，一碗稀饭，我则只能吃一个窝头，没有稀饭。看起来，知识分子是真的不能犯罪，否则，在同样的条件下，更不好过一些。”

六

“啊，朋友，我年轻的朋友！你们听见有人给你们讲过饥饿的事吗？如果没有，我劝你们回去找找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生命的热爱》看看。列宁是很喜欢这部作品的，它逼真地描写了一个人在饥饿折磨下的生理痉挛和精神恐怖。列宁有句话说得非常深刻：‘饥饿是无情的。’所以直到今天，一想到饥饿这个无情的怪兽，我的每根神经就都像秋风中的

一片叶子那样战栗、瑟索，思想和感情都被无边的阴云笼罩起来。因为，我曾被那只怪兽欺凌得那样凄惨，那样可怖和可怜，就如巨蟒缠绕中的一只小兔，一只青蛙，几乎完全窒息了呼吸，昏迷了知觉，整个身心都处于濒危待毙的麻木中。我看到一群饱含着智慧和才能的生命，一片血肉之躯，都被这个怪兽给无情地吞噬掉了。啊，太可怕了……”

他用双手捂住了脸，埋藏在窒息人的寂静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恢复了原来姿态，并向我们致歉地说：“请原谅我刚才的下意识动作！不知怎地，每当我回忆到这恐怖的地方时，便不能不用手捂住自己眼睛，已经无法自控。”

“1960年，我们调到清河劳改农场，因为那里缺乏劳动力，需要有人去补充为饥饿所造成的自然减员。我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阴晦的日子，绵绵细雨下了几天几夜，田地里积着水，道路也很泥泞，卡车粘在泥水里，像一头奄奄待毙的黄牛，无论怎样喘着粗气都滚爬不动。等我们到了清河农场时，衣服全都湿透了，潮气侵入骨髓，从心里往外冷。我被分配到二号工棚里。走进屋内，淅沥的雨声倒是听不见了，但是潮湿的地却与外边差不多，一踩直冒水。这里没有床，连木板炕也没有搭，只在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人们就睡在稻草上。那堆可怜的稻草也早被潮气给湿透了，摸一把就像在水里浸泡过似的。我们这些丧失了政治生命的劳动力，今后，就将长期地栖息在这像被冷水浸泡过的潮湿和阴冷中。”

“蜷缩在稻草铺上三个昼夜之后，天放晴了。我们编队下到大田里去干活。临出工前，我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拿出来，在院中拴起一根绳子晒起来。考虑到下地干活要出汗，我只穿了两件单薄的衣衫。走到地里，人们僵硬的感情好像

又复苏了，有说有笑，甚至有人还哼着小曲。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总是能够找到生活乐趣的冷杉，甚至产生了创作的激情。对了，我忘记向你们做交待了，这个冷杉是我在画院时很要好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报社里工作。在我进到劳动教养所之后不久，他也进来了。至于什么原因，不用说，其中也自有一番既清楚而又糊涂的经历。

“他凑到我的跟前，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一幅画的构思来：‘老史，你知道我用什么作标题吗？你是猜不到的，诗意浓极了，简直就像一杯咖啡，一杯白兰地。不，不，不是白兰地！你还记得我们在萃华楼里喝的那种酒吗？就是为庆祝你获得青年联欢节银牌奖的那次！我的天呀，那股醇香劲儿，叫你的灵魂都醉了，每一个细胞都会感到安慰和舒畅。’‘能够理解！能够理解！不过那酒叫什么名字，我倒忘了！’我补上了一句。在那个时候，人们最爱讲的话题，就是关于吃的。食欲垄断了人们的思维，排除了其它一切杂念。

“老史，我告诉你，我这幅画的题目，就叫作《在泥泞的小路上》。你知道我用什么颜色吗？不，那种颜色会造成太沮丧的气氛！恰恰相反，我要用……’冷杉的画《在泥泞的小路上》我总没有见他画出，可当下我们已在泥泞的小路上送走了落日，并沿着来时的足迹回到了工棚。一进院子就使我大吃一惊，我晒衣服的绳子依然尚在。而绳子上的衣服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我维持生命的全部家当，眼前的湿冷，日后的严寒，叫我用什么来防御呢？我去问看守人员，遭到的是一场理所当然的臭骂：‘谁叫你不看好，到这里来摆阔气！没法给你查！’

“吃过这场窝心的训斥后，没有办法，只好端起面盆，

去吃那顿略微可以顺心的晚餐了。所谓晚餐，就是用白菜帮子和叶子加上一点玉米面熬成的稀粥。晚餐的定量是每人三两，白菜叶子按六两折一两粮食计算。因为还要加若干的清水，因此这区区三两粮食就得要用洗脸盆子去盛了。你们没有这方面的感受，人们的肠胃是越灌越大的。本来想要用汤水来填补食物不足的空白，结果越填空白越大。因此打完一脸盆稀粥后，人们并不离开饭桶，而像一群入冬后的苍蝇一样，粘粘糊糊地围在那里。嘴里喝着盆子里的，眼睛却望着桶里的。等到炊事员把定量一分完，人们便喻地一下拥上去，争着抢那桶里的残渣余孽。为了能多捞一口，有人把胶皮鞋脱下来往桶里去抠，抠出些汤水来就往嘴里送，什么鞋壳里的泥土和汗脚的臭味，全都顾不得了。而且，饥饿的胃也容不得你去品尝那些难以捉摸的味道，不等你咀嚼，嗓子眼里就伸出一个小巴掌来，一下子就把手中的食物搂进肚子里去。有什么办法呢？生命，是制造馋虫的机器！据生物学家讲，许多低等生物的全部生命过程，就是吞食和排泄。能够吞食，生命就能延续，否则就是灭绝。大自然只承认这一无情的规律。

“我不想灭绝，就得想办法维持我这没有政治生命的生活。我不得不给很想爱我、但又不敢爱我的母亲写信。这是我划成右派后第一次给她写信，我不愿意用我污浊的手去玷污她纯净的面目，纯净的心灵。我是非常爱她的，正因如此，我就更不愿意因我的不幸而牵连她，用自己的烦恼来增添她的烦恼。即使这样，她已经够痛苦的了。她曾经为了生命的纯洁，先是像《怎么办？》中的薇拉，忍痛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后来又像《牛虻》中的蒙泰里尼，忍痛抛弃了自己的儿子。

我的理智和感情，都不允许我无缘无故地去破坏她的纯洁，破坏她的平静，让她把天生的聪敏和半生积累的经验，都贡献给医学，贡献给把人接到这光明的世界上来的神圣事业。可是现在，我终于无法阻拦我的自私的欲望，不得不给她写信了。因为我还年轻，还有对艺术的梦幻与追求，还有一种动物的本性。我在信中，尽量不带一点感情的色彩，对自己的处境不做一丝一毫的吐露。比等因奉此的公函写得还要枯燥死板，只是在信的尾巴上提出了一点要求，希望她能够给我寄来几件御寒的衣服，如有可能，最好再寄来点吃的东西。

“冬天来了，冰雪和寒风冷酷无情地抽打着地上的生物，同时，也冷酷无情地撕毁着一年里残存无几的岁月。它把已逝的时间骨骸用白皑皑的寒涛卷走，又用刮刀似的舌头来舔噬最后几张日历片。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脸上浮肿，头大得像个大头娃娃，两条腿走路如同踩在棉花包上。周围不断有人死去，像门前那棵老榆树上的叶子，眼见着一片片无声地落下去。不少的人在晚上睡下时要铺上一片席子，以备第二天起不来时，人们更容易地将他用席子卷走。母亲不时有东西寄来，这是我以比别人更弱的身躯，能够更长时间地耗下去的原因。老朱就睡在我的身边，这个身体硬梆梆的傻大汉，也有较比别人更多的体力消耗，因之他的体内收支有较别人更多的不平衡，浮肿的程度也就更严重。

“农场里规定，早晨出工干活的人，可以多吃一碗稀饭。为了这稀饭，这傻大汉每早都要出工的。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使他的收支更加不能相抵。我不时地给他一些支援，但是杯水车薪，怎能浇灭他体内熊熊燃烧的饥饿之火呢？他见别人隔三差五地都有邮包寄来，就央求我也给他一个家住农村

的哥哥写信。信是接二连三地寄走了，但却一点回音都见不到，就像站在绝顶悬崖上向幽深无底的狭谷里投石子一样。可他还老是不死心，一闲下来就凑到我的跟前，傻憨憨地笑着说：‘老史，帮我再写一封信！帮我再写一封信！’人哪，可怜的人！为什么天生下来都有这样强烈的求生之欲呢？

“更加可怜的是冷杉，这个倒霉的画家叫人看见了就为他心酸。他那永不消逝的笑容在悄然地消逝了，原来就很突出的颧骨，现在竟像两把尖刀似的向外凸起，眼窝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呆滞无神，再也看不出有什么艺术感受的灵光了。那薄薄的线条细腻的嘴唇，像两片秫秸叶子似的干瘪，那些有风趣的俏皮话儿，也全部被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唯一能够听到他说出的话，就是有关吃的信息。只要有人从外边进来，他总是要贪婪地去打听一下：‘八分钱一个的大油饼，还能买得到吗？’‘加糖的小豆粥能喝到吗？’

“有一天，他突然悄悄地走到我的跟前，嘴角上掩盖着一丝捉摸不定的笑纹，眼光里流露出谲诈诡秘的神情，爬到我的耳根子上说：‘老史，你别生气！我跟你泄露一个秘密，不过你得保证，千万不能对我、对她发脾气！’这个家伙，不知从哪偷来了一点活力，舌头又那么灵巧起来了。‘老史，这不能怪我，我有什么法子呢？饥饿的毒蛇缠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也不打算像条狗似的可怜巴巴地死去。现在，我的身上只有思维的器官还能开得动，于是我就闭着眼睛苦苦地思索着，想在荒野闭塞的草莽林檎之中寻出一条求生之路来。你知道，我是一个孤儿，世界上有谁会对我这个被遗弃了的人伸出同情之手呢？在绝望中，我想到了一个人，我知道只有她在这个艰难时刻里，能够不对我们这号人投以鄙夷的跟

光。她会为了你，拿出身边的一切，甚至包括维持她的生命所必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需要，她会献出她的整个生命'。我渐渐地明白了他想要说些什么，他想要向我乞讨什么。我的心，就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老史，于是我就跟她（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谁）通了信，告诉了她我们的地址，讲了你，当然也讲了我的近况。我对她发誓，我绝对把这一切隐瞒过你，偷偷地把她寄来的食物分给你一半，让我们能够维持住生命，渡过难关，等将来情况稍微好转一些之后，再把详情告诉你。可是当我收到邮包之后，竟禁不住伤心地哭起来。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从娘胎里爬出来时，泪腺的发育就不健全，可是这回却再也无法控制。我把几十年来积蓄下的泪水，一古脑地都流出来，把双层包裹的邮件都湿透了。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了羞耻、悔恨之类的道德等观念而伤心，不，这些伦理上的东西早被饥饿给赶到爪哇国去了。我是为她而难过，为她一颗纯洁的心蒙受如此深厚的灰暗而难过。多么沉重的良心负担呀！不该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到一个弱女子的身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公道的了！我真后悔，我真不该拨开时间的荒芜，触动她心扉上滴血的创伤！可是我……'

“冷杉说着说着，整个的人就浸泡在泪水之中了。我本来想要发火，狠狠地痛骂他一顿，现在竟没有了一点力量，只是默默地垂下了我本来低得已经很深的头，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抵御住身外的狂风暴雨和心内的冰冻火烧。

“过了一阵子，痛苦的寒潮好像已经流淌过去，冷杉又从灭顶的波涛里探出头来，喜孜孜地望着从小窗口里透射到

他身上的一线阳光：‘老史，你听我说，这些都没什么，最主要的是活下去，勇敢地活……吓，别说这种空洞的漂亮的词吧！反正，反正我们得想着法儿活下去！这包吃的东西，不管你怎么说，咱们俩二一添作五，你一半，我一半。你要不收，我就没法吃，不，我就没法活下去……’他又流出眼泪来。

‘我心乱如麻，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对他说清楚，更确切一点说，可以对自己的心灵说清楚。冷杉见我木讷地呆坐着，便偷偷地把一个包裹塞到我的被窝里。‘你回来！’我把他喊住，他浑身颤抖，一片恐惧的目光，一边后退一边说：‘不，不，老史！你千万别拒绝，这对她，对我，都是致命的打击……’

‘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干了！’我严厉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他像获得大赦似地高兴地走了。

‘可是后来我知道，他又接连几次收到了邮包。有一次，我真发狠地骂起他来，差一点没骑到他的背上捶他一顿。我气乎乎地说：‘你真不要脸，真是个无耻之徒，不是一个男子汉！你根本不懂得人生，不懂得人的价值，连个猪狗都不如！你挨饿，别人也在挨饿。她也是定量供应的，你怎么可以从一个孱弱女子的手里，去夺取她活命的口粮呢？你靠刚割别人身上的肉，来苟延自己的生存！’

‘冷杉一点气恼的意思也没有，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说：‘别这么说，老史，别这么说！你不说，我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我不过是觉得她在外边，总比我们这里活便得多，总有办法可想。而且，你看她的来信，不也一再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完全不必为她担心嘛！’

‘我不看，也不想看！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像你

我这样的人，也没有权利去剥夺她。凭什么呢？靠她的施舍，靠她的忏悔，靠她的赎罪！你曾想过没有，我们吃的这是什么？是她寄来的食品？不，不，那是她的良心，她的一颗滴血的心……’我禁不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你不能这样残酷地揶揄她，这样无情地挖苦她！她没有罪，像她这样纯洁的人，是丝毫无罪的，更谈不上用什么来赎；有罪的倒是我们，我们这些毁弃自己政治生命的人，我们这些新社会的罪人……’他的眼圈也同样地发了红。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吃，绝对不能吃！正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才应该承受这份罪恶的惩罚！哪怕有一千条毒蛇来咬我们的胃，有一万只凶鹰来撕我们的肚肠，我们也当忍着，无条件地忍着。命中注定了的事，是无法抗拒的，也是推卸不得的。决不能牵连旁人，更不能牵连到像她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们应当像一个人那样地活着，也要像个人那样地死去！该死，就痛痛快快地死吧！’我不再说话了，眼睛里射出的是耶稣弟子们坐在《最后的晚餐》的席上所射出的冷冷的目光。

“冷杉被我阴冷的目光屈服了，他低下了头，两手瘫软地垂到膝上，嘴里喃喃地说：‘那……那你说该怎么办？’‘把邮包退回去！注上查无此人，原物退还！’我斩钉截铁地说。

“冷杉提起邮包悻悻地走了。后来，他到底没有把那邮包退回去。上帝也许会原谅人们的这种罪过的，一定会的！只有经过饥饿的人，才会懂得这种感情。列宁说过：饥饿是无情的。

“食堂管理员绞尽了脑汁，不断地变换食物的形状。窝

头的个儿，先是一天天地由大变小，然后又是由小变大。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有一条铁的规律却是不可改变的：粮食的实际供应量在不断地缩减。由大变小是缩减，由小变大也是在缩减。因为，把二两一个的窝头做成四两一个，形状是大了，实际的份量却减少了。而且，暂时显眼的大，又为以后不显眼的逐渐缩小创造了前提。

“现在说起来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我当时虚弱得走路直打晃，连解个小手都很费劲，因为解扣子和系扣子的手不住地发抖。在那个灾荒的年月里，国家在动用储备，地方在动用储备，个人也在动用储备。而我所能动用的储备，就是内耗自己的体重二十五斤。由于身上缺乏脂肪，白衬衣连穿两个月不洗也不变黑；由于不断有大量的细胞死亡和脱落，洗脚时水面要浮一层白沫子。我不能再下地干活了，虽然这使我少得可怜的定量，又被减少了一半，使得生活变得更加阴冷、僵硬、空虚，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饥饿的威胁。我每天靠在土墙的旮旯里，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这种棉大衣在我们所处的那种生活里，它的好处简直是说不完的，因此我在画那幅《自述》的画时，元帅身上披的那件棉大衣是倾注着我的全部感情的。你们看画时是否也曾注意到，上面的衣角、钮扣以及每一个皱褶，都表现得非常细腻，都含蕴着一定的细节，透露着生活的余温。因此有的朋友对我说，只有经历过我这种生活的人，才能挖掘出那种题材的深度。当然，这只是朋友们鼓励我的话，实际上，我还不能够把我认识到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我盖着那件棉大衣，紧紧地靠在墙角上，手里捧着一本永远也看不完的古典名著《死屋手记》。我所以一定要靠

在墙角上，因为我不愿意像条狗那样的趴着死去。我的头脑里是空空的，眼睛是呆滞的，书上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透过眼帘进入大脑，产生出类似情感之类的涡流。大脑汁液所能制造出来的意识和观念，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关食物的。如果有个作家想要描写我当时的意识流，那倒是一篇最简洁的文字，只有饥饿、阴冷、食物几个字，就可以勾勒出思维活动的全部链条了。饥饿在精神上给我的折磨，比肉体上的更加难以忍受。因为，我的脑子里虽然一直想着食物，而食物只能在天黑下来之后，人们都下工回来了，才能喝一口热的菜粥。

“最使人产生期望或失望的日子，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这是专给犯人发放邮件的时刻。吃过晚饭之后，我们都盘膝坐在地铺上，伸长脖子，瞪大眼睛，静听那一声声的呼叫，一旦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也不知怎么会产生那样一股神奇的力量，会腾地一下站起来，急匆匆地奔跑过去取自己的邮件。坐在我身旁的老朱，每到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紧张，脸上蜡黄蜡黄的，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听着，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捕捉住，吞咽下去。然而，每一次都使他产生更大的失望，呼叫刚一结束他就瘫软地躺到伤心的国度里去。有一天，却突然喊到了他的名字。这不可能，不可能！他听了之后仍然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又喊了一声，他还是没有回答。我急忙用手捅了他一下，说：‘你怎么不答应？’他这才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腾地一下从地铺上爬起来，连鞋也没穿就奔扑过去。

“老朱的邮包是十分可怜的，一块旧得发灰的破白布，包着一双袜子和一个心里美萝卜。那么多个望眼欲穿的岁

月，盼来的却是像草芥一样微薄的回音。望着那个邮包，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然而老朱却像得到了天一样大的馈赠，蜡黄的脸上甚至出现了一片梦幻一般的血色。他兴奋地把萝卜切开，把不大不小的一块送到了我的手里。‘这萝卜真甜！真甜！老史，你也尝尝！’我怎么能够吃他这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萝卜呢！我把他的手推开了。他惊疑地问：‘怎么，你不要？这萝卜可真甜呀！哥哥能给我寄这些东西来，也就很不容易了！你知道，他家里也很困难呀！’

“‘朱二丑！熄灯之后你还吃东西？再吃就把东西都给你没收了！’小队长听到老朱咔嚓咔嚓咬萝卜的声音，厌恶地把他痛骂了一阵。老朱不敢再吃了，声音没有了。但是不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小声地对他说：‘你怎么还吃？小队长听见了，真要没收你的萝卜了！’‘对，对，我不吃了！’可是，饥饿的食欲真是没法抵御的，我已经睡着了，但迷迷糊糊中仍然听到他一会儿坐起，一会儿又躺下，为了一个心里美萝卜，他竟然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最后，他终于用被子蒙住了头，一小块一小块把萝卜啃吃下去。天亮后，老朱没有起床，甚至出工的哨子响过两遍之后，他也没动一下。一夜没得安宁，现在总算睡下了。

“炊事员送饭来了，凡是早起出工的，可以吃到一碗薄薄的稀饭。我因为无力下田，因而也就无权享受这份优厚的待遇。临到朱二丑的头上，炊事员见他还在躺着，提着桶就走过去。我唤住说：‘他每天都出工，今天虽然起来晚一点，还会照样出工的。你先给他打上，如果他不出，你再把这碗粥收回去就是了！’

“一碗菜粥放到朱二丑的头上，散放着诱人的热气，然

而，他却再也起不来尝尝这碗粥的味道了。他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半个小时之后，小队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掀开他的被子，拉他出去干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直挺挺地死过去了。‘都是他贪吃的原故，馋鬼！’小队长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惑与怜悯的表情，而是臭骂了他一通，并且利用这个事件，对我们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训话教育：‘你们看见了吧，朱二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们绝不能再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有人见到死老鼠都吃了，这不是找死吗！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浮肿，生病，就是因为胡吃乱吃！今后谁再违反纪律胡乱吃东西，发现了之后就要严厉惩罚！’”

七

有好几天没有见到画家老师了，心里一直惦记这个事，闲暇时常常想起了他。说实在的，同他类似的遭遇，在小说中看到了不少，但总不如听他讲得那么动人动心，让人产生割舍不断的悬念。我也时常在想，为什么它能够产生这种深刻的力量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他的亲身经历；二是他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能够敏锐地观察生活，观察到生活中别人未曾注意到的细微之处（正如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宋玉观察到了，而楚怀王和子兰等人观察不到一样），观察到生活的本质之处，观察到生活中的背面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他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这种气质对于常在逆境中生活的人是很重要的，他能够使人精神上不轻易地被摧毁，被征服；即使在肉体上被打趴下了，他也会鄙视地瞧着将他打翻在地的人的影子。这使我想起了有骨气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他曾经对人说过，他低头弯腰被人架起胳膊坐喷气式飞

机批斗的时候，他也要从胯下向后看看那些批斗他的人，看看那些像演杂耍似的装模作样，让人既可气又可伶的人的影子。

我很想抽时间再看看他去，可是老文已经走了，田滕正忙着帮助白教授整理一份可行性分析资料。白教授很器重他，尽管他现在还不是白教授的研究生，但已几乎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了。白教授正在为一家大公司的产品开发做市场预测，大量的数字资料，都要经过微机处理，而上机器的事，就几乎全由田滕包下了。有一天我也走进微机房里，帮他打下手，当把一大堆缠绕得人头昏眼花的数字资料整理出一个眉目时，田滕突然神秘地望着我，而后悄声地对我说：“你知道老胡是谁？”

我摇了摇头。

“就是胡嫋嫋的爸爸！”

“是谁？”我惊诧得几乎喊叫出来。

“你先不要叫！你还记得，那天我向画家老师打听他的命运故事中的那个老胡是谁吗？”我开始有些醒悟。我记起来了，画家老师好像告诉过我们，那人后来调到某个进出口公司工作，听说还担任了副经理。啊，真想不到！真想不到！这能是他吗？

“是他，那天画家老师说出了他的名字！当时，我心底里的全部疑团都解开了，也就是说，全缠绕住了！”田滕陷入深沉的思绪里。

一天，我们终于又找到了空闲时间，相约到画家老师那里。

天气很热，空气像是从锅炉里喷出的水蒸气那样闷热熏人，身上粘渍渍的，画家老师却对外界一无所察地俯在案头

上作画，连身后的电风扇都没打开。我们好奇地走到他的背后，见他正在一笔一笔地勾画着一个草图。

“啊，我正为一家宾馆创作一幅壁画！”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并把草图拿给我们看，询问这样的框架、结构和色彩与当代青年的绘画观念是否接近。画面上是一条小街，依傍在流水弯弯的河上。画的构思不落窠臼，有一种冲破一切格局的奔放气流，从画的一端向另一端迅速地变换着主题的内容，紧凑相连的景物丝毫没有影响急剧变化的节奏，而且随着节奏的变化，色彩也采取突变的形式，整个画面是在极不和谐之中，追逐着一种近似离奇的和谐。它既是一幅画，也是一串含蓄很深的动态系列。将它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恰好一个是反映了自然经济的平稳悠扬的天然情趣，一个反映了信息时代飞速旋转的变化节奏所产生的心理。

我们如醉如痴地在那张草图面前站了很久，没有评论，没有褒贬，因为一时还说不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接受。观念的凝固性并不一定在年轻人的身上就比年老的人更少一些。

“好了，不让你们非要表态了！一种新的意识不会一下子就让所有的人产生共鸣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草图收起来，又回身走到小厨房里，为我们沏了两杯咖啡。我和田滕都尴尬地笑了笑。

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咖啡，仔细地端详屋子里悬挂着的画。画家老师沉默了一会，吸过半截香烟之后，转过脸来说道：“好吗，既然你们来了，我们还是转到老题目上。继续说我那悲惨的命运故事吧！”

“冬天总算过去了！虽然，它一再地拖延时间，死死地

赖在这块土地上不肯离去，但是，一丝丝温柔湿润的风还是偷偷地从它那宽大厚实的背后绕过来，无声无息地偷着染绿了田埂，染绿了池塘，在干枯的树枝上钻出几片单薄的生命嫩芽，苍苍莽莽的大地显露出一片旺盛的生机。我很惊疑，像我这样孱弱的身体竟能奇迹般地熬过那奇冷的冬天，而没有像朱二丑、老李……还有几个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的人，彻底地摆脱掉痛苦；相反，却又随着太阳从南回归线上开始向北倾斜，逐渐地生出一些活跃的汁液来。我不能再靠着墙角了，要想法子站起来，要到晶明鲜亮的空气中去走动走动！更何况，在野地里还会寻找到一些有生命的蛋白质，补偿自己体内过多的蛋白质亏空。

“我不是又在故意地向你们渲染离奇，给你们讲些从《天方夜谭》里抄袭来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不，不是！我是在讲活生生的事实，在讲我自己什么时候都不会褪去颜色的记忆。那时，我们在田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像野兽一样不停嘴地觅吃一些什么东西。凡是能够撑起肚皮的东西，见到什么吃什么：野菜、嫩草、留在泥土里的植物根茎。最好还是那些活食：泥鳅、老鼠、蛇、野兔、青蛙……说来你们也许不信，我们竟像羊一样地吃草，像猫一样地吃鱼和青蛙，又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古老洪荒的年代。若是遇到了一条蛇，便急着用铁锹砍掉了头，然后就生生地把那条蛇吞咽下去。当你咬它的上半部时，它的尾巴还在乱摇乱摆。你们看看我的牙齿，前边的门牙全都折断了，这就是我用人类已经退化了的生理器官去做未退化之前的事情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动物的蛋白毕竟是高级的营养品，靠着那些青蛙与蛇，我的身体确实又在恢复，生命开始复苏！”

“冷杉，你们还记得他吧？那棵过早枯萎了的艺术之苗，也开始复苏了，又在大谈他的创作构思了：‘喂，老史！你知道我又想好了一个什么主题？简直是绝妙的、人间少有的杰作！是这里的特有环境赐给了我这难得的灵感之光！我要画一幅《爱斯基摩人的晚餐》，画的中心人物就是你，当然，还有你口中那条弯屈扭动的蛇……’他神情得意地眯起了两眼，好像那幅画就在他的眼前一样。”

“‘小心，我去揭发你！要知道，你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我又可怜地望着他一眼。”

“‘你别吓唬我，我知道你不会的！在这一点上，我知道你和我是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这小子，又开始耍弄他那才子加流氓的腔调了。”

“‘你现在还收到罗兰信吗？’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我无意又似有意地问。”

“‘有啊！当然也不是最近，是一两个月以前收到的！’‘她现在怎么样了？’鬼知道我怎么了，竟然破例地问起我最不愿意知道的事情。”

“‘噢，你怎么了，也忽然对她凄惋的命运垂下了高傲的眼光？唉，可怜的罗兰，她将从痛苦的深渊里爬出来了，但愿她不是向更深的潭底里跌落下去！嗯，不，不会的！她应当得到幸福！像她这样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应当得到幸福，应当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冷杉沉浸到一种深奥莫测的心境之中，嘴里不停地说出些含糊而又明确的话来。‘噢，幸福，你这神秘、奇幻的东西！你总是在人世间匆匆不停地晃去，飘渺不定，诱惑人们费尽心机地去追逐你，捕捉你，但你却常常悄然无声地从人们身边溜掉，变得无影无踪。有的”

人看起来好像已经捕捉住了你，但是他们不知道，捉住的并不是你，而是你的影子，是你蝉蜕的皮。至于幸福本身，却早已一缕清风似的飘走了，飘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这个艺术狂人他想说什么？罗兰怎么了？战栗的思绪领着我向前探测，一直达到最不幸、最不吉祥的墓地的边缘。我疑惧地问：‘别瞎说了。快告诉我，罗兰她……’

“‘她结婚了！’我的天呀，是这样一个信息！揪到嗓子眼上的心一下子松开，轻松地沉落下去，但是，还没过多久，沉落下去的心又被揪了上来。这是干什么？对，这是干什么？我的心应当得到宽慰，得到极大的宽慰。她，不再受我的折磨了，不再承受本来不应当由她承受的惩罚。她是应当受到宽恕的，她是那样纯洁完善，是一个玉为肌骨雪为心肠的人。我的毁灭，完全是我自己的罪过，是我骨子里天生的叛逆性格所造成的，应当把一切灾难和惩罚统统压到我自己的肩上，霹雳闪电，都轰击到我自己的头上。解除她身上的压力，减轻她心灵中的痛苦，应当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我肉体生存的唯一乐趣。不为这，我还为什么活着呢？我真糊涂，为什么没有早些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早些给她去信，想法子熨平她那早已破碎的心。但愿她因此而得救了，我的心也就从无法解脱的梦境里解脱出来了。

“‘老胡，我们的胡副书记，’冷杉又恢复了他那得天独厚的诙谐气质，说，‘他终于没有赢得罗兰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据说是一个感情丰富、意志又很坚强的人。真好啊，真是一个好人！感谢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位能够拯救肉体、又能拯救灵魂的天使！但愿天地能够多多造就出一

些这样完美无缺的人。多好啊，我的上帝，阿门……”

“那么，老胡呢？”奇怪，今天我怎么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兴趣。‘他嘛，他是生活中永远击不败的拳手，幸运的大门对他永远是敞开着的。他已经和我们院长的女儿结婚了。那是政治与爱情的结合，一定会结出甜蜜的果子来的。我不是预言家，但这十几年后的事我还是能够推测出来的！他是个幸运儿，那张面糊糊的让人永远摸不透内心思想的脸，就是一张最好的门票，一把双保险的钥匙，可以敲开各种幸运的大门。而老兄你，还有我，不用说别的，就凭这张性格暴露的脸，把一切想法都贴到脑门子上，就注定要走上这条滑向地狱的路！’”

“噢，年轻的朋友们，我不想再说下去了！”画家老师站起身来，踱着步子对我们说，“讲述这种忧郁，凄楚，酸心的往事，心里总觉得憋闷，灵魂受的刺激太深！让我们出去散散步吧，透透新鲜空气，不然，我简直无法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走出屋，到了假山背后的小池塘边。

“我不是宿命论者，不是的！但是我所遇到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叫人无法相信，都是注定要与灾殃连在一起的。快乐会变成痛苦，和谐会变成冲突，希望会变成失望，宽慰会变成创伤。就拿罗兰的事来说吧，正当我从心眼里为她终于找到幸福而高兴的时候，她却突然来到了我们高大的围墙里来！”

“呸，今晚这么闷热，连水边都没有一点风丝！我们还是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去坐坐吧，也许那里能够找到一点小风！我不怕热，也不怕冷，但是这郁闷的气压我受不了！看样子，今天夜里要有一场雷雨！”

“我生活的那个环境，就是憋闷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我身边的那些盗窃、诈骗、奸淫的刑事犯，虽然他们的灵魂早已掉进污秽的泥潭里，把毁灭的罪行当作儿戏来戏耍，但他们却有充分的理由申斥我，侮辱我，痛骂我，甚至是理所当然地仇视我。他们理直气壮地教训我说：‘你这个臭右派，你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犯了错误，但是我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决不像你是黑了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和我们站的不是一个立场！我们坚决地和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他们和我都清楚，我们的政治地位是大不一样的！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刑满之后出去，又会回到人民之中；而我，即便是摘掉了帽子，也还是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我常常被作为白旗来拔。虽然我在劳动中总是尽心竭力，有时还受到小队长的表扬：‘你们看看史复生，瘦得像个纸糊的人，可活干得还挺不赖！’可是一到有了什么政治运动，一切怀疑、责难、惩罚的目光就都投射过来了，你是右派！右派！虽然，我酷爱艺术远远超过政治，曾经赞赏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想着法儿尽量避开政治，但是政治却永远也不肯放弃我。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第一个冲击波下的牺牲者，肯定是我。‘像你这样的人，还能干好事！’这是人们不需任何推导程序就能得出的结论。我画风景画，他们说我用色彩太暗；我画肖像，说我画中人的眼睛都在睥睨现实：‘为什么你画的树不是绿的，月亮不是圆的，道路不是直的？’我吟古诗，说我喻古讽今：‘你念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什么意思？你想污蔑我们的社会制度？’我练写毛笔字，他们会把几个不相干的字联起来，斜过来

念，倒过来念或者跳着格儿念，给我胡乱地上纲：‘你写这行黄花岗高、千秋英烈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去广州黄花岗时填写的词。’‘胡说！你明明是为高饶反党集团招魂！’我的天呀！我怎么和高饶反党集团联上了呢？‘你还想抵赖！这黄花岗高，倒过来念，不是高岗花黄吗？’

“我作为拔不掉的白旗，永远罚不下去的老运动员，反复地被围剿和批斗，时常被围困在无望的垓下。每当这个时候，那些窃贼、扒手和赌棍便活跃起来，个个都成了批判的勇士，抢先地争夺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殴打我，辱骂我，用无影的谎言揭发我：‘他曾经用英文说过，他要逃跑。’说话的人是个混蛋，斗大的字不识两升，根本不懂英文，但却能够听到我用英文说要逃跑。不过，他也确实听到我说过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话。有一次，我与冷杉正兴致浓烈地谈论巴尔扎克，他也怀着异样的兴味凑过来问：‘巴尔扎克是什么？’冷杉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那是法国一种名酒。’

“一天，我又被按着头倒剪二臂给抛在批斗的漩涡里。时间是那样地长，批斗得那样厉害，使人两眼发黑，两腿发软，被侮辱了的灵魂和肉体一齐在颤抖着。我像跪在祭坛上的一只可怜的羊羔，周围是狂热的人墙，林立的话筒，呼唤嘈杂的声音以二百分贝以上的强度来刺激我的神经。

“等到四堵人墙撤去，几缕习习清风又扑进我的心怀时，我像从深沉的噩梦中醒过来，头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思绪仍然留在痛苦的泥沼里挣扎。等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眼前是否还有我容身的天地时，突然，一个让我全身战栗的影子立在那里。啊，是她，罗兰！她正垂着头临风抽泣。我不是还留在梦里吧？是前一场噩梦没有破醒，还是又进入

另一场压迫人喘不过气来的噩梦？

“她容颜憔悴，形销骨立，简直像一束枯旧了的打蜡纸花，昔日耀眼的少女红晕和青春的鲜艳光环都早已消失。她比在张各庄时还要干枯了一层。‘啊，是你！你怎么也来到了这里？’木呆了一阵之后，我终于嗫嚅地说出了话。她擦去了泪痕，毫不犹豫地径直向我走来；然后，又轻得像个影子似的停落到我的跟前。直到这时，我还相信这一定是在梦里。她为我掸去身上的泥巴和尘土，平静得像秋水似的对我说：‘好了，我终于偿还了良心的债务！’”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首先提出了《契约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欲想得到真正的和谐，只有建立在各个公民无条件地偿清各自对于社会所负的债务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纵横交错、连锁反应的契约关系网。但是，卢梭所提到的债务，只是经济方面的，世俗方面的，而没有涉及到精神领域。今天，罗兰竟要扩延卢梭的思想体系，提出心灵方面的债务关系，这不能不打乱了我的整个思维方程。

“‘我得到了宽恕，得到了解救，’她像似即将要跨到彼岸似的冷冷地说，‘多少年来压到我心头上的波浪，终于减轻了许多。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偿清我的债务，没有直接地进行偿还，但是总算找到了弥补的机会。因此，我现在站到你的面前，还不是毫无愧色的。因为，我对你所欠的债务，是永远无法偿还的！’‘罗兰，你错了！你根本不应当自寻苦恼，自我折磨，根本不应当把自己沉溺在中世纪的偏见和近似宗教报应的教义中！’我说。

“‘不，不，这不是偏见，更不是教义，而是用痛苦与悔

恨所铸造的现实。我负欠的太多了，太多了！拖延，只能加重我的悔恨，除了清偿，永远也不能使我的心灵得到平衡！’
‘因此，你就做出了这样严峻的选择，自投罗网地迈进了这个门坎？这太残酷了！不论是对你，对我，对所有了解你的人，都是太残酷了！这个环境，绝不能收容像你这样纯圣纯真的人！你是走错了门坎！趁现在刚刚迈进了前脚，赶快把后脚收回去吧！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放你出去的。’

“‘如果，若是我在政治上也犯了大罪？’‘你……这不可能！’‘完全可能，而且是我自愿取得的，高高兴兴取得的！你知道，不，也许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给苏汶教授当助手，他的一份建筑方案是我给抄写的，而这个方案竟被株连到某项政变工程里去。他们在苏汶教授那里抄家没有找到，就到我那里去找。在他们来到之前我已经把那份材料安全转移了，但为了让他们死心，在他们到来的前五分钟，我故意把一卷废纸烧成灰烬。这样，我就成了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你以为这样做就救了苏总？’我望着她因一时得意而泛起一丝红晕的脸。‘起码会减轻他的一些罪责，去掉一份批斗苏总的材料！’过了一会儿，她又恢复凄冷的声调说：‘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良心上得到安慰的事，这在我罪与罚的平衡表中，是很微不足道的，无法弥补我的过失！’‘罗兰，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只有一句话请你记住：多多保重身体！’我们怀着死别一样的凄惋分开了。

“记得越剧《红楼梦》中有一句唱词：相见时难别亦难，一声珍重泪湿衣衫。我们当时的情景正是这样。”

八

“啊，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山顶上了。这里真好！你们看：红霞绿柳，碧水蓝天，多么迷人的黄昏呀！它一定会使你们的青春血液欢畅，心房的门大大敞开，充分地容纳着大自然中的优美、温馨、甜蜜与和谐，整个思绪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得意洋洋地倘佯在对于今天和明天生活的爱的迷恋中。而我，我的年轻朋友，虽然也曾有过青春，面对这样美好的景色也曾鼓荡着像你们一样奔流的青春血液，但是现在不行了，背上驮着的岁月负担太沉重了，黄昏中那顾长的树影和烟雾霏霏的田野，只能给我增加惆怅和忧伤，容易感染到我心田上的颜色，只有那逐渐暗淡下去了的气氛。回忆起我的青春也恰如眼前的景物：它像血红的落日，虽然是无限美好的，但是却不富于希望的。

“自从那次和罗兰在猝不及防中谈过一次话之后，再没有机会和她单独会面，更不要说是剖开心腹地畅谈了。唯一能够使我得到满足的，就是在女犯的行列中能够见到那日见干枯的背影。没有希望的劳动，永无止境的疲劳，既摧毁人的身体，又摧毁人的意志，而这两者又互为前提在恶性循环着。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终日是批斗和强劳，而在含辛和忍辱的尽头，又看不到可以得到静谧、安详、温馨的黄昏。这个黄昏如果真有的话，那只能是在永生中去取得。我曾经想到死，想到把灵魂寄托到死的和谐之中，但是，那个骨瘦如柴的背影又萦牵住我，提醒着我，不能离去，不能离去，不能再去刺伤她那颗已经得到一些平静的心灵。

“一天，冷杉带着少有的奇妙神情，悄声地对我说：‘你

知道吗？老胡被揪出来了！’我不能相信，虽然冷杉的语气又不能不使我相信：‘怎么会呢？像他那样政治成熟的人……’

“大千世界，变化无穷呀！”冷杉的那种戏谑刻薄、玩世不恭的神态又活跃在眉宇之间，‘他很会跟形势，抓时机，为自己积累起雄厚的政治资本来。但是，这些政治资本今天恰恰又成为他注定要倒下来的材料。他是既喜欢政治运动、又善于搞政治运动的人，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他的全身细胞都活跃起来，他的全部聪明才智都展现出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良医之子多死于药；良巫之子多死于鬼。打雁的人被雁啄了眼睛，玩火者必自焚……’

“冷杉又告诉我，老胡这次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受到他位高权重的岳父的牵连，当然，他本人爬到的位置，一个大学里的教务长，也够那些官迷心窍的人眼馋的了。那些造反派头头嘴里喷着热气地说：‘你们捞够了，该我捞一把了！’于是，老胡便无法逃脱地被推到喷气式飞机上，在他最善于筹划的批斗漩涡里承受着批斗的折磨。他在侮辱别人的人格时，从未想到这种灾难也会落到他自己的头上！应当叫他尝尝这种滋味，看看政治运动之树结出的果子会有多么苦涩。不然，他一生一世会永远津津有味地朝那棵树下浇水，还想攀着那棵树够到更高的权位！”冷杉的刻薄有点近于冷酷了。

“我想考考你的观察能力！”我的天性是不愿意报复的，没有兴灾乐祸的气质，不管是对于什么人都是一样，因而我想转移冷杉那刻薄尖酸的话题：‘冷杉，你说说，老胡凭什么本领能在历次运动中乘风借力，步步青云？’‘你还没有看出这点诀窍？’他显出更为得意的神情来，‘我的《投影几何》学得比你好，不客气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来说在老胡这

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了物质运动的深邃。一般的人，只看到了他外在的面孔，只看到了那张面面糊糊、没有线条、没有血色的面孔，而不知道那就是他思想的镜子、灵魂的窗户。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平日里什么事情都不要表态，更确切地说，不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把它藏得好好的，埋得越深越好。人们越是无法知道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正思想，他就越是永远处于可以随时出击的优势地位。因为你是处在明处，他是处在暗处。别人想进攻他，摸不着看不见；他想进攻你，你明明晃晃地就摆在他的眼前。而且，他的一身精力又全都放在这上边，平日的工作可以马马虎虎，能够应付就尽量地应付，可是他的小本子却不会少了你的材料。等到政治运动一来，他就立即脱去慵闲懒散装束，马上雷厉风行，披挂上阵。这叫作平日里抓住你三丝五缕，到时候不愁不揪出你的心肝脾肺肾！‘是这样！’我真惊奇冷杉的透视几何学的功底，怎么我同老胡打过这么多年的交道，就没有冷杉对他看得这样透彻呢？

“你以为这是老胡的天生性格吗？”冷杉进一步地阐述他的《投影几何学》以至于《生理解剖学》方面的知识，说：“你注意观察过没有？人们的面孔都是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系。蒙古人的面孔比较粗犷红晕，那是沙漠和草原上干燥的劲风吹的结果，南方人生得黝黑瘦小，与炎炎的烈日暴晒不无关系。正是因为总有政治运动，所以老胡的面孔才越来越含混不清。他的头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所塑造的风貌。他很清楚，平日里的工作好坏，对一个人的升迁荣辱并不起多么大的作用，而每次运动之后，却必然要提升一大批积极分子，这已成为普遍的规律。我听老胡的好友们互相勉励

说：瞎忙乎啥呀？好好地养精蓄锐吧，运动又快来了，到时候再干它一场吧！’

“但是，最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老胡的被揪，竟然使我也受到牵连，遭受到几次围攻和批斗。事情是这样的。在我所熟悉的人们中，只有老胡够得上当权派的格儿。他一被揪，就有一伙接一伙的外调人员纠缠上我。那些外调的红卫兵小将，对于取证的人要根据不同的身份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一般的人（他们称作革命群众），是同志式的，你说什么他们记什么，而对于不能列到革命群众行列之中的人（他们称作为牛鬼蛇神），就要采取专政式的审讯手续，问什么就要逼你说什么，供什么。他们见了，首先让我弯腰站着，向毛主席请罪，然后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语录，这叫作打态度。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不能证实，不能给他们提供所需的材料，就要按头揪发，施以种种革命的暴力，这叫作加温。一天，有一个黑粗的小伙子，一见面就瞪着眼睛训斥我说：‘你要放老实点，痛痛快快地交待。你看见我这个块头了吗？唉，我姓文名斗，懂吗？我叫文斗！说是文斗，实际上就是武斗！’

“这些文斗加武斗的外调红卫兵，可把我折腾苦了。我曾经说过，我是不喜欢报复的一个人，而且最忌恨对人无中生有、添枝加叶的陷害。不管是对谁，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丧失做人的这种起码品德。我过去曾经身受这种诬陷之害，对于用这种诬陷手法猎取功名或者是保全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恨不得用全部仇恨的牙齿来咀嚼他们的名字。但是今天，我却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管我自己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威胁，遭受多少痛苦。让那些外调的小

将们随意加温好了，对于老胡的事，我知道多少说多少，决不添加一句。我虽然是个阶下囚，但我并不会因此而丧失做人的格。我虽然属于牛鬼蛇神，但决不做鬼神难容的事。

“后来，记不清又过了多久，大约有一年多吧，罗兰又被人从劳改农场给提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又坏在老胡身上。这个在什么时候都能站得住的人，虽然一时被涨潮的猛浪给击倒在地，但很快就清醒过来，看清了方向，顺着时起时伏的浪潮顺利地游弋过去。老胡可不是个耍种，不是跌倒了就爬不起来的人。他在牛棚里住了半年之后，很快就摸准了造反派的脾气。他可不会像我这样憨傻，用多少棍棒都打不出一一点有用的材料来。他能够察颜观色，紧跟形势，充分地满足小将们所需要的一切材料。至于什么诬陷不诬陷，就顾不了那许多了。他想要从牛棚里爬出来，就得有带罪立功的积极表现，让造反派看见他确实不是那种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弯着腰向造反派认罪说：‘革命生师们，我有罪，确实有罪！’这个狡猾的家伙，为了讨好革命小将，他故意把革命师生念成革命生师，把学生放在教师的前头，他知道现在谁的权力更大。‘我有罪，我有罪，但我决不作顽固派。我要在革命小将的带领下，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他写的交待材料中，揭发检举性质的最多，黑天白夜地写，写得牛棚里的人们都傻了眼，远远地躲避开他。他揭发了张副院长、苏汶教授、前党委、前文革、前……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能大义灭亲，揭发他岳父大量的罪行，而且都是硬的，一下子就可以打死材料。因而，他取得了造反派的谅解，那厚厚的一摞子材料，证实他有一颗三忠于的红心。他不仅被释放出来，而且很快又被三结合进去，成了院革委会的副主任。

而在权力磁场的另一极上，张副院长、苏汶教授、他的岳父，同时也牵连到了罗兰，都被打到更深的罪恶渊藪里。

“自从罗兰走了之后，我就一直为她忧心。我有一种预感（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预感是一种什么物理现象，或者是什么生理现象造成的，但是这种东西却常常是在一种奇妙的意境中出现，带有一种的感应的灵光，后来许多事实证明，我预感到的事，都得到了证实），罗兰这次从我眼帘中消失，恐怕将是永远的了，我把这种预感告诉给冷杉，一贯喜欢发表议论的他，也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我已看出，他的眼睛里同样流露出忧虑和凄楚的神色。我们的命运都像晚秋中的落叶，谁能自主？谁能自持？都只好任凭那无情的夜雨晨风了。

“果然，没过半年，我就收到了一封不知几经辗转才转到我手里来的信。一看那印着斑斑泪痕的字迹，我便知道这是罗兰的绝命词了。她在信中写道：‘我知道我快要不行了。在我临死之前，我要大胆地、坦率地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你，一直地爱着你！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对你说这样的话。因为是我，而不是别人，毁灭了你的幸福、你的天才、你的前程，毁灭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世上美好的一切。因此在你的面前，我永远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你的痛苦有多深，我的罪孽就有多重。但是在今天，我还是想把真情告诉你，前次冷杉传给你的消息，说我已经结婚了的事是不确切的。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一个感情丰富而又意志坚强的人使我爱慕，即使是有，也不会占据我早已枯萎了的心灵。自从你丢失政治生命的那天起，我就彻底砸碎生命中可以贮存爱情汁液的瓶子，关闭了一切可以产生爱情信息的

通路。前两年传出关于外科医生的话，是我为了让老胡死了心，免得他无休止地纠缠我。同时我也有意地让你知道，我觉得这也许会减轻一些你心灵中的痛苦负担。我被提回之后，他们就不断地审讯我，折磨我，采用种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刑罚，除了让我交待那份被我烧毁的反动材料之外，还让我证实老胡对苏汶教授所编造的所谓叛国投敌的罪行。他们甚至胡诌说，苏汶教授准备带我一道逃往国外，并且拟好了逃跑的计划和路线。他们说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非要让我照他们讲的话出具证明材料，我说，你们再用这些无中生有的话来诬陷我，诬陷苏汶教授，我就自杀。说完，我拉开窗户，就要往楼下跳。他们害怕了，以后再不敢让我靠窗户站着了。我所处的环境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比在劳改农场里还要恶劣十分。他们轮番地采用攻坚战、挖心战、麻雀战等各种战术，非要把我作为攻破苏汶教授这个顽固堡垒的突破口打开不可。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支持了，肝区作痛，肝硬变已经到了后期，没有这场触及灵魂又触及肉体的革命，我荒凉寂寞的生命旅程也即将结束了，现在更是人命危浅，听到死神在我头上忽忽地扇动翅膀，并常常伸出冰凉的手臂搂我的肩膀了。但是，那些造反派头头却不给我留下一点时间，让我静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我该怎样告别这块曾经使我欢乐又使我痛苦的土地，曾经使我爱恋又使我绝望的天空。我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我决不流出一滴眼泪。我决定用微笑面向那个时刻，面向那个世界。因为，我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东西几乎等于零，是一片空白：既无惜别，又无祝愿；既无创造，又无财产。我能够给它留下来的只有让人回忆起来不会感到凄凉的笑容。如果你愿意在记忆中保留我，就请你留下

一个你所见过的一次最美好的微笑吧！

“啊，年轻的朋友！你们知道，我看过了这封信，流出了多少眼泪，多少不是从泪泉里面是从心底里流出的泪水？后来，我从泪水中彻悟过来，我应当拿起画笔画一幅画，画一张女人的头像，也像达·芬奇为他所熟悉的女人所画的头像一样，用《微笑》来命名。当然，我画出来的那张《微笑》无论怎样调配颜色，也不会像蒙娜莉莎笑得那样甜蜜、温柔、宁馨，我的画上可能是令人颤抖的微笑！”

从画家老师那里走出来时，心头感到非常沉重，特别是田塍，脸色十分苍白，手臂微微地颤抖。我们这样感伤，这样动情，一方面是因为画家老师的悲惨命运，同时，也为他命运故事中那些更为令人感伤的人。

夜，用朦胧和沉默来填充大地上的空隙，填充人们心灵中的空隙。我们默默地向家里走着。灼伤的神经和颤抖的灵魂可能是由于朦胧中暗暗流淌的泪水而舒缓下来，压在心头上的浓雾也因与朦胧浑沌的夜色融为一体，逐渐地把压力点扩散开来。

九

我和田塍在细雨濛濛中来到画家老师那里时，他正忙着收拾东西。地板上、写字台上、沙发上、床上摆满了什物，而其中最多的还是画：大幅的、小幅的、纸面的、亚麻布的、素描的、着色的，琳琅满目。画家老师愉快地告诉我们说，月底之前他要去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艺术中心将要为他举行一次画展。消息是振奋人心的，我们都向他祝贺，像自己的喜事那样高兴。

我们蹲下来帮助他收拾东西，挑选和整理那摆得满屋子的画。这些画，过去有些见过，但大多数没有见过。我惊奇地发现，画中最多的题材，是新疆的山水、人物、风情。我好奇地问：“老师，为什么您的画大都以新疆为题材呢？”画家老师抬起了头，感情深沉，真挚地说：“这是我的命运的选择！如果说我的江南故乡是我的生母的话，那么，新疆就是我的养母。她在日暮天寒的时候收容了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唤醒了我已冻僵了的艺术创作灵魂。她的善良、淳朴、慈祥的性格和充满乐观情绪与富于理想的生活，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永远也不会减退的激情。我早已发现，她攫取了我的全部感情，每当我提起笔来，心底里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对于她的爱。我没有理由把她忘记，而且也无法忘记！”

噢，画家老师的经历竟是这样的艰险曲折，含蕴深广！原以为我们听到的部份就够扣人心弦、摄人魂魄的了，想不到后边还有那样动人的情节，那样色彩绚烂的画面。于是，一种浓厚的追求愿望油然而生，我们都想尽快地帮助他帮屋里的东西收拾好，然后请他继续给我们讲他离奇的命运故事。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曾经说过：‘惊奇是无知的女儿’，‘无知是惊奇的母亲’。”他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叙述，我们并排地坐在他的对面。“我由于对于生活的无知，便经常睁大惊奇的眼睛，惊奇地望着生活，望着人生，而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却一直是茫然无知。尽管我睁大眼睛去看，绞尽脑汁去思索，结果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1970年，在痛苦地送走了罗兰之后，我们这批失去了自由的人，终于被遣返到广阔的自由天地之中。根据家在农村的还家、家住城市的由政府统一分配的原则，我被安插到

生活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河北农村里落了户。我的心情又开始明朗起来，因为，生命毕竟是倾向于自由的。过去，我在纷纷扰扰的人海中游泳的本事不强，结果丧失了自由，丢失了极为重要的政治生命，今后，也许会在回归大自然中获得新生。

“开始，我的生活挺叫人满意的。国家发下来二百五十元安置费，如数地交给了刚夺了大权的曲队长，他在村头池塘边上给我找来半间小屋。小屋外面有两棵槐树，正午时候日光刚好把槐树的枝叶投影到小屋的纸窗上，婆婆斑斓，颇有一些情趣。至于屋顶上还有拳头大的一个漏洞，屋子里除一个泥垛的土堆算作桌子之外再无任何家具等等，对于我来说都已算不了什么啦！啊，我又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天地了！在人群中间能有一小块纯属于我自己、不受别人干扰的空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叫人感到惬意和满足呢？这不就是王维的辋川别墅、陶渊明的五柳故居吗？在这里我可以钻火而食、淘水而饮，充分地享受着最原始的质朴和田园的清幽。而最大的乐趣是，劳动之余还可以作画，画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美的东西。在我的眼前正展现着一幅完整的、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画图，尽管这里的景色还不够十分理想，但已足够令人神往的了。况且，艺术大师罗丹早已说过，自然本身是没有丑陋的，丑陋的只是人们的习俗。画家应该是自然的儿子，直接面对自然比面对什么巨擘杰作更能使人产生灵感。直接向大自然中去寻觅吧！达·芬奇曾经说过：‘谁能到泉源去汲水，谁就不会从水壶里去取点水喝！’

“清晨，天边的朝霞和草叶上的露珠都在鼓足劲地炫耀自己身上的色彩，我挑着笨重的木桶到池塘里汲水，汲取生

活的清流和艺术的清流。汲水的时候，使我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不是因为池塘后边一片黝黑的树林，不是随着晓风吹过来的大自然的呼吸声音，也不是那株枝桠歪扭、样子狰狞的枯槐（虽然它叫我想起小时候听到的关于山魈和树精的故事），而是每天比我到池塘去得更早的一个瞎眼老头。他摸摸索索地走到池塘边，然后缓慢地蹲下身去，用手撩开水面上的浮萍水草，就着塘水淘洗罐子里的糙米。有时，也去搓洗几件破旧的衣裳。做完之后，便又摸摸索索地走回池塘边上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去。他是谁呢？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怎么能够瞎着眼睛干着睁眼人的活儿，怎么能摸索着走到塘边，而从来没有掉进水里去？有一天，我实在忍耐不住，便绕过满地的芦荻走到了池塘的那一面，蹲到他的身旁问道：‘怎么就你一个人？你没有亲人吗？’老人抬起了失明的双眼，朝我望了望，脸上除了恐惧和悲哀之外，没有别的表情。尔后，他又埋下头去摸索着干他的活儿。我又大声地说：‘我来帮你干吧！’他仍不作声，也没有给我腾出地方。看来，他是不会给我说出什么来的！

“还未等我弄清这个瞎眼老头是谁，劈雷闪电就炸到我的头上了。应当承认，我刚来时的想法太天真了，太单纯了，也可以说是太无知了！我对于返归大自然所得的乐趣还没有陶醉几天，炽烈的阶级斗争（确切一点说，是炽烈的派性斗争），便把我揪到罪与罚的祭坛上去了。他们把我从池塘边上那间小屋里赶出来，因为现在村里大权已被另一派人夺了去。他们为了表示比对方更革命，便在我的身上大作文章。包庇我这个右派、刑满释放分子，让我离开贫下中农的监督，躲在池塘边上的避风港里逍遥自在，就是曲队长那一派

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表现。因此，新上台的阙队长一上任，就把村里的黑五类统统地揪斗了一遍。他威风凛凛地对社员们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就是斗出来的！没有七斗八斗，就没有政权。今后，我们就是要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斗得这些阶级敌人都直不起腰来，趴到地上，我们才能把印把子掌牢！’我知道他讲的这话，既是对着我们这些黑五类，也是暗指对立的那一派。人们为了权，眼睛都斗红了。后来是谁告诉我一句话，说得很中肯。他说：‘什么阶级斗争天天斗，月月斗，斗来斗去，都是为了一个权字。家庭中的矛盾与不和，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我被赶进牛棚里。这不是那个意义的牛棚，而是真正的牛棚，也就是说，牛马骡驴被牵出去了，牛鬼蛇神被赶了进来。啊，年轻的朋友！我的命运真是凄惨得很，苦得很，现在我又变成牛鬼蛇神了！灾殃在别人身上很容易抖落掉，就像抖掉身上的落雪似的，而到了我的身上就像粘胶似的，永永远远地粘住。自从五七年失掉了政治生命以后，头上的帽子便纷至沓来，什么右派、白旗、三反分子、刑满释放分子，如今又加上了牛鬼蛇神这么一顶不论不类的政治帽子。光是这些沉重的帽子，就足以压碎我的灵和肉、理智和感情了！

“和我一起被赶进牛棚里有两个地富（说是地富，实际上是地富子弟，因为土改时他们年纪还轻，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的是他们的父兄）、一个走资派（过去村中的第一把手），另外就是那个瞎眼老头。尽管我们的出身和经历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时代的风暴却如此戏谑地把我们卷到了一起，而且统统冠以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在悲哀之余，想想眼前的身

世也觉得滑稽可笑。牛鬼蛇神不知源于何典，不知它们当初是否被一些崇拜图腾的部落当成偶像供奉过，但牛与蛇在神话世界里一直居于显赫的地位，民间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如今竟不知犯了哪项天条，一律给贬落到罪孽的污淖里，为我们这些被鞭挞、被摒弃的人来作护命神。

“在牛棚里，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因此，我与反动地主分别睡在门的两旁。夜里，寒风挟着冷露从没有遮挡的门洞里钻进来，打湿了我的被头，吹凉了我的被筒，冻得我半夜醒来，瑟瑟索索地抖着，长久不能入睡。白天，村里的孩子们都跑过来，像围观几头怪兽似的，爬在牛圈的栏门外边半天半天地望着我们，还不住地往里边丢土块、木棒和牛屎，特别是当瞎眼老头烧火做饭的时候（他因为不能出外劳动，便被指定作牛棚里的伙头军），投得更为厉害，以致我们的饭锅里除了清水和着米粒之外，还夹杂着牛屎、枯叶、草棒等脏物。他们看到我们实在无法吞咽那碗饭时，便哄地大笑起来。这群可怜的孩子，他们就是用这种愚蠢的捉弄来满足愚蠢的心灵，用粗暴的感情来满足粗暴的信仰！

“更为凄惨的是，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中间，还要进行区分，据说，没有区分就没有政策。那两个地富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被当作死老虎，那个瞎眼老头虽然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但既然两眼俱瞎，也被列为死老虎。对于他们只进行惩罚，一般就不进行审讯和批斗了，最多也只作为陪斗对象列在走资派的身旁，以此来衬托走资派的罪行，证明他们是如何地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同走一条复辟的道路的。而对于老支书则当作活老虎来斗，因为他们虽以走资派的罪名将他打翻在地，斗倒斗臭，但他们心里明白，实际上并没

有倒也没有臭，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目中，他仍然是这块土地的合法的权力象征。只要他存在一天，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派头头们，在他面前总像是个窃国者，说得好听一点，是个夺权者，心里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感。因此，他们就加劲地折磨他，摧残他，企图依靠狂暴和粗野来证实他们权力的合法性。至于我呢，他们认为是一只半死不活的老虎。说是半死，因为我的敌我性质早已明确；说是半活，因为我的作人资格还没有被彻底地剥光，我的生活能力还没有彻底地被剥夺。

“对于劳动，我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是怎样划分的，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浅薄，用达尔文的话来说：‘我应当努力弄懂这门深奥的科学’；但就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我觉得确实应当严格地区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一种是自由的劳动，一种是惩罚性劳动。从事前一种劳动，使人感到愉快、光彩、尊严；而从事后一种劳动，除了体力上的严重耗损之外，在心灵上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刚刚享受到几天自由劳动的快乐的我，不幸又落到惩罚性劳动之中。而且，他们为了把我这只半死不活的老虎打趴下去，也必须先从劳动这一关下手！”

“第一天的劳动，他们就把我摆在一个非上即下的崖坎上，非生即死的狭径上。开头，我在晒场上装口袋。扬过两场之后，阙队长叼着烟卷从刈过的田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朝这边吆喊几声，朝那边指点几下，就冲我来了：‘喂，大个子，这边来！’他看我走过来之后，一屁股坐在石滚子上，让那两个地富给我装口袋：‘不，不，这些不行！还得装！’那种乡间惯用的粗布口袋，一般人只抗半个，最多有六、七

成，而一心想把我压垮的阙队长，硬逼着给我装了八成，然后不无讥诮地说：‘怎么样，大个子？你不至于只会读书和反党，而不会干我们庄稼人的活吧！’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冷漠地望了望他那张肮脏而又兽性的脸。‘嗯，不服？再给他装！’又是几锨，口袋装到了九成。‘给他抬到肩上！’我艰难地迈起步子，沉重的口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头晕眼黑，但我不能停下来，不能摔倒下去。我知道，他们正眼睁睁地看着我，正在等着我倒下去呢。我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汗珠子成串地摔落下来。突然，觉得有口咸痰从心口里涌出来，擦擦嘴角，是鲜红的血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不能把这口血吐出来，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是一个不值折腾的人。我使劲地憋了一口气，把那口血水咽回到肚里去。

“‘怎么样，滋味好受吧？’当我提着空口袋走回来时，阙队长用挑剔的眼光上下地打量着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说：‘这该死的家伙，居然没有把他压倒！’他把木锨夺过来，自己给我往口袋里装：‘好吧，那就再来两趟！’我依然没有吭声，又准备弯腰把口袋扛到肩上。这时，在旁边把一切都看到眼里的老支书，霍地站起来，我第一次听到他用那样严厉的不容反驳的口气说：‘够了，别再这么闹了！会把人折腾死的！’顷刻之间，掌权者的威严又蓦地归附到他的身上，以至弄得阙队长一刹时也忘掉了自己的地位，扔掉木锨丧气地坐到石滚子上。但是，这种突然爆发的场面并没有使人愣住多久，几秒钟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阙队长又睁大了粗俗的带着血丝的眼睛，不过这次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老书记。他带着双倍的讥讽口吻说：‘嗨，我们的老支书又在下达命令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睁开眼睛看

看，今天竟是谁家的天下，还敢这样猖狂！’

“老支书被推推搡搡地给拉走了，晚上收工后也没回来。瞎眼老头把饭给他温在锅里，又不时摸摸索索地走出门外候望着。我悄悄地走进他的身旁问：‘你在等他？’瞎眼老头点了点头。我又问：‘他是——’瞎眼老头说：‘他可是村里第一个大好人，只因看不惯他们这套折腾，就遭了他们的暗算。’听这老人讲话很有见识，完全不是在池塘边上见到时那种茫然冷漠的样子。我又好奇地问：‘你是——’老人淡淡地说：‘我是个残疾人，村里的五保户。早年曾在外边说过评书。今天别的也许记不祥了，但忠臣奸臣却分得清。前些日子，他们在池塘边上偷着议论暗算老支书的事，被我听见了，悄悄地告诉了老支书，让他提防着点。这事被他们知道了，怀恨在心，先斗我的保皇派、狗腿子，后来又揪我的历史问题，说我给日本人、国民党说过书，是汉奸走狗！’说过，老人又悄悄地走了，摸摸索索走到灶下，拾起一把柴又去温那锅里的饭。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互相间都看得清楚了，难怪前几天我问他话他一句也不说，当时他也许把我当作是……

“大约是午夜两点多钟，我刚朦胧地睡下，突然忽喇喇一阵人声把我惊醒，牛棚的栅栏门打开，咕咚一声老支书被推倒在牛棚里。我与瞎眼老头连忙走过去，将他扶到木板床上。借着小窗口射进来的一缕惨淡的月光，我看见老支书满脸伤痕，从眼角里涔涔地向外流淌着的不是眼泪，而是殷红的血水。瞎眼老头找了条湿毛巾，慢慢地给他擦拭伤口。我把床单撕开几条，简单地为他包扎了一下。瞎眼老头又从锅里舀来一碗热水，蹲在床前一口一口地给他喂下。夜里我翻

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墙角里不时地传出老支书轻微的呻吟声和瞎眼老头窸窸窣窣的摸索声。

“第二天下工回来，老支书的精神看来略微恢复了一些。我和瞎眼老头轮着喂他吃了一点东西。在入夜之后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悄悄走到老支书的床头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你这么凶？’老支书痉挛的面孔猛地颤抖了一下，满含愤怒地说：‘为什么？他想叫我给他摘掉帽子！’我浑身立时颤抖了一下，倒霉的帽子，这里又碰见了它，于是疑惧地问：‘摘帽子？摘谁的？’老支书告诉我说：‘就是那个赌棍，心黑手狠的阙队长！’这真叫我大吃一惊，想不到那么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头上居然也有一顶帽子！而且直到今天，在这样一个是非非完全颠倒的境况下，那顶帽子还被别人攥在手里，死也不肯扔掉。我的思绪和感情变得复杂极了，真不知该怨恨谁，同情谁？诅咒什么，憧憬什么？堆在心坎里的是一坛打翻了的油盐酱醋，说不清是股什么滋味。

“‘你知道，他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赌棍，’老支书喘吁了一阵之后，接着又说，‘一年四季，少说也有两季半躲到牌九窝里。村里民兵逮住他好几回，也往县里送过，可这家伙手眼灵通，用赌场上捞来的钱买通了上下关节，关进去后很快就放回来。后来，他就越干越精明了，到处都安下他的耳报神，明明知道他在耍钱，可就是抓不住他。可是不管他怎样滑，赌棍这顶帽子还是抓在我的手里，休想从我的手里换回好名声，别看他今天抢了个队长当！’‘那他是怎么当了造反派头头的呢？’我掉进无法理解的是非漩涡之中。‘仗着他的家庭出身好呗！是个烈属……’‘他爸爸？’‘不，是他哥哥，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另外，他靠银钱酒肉早就勾结了一帮

朋友。这回一兴造反，他很快就拉起一个山头来！’老支书说着说着，因为创伤的剧痛，又使他全身痉挛起来。他把头歪靠到土墙上，手握着床头咯咯地发出声响。

“后来，我的境遇稍微地改善了一些。那个心黑手狠的阙队长在第一次斗狠中，没有用过重的口袋将我压垮，发现我这个只知道念书和反党的家伙，也还有别的用处。据说，人才的价值就在于他可被人们利用的程度，正如商品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一样。当时，人们正深浸在三忠于、四无限的狂热激情中，到处都忙于建立宝书台、敬立主席像、把墙壁变成刷满语录的红海洋。这些红化工作，成为人们觉悟程度的标识和思想革命化的体现，它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善于赌博的阙队长，是不会放过这个捞取左派资本的大好机会的。因此，我的价值，准确一点地说，我的使用价值便被发现了。他们把我抽出去专门搞红化工作，当然，搞这些圣洁工作的人是不宜住牛棚的，于是，我又搬回池塘边上那间小屋子里，你们知道，那是我最理想的画斋。

“我的红化搞得是很出色的，因为我的心坎里也像一般人那样（如果不是更厉害一些的话），灌满着虔诚的圣水。不错，历史上我有过错误，有过罪过，亵渎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圣坛；今天，我有机会来到洗罪的清流里，为什么不掏尽肝胆来洗涤干净呢？当然，我的赎罪是在最使我厌恶的阙队长的监视下进行的，这不能不大大地伤害了我的感情，但是，捐修庙宇的人也可能是贪得无厌的奸商，由他们捐献出来的钱丝毫也不会影响神殿的圣洁。同样，阙队长的权力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高尚意义。

“我每天早早地起来，提着油漆桶、调色板和画笔，到村中各处去写和画，一直到天色暗得用肉眼无法辨认色彩时，才返回池塘边那间小屋里去。我用艺术体写了许多语录，从村头大柳树下一直到村后的小学校。而最使人感到骄傲的，还是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为了让它更显赫地立起来，村中还专门修建了一座三米多高的牌坊。这一下子，我们的村子出了名！阙队长出了名！他的左派旗子从而举得更高，他手中的大权也就抓得更牢了。

“在这期间，他多次给老支书开批斗会。每当他与他的派友们喝足了酒，歇足了气，就要把老支书从牛棚里拉出来批斗，有时还要拉几个黑五类陪斗。他一手拿着语录，一手掐着烟卷。对着老支书滔滔不绝地讲，滔滔不绝地批，好不威风呀！他常常快活地说：‘现在我才尝到了掌权的甜头，当领导的派头，做工作的奔头！’群众没有一个瞧得惯的，在暗地里给他编了一套顺口溜：‘队长批支书，穿着尼龙裤，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原来阙队长把上级拨下来的进口化肥，都私自倒卖了，而将装化肥的口袋留下来，染成黑色制成尼龙裤子，抖抖擞擞地穿在身上，遗憾的是，黑染色没有能够将‘日本尿素’四个字盖住。

“可是，他穿尼龙裤到处抖擞的好运没过多久，就同我这个一直为灾星笼罩的人一道被彻底地打垮了。因为这个权太炙手可热了，它既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小丑变为英雄，使歹徒变成贤者，别人也想再重演这一场戏，把权再夺回来。他的对立面，就是我刚进村的那个曲队长，乘着我夜间熟睡的时候，偷走了我的油彩、画笔和刮刀，然后到牌坊上将《去安源》的画像胡乱地涂刮了一番，又把作案的工具丢在

附近的草地上。

“天亮之后，村子里像一锅沸油泼进了冷水，炸开了锅，愤怒激昂的气流差一点没有把天空当作锅盖给掀开。还没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像一个犯人被押解到牌坊的前面，站在我身边的，还有阙队长和他的几个派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什么罪过也没有比亵渎主席像的罪过更大，什么也没有比破坏领袖的光辉形象更能扇起群众的狂魔怒火。还没容得我做半句的分辩，拳头和木棍便像雨点似的打落下来，很快就被打昏过去。至于阙队长他们是否能够替我、替他们自己洗清罪责，我就知道了。反正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和穿日本尿素裤子的队长，都血迹斑斑地躺在牛棚里了。

“夜里，我全身巨痛，翻一次身就像有无数把刀割一样。瞎眼老头听见我发出呻吟，悄悄地爬过来，给我递过了一碗热水。他屏住了气伸头向那边听了听，见四周没有动静，便凑近我的耳根说：‘赶快逃走吧！这一派比那一派还厉害，他们这是栽赃害人，打算从你的身上打开一道缺口，全是暗算！全是阴谋！你想，你能躲得过去吗？’我也觉察到了这一切，便低声地问：‘能够逃得出去吗？’‘注意留心机会吧！’他听阙队长翻身呻吟便不再说什么了，悄悄把我喝水的碗拿走。

“过了两天，我在瞎眼老头和伤口已经化脓了的老支书的帮助下，终于从虎口里逃出去了。那天，正是腊月将尽的一个漆黑夜晚，我顶着割面的西北风，绕过已经铺满冰雪的池塘，从让我流淌血泪的田野里逃走了。我不敢在就近的车站上车，我听说过许多这类事情，逃跑的人刚刚走到车站的检

票口，就被追赶来的人给逮住了。我是趁着夜色还没有隐退，几乎是小跑着赶出去五、六十里地，等到鸡鸣之后，我已经在第三个火车站里买了车票，登上南去的列车逃跑了。”

十

“亲爱的朋友，你们以为我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蹚过险恶的湍流，进入安全的河谷了，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你们还都年轻，无法理解像我这样头上带着几顶帽子的人，无论怎样挣扎，也很难逃出厄运之神的手掌的。他总是把倒霉的风口袋对着我吹，让我在生命的旅途中永远只能走逆风的路。”

“除夕的夜晚，炮竹一串接一串不知惜身地争着自我爆炸，把清脆的声响和剖腹的残骸留给这寂寞的人间。路灯刺眼地亮，人流夹杂着让人无法理解的喧嚣，向着百余年来从未脱却繁花似锦的旗袍的南京路，毫无感情地冲撞着，拥挤着，阻塞着，丝毫不容它回忆什么过去和思索什么将来，只能默默地承受岁月的刀剑在它身上刻下一道‘不太显眼的年轮’。唉，真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她的身边！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去敲母亲的门。她出来了，我的母亲。我已经有十五年没见到她的面了。她那白皙的面庞虽然变得灰暗，眼角上刻出一大把鱼尾纹，但是依然是我想象中那样整洁、利索，仍然可以说是清秀、文静。她一见到蓬头垢面、褴褛一身的我，几乎是惊呆了，发傻了。是悲伤、难过抑或是恐惧、担忧，一下子就把她推到不容回身的墙角里，半天也说不出来话。足足怔了有五分钟，她才悄悄地打开门，把我放进到屋里去。”

“窗外的西北风疯狂地呼啸着，把旧年死去的岁月残骸一件件地拖走，然后又缓慢地把一大块空间打扫干净，留给马上就要从地平线上跨步走来的新一年。母亲忧郁地坐在床上，听我简单地把我的遭遇给她述说了一遍，她的脸色就更加灰暗了，在布满鱼尾纹的眼角上挂着苦涩的泪珠。她替我洗去了身上的污垢，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只有耶稣受难时才吃过的晚餐，因为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次晚餐。第二天一清早，她便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走了。

“在一个里弄的口上，她打开了车门对我说：‘孩子，下车吧！那是你爸爸的家。我实在没有办法留下你，整个的情形你也见到了，我的处境也很困难。你爸爸那里也许会好一些！’我心酸地从车里走出去，甚至没有回头再看看她，不知她是否依然守在汽车门旁边，还是含着眼泪走了。总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是她这个一世洁身自守的女人，两次抛弃了自己的儿子。

“到了爸爸那里我才知道，他的情况不仅不比母亲强，而且在我见到他时，这个可怜的老人已经像一只即将燃尽的蜡烛，正在用它最后几滴孤独的泪，面迎自己最后的熄灭。他早已被揪出来了，胡风分子，反动权威……有多少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就有多少条无形的锁链套在他的颈子上，没有一条不是在尽力地要把他从痛苦灾难的人生中彻底地引渡出去。他每天到机关里去打扫厕所和楼道，接受革命组织的监督和批斗，领回来的只是仅够维持他一个人生活的生活费。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已经得了肝癌，通往人生彼岸的路程已经不会很远了。他见到了我，当然感到了很大的安慰；但是，也使他本来就是风烛残年的生命，更加迎风颤抖，

临近熄灭的时刻。‘孩子，这可怎么办？这怎么得了！’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淌下了伤心的眼泪，抖抖索索地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咳，我快完了！可是为什么在我结束之前，还要再见到你这样不幸呢！’

“我的到来，也确实是给老人增加了无法承受的负担。那点生活费，不用说是不够两个人用的了。而且，更难以对付的还不在这里。街道里三、五天就要来检查一次户口，它使我根本无法在此久住下去。她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们，我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仅此一句，就引起了她们极大的怀疑，有饭杓子大的一个问号立时就贴到每个人的脸上。哪有这么大年龄的知识青年？！她们说：‘现在正在贯彻一号战备命令，有户口的人还要动员下去，何况你这没有户口的了！’街道里的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把警察也请来了。情况非常明确，不管怎么样我是非得走不可了，虽然我无处可去，又有老父病入膏肓，但不走不仅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而且要给经不得拖累的老父亲找来麻烦。

“当父亲早起吃过一小碗稀饭，又像一根枯草似的瑟索摆动地走到机关去打扫厕所楼道的时候，我把自已关到屋子里，两手抱住了头，久久地思索着：在这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我该到哪里去栖息这五尺之躯？鸿蒙辽阔的苍天，我这片可怜的羽毛该向哪里飘零？不错，在北京、武汉、广州，以至于眼前的上海，都有我的同学和朋友，求他们给我伸出一只友谊之手吧！但我怎么能去过那种乞哀告怜的生活呢？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只要他们不肯廉价地典当和出卖自己的良心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我也必须离开我所熟悉的人和我熟悉的环境，离得越远越

好！也许在遥远的天边，能够寻觅到一点死里逃生的机会！即使寻觅不到，在那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陌生的人群中间，结束了自己这不幸的生命，也会清静一些，没有更多的帽子让我带进坟墓里去。人们路过我的身旁，最多只会望着我坟头的青草，带着几缕淡淡的哀愁，而大多数人只会不屑一顾地走过去，谁也不会对他评论什么，因为，那里边长眠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异乡人！

“小时候喜欢读《唐诗三百首》。每当读到李白的那句‘孤篷万里征’时，心里边便充满了无际的苍凉、忧郁之感。虽然在头脑里还勾画不出孤篷是什么样子，也想象不出它是怎样在水天迢迢的迷路上凄凉无主地漂流着。但是那过分伤感的情绪，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强烈地感染着我。意想不到，今天我自己正在尝试着孤篷万里征的滋味。父亲把他仅有的一件皮衣卖了，为我拼凑路费。难道我有权利剥夺老人这最后的一件御寒衣物吗？他的东西几乎在几次抄家中都被抄光了。”“你不要为我担心了！现在什么衣服也不会帮助我御寒了，因为，我的心脾早已结成寒冰，还怕什么外部的风霜呢？”父亲仰起布满秋霜的脸平静淡漠地说。我知道，那些凄凉、忧伤之类的感情，早已从他心头消失了。

“我离开了二月春早的江南，离开了莽莽苍苍的中原大地，随着颠簸的车轮一个劲儿地向西行去。眼见熟悉的景物逐渐地从眼底消逝，心里总不免产生些留恋之情，虽然这里有我许多痛苦的回忆。故乡，毕竟还是故乡！”

“风一程，雨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这是清代诗人纳兰性德的词。我呢，此时正在风雨兼程地向阳关那畔疾行。风声雨声，充满了心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而我不怕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我早已抱定了主意，要远远地离开我所熟悉的人。但是真地就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心里又蒙上怅惘苍凉的气氛。更何况我要去的地方，完全是陌生的，像我这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政治生命的人，能够在那里生存下去吗？

“正当我在忧伤的歧路上踟蹰，在万里飘泊中徬徨的时候，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把我从愁绪万端的迷惘中惊醒。原来，坐在我身后的一个青年工人和列车员争吵起来。

“‘你为什么没收我的书？’青年工人不服地问。‘因为它有毒！’列车员也只有二十多岁，瘦削的身材，红润的脸膛，操着一口陕西话，把‘我’字都念成了‘鹅’字。这小伙子可真能讲，口若悬河，大概他在这种大辩论的场合里是很内行的了。他摆出许许多多让人难以回驳的理由，硬要把青年工人的书给拿走：‘你是工人，为什么不带头学习毛著，还要看这四旧的书？什么，你还说有教育意义？我告诉你，这本书（指《青春之歌》）我看过，那里边的青年是真正的革命者吗？那是一群知识分子，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情调的知识分子，而且更为突出的是，他们走的不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说实在的，我真佩服他，他的语录背得那么熟，用得那么顺口，确实是个难得的天才。

“正当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一个胖敦敦、身穿皮夹克的小伙子站起来，仗义直言地说：‘列车员同志，我对你的做法提点意见！他看这种书是不对的，可是你没收也不对，应当采取说服教育，不能关卡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助战者，开头使得列车员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以攻为

守地问：‘你是什么成份，竟然站出来替四旧说话？’

“小伙子一拉皮夹克的拉锁，拍拍胸脯说：‘我是乌鲁木齐市运输公司的司机，贫农成份，不信，你可以去调查！我不是说看四旧的书是对的，我只是说你没收乘客的书是不对的！’小伙子始终是笑盈盈地说话，他的汉话说得不太流利。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是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列车员比这个贫农出身的司机更厉害一筹，大概这种事情他经过得多了，对这样的辩论是轻车熟路，因此，他现在力战两个出身好的工人阶级全无法色，而且越战越勇：‘你们出身好的，更应当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四旧作彻底的决裂！我告诉你们，我没收的书多了，不信请到我的房间里去看看，已经堆了一摞子了！不过你们可以相信，这些书我拿回去不会去卖废纸，换两个钱花的。我要马上采取革命行动，将它们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这个能说会辩的列车员，终于把那本《青春之歌》给拿走了！”

“事情过后，我开始对我身边的维族司机产生了兴趣。这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二十多岁，身体壮实，性格开朗，待人很和气，完全没有当时流行的那种把粗野当豪爽、把无知当高贵的习气。从刚才那场辩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注意讲究策略的，虽然列车员最后还是蛮不讲理地把书拿走了，但他在群众中已经赢得了明辨是非的效果。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当列车员走了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罗丹艺术论》。那是我方才看过的一本书，随手放到靠窗口的小桌子上。因为长时间地默念自己艰难忧伤的旅程，完全把书忘记了。是他首先发现列车员来收书，敏捷地将书揣到自己的口袋里。现在，他又微笑着把书归还给了我。”

“我们开始攀谈起来，而且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种奇遇式的邂逅一样，很快我们就成了知音。他满怀兴趣地问：‘你是搞美术工作的？’眼睛瞪得很大，热切地期待我能给予他肯定的答复。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他高兴极了：‘你知道，我也是非常喜欢美术的！1966年我已考上了美术学院，这你是知道的，各艺术院校都提前在五月份招生。可是命运好像故意跟我作对似的，还没等我去学校里报到，各个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六六届老高三是最不幸的一群了，因为从我们开始把一切科学艺术的宫殿大门都关上了，关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国外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也没有采取过这种极端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打得最厉害的几个国家：德、日、意、苏、英、法等国，学校并没有关掉。抗日战争期间，我国也还在西南、西北保存了那么多的大学呢！’接着，他又谈了许多在当时听了都是相当惊人的见解。将要分手时，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到乌鲁木齐有什么为难之处，请来找我喀什姆，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乌鲁木齐的二月，还是冰与雪的世界。空气中漂浮着轻烟似的雪沫，盖着冰雪的马路像一条白色的河谷，静静地躺卧在两边高耸如山的建筑群中。我孤零零地在冰雪的河谷里走着，白天黑夜，默默不停地走着。晶明的空气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我感到轻柔、静谧和宽慰，已经浸透灰暗的心灵，开始透进几缕明亮的光线。我这个丢失了政治生命的人，在这遥远的乡土上没有人认识我，也就没有人诅咒我、嫌弃我。与之相对等的，也就很少有人招呼我、接待我。我默默无闻地走着，也就是自由自在地走着。如果，我真能够

永远在这陌生的土地上这样地走下去，该有多么好呀！我向人间并无多求，只要一天能够吃上一顿饱饭，有一个夜间不至于冻死的住处，也就心满意足了！

“开头，我真地找到了这个地方。我到各个剧院里去打听，问他们要不要画布景的临时工，我把画过的东西拿给他们看。有个好心的经理接受了我的提议（可能他们这儿的活很多，几个搞舞美的人都忙于串连和造反去了），让我给他们画画天山、草原、果园、羊群之类的布景，条件是可以住到剧院后台的布景贮藏室里，拿到一点低得无法再低的酬金。但仅仅是这一些，就已经使我满意得快要流出了眼泪。生活啊，生活！我现在才体会到，人们毕竟是留恋着生活的。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吧？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地好，很值得向你们再提一提。他说：‘作为一个人，他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我也是一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生命，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我也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感情。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长久被生活所摒弃，从没有很好地搂抱过生活的人，可以说，比别人更有高出十倍的热情去热恋生活。所以，在那白色的河谷里我孤零零地走着、走着的时候，慢慢地又感到了生活的温暖。

“而最使我感到生活温暖的，是风雪中那个小小茶馆的窗棂。为了节约开支，我每天都到车站附近一个小小茶馆里去用餐。一杯茶，一个烤馕，就是一顿最好的晚餐。每当我握住滚烫的茶杯，用一只手支撑着头，细心地观察和欣赏我身旁的一切时，一股生活的温流便缓缓地流遍全身，涌上心头。在这里，坐着各种不同面孔的人，他们饮茶、吃酒、谈

天、唱歌、取笑，各有自己一颗心灵，各有自己一份欢乐和悲伤。我更为喜欢的是那些维吾尔人，他们淳朴、热情、豁达、开朗，不习惯把自己的感情掩盖起来。他们心中的喜怒哀乐，都显露在眉峰和眼神里，显露在鼻翼和胡髭上。我几乎是沉醉在这动人的观察中，默默地坐着，观察着，没有人来干涉，又没有人来打搅，多么美妙呀，我在亲切地感受着自然而又和谐的生活的旋律。

叮叮咚咚地流淌过去了，
我那欢乐的时光。
在这宁静的黄昏，
我唱起了童年的歌，
反反复复地唱！
回忆起春天，
回忆起小河，
回忆起甜甜的奶子，淡淡的月光！

“一个留着一撮山羊似的白胡子、眼窝里藏满着生活阅历的老头，抱着都塔尔满目凄凉地唱着。他身旁坐着两个和他同样年龄、同样神情的老人，默默地握着早已喝干的茶杯，如醉如痴，随着歌声一道回到那遥远的过去，在记忆的屏幕上去寻找春天、小河、马奶子和月光……”

“一个身材魁梧、满脸和善、连胡子和眉毛的抖动都显得诙谐有趣的中年汉子，正拿他的老婆作题材说着开心的笑话：‘赛坎特，你每次出门你老婆都要哭哭啼啼地送你一程，还要亲亲热热地叫你几声小宝贝。可我那个老伴儿，每次我回家她都叮叮当地摔打着锅铲和饭杓子。我对她说：你不

缺吃，不缺穿，还有什么事使你不顺心的？你猜她怎么说的？她说：别人都能调功调动工作，你怎么没弄个汽车司机当当？我问：当汽车司机有什么好处？她说：那时你就可以经常地远远离开我了！’没等他说完，周围便是一阵捧腹地哈哈大笑。

“一个头戴鲜艳围巾、两腮绯红的姑娘，深情地望着头发卷曲、高高颧骨、唇上留有浓密胡髭的小伙子说：‘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也不要再抽烟了，这些东西都是有害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两盒刚从集市里买回来的莫合烟递给了小伙子。

“朋友们，我看到的是多么丰富多采的生活画面呀！多么叫人心醉的生活之歌呀！我应当拿起画笔把他们全都画下来，每一张面孔都是一首诗，都有自己的格调、旋律和节奏。每一个微笑，每一条皱纹，都能使人领悟不少生活的哲理。噢，你们看，这些素描就是我那个时候画的。你们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有多么丰富、明朗呀！每一张脸，都是一扇敞开的心灵之窗！还有那冬不拉与艾杰克，叮咚弹起的都塔尔与热瓦甫，好像这就是那个民族的自身。他们还没有学会说话就先学会唱歌，没有学会走路就先学会跳舞。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先哲的智慧、祖先的沉思、少女的热恋和英雄的豪情，都在这热烈而又忧伤、奔放而又苍凉、迷恋而又焦虑的歌声里激荡和沉浮着。记得刚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在那里画的素描拿给一位老画家看，他的眼角里落下了泪，手抚着下颏在屋里来回地走动，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人民，是多么热恋自己的生活呀！’

“但是不幸得很，这种世外桃源般的快乐生活，很快又

被新的不幸给击得粉碎！”

十一

这场雨来得特别快，方才还青天如洗，阳光耀眼，不知什么时候竟蹿过来乌云，而且还未等乌云遮住当顶，豆大的雨点就噼哩叭拉地落下来，一阵紧似一阵，不大一会工夫地面上就积满了水，冒起水泡，弥漫起一层灰白色的水雾。火热的天气骤然湿凉起来，只有在不大通风的角落里还充塞着热溽溽的闷气。

我和田滕碰巧今天都来学校。假期中的学校静得让人发呆、惊奇，谁也不敢想象一个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沸腾的生活和满地青春的脚步；现在，操场、教室和宿舍里，到处是空旷和沉静。宿舍里偶然走出一两个人来，但也都急匆匆的，办完了事又走向自己的寝室内。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正在补习外语，忙着出国留学的准备。就像七十年代急着去参军一样，许多人都把出国留学当作最上乘的出路，甚至毕业了之后多少年，还在机关单位里不撒手地忙着准备功课。

“你不打算出国？”我问田滕。

“不，不。过去和现在，从未有过这种打算，今后也不会有！”每逢遇到这样的问题，田滕总是显得急躁、多疑和不耐烦。

“好了，好了，我们就不谈这些了！我看，我们还是去看看画家老师吧，他明天就要动身去美国了！”我把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另一个角度上。

“可是，你看看这雨——”田滕探探头，望望窗外一片浑浊的雨帘。

“不会太久的！伏天的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说。

暴雨虽然没有很快就停下来，但在天近黄昏的时候还是放晴了。鲜艳的太阳冲破了乌云，把金色的流苏一缕缕地飘洒到雨后清新的长空中。不久，太阳就坠到一抹青山后边，暗蓝色的暮霭笼罩着大地。树枝上挂着晶莹透亮的雨滴，每颗水珠都闪耀着已经坠下山去的太阳给它们留下的绚丽色彩。街上的行人很多，我和田滕夹在人流中间，匆匆地向画家老师那里走去。

“出了一点点小的故障，因此，没有弄到这次航班的机票，至少要延迟一周以上。你们今天来了也好，正可帮助我消除行前等待时光的烦闷和腻歪。趁我出国之前，咱们就抓紧把我那无法结束的故事尽快结束了！可惜的是，小文同志这次没有来！”

我告诉他，文克生已经放假回家去了，不过，我一定会把我所听到的故事结尾转告给他。

“那好，那好，我们就接着说吧！朋友们，现实的生活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造物主对于我好像特别的吝啬，总不肯把过多的宁静给予我。它总是在我略微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又把我像一匹驴子似的赶跑。不久，我又陷入到绝望的逆境中。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招聘我去剧院画布景的那位好心经理受到了批判，栽到他头上的罪名，除了守旧复礼之外，包庇重用逃窜的右派分子也是致命的一条。他被赶下了台，我被赶了出去。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何处以栖身？在那冰封雪冻的银白色河谷里，我凄惶饥冷地默默走着，默

默走着。我必须不停地走，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一停下来，马上就要冻死。许多人就是因为抵御不了不断奔袭过来的疲倦，想找一个避风地方略微休息一下，结果眼皮一合上，就再也睁不开了。

“天亮以后，我浑身发抖，筋疲力尽地走进了长途汽车站。那里的门刚刚打开，马上就挤进一群购买车票的人，我贪婪地挤到人群中间，想从挤靠摩擦当中寻得一点温暖，因为我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生命之火，都可以散发出几个大卡的热量。天上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而受到惩罚，而我今天却因为盗取温暖，很快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这是个什么人，为何只排队，不买票？每一次轮到他靠近窗口时，他总是把位置让出去，而又重新排到最后一个？’等到我让过了三轮，又去排第四轮的时候，有一个带红袖标的人就把我叫过去。他们一定怀疑我是小偷。

“你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早就注意到你了！”说罢，他就把我带到民兵指挥部里去。跨进那座禁严的门槛不仅没有使我怯步，倒产生了几分向往，因为屋里升着一个又粗又大的铁炉子，炉火熊熊，满屋暖融融的热气。靠炉边坐着一个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操着甘肃口音，从他的举止和气度上不难猜测，他一定就是这里的头头。他上下打量我两遍之后，便用炉钩子敲了敲烟筒，示意让我说下去。我告诉他，我没有住处，冷得发抖，只好挤到人群中间窃取一点温暖，免得被寒冷把生命夺去。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开心地笑了，怀疑却因此而更加深了一层。

“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有证件吗？”一个身材臃肿的女人俯在靠窗的桌子上抄写什么，听见我这么说也抬起

头来，像望着—头稀奇的怪兽似的望着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工作，没有证件，也没有户口。噢，是个盲流，逃窜分子！不，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敌特分子？！‘你老家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流窜到这里来？’守在炉火旁边的头头又敲着烟筒问我。我老老实实地说出了我的身份，告诉他们我是怎样被那总是与我作对的顶头风把我一步步地吹到这里来的。因为有一大堆政治帽子压在我的头上，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应有的警惕：‘你要放老实点，我们马上进行函调，一定会把你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在此期间，你先住到拘留所里去！你有钱和粮票吗？我们给你兑换饭票去！’

“我告诉过你们，我没有钱。否则，我何必不买—张车票呢？”‘哼，这个无赖，想跑到这里来混饭吃！’带我来的那个民兵狠劲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吐沫，愤懑厌恶地望着我说。是呀，我是不应当到这里混饭吃的！可是……他们不容我再分说，就把我推到—间禁闭室里。屋里有一张木板床，—张条凳，床上堆有稻草败絮—类乱糟糟的东西。我进了屋，几乎什么也来不及细看，什么也来不及细想，—头倒在木板床上就睡着了。我实在是太疲倦了！

“函调很快就回来了。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又发生了变化，掌权的又换上了阙队长，他们那—派在外力的支持下把印把子重新夺了回来，像烙饼似的又翻了个儿。可能是由于我们曾经—道遭过难，阙队长在回信中并没有给我写什么坏话，这可能是他—生中难得的一两次善举了。‘现在我们完全弄清楚了，’民兵队长阴沉着脸对我说，‘你不仅是—个右派，而且还是刑满释放分子！你不服管制，私自逃窜，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嗯，你说！你不是一般的盲流，而是—个政治盲流！对

干你这样的人，我们是有办法的！你懂吗，是有办法的！现在就把你运到收容遣返站去。不过，你要记住，你的问题是属于两类之间的矛盾！不老实，随时都可以转化为敌我性质！’

“两个民兵把我从拘留所里提走，押送到设在城郊的收容遣返站去。我茫然地随着他们穿街过巷，在周围一片可怜的目光下可怜巴巴地走着。突然间，有一个人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说：‘这不是史老师吗？你这是往哪里去？’我的天呀，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他！原来，他就是从上海与我一路同来的那位维族青年喀什姆。到乌鲁木齐这半年来，我常去找他，通过他我接触了许多和善、热情、朴实的维族人，特别是他职业圈子里的人：那个总是充满诙谐之感的汽车修理工瓦哈普，留着两撮动人的八字胡的食堂管理员易卜拉欣，还有眼睛总是在笑着的汽车售票员阿尔古玛姑娘。他们都给我留下了难得的良好印象。喀什姆也常到剧院来找我，我们坐在那间又脏又乱的贮藏室里，喝着浓茶聊着天，他有时也过来看我怎样调色和画画。

“‘史老师，你怎么会给抓起来呢？’我把原因如实地告诉他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不因听到我的身份而感到吃惊，没有摒弃和退缩的意思。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史老师，你放心地去吧！收容站里我认识很多人，我跟他们说，不会屈待你的！’多少年来没有因为真挚友谊而冲动的我，禁不住热泪悄悄地滴落下来。当时正是日暮天寒，但我的心头却滚烫的，像燃起了一团火。民间有句古话，叫作‘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只为这一句温暖人心的话，我禁锢已久的感情闸门，忽啦地一下子打开，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浑身颤抖地扑到年轻人的身上。我在万万千千的人群中又看到

了，人与人之间除了阶级性之外也还有人性的一面，除了利与害的关系之外还有对于弱者的怜悯与同情的一面。

“由于喀什姆的关照，我在收容站里的处境比一般的犯人都好，一句话，是一个特殊待遇的囚徒。每天天色刚亮，我们就要排队到一个荒凉冷落的旷场里去打土坯。每人限量一天至少要打够一千块，中午打不够五百块的，吃饭的定量就要减去一半。我由于身体孱弱，虽然卖尽力气去打，也打不出五百块坯来，但是站长沙姆沙克并不因此给我减低饮食定量。他还允许我常到医务所里去看病，并且主动地走过来对我说：‘你去瞧瞧病吧，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是社会福利机构！’喀什姆也常到收容站来，给我带些吃的东西，还有比吃的东西更为重要的莫合烟。我们坐在火炉子旁边，一边用废报纸卷着莫合烟，一边谈论着画。说到兴起的时候，便把一根筷子插到炉子里，等烧焦之后便成了一只挺不错的炭精画笔。然后，就在准备卷烟用的废报纸上画起来。那种乐趣，也是人生中难得寻觅的。

“有一次，我笑着问他：‘你与沙姆沙克是亲戚吗？’他摇了摇头。‘那他为什么会听你的话，对我这么好呢？’喀什姆狡黠地向我眨了眨眼睛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关系学中，听诊器和方向盘都是极有用的武器，比那通常所使用的炸药包、十二响等武器都厉害。特别是方向盘，它在我们这交通不大发达的地区，简直就是一个活神仙，没有一座它敲不开的堡垒。他这个站长算什么，每月拿的那几个工资，还不够我们那些哥儿们一盘小菜钱！’

“喀什姆是当时当地觉醒得最早的一个青年。他由于走的路多，接触的面广，听到的社会消息也最多。关于《红都

女皇》等传闻，都是他一面作画一面告诉我的。在单位里，他常常用叫人哭笑不得的手法进行合理斗争，让那些当头的拿他一点没有办法。他告诉我，有一次，车队里开批判右倾翻案风讨论会，上边还派人来参加。喀什姆那天去晚了，小组长正在念三项指示为纲等供大家批判的反面材料。喀什姆一进屋就说：‘这些话说得真对！’别人告诉他说：‘对什么，那是走资派说的！’喀什姆连忙更正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是走资派说的，那自然就是臭的了！’材料念完了，大家谁也不发言，都像睡着了似的闷在那里。工作组着了急，催促大家说：‘发言呀！发言呀！怎么都不说话了？’喀什姆说：‘没有人说，我说！我看这个走资派可真坏，还想着给我们工人增加工资，这不是资产阶级福利主义嘛！’逗得大家在心里嘿嘿直笑，但有工作组在场又不敢笑出声来。工作组长气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一甩袖子就走了。

“喀什姆有时也给我带进一些书来。我一看，全是《红岩》《红日》《青春之歌》之类的书。我惊奇地问：‘你怎么敢把这些书带进来？’他忿忿地说：‘现在出的那些高大全的书，还值得一读吗？’我又好奇地问：‘你是从哪里把这些四旧东西都翻找出来了？’他听了，又变得十分得意地说：‘我这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剥夺剥夺者。造反司令部里这类的书堆成了山，都是抄家抄来的。我又想着法儿把这些书鼓捣出去，送给喜爱这些书的人去看。你要问我靠什么方法吗？当然，还是靠手里的方向盘！’真是个小聪明的小伙子！世上能有几个这样韧性战斗的勇士，也就是十分难得的！

“我的土坯打得快够迁返内地的路费的时候，有一天，沙姆沙克站长高兴地走来对我说：‘我们很快就要放你出去了！’

这些日子，我们之间处得都很不错，你临走之前，给我们留下点纪念吧！我的儿子赛坎特下个月就要结婚，你能在一对新箱子上给我画一幅画吗？’朋友们，我该怎么对你们说呢？这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大好机会。‘艺术之神竟会这样轻巧地来到我的身旁，并把一只手亲昵地搭在我的肩上。当沙姆沙克向我提出邀请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恢复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艺术生活的开端，愁头愁脑的沙姆沙克，竟是秉持打开艺术宫殿大门钥匙的司阍！

“由于，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彩绘一对箱子会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因此沙姆沙克说完后，我便马马虎虎地对他点了点头，答应他只要把一切安排好了，我随叫随到。果然，两天之后我就站在沙姆沙克的那对杉木箱子前。我拎着油漆桶，精心地给他油饰他们最喜欢的花纹与图案。对了，我还忘记告诉你们了，在维吾尔人中间有一种传统的喜好：每个维族人的家庭里，都要摆设那么一对油漆的木箱和木柜，上边都要画着各种鲜艳吉祥的图案，而最使他们感到开心和满足的，是一只喔喔啼叫的大公鸡。那天，我正巧满足了他们的这种心理要求，在沙姆沙克的枣红色杉木箱子上，昂然屹立着两只全身羽毛都振抖起来的大公鸡。喜得沙姆沙克买来一腿羊肉，又杀了两只活鸡，把邻居中有头有脸的人都请过来，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跳舞唱歌，共同庆贺那双吉祥的鸟儿到沙姆沙克家里来落户，祝贺他的儿子一定能够娶过来一个既美貌又贤慧的新娘子，祝贺他的儿子将来比站长本人的福份还要高，作的官还要大。而我这个给人们送去吉祥如意的画家（后来，他们都亲昵得称我为油漆匠），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殷切隆重的款待。主人拉住了我的衣襟，说什么也不

让我走，一个劲儿地往杯子里筛酒，直到我把酒从嘴里喝进去又从鼻子里流出来，才算告饶了事。

“我的大公鸡一下子出了名，在乌鲁木齐的许多人家里都在传说，有个汉人油漆匠能把公鸡画得比活的还有生气，还逗人喜爱。还说，有个婆娘看着看着就眼花了，顺手给箱子上的公鸡丢了一把米。‘去把那个汉人请来，让他给我们的箱子也画个大公鸡！’这是丈夫出门时，妻子最爱叮嘱的一句话。于是，我便被请到列扬·买买提站长家里去，柯孜站长家里去，王参谋家里去，宋指导员家里去，那些拍打着翅膀，或者是喔喔啼叫、追逐角斗、土里刨食的大公鸡，便飞到各家的屋子里。

“收容的期限已经满了，但是靠着大公鸡的力量，当然，更主要的是靠喀什姆、沙姆沙克这些好心人从中斡旋，我没有被强令遣返回去，仍然像只孤雁那样飘零在银色的河谷里。我没有住处，没有粮票，没有钱，只能在请我给油漆箱子的人家里借宿几夜，靠几个好心的朋友周济勉强填饱肚子。当我实在找不到住宿的时候，就到喀什姆的汽车里去过夜。

“茶馆是我作画的最好地点了。我凭借一杯热茶和一个烤馕给我所提供的体力，就可以在吵杂拥挤的茶桌上（最好选择倚靠墙根的偏僻角落），摊开我的纸笔，细心地观察和描绘坐在我眼前的人像。朋友们，你们想象不出他们有多么朴实、可爱，在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细心地观察我：噢，这个汉族人是干什么的，老拿着笔画呀画的？有的竟走过来看我的画，看画里边那些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就像他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于是，他们开朗地大笑起来。有一次，一个抱着都塔尔的老人走了过来，伸手抓住了我的画

笔，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画我？’我说：‘你没有注意，你长得有多么和善动人！’‘那不是理由！我有工作，有户口！我不准别人画我，那是亵渎圣灵的事，《可兰经》上说过，除了先哲之外，人是不能随便画像的！’老人的态度非常执拗，我只好收起画笔来。

“有一天，喀什姆在茶馆里找到了我。正巧我的旁边有一个空位，我便拉他坐下，把一杯热茶推到他的跟前。当我撕下一条报纸给他卷莫合烟时，他挺认真地对我说：‘有一个市场管理所主任，是个很讨厌的家伙，外号叫手术刀。他家里吃的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他在自由市场上所动的大小手术刮去的。他今天心血来潮，也要附庸风雅，想请你到他家里去画只大公鸡。我对他说，你可以到自由市场上一钱不花就提走一只活鸡，但画上的公鸡却不会免费飞到你家里去的，他问：要多少钱？我说：至少得这个数，我伸出两个指头。他眯上眼睛笑着问：两元？我说：别做梦了，二十元！后来经过讨价还价，他出到十五元。你说去不去？’我们商量了一阵子后，决定还是去。因为，我很想见识见识这样一个人物，看有什么可以入画的色彩和线条，而且还可以改善一下我的窘境。十五元钱在当时是可以买到一头毛驴的。

“这位主任的家是相当豪华的，同时也是相当庸俗的。主任的长像相当富态，同时也相当粗鲁。他坐在做工极其拙劣的单人沙发上，肥胖的身子紧紧地塞满沙发框子，连左右回身都异常地困难。我问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公鸡，他眯缝起眼睛想了半个时辰，也没想出个样子来，最后还是把他老婆叫过来，由他老婆帮衬和提醒才把他所喜欢的样子说出来。我按照他讲述的样子去画，他坐在一旁监工，因为他很怕我

偷工减料，给他省掉几笔不应该减少的东西。他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嘟嘟囔囔地说：‘喂，大个子，我跟你讲，我不会少付你一分钱的；你呢，你也应当明码实价地给我画，一根羽毛也不要给我少。不然你要当心，我会扣你工资的！’可是，当我把大公鸡完整无缺地给他画出来之后，他却赖了帐，满脸蛮横地说：‘你一定是偷工减料了！我们讲好是画一天，你却半天就画完了。这只公鸡一定是短斤缺两，不够份量！我是管理市场的，有丰富的经验，你休想在我眼前滑过去！我不能给你那么多钱！’我给人家油漆箱柜，是从来没有讨价还价过的，但是面对这么一个敲惯竹杠的无赖，我却半分也不能让。我宁肯把百两黄金丢进清流，也决不把一枚铜板掉进污淖。我对他说：‘你的公鸡一点也不短斤少两，甚至比别人家的还要肥胖一些。至于为什么半天就会画完，这是艺术家灵感范围内的事情，兴之所至，一笔勾成；兴致不来，也许两三天画不出一笔。我们是论幅讲价的，不是计时工资！’

“他气得腮上的肉乱哆嗦，拿着手指计算说：‘你只干了半天活，怎么能挣十五元呢？打土坯一天才挣三元！’我告诉他，为了在半天时间内画出一只像样的大公鸡来，我要花费十几年练笔的时间。他更加气愤，站起身来向周围一指说：‘我家里的这些东西，你看，从沙发到衣柜，从碗橱到纸篓，都是在市管所里上过税的（天晓得，他是怎么上税的）。就连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你看（他从头上把帽子摘下来，但却没有叫我看），也是上过税的！你画大公鸡有多长时间了？啊，半年多了！起码也画有五十只了！每只要扣你百分之十的税。嗯，现在你就补交出来！’在这个竹杠能手面前，我真气坏了，怒冲冲地说：‘我这是出卖劳动力，跟打土坯一样，拿什么

税？如果要拿税，就先从你这儿开始，在十五元之外，你再向国家交百分之十的税金！’他气坏了，伸手要夺我的画笔。我马上站到木箱跟前对他说：‘大公鸡你还要不要？不要，我马上就涂去，你一个钱也不用给！’这时，他老婆赶紧扑过来，紧紧地拉住我的胳膊，用眼睛示意她的丈夫，让他如数地把钱付给我。他一边掏钱，一边气得手直打颤说：‘你这个流氓，不，你这个盲流，政治盲流！我会想法找个安置你的地方的！’我也很气愤，直接了当地回敬他说：‘不错，我是个政治盲流，但丝毫不比你这个政治流氓更坏！’

“但是，政治盲流到底斗不过政治流氓。他可以用政治权力加流氓手段来对付我这个没有政治生命的人，就像巫婆对付一个求神的病人一般，她是可以随时以神的名义来敲诈他、捉弄他、惩罚他，而又丝毫不露出她自己的猥琐、贪婪和邪念。他时常让市管人员和民兵来检查我的户口，常以流氓分子的罪名把我传去审讯和拘留，特别是社会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例如发现什么反标、谣言、匿名信等，首先受到怀疑和审查的就是我。为了躲避这些拘留和审查，我的住处更加变换不定，不仅每天要换一个地方，有时一夜要换几个地方。我是在缝隙中艰难地生存，又在艰难的生存中从事一点艺术创作。

“但是，通过与这个政治流氓的接触，也给我另一方面的有益启示。他让我知道，艺术不仅具有其崇高的价值，而且具有市场上的使用价值，每只彩绘的大公鸡，也像市场上的大公鸡一样，具有着明码实价的价格。自从与市管所主任那场争论之后，我脑子里更加明确：我的劳动不是行乞，可以完全凭主人的兴致来行赏。既然深知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市

管所主任那样认真地争辩彩绘大公鸡的份量和价格，由此可见，它是有坚实的价值基础的，我有权利得到我所应得的报酬。

“自此以后，我便提着油漆桶主动地走街串巷，像磨剪子与焊洋铁壶的一样，努力地去寻找邀请我的雇主。而乌鲁木齐人对于我的大公鸡是永远不会感到乏味的，更何况我的公鸡越画越活，差不多只剩下不会喔喔啼叫了。这也就是说，多少年来已经生疏了的笔，如今总算找到了运用的机会，多少又恢复了它的灵性。每当我拎着油漆桶从小巷子里走过时，总要惹起人们的一片注目和议论，特别是那些家庭妇女，她们有比男人更多的情，因为，她们比男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箱子和柜子。每当听到我吆喊的声音，总是她们头一个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满脸嘻笑地说：‘喂，油漆匠，请到我家来吧！我们又买了一对好木料的箱子！’

“油漆匠的工作使我逐渐有了一点积蓄，这样，我就有钱可以买些颜料与画布，乘车到南疆去写生和创作了。你们也许要问，我为什么不怕路途迢迢非到南疆去不可呢？因为，我深深地爱上了维吾尔这个民族。而我认为南疆这个地方更多地保留了这个民族的本色。他们民族所特有的风情习俗，特有的音响色彩，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为浓郁、醇厚。更何况，那里的自然景色又是那样的优美，阳光和空气是那样的明丽，艺术家不到这里来呼吸而到哪里去呢？

“等我积蓄的钱花光了，买的颜料和画布用完了，我便又回到乌鲁木齐来，重新操起油漆匠的职业。等我有了新的积蓄，够我再作一段时间远行写生时，我便又回到了阳光灿烂的南疆。如此往往返返，等我的问题彻底解决回到北京时，

已经有了上百幅油画和素描了。去年在美术馆里举行我的画展时，有些老同学拉住我的手说：‘真想不到你能在那样残酷环境下，在压扁了的时间和空间里，不仅没有扔下画笔，而且还出色地创作了这么多好画！’”

十二

“我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越是当你要急着办成某件事情，往往越是要出岔子；越是想要走得快些，越是迈不开腿。1976年的春天，我在新疆大河堰等着上火车时，情形就正是这样。我好不容易甩掉身后盯梢的人，从一家雇主的后墙上跳下去，搭了一段公共汽车，逃到离乌鲁木齐有二百多公里的大河堰。本来想第二天转乘长途汽车去库车，想法子找到喀什姆，告诉他暂时不要回乌鲁木齐，因为那里正在搜捕他。可是，当我靠近窗口准备掏钱买票的时候，不幸得很，口袋中的几十元钱被人掏走了。

“一急，浑身的汗水就像雨滴似的落下来。我来回地兜着圈子，在乱哄哄的汽车站里茫然若失，无论怎样拍着脑袋，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来。后来，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特别机敏地活动了一下，它启示我可以卖掉身上的衣服，因为车向南行，越走越暖和，没有外衣照样可以活下去的。于是，我就变成车站上兜售自己身上唯一一件外衣的蹩脚商人。你们当中无论是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是怎样一副窘像。虽然我想极力地去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弄巧成拙，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做商人的材料。因此，兜售了一个上午，那件外衣依然搭在我的手臂上。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少，我也就

越加感到失望，一身无主地依靠在门框上，心里盘算万一外衣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有一个四十多岁头戴压舌帽满脸连鬓胡子的汉子走到我的跟前。他那一身工作服和沾满油污的手，很容易使人辨认出他的职业，不是个司机，也是个汽车修理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后说：‘看你样子不像个做买卖的！为什么要卖掉自己身上的外衣？’我告诉他，我的钱被人掏了，由于特殊的情况，又必须急着赶到库车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他的名字叫喀什姆。不知他是认识喀什姆呢，还是同情我的处境，非常豪爽地说：‘你就坐在我的汽车上吧，我下午就出车去喀什，正好路经库车。’

“一路上，他都让我坐在驾驶楼里，坐在他的身旁。夜间，因为我没有钱住店，还被允许睡在他的驾驶楼里。汽车连日不停地行驶在浩瀚的戈壁滩上。车窗外是一片黄沙的海，无边无际，除了反射着耀眼阳光的沙丘和沙浪之外，野旷天低，别无一物。而在这沙漠里颠簸的汽车，确如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车子上不论是什么人，一旦被抛到车外，就如同船上的人跌落到大海里一样，很快就会被那无际的波涛所吞没。多么使人依恋的车呀！它使我想起了上帝拯救地上生灵的诺亚方舟。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禁不住从书包里抽出画笔来。他一边把握着方向盘一边向我斜视了一眼，微笑地说：‘是画家吗？’我点了点头。他接着又说：‘你有什么事情找喀什姆？是不是你们那幅贴到广场上去的诗配画，已经被人注意了？’啊，他知道得这么清楚。我大吃一惊，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绝不是一个坏人，心里绝没有歹意。我急忙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正面回答，只微微一笑说：‘喀什姆，是个好小伙子！’

“沉默了一阵之后，我终于忍不住，便把自己激愤的感情向他全部倾述出来。虽然我们还是萍水相逢，但许多直观的感受让我已经相信了他：‘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几亿颗心都在淌着血，滴着泪，可是有人却还要堵住想要痛哭一声的人的嘴巴。恐怕人们都有这种感受，当一件大的悲痛落到心头上时，只有痛哭几声才能泄一泄充满心头的悲愤。如果有谁想要堵住嘴巴不让人哭出声来，就非把人憋得发疯不可！’

“那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喀什姆突然到我临时的住处（一座废弃的旧工棚里）找到了我，拿了一首悼念总理的诗让我给配图。他眼角里滴着大颗的泪珠，把一张捂得滚烫滚烫的稿纸递给我：‘你敢不敢把这个意思画出来？’我看过了诗，同他一样泪珠也不断滚落下来，心头，塞满了烟和火。我对他说：‘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而且，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是坟墓里的人了，对后果的严重性丝毫也不在乎，也不恐惧，最多，也不过是从生的坟墓走到死的坟墓里去！’

“傍晚时候，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库车。但是真不凑巧，喀什姆在两个小时以前，已开车给勘察队送仪器和给养去了。我正焦虑、茫然地在街头上踟蹰徘徊，眼前的一个景象却突然把我给吸引住了。那是一个雨后的黄昏，夕阳从乌云破碎的缝隙中露出凄冷惨淡的面庞，飘洒下它最后一点血红色的余晖，依依不舍地向眷恋着它的大地告别。空气中稀稀落落地飘零着雨丝，树枝上和电线上挂满串串晶莹的泪珠。道路泥泞得很，积水汪汪，在一片泥水的路上簇拥过来浩荡的人群。淳真质朴的维吾尔族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街头。他们捧着花圈，擎着周总理的遗像，向着落日的方向默默地

走去。雨水和着泪水，忧虑和着悲痛，大地上的一切都融在那默默无声的烟雨黄昏里。啊，多么悲壮、浑厚的场面呀！应当有一只笔，绘出历史长卷中这一深沉有力、石破天惊的场面。我是这伟大的瞬间的历史见证人，艺术家的良心和爱国者的血勇，都不容我推辞这一神圣的职责。我要留下来画出这幅画，不管危险像洪涛还是像毒火，从哪个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扑过来将我烧毁和吞噬。但是，正当我要抽出画笔的时候，却又感到万分为难，喀什姆我还没有找到，没有把最为紧要的消息告诉他。司机在一旁看透了我的心意，他把一只大手有力地抚到我的肩膀上说：‘你留下来好好地画吧！画吧！通知喀什姆的事交给我，我会想办法找到他，让他躲过这场风险！’

“十里长街，人潮滚滚。我站在马路边上打开了画夹子，细心地观察和描绘从我眼前缓缓走过去的人流。在巴乌姆帽子下面是一张张多么肃穆、悲伤、虔诚的面孔呀！多么可爱的民族，多么可贵的感情，它像强烈的电流击撞着我，激动得我的手在发抖，血在奔流。先哲们所宣布的真理，祖先所告谕的正义，都融铸在这肃穆的人流中，都显现在那些雕塑般的面孔上。我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五、六年，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看到他们的心灵。我瞪大了眼睛，摒住了气息，尽力去捕捉最典型的面孔，最典型的场面，最典型的气氛。

“我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个夜晚，又站了一个白天。司机临走时给我在汽车站里找了个住处，但我一直没有回去歇息，他给我留下几个烤馕，到现在还有一半揣在怀中。人有思念饥渴的时候，也有忘了饥渴的时候，我这时正属于后者。正当我如醉如痴地描绘那早已存在我的理念之中，然而却又是

从绝对现实中取材的画卷时，突然有人用自行车轮子强劲地撞我的后腿，说：‘走，收拾起你的画笔，跟我们一道走！’好半天，我才清醒过来，从感人的艺术境界里返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明白了眼前发生什么事情。站在我身边的是两个推自行车的便衣，身后影影绰绰还有一个人，只要一看到那双既愚昧而又狡黠的眼睛，我就知道那不是别人，正是随时寻找机会要惩治我这个政治盲流的市管所主任。他是什么时候追踪到库车来，什么时候在人群中辨认出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这个反革命，又窜到这里寻衅肇事了！”我被带到拘留所，审讯的人含着威慑的目光望着我说。‘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寻衅肇事了！我在干什么，你们大概早已看清楚了！’我把我的素描全都拿给他们看。‘哼，典型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你还臭转，没有人跟你讲空道理！只告诉你一句话就够了：你违反政策，违反法令，有罪，要判你的刑！’

“果然，我被判了刑，两个持枪的兵将我押送到劳改监管站去。这个结果，虽然早已料到，但真的发生时，仍然感到震惊。为了艺术，为了真理，被带上手铐，甚至被拉到绞刑架上去，自古以来就不乏其人的。我还算得了什么呢？况且我的一双手，早就铐着一副无形的镣铐。今天进了劳改监管站，处境未必发生多么大的恶化。但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那幅历史画卷不能完成了！”

“劳改监管站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院子，四周是一排低矮潮湿、没安门窗的小房子。在一个黑洞洞的门口前，坐着一个干瘪的老头，正光着脊梁捉拿虱子。他见我走过来，好奇地打量了半天，然后笑了笑说：‘你是个小偷吗？’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那么，是个走私贩子？’我又摇了摇头。他

好像懂得了什么，眨了眨眼叹口气说：‘噢，是了！是了！又是一个没用的读书人！前几天进来一个跟你一样只会摇头不会说话的人，听说还是个画画的呢！你不会也是个画画的吧？’噢！先我而来的还有一个画画的，他该是谁呢？难道也是因为要画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而被捕的吗？啊，朋友们，你们也许还不能理解，像我们这些沦落天涯的人，是多么希望能找到个知音者呀，即使在监牢中也是一样。

“我们这些劳改犯每天被押送到一座荒坟累累的沙梁上去烧砖。活儿是相当重的。码窑、起窑、加火、灭火，在烟熏火燎之中磨爬滚打着。我的身体本来就很弱，在这些年的风雨飘泊里更是五劳七伤，如今，怎能应付得了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呢？因此，有几次我竟晕倒在喷吐着火舌的窑洞前。

“几天之后，有一批犯人从山上干完了活，返回来。那天晚上我去伙房打饭时，你们怎么猜也猜想不到，我会在西域楚囚里，见到了已经分别多年的难友。对，就是他，就是那个虽然枯萎瘦弱，但却总是死不了的倒霉画家冷杉。我们差不多要拥抱起来，互相拉着手久久地、久久地不肯松开。我们有的是泪珠，缺的是语言。能够使我们复杂而苦涩的感情紧密交流的，是深沉的目光和颤抖的手。欲问别后离情，欲语还休！欲语还休！我们都是飘蓬万里，行尽了茫茫天涯路，如今又在这铁窗下面碰了头。后来，我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简单地向他叙述了这几年里的悲惨遭遇。他听了之后，苦笑一声说：‘我的遭遇也几乎跟你一样。像我们这种把好的运气与政治生命都彻底丢掉的人，也只能有这样的遭遇，如果不是更坏一点的话。说实在的，我同你略微不同一点的是，我真的作了坟墓里的人。有一年，我实在没有住宿的地方，便躲到

一座坍塌了的古墓中过夜，同骷髅作伴，住了半个多月。前年又从古墓里飘流到这里，打算在这天边异域，默默地了此残生。想不到在这次追查政治谣言中又牵涉到了我，看起来默默地了此残生也并不是件容易事？’我同他谈到了我在库车的所见所闻，谈到了我在街头的那幅画，我告诉他，我打算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这件艺术作品上。他很赞赏，也很激动，甚至一下子就如醉如痴地扑倒在我的主题和我的构思中。后来，他便利用一切能够找到的业余时间，带着狂热的追求和我一道起草这幅《落日》的草稿。没有画纸，就把有人丢下的包莫合烟用的牛皮纸捡起来，精心地将它展压平整；没有画笔，就把筷子放到炉子里烧焦，燃箸作画，恐怕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呢！条件虽然如此简陋，但同样能使我们享受到创作的乐趣；况且，主题是如此的圣洁，它必然使我们的思想得到激励，灵魂得到升华。

“冷杉告诉我，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从北京来的熟人，闲谈中还说起了老胡。这些年来，他更加得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的政治素养也就越加成熟了。他能够洞察政治风云中的一切变幻，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气候和温度里愉快地生存，成长。他好比是个闯惯了江湖的船客，不管梢工和舵手怎么换，船在风浪里面怎样地飘摇，他都能够看准方向，把握主动，稳稳当地坐牢，不仅不会丢失他已经取得的东 西，而且还会趁着颠簸混乱，伸手窃得尚且不属于自己的东 西。这些年来，风风雨雨，人海浮沉，使我看得更清楚了，对于某些人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他们的仕途经验的要诀，就是看准风向，急速转

舵。有了这点，就能保住官、禄、德，保住应当归他们享有的一切。我敢说，即使是那位旗手的旗帜倒了（但愿上帝叫她早一天恶贯满盈），我们的老胡依然会稳稳当当，富富态态地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升得更高一些的话！

“后来，我这里所讲的后来，就是在劳改监管站里烧了半年砖窑之后，我们站里来了个浑名叫‘洋葱头’的副站长。他的那个形象，实在是滑稽可笑。生得一张鸭蛋形的脸，但是天不作美，偏偏让它横着放在颈子上。一身屁股伦敦的肉，上下地圆，从远处望去，活像一颗会滚动的洋葱。这个家伙又浑又蛮横，不是摸女犯人的屁股，就是殴打那个干瘪瘦弱的老头。他来之之前，那几个站长见我体质衰弱，多少又有点文化，就让我负责烧砖的统计工作。他对我的这种特殊待遇看着很不顺眼，每逢他带班时，总是怒冲冲地对我说：‘喂，大个子，你凭什么站着不干活？谁给你这个权利！’我告诉他我在统计每窑砖的数量，他鄙夷地说：‘不用你数，砖也一块多不了，一块少不了！’我再和他辩解，他便蛮横地将我推倒在砖垛上，酒气熏天地朝我怒吼道：‘别装蒜，干活去！’然而使他更为恼火的是，当他不在的时候，别的站长依然派我去数点每窑砖的数量，这也就更加深了他的偏见和恶感。

“有一天，他突然在夜里走进我们的号子来。天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喝足了酒，要找个地方宣泄宣泄，真是不巧，他闯进来时我正和冷杉埋头在一张牛皮纸上潜心作画。两根燃管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尚的、圣洁的意境之中，因此，这个醉汉来到身边时，我们竟一点也没发觉。他伸手把那张画稿抢去，端详了半天，极力想在那些悲伤肃穆的维吾尔族人的脸上找到我们思想的

反动。他指着那张画问道：‘为什么把维族兄弟画得这样悲伤？’我回答说：‘他们在悼念周总理！’他又说：‘那么，为什么要画黄昏日落？这显然是在恶毒地攻击！我决不允许你们画这些反动的画，决不允许！’说着，咔嚓一声就把画稿撕成两半，接着还要撕下去。这时，一直蹲在地上的冷杉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股神奇的勇气，像一个殉道者站在舍身崖上，尽管眼前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猛扑过去，企图将那张浇灌了他全部心血的画稿抢夺回来。他的这种反常行动，给那个醉汉增加了更多的胆量，肆虐出更多的暴力来。他狠狠地一拳砸在冷杉的脸上，那副干瘦得像根灯芯草的身子便咕咚一声摔倒在对面的墙壁上，随后，是更为凄惨的，更为狂暴的惩罚。他胸口里燃烧着六十五度的液体，从而给他增添了双倍的力量。他在猛烈挥舞的拳击中，享受到了肢体运动的快感，享受到了酒后施威的刺激。

“啊，亲爱的朋友，我应该结束我的悲惨故事了。因为我的好友，像我一样命运、一样衰枯的冷杉，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他开始吐血，气若游丝，惨白的脸上除了清醒的时候有意地做出一丝苦笑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多数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总是布满着凄惨痛楚的阴云。我在愤懑之中燃烧着，什么也不再顾忌，接连地向站里和上级有关部门做了严肃的控告。由于我舍得了一身刚，那个副站长也就无法呆下去了，调离开监管站。至于他以后是不是还在别的地方这样耍酒疯，我就无法知道了。但是我的好友冷杉，不论怎么治疗，却总不见有明显的好转。

“我的心几乎碎了。除了守在他的身边精心地护理之外，余下的事，便是在他昏迷过去时候陪他流着伤心的眼泪；在

他醒过来的时候，故意振作起精神，为他讲述一些我心灵中还能想象得出的美好的东西。他望着我变得枯瘦的脸说：‘你不必为我操心了，我的苦难一生早该结束了！’我拉住他的手说：‘不，冷杉，你应当尽量地往好处想，想些美好的东西，坚强地活下去。不要因为我们身世苦辛，处境艰难，就想不到美好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的心灵是富有的，他便可从世界上取得许多美好的东西。那清晨的露珠、月光下的小河，不是因为你看到它的美，它才对你微笑吗！俄国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的生活充满着美和伟大事物到什么程度，全以他自己为转移。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奇的人看来，才是空洞的和平淡无味的！’你还记得，我们在那饥饿啃噬人心的时候，不是也生活得很不错吗？不是也充满着许多美好的理想和向往吗？这个酒鬼虽然把我们的美好的梦给打碎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重新把它补起来！你自己也知道，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再把它补起来。为什么不呢？凡是人们心中美好的东西，总是打不碎的！’

‘啊，冷杉，你看看，我这不是已把撕碎的画稿又补起来了吗？而且，又复制了一幅新的草稿。应当相信，一个人只要他的心灵是富有的，总会聚起摧折不尽的勇气。让我们再在一起完成这幅杰作，把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理想、热情和希望，都用线条和明暗把它体现出来。我相信你会站起来的，一定会，一定能够更坚强地握住画笔，即使是一根燃焦的筷子，甚至更为简陋的原始工具，也都束缚不住你那倜傥不羁的才思！你还记得我们经常背诵的那句话吗？对，是他，是那位罗丹大师说的，他说：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去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

“我不记得，我用这种精神疗法为他治疗了多长时间，好像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渐渐，他那衰弱到了极点的腔体里又有了畅流的血液和复苏的勇气。他甚至还伸手接过燃焦的筷子，抖抖嗦嗦地伸到画稿面前，费尽了全身力气，试着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绘出一个起伏很大的幻觉和过份清晰的意向，但是已经不听使唤的手，终于没有帮助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有一天，十分例外的是，站长竟带进来一个人前来探望我，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喀什姆。这半年多来，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也为风雨吹皱出几条皱纹来。他怎么能够进来呢，而且还有站长陪着？我当然相信他的本事，他的神通，手中的方向盘就是无坚不摧的武器。我们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拥抱起来，心里头都装满了倾述不尽的激动和感慨。我向他介绍了冷杉，至于撕画和挨打的事，不用我说他已经在外面听说过了。他带来了一大包莫合烟，还有一大堆吃的东西。他把手放到冷杉的额头上，俯下身去久久地望着他的眼睛，他们通过各自的眼色已经寻觅到了，而且互相馈赠出去。那是言语表达不出的友谊、信念和勇气。

“喀什姆愉快地讲述了他这半年来的经历。他不仅巧妙地躲开了前次的搜捕和追查，而且，在风一程雨一程的路上，又认识了许多敢于面对现实的朋友。大多数的人，心都想到一块了。他站起身来向屋外看了看，然后转过来悄声地说：‘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四个害人精给抓起来了！这虽然是个小道消息，眼下还没有为大道所证实，但是人们既然都愿意这么说，这么想，我想，它终有一天会变成真的，而且一定会变成真的！’不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冷杉也是这

么认为的。入心，就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它能开拓历史，为历史开拓前进的路。我们都兴奋得周身火热，面颊发烧，连衬衫渗白的脸上也闪耀出焕发的容光。我说：‘如果能喝点什么有多好！可惜，我们暂时还是在这里面！’‘不，我已经随身带来了！’喀什姆又狡黠地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个扁扁的酒瓶。”

十三

学校，可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前几天，这里还是一片空旷、沉寂和冷落，近乎于一个无声的世界，而一过了九月一日那个法定的日子，就像魔术师把蒙住的毯子掀开，唰地一下就从地心里冒出来无尽的欢快、笑语、歌声和绚烂多姿的青春色彩。人群，欢快地流动着，随机地划分和有意识的聚合在反复交错地进行着，构成了谁也说不清的既生动活泼又和谐明快的思想流动脉络图。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返回到学校里来，一段时间的分开与重合，使大家心里边都增添了不少兴奋、激动和亲切的感情，有更多的兴味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自的所见和所闻，各自的感慨和感受。轻松地谈论着严肃的问题，严肃地谈论着轻松的问题。他们曾经渗透到社会的各条毛细血管里，因而带回来了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信息。如果有人要了解社会当前的动向，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熟悉一下开学后第一周的大学生宿舍了，而且，这里边还充溢着年轻人所特有的机智和情趣。

307 寝室更是典型。且不说里面的七个人来自七个光线不同的角落，而且七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敏感区域。没事的时候我常爱走到他们那里去，听听他们从同一的角度来理解不同的事物和对同一事物叙述各自不同的理解。当然，我也喜

欢在那不同的色彩中涂抹上自己的颜色。我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一片混乱的争论中来明确自我意识。

“到2000年，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一万个人有一万种预测。”文克生的海论最使我感到趣味，这个体系博士常愿在错综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去生搬硬套地归纳出个什么体系来。他虽然酷爱德国人的思维方法，但却缺乏德国人的思辨能力。因此，他归纳出来的体系常常是挂一漏万，矛盾百出，让人啼笑皆非，你不论是想赞成或者反对都会感到在感情上受到委屈，在理智上无法找到理由和根据。他很得意地接着说：“但是，我可以把这些不同的预测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乐观的，一类是悲观的。当然，乐观的有各种不同的乐观想法，悲观的有各种不同的悲观理由。”你看，这个家伙又在进行让人不敢轻易接受或者反驳的归纳与分类了。“在暑假期间，我们回乡的同学们，曾在本市科学宫里举行了一次《青年未来学家谈未来》的辩论会。顺便说一句，本人是这个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中的重要一员。各校的大学生们都参加了这个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摆出了上万条的理由和根据来。嘿嘿，青年人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呀，用银河亿次电子计算机也无法计算出它那辽阔的两极！

“我们这些青年未来学家，”老文接着又说，“还在一起为我们的家乡做了向2000年进军的远景规划。我们跑了许多路，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做了详细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你们知道，我们家乡西北高原现在是经济落后地区，但是按照一切事物都是波浪式向前推进的发展规律，我国经济繁荣的浪潮，会有一个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逐渐推进

的过程，就像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先有东海岸几个州的畸形发展，然后逐步向西海岸推进一样。现在，西海岸的经济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东海岸。我的预测是，20年后我国经济繁荣的浪潮会由东部推进到中部；再过15年，西部就将赶上或者是超过东部！”体系博士又提到了美国，我偷偷地看了看田滕的脸色，十分明显，在一片明朗之中飘浮过几片黯淡之云。

开学后，我发现又有几个同学出国留学去了，寝室里空出了好几张床位。

当然，也有不少从国外回来的——出国考察的，讲课的，留学的，干什么的都有。许多同学都兴致勃勃地围过去打听这打听那，关心那里一切使他们感兴趣的事。但是我发现，田滕却从来没有围过去，而且他床头上摆着的那几本《美国大学生生活》杂志也踪影不见了，很显然，他对那里早已失去了兴趣。是那颗远方的星已经熄灭了呢，还是他另外发现了一颗新星？

有一天下了晚自习，老文在走廊里见到了我，说：“今天晚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画家老师在美国举行的画展很成功，现已回国了。你看，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道去看看他？”我点了点头。马上又联想到田滕，到时候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去，虽然他最近的功课更忙了，正着手收集资料准备写毕业论文，听说选的题目，正是建筑工程的可行性分析。

太阳，从一天破碎的云层中钻出来，远近是一片浮动着的金色的雾。看着在阳光下闪光的物体依然有些让人耀眼眩目，空气也还是热烘烘的，但已经不是那么粘乎乎的了。风儿的来去，变得像水一样的流畅了，当它扑落到树上时，树便像触了电似的浑身摇动，发出沙拉沙拉像金属般的声音。

路边长满了萋青的野草，茎叶挺拔，都扎扎实实地走向自己的成熟期，并在努力地寻找生命的遗传锁链。星期天歇过午晌之后，我便和老文、田滕一道往西郊去拜访画家老师。可是房门久叩不开，到邻居那里一打听，才知道他已被蕙川饭店请去绘制壁画去了。我们又转车去到蕙川，很幸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找见了。他刚巧与饭店经理谈妥了壁画的基本构思，不日，就将正式动手作画了。

“噢，年轻的朋友，感谢你们又来看我，让我感到十分的高兴！”我们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画家老师心境明朗地说，“虽然我们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两代人，岁月的风尘在我们记忆的底版上蒙上不同的影子，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对于生活、价值、理念等等问题的理解上，还有不少可以接通的线路，因此你们才有兴趣远道而来，多次听我讲那些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陈词滥调和让人心烦的喋喋不休。我的悲惨的命运故事好像是已经说完了，你们还想要听我说些什么呢？况且，我早已对你们说过，我是个很不善于讲故事的人，否则，我早把我那份履历表编成剧本，搬到银幕或舞台上去了！”

“怎么，你们希望我讲讲这次美国之行？朋友们，这虽然只是昨天的事情，可惜我这次出国的时间太短，到的地方又太少，实在讲不出什么来！至于画展，报上已经都谈了，情况大体就是那样。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大才华、又不走运的画家，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倾听一下他们的意见，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至于在万万千千的人群中，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不好，那也是寻常的事。没有什么可以夸耀或者是懊丧的。我也没有兴趣再去谈论这个

题目了！不过你们一定要我讲，我就讲讲我这个初次走出国门的人在这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听得到的印象吧！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到了许多的人，许多的事，也悟出了许多的道理。至于那个既让人着迷又让人痛恨的社会，我还没法准确地给予评说，因为它是那样的庞大繁杂，那样的多层次、多角度、多变化，而我有的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一走进这个超豪华的国度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性格，它的极不协调的性格。我是个搞美术的，喜欢用线条、明暗、色彩和图形来观察和理喻一切事物。而在美国，这些线条、明暗和色彩在我视觉网膜上所留下的印象是极其紊乱的，极不和谐的。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波士顿，一眼就望到了一排排让人感到迷惘的摩天大楼，但是就在它的身边又看到了不少让人感到憋闷压抑的又脏又乱的低矮房屋；有的马路很宽阔，而有的人行道又很狭窄；有的造形是那样的圣洁（你们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而有的造形又是那样猥琐污秽；有那么多幽雅、清静、几乎是把天上伊甸园搬到尘世上来的新式别墅，而又有混乱污浊，荒冷破败的黑人区。即使是在被誉为美国明珠的曼哈顿岛上，我也同样看到了一片典雅与粗俗、富丽和贫陋、骄宠和冷落、高傲和卑怯的错乱与混杂。总之我感觉到，在这里集聚了多少财富，就集聚了多少差异；创造了多么高的效率，就创造了多么高的颠狂！

“我住在美国朋友詹姆斯·菲希丁先生的家里，他是艺术中心的成员。基金会指派他来出面，与我具体联系筹备画展之事。菲希丁先生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虽然已经是两鬓斑秃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精神还很旺盛，说话声音宏亮

有力，发出金属振动的声音。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儿。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她有母亲那副端庄秀丽的面庞，又有一双像她父亲那样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但比父亲的眼睛显得更为空灵、秀气，笑的时候，两只眼睛里就会荡出诗一般的美意来。她的脸圆圆的，像一轮满月。身材也是圆鼓鼓的，胖乎乎的，穿一件镶着花边的多褶连衣裙，两只平整的小脚放在棕色高腰皮鞋里，鞋上边露出二指来高的白色丝绒短袜，活脱脱的像是一个精制的洋娃娃。他们全家都极好客，把我安置在他家最宽敞的一间客厅里，而他们自己只好使用那间较小的客厅和起居室了。这个家庭的陈设都极为典雅、和谐、舒畅，我们所经常谈论的现代化家用设备一概俱全，它使我具体地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富，看到了美国效率所创造的物质文明。

“在我来到大波士顿的第二天，冷杉便驾驶他那辆豪华的、有足够气派的银灰色小轿车赶来看我。认真地说，我这次能够在这里举行画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是他向艺术中心的某些权威人士大力推荐才促成这件事的。对了，我还得向你们简单地补叙一段历史，因为，我从你们疑惑的眼光中就已经看出我的纰漏。你们一定要问：这个冷杉不是在新疆库车吗？原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改正，都返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里去。他在艺术上是有才华的，多年来的坎坷生活和别人所无法经历的感受，为他的创作蕴聚了雄厚的根基。现在闸门一旦打开，他便脱颖而出，很快就在画坛上崭露头角。有人欣赏他的画，有人欣赏他敏捷的辩才，也有人欣赏他敢于破门而出的大胆泼辣风格。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批评与指责，讽刺与非难。但这正是

我国当前文艺界中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有人指责的作品，越是被社会上一种不可捉摸的心理把它捧推起来，把它置之于那些端端正正、顺顺当当的作品之上。冷杉就是这样，他一度成为了人人都喜欢谈论的幸运儿。后来，因为一个远房亲戚在财产分配的临终遗嘱上，一长串的名单上有他的一个名字，他便申请来到美国。如今，他到这里已经有三年多了，他在物质生活方面确实有许多让人羡慕的地方。

“太阳已经倾落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后边，斜射过来的古铜色光线仍让查尔斯河水拍击出亮晶晶的波浪。沿河马路上印着一条条长长的树影，汽车的轮子就从那些树影上飞驰而过。我摇开车窗，面对着查尔斯河，观赏着水面上缓缓移动的帆影和款款飞翔的雪白的水鸟。‘秀色可餐呀！’我禁不住赞美地说。冷杉微笑地回过头来，用谲秘的眼光望了望我，随手又把录放机打开，于是，在越来越苍暗的黄昏里荡漾起醉人的旋律来。

“我们在一家通体闪光的酒家门面停了下来，他领我走进一间光线柔和，陈设华丽的餐厅里。里边人影幢幢，觥筹交错，有馥郁的花香、酒香和脂粉香在空气中暗暗地浮动。我们在一张铺着雪白的剔花台布的餐桌前坐下来。‘你想喝点什么？’冷杉说过，又指着桌上的菜谱说，‘你喜欢什么菜，尽管点来！’我仔细地望着冷杉的脸，想从那张熟悉的面孔上找到一些未曾见过的东西。遗憾的是，费了半天功夫什么也没找到。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在苍白的略带几分忧伤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挑剔的眼睛，惯于笑谑诙谐的薄薄的嘴唇微微地向上翘起，鼻翼敏感地翕动着，像是在有意地嗅着身边的气味，整个就是一个悲天悯人而又自怨自怜的浮

士德形象。不论什么时候，眼睛里都未曾泯灭过他那机灵的敏感的洋溢着几分才气的光芒。

“‘我们干一杯吧，祝贺我们的重逢，祝贺我们在生命之旅中这次很不寻常的重逢！’他把一杯白兰地擎到我的眼前，用手不断地转动着杯脚，眼睛盯着那里边藏有精灵的液体：‘我们曾经多次在意想不到的境况下重逢过，今天，可以说又是一次意想不到，但却完全是另一种境遇了！’我举起杯子，同他清脆地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冷杉的情绪特别好，不断地拍手唤招待女郎过来，敦促我再选几道可口的菜：‘老史，我们是酒逢知己，酒逢知己呀！而且，又是在他乡！’然而，我迟滞地端着酒杯，抬眼望着坐在我对面的知己，却总有些陌生的感觉。‘冷杉，你现在每天都做些什么呢？’我问。

“‘怎么说呢？也忙着，也闲着！’冷杉点起一只雪茄，仰靠在椅子背上，耸耸肩头拉长着声调说，‘我在两个体面的家庭里作家庭教师。’‘那么，你不画画了？’我吃惊地放下了杯子。‘不，不，怎么能丢下艺术呢？那是我的生命组成部分！’我轻松下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接着又说，‘可是，只靠画画是没有多少收入的。你也知道，这里的房租、家具、劳务等方面的开支，还有交际方面的支出，都是高得没法再高了。而我的画，虽然也有一些人欣赏，但总的来说并不怎么理想。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我想它是暂时的！只要不懈地努力，我是能够夺得我想要夺得的东西。而这个地方，能够给予热心追求的人以一切方面的自由。美国，是热心追逐个人名利的大竞技场，它是由追求个人名利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剩下的问题，只是每个追求的心是不是

那么执著、迷恋，每个追求的人有没有充分的欲望和才能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节俭一下开支，集中力量去从事艺术创作呢？我记得你曾和我说过。你的所谓艺术追求，就是精神和思维对于物质生活困扰的挣扎与摆脱。”我望着他的脸说。“看你说的！看你说的！”冷杉露出轻浮的笑说，“在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怎么能够摆脱对于物质的追求呢？而且，我如不想埋没的话，就得要交往，与各种类型的人经常地交际往来。如果没有可靠的固定收入，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

“不过，你要忙着到两个家庭里去教课，又忙着与各种人物去应酬，能够剩下来搞创作的时间，恐怕就不多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的，但肯定他不会有神力把24小时变为48小时。“这个，这个，当然这也是个问题！”他的脸上终于也现出几分无可奈何的神情，“不过，这也不是个问题！艺术上的成就，不在量上，而在质上，说得更实质性一点，是在机遇上。遇到了一个好的机会，一举就可以成名；不遇机会，十幅，百幅，也默默无闻，闯不出一条路子来。这，你可能比我体会得更为深刻！”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我知道，他这一眼望的是什麼，是什麼样的含义。那是对我的辛勤笔耕和超负荷的运转进行挑战，讥笑天道并不总是酬勤的，特别是画画儿这玩艺儿，法国作家梅里美的笔下就写过多少一辈子都不走运的倒霉画家。我不免也苦笑了一下。

“我的画展在菲希丁先生的协助下，很快就在一间宽阔的大厅里展出了。这中间，冷杉也跟着跑前跑后出了不少的

力。我得承认，他在人际交往方面确有不容忽视的天才，这是我早已发现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展出的头一天，菲希丁太太带着她的那个可爱的女儿，一大早就热心地跑去参观了。中午她回来时对我说：‘你的画真迷人，我和小姐一下子就被征服了！那些淳朴和善的面孔和恬静坦率的微笑，就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一下子就打开了人们之间相互认识之门。从你那不太渲染的色彩和轮廓里，对于画上的人，我好像已经能够亲热地呼出他们的名字来，能够听见他们的歌声和笑声，虽然我除了这个城市哪儿也没去过，更不要说你所画的那个遥远的地方了。我自己感到，好像在你所画的那棵向日葵上，就拴着我许多童年的记忆；在那堆满着瓜果葡萄的集市上，就堆积着我许多温暖的感情。当我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讲给我的女儿时，小姐说她也是这么想的。艺术，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够把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送给人们！史先生，我感谢你，真心地感谢你！’晚上菲希丁先生回来，也兴奋地告诉我一些喜讯，说许多人对于我的画展表现了浓郁的兴趣，其中也包括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声望地位的人。菲希丁先生说他自己也对其中一两幅画产生强烈的感受，用粗俗一点话来说，甚至产生了爱情。

“没过几天，冷杉也兴致冲冲地跑来，手里还拿着几张报纸。一进门就搂住我的肩膀说：‘老兄，祝贺你！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你看，有好几家报纸评论了你的画展，而且一般来说，用的都是暖色的词句！’我接过报纸，把它摊在桌子上阅读着。快到傍晚时分，冷杉拍着我的肩头，用神秘的眼光望着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点奇遇？’我对他这样故弄玄虚有些不太满意，但为了不使他太扫兴，便无可无

不可地拿起帽子，随他向外走去，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奇遇？’冷杉笑了笑，耸耸肩头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冷杉的小汽车在查尔斯河畔马路上像一缕清风，轻快爽利地奔驰过去。从车窗往前看，前面是一排红色尾灯所组成的光流，逶迤飘逸，使整个街道虚虚实实、闪闪烁烁，产生出像江南丝绸那样光亮而又柔和的质感，而那迎面扑来的摩天高楼又以它们那狰狞怒突、桀骜不驯的轮廓，让人喘嘘不宁。冷杉把车从市中心里绕出，到了临近昆西市场那一带。‘今天，我们到小餐馆里去吃顿便饭！’冷杉说过，嘎地一下把车停在一家挂有‘湖南风味’招牌的中国餐馆前面。

“‘想不到在这里也能尝到湖南风味吧！’冷杉指着烧得像紫晶一般光亮的虎皮肉和像羊脂一般细嫩的芙蓉鸡说。‘只是味道还不太地道！’我尝过几口之后说。‘我倒没有仔细地去考究这些！左右湖南、湖北、四川都离不开辣子！这里的中国餐馆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以湖南风味来标榜自己，好像北京、上海、广东的味道倒不如湖南似的，真有意思！反正能够有顾客上门，卖得出去，别的谁还管那么许多呢！不过，我倒有兴趣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注意到刚才给我们端盘子的那个姑娘了吗？’‘哪个？’我不知道冷杉为什么要把话题转到这上面来。‘就是我向她打招呼的那一个。’冷杉说过，恰巧那姑娘又在远处闪过一个背影，‘你瞧，就是那个！’我回头看了看，记起了她的模样，是个很俏整的中国姑娘：纤细的高挑身材，削肩膀，浑圆的颈子，修长的手臂，有一副很可爱的有点像男孩子似的脸庞，描得细细弯弯的眉毛在看人的时候，总是向上抬起，配上嘴角边浮动的微笑，给人

一种介乎于傲慢与天真、爽直与矜持之间的感觉。她的动作干净利索，英语也说得蛮不错。‘你想象不到吧，她，就是老胡的女儿！’冷杉告诉我说。

“噢，不会吧？我听说他的女儿还在某个大学里读书，而且，还和国内的一个大学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感到有些吃惊，无法相信冷杉的话，他富于幻想的头脑一定是又在做幻想的联系，‘你一定是认错了人！’笑话，我会认错了人？画家的眼睛不就是观察人的吗！你呀，你对美国的情况一点也不理解，脑子里装的还是一张中国的物价表，根本无法理解这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成功，力求摆脱依赖，力求摆脱社会、家庭、亲友为他带来的规定性。他们对于家庭、亲友所给予的东西，总感到不太舒服，使用时心里产生一种负担，一种抗体，甚至产生内疚。他们热烈追求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创造出能够满足他们生理上的心理上所需要的一切，甚至虚荣方面所需要的一切。’

“你是说，她已经放弃了她父亲为她创设的一切条件，她要自食其力地求得学问，求得文凭？”说过，我又回头在人丛中去寻找那个姑娘，但在来往如梭的人流里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记得前次我已经对你说过，美国是个由狂热地追求个人名利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关键是人人都要追求，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甚至可以说去冒险，去赌博，去疯狂地抓住一切有利于他们的机会。为什么这里的竞争是这样的激烈呢？为什么这里是人们都在诅咒的人吃人的世界呢！为什么这里是人人都只顾自己，只有上帝才顾大家的社会呢？”

因为有人成功，必然会有人失败；有人发财，必然有人破产。这里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把自己摆到一个非输即赢、非胜即负的狭径上。他们的哲学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进取的体系，成功的体系，致富的体系。这个姑娘，我知道她是相信这个哲学体系的。她在谋取自立，而且听说在这里已经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是个华裔。那个男孩子很快也要自己开设一家餐馆，到时候你来看，他们挂起来的招牌还是要写上地道湖南风味的，虽然我知道，老胡的祖籍不是湖南，那个男孩子的祖籍也不是湖南！’‘那么，老胡女儿她……’我更感到震惊，这观念上的剧烈变化确实叫我感到头晕目眩，无法判断也无法理解。

“‘是的，是的，我想她是不会再回国了！这个姑娘是一个聪明人，从她长的样子我就看出，像她的爸爸似的颇有那么一点才气，她肯定能够在这竞争的大赌场里，赢得到她所要追求的东西！’‘咳！’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史！我们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同寻常了吧？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一道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因此我想进一言，不知道你能否听得进去？你这次画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有不少的人喜欢你的画。在这里，你是完全可以扎下根的。用你的才华和勤奋去同他们竞争一番，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在画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一席相当可观之地！’冷杉差不多把脸要凑过来说。

“我像吞进了一个苍蝇，一种强烈的反胃之感强劲地冲上喉咙，扩散到全身，举着筷子的手禁不住簌簌地抖动起来。我再一次抬起头来望了望坐在对面的昔日难友，突然感

觉到他完全改变了模样。那双过份挑剔的眼睛好像有些乜斜，那张饶有风趣的薄薄的嘴也翘得太不自然，扭曲得十分丑陋，而那不断翕动鼻翼的鼻子，让人联想到狡黠的猫。他的腮边还挂着微笑，但那笑却让我感到谄媚、刁钻、轻浮。我记起了他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许多话，那些话那样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就像是昨天说的似的。他曾经多少次含着泪水倾述着他对祖国、故乡的热恋和一片无私无畏的痴情，那时候他的内心里是充满着热恋的火焰和一片美好的谐音。可是今天，我真不敢相信，那些刻在心灵上面的诗和画，都被他给涂抹掉了！冷杉呀，冷杉，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你的痴情呢？你的海阔天宽的痴情呢？都到哪里去了！

“还没等我把话问出口，他又过份轻薄地说道：‘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对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而且越早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赢得生命，赢得时间，才能感到你的今天胜过了昨天，明天更胜过今天，你一定会有钱，有名声，有爬上去的机会。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也不要紧，在这样一个大赌场里，心里边总能够揣上一种希望的，今天没有遇到，明天也许就会遇到，明天没有遇到的，后天肯定会遇到。这样，你的心里就会觉得踏实，灵魂便会得到安慰。老史，到这里来追求吧！来拼搏吧！来与命运之神及艺术之神进行挑战吧！’

“住嘴吧，冷杉！我的艺术追求不在这里，这你是知道的！简单来说，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的。至于我们长期患难与共的生活，更会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的感情，我的信仰，我的理念，最坚实的支撑点都在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我们想要得到的，当然也不会去依赖外

人，我们就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去创造，去追求，去争取。今天还没有争得到的，我们就争取于明天；明天没有争得到，我们就争取于后天。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干，不是去赌博，去拼侥幸！这当然要比你那寄望于侥幸的赌博会更心安理得，更符合于我们的初衷……’

“由于过份的激动，那天我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总之，我的心是淹渍在侮辱、苦涩和痛恨的泥水里。在回去的路上，他还在车上向我喋喋不休说着什么，我只感到一阵嗡嗡的耳鸣，什么也没听进去。我一直在想，不应就这样尴尬地与他分开，应当再在一起说些什么，像过去一样，再推心置腹地告诫他一些什么，争辩一些什么。可是，由于我感情上产生一种特殊的抑制性，我终于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就分手了！”

“啊，年轻的朋友，我后来的活动和整个画展的情况，你们从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十分感谢菲希丁先生，还有他那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女儿，感谢给予我此行许多帮助的美国朋友。冷杉呢，我当然也不会忘记他的，虽然他向我说了那些亵渎的话，但我想，也许明天或者后天他就可能不这么说了，不这么想了，又像从前那样和我想到一块去了，这也完全是可能的。在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有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性格，我甚至马上就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应当再一次地感谢你们大家。在你们这样的青春年华里，会放弃那么多的大好时光，大老远地跑来听我絮絮叨叨，听我那些与你们今天的绚烂多姿的生活挂不上一点边的话。你们都会有好运气的，肯定的，都会有的，上帝是特别

偏袒年轻的人的！预祝你们取得成功，不论是在哪一个方面！生活的黄金大门，一定会对你们启开的，努力地去争取吧！